欧洲文学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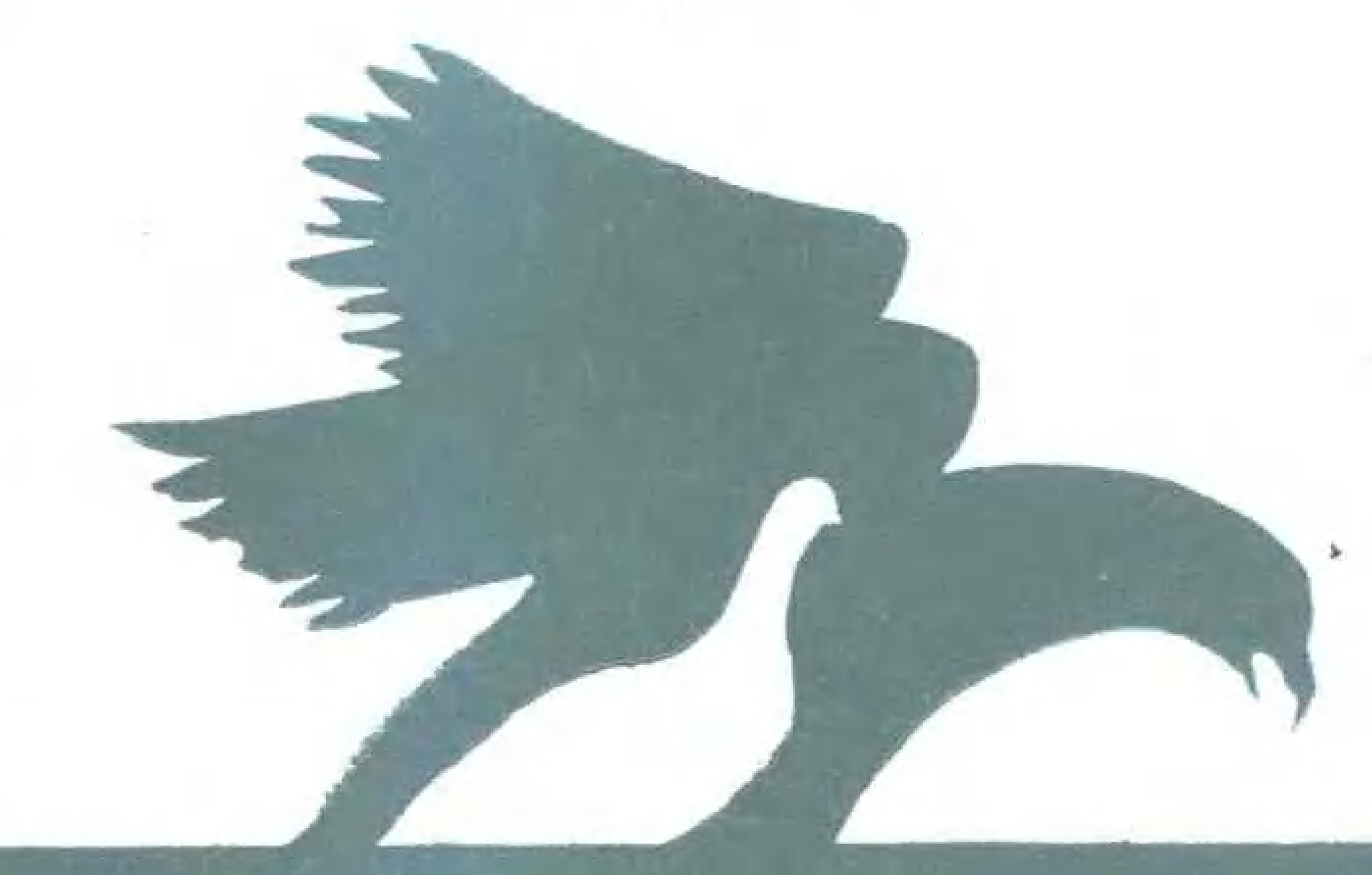
〔美〕罗德·W·霍尔顿　文森特·F·霍普尔 著

王光林 译　　重庆出版社









欧洲文学的背景

〔美〕罗德·W·霍尔顿
文森特·F·霍普尔 著
王光林 译 张子清 校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010号

Backgrounds of European Literature
Second Edition by Rod W. Horton Vincent F. Hopper
Prentice-Hall, ZNC,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根据美国Prentice-Hall INC 1975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陈世勇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刘黎东

（美）罗德·W·霍尔顿　文森特·F·霍普尔著
王光林 译　张子清 校
欧洲文学的背景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875插页 4 字数292千
1991年9月第一版　1991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

*

ISBN 7-5366-1582-5/I·294

定价：5.10元

前　言

这本书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从古到今西方的主要历史和文化事件。它追溯了欧洲文明的主流：从古典的世俗文化和希伯来宗教思想，经过和中世纪哥特成就的融合，再到现代欧洲各国文化错综复杂的融合。

本书适用于大学水平的学生．使用方法如下：

1．为从欧洲文学中看西方文明的起源和主要运动的课程提供背景知识；

2．为名著选读课提供综合，意图和方向。

3．可以作西方文学或欧洲文化模式概论课的补充材料。

为了使本书成为一本有用的课堂参考书，作者们在每个主题讨论之后都列了一些供进一步研读的参阅书目，为了复习方便，每一部分的结尾还附有一个重大事件编年史。

在这第二版里，作者们又加进了许多新的材料，叙述了从公元前1500年到现在的主要事件。文艺复兴一章又得以扩充，扼要地叙述了改革与反改革和西班牙的黄金时代。此外又增加了两章全新的材料，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参阅书目全是最新的。

这本书来自作者们的欧洲文学课程教学经验。他们觉得研读文学名著本身并不能给学生带来多大收获，除非学生事先了解这些名著诞生的文化背景。比如，如果你想聪明地阅读古代希腊悲剧，那么你至少要了解伯里克理斯时代的雅典和希腊的戏剧形式与舞台条件，通常还要知道一些古代希腊宗教和神话。同样，复

习一下早期希腊哲学之后，你就会觉得柏拉图更富有意味。对于一门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主题上都相隔甚远的名著选读课来说，教师可以先从古代希腊和罗马入手，然后再转向《旧约》和《新约》里的段落和篇目，最后再观察一下古典主义和希伯来主义在后期西方文学中的融合，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明智地安排一个前后连贯的古今文选读。

在选择本书的讨论材料和决定这种讨论的范围时，作者们考虑到了课堂教学中所明显反映出来的学生需要。虽然这本手册不是一本详尽的西方文化史，但它对那些促使现代人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复杂动物的主要文化影响却具有启发作用。

作者们要感谢特斯·库什尔夫人在第一版手稿的准备中所给予的帮助，感谢纽约大学赫伯特·W·爱德华滋教授对某些章节所给予的批评性建议。要特别感谢阿尔伯特·C·鲍教授在准备和完成本书中所给予的许多有益帮助和亲切指导。关于第二版，作者们要再次感谢爱德华滋教授和科罗拉多女子学院的哈罗德·A·肖费尔教授对新增补的材料的校阅。我们的妻子们在手稿的准备中也是不可缺少的。

R·W·H

V·F·H

目　　录

第一部分　古典主义

第二部分　希伯来主义

第三部分　中世纪的融合

第四部分　现代精神

绪论　我们的文化遗产

生活在二十世纪的我们往往为我们的个人主义精神而感到沾沾自喜。殊不知，尽管我们想独立自主，但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却是过去的风俗、社会及文化传统的产物。也就是说，我们诞生于昨天，而世界并不如此。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所学到的仅仅是从过去，甚至是遥远的过去的发明中所筛选出来的。我们的先人为我们创造了极其珍贵的思想和社会风尚。甚至连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习惯以及思维方式都脱离不了多少世纪以来的文化发展。

我们生于此间的这个文化极其复杂，它代表了许多先前文明和成就的大融合。在这些文明中，古典主义，希伯来主义以及哥特文化对形成当今西方世界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然。还有许多来源于其它地方的重要的个别贡献（如阿拉伯数学），但是欧洲文明主流却是古代的古典主义和希伯来文化，再加上后来的哥特人入侵。

发源于希腊，后来在古罗马又得到继续发展的古典主义对我们通常所称作的世俗的生活作出了主要贡献。我们的办学制度，我们的公民机构，我们的科学以及我们的文学艺术都可以追溯到古典主义的灵感。古典主义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领袖们一直在探求人生现实，辨别是非。他们贪婪地探索着自然世界，从中找到了自己；他们不停地推测，从而产生了从古到今最为伟大的哲学家。事实上，古典世界的学术气氛大力支持个人思维，所以任何现代思想它都可以在古典世界里找到其来源。他们希望创造一个健全而有秩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人类的成就得到鼓励，与此同时他们还强调

生活中的和谐和对称，艺术表现也是如此。由于不相信难以控制的感情冲动，他们想创建一个广泛的理性主义和平衡的行为准则来陶冶人的大脑，身体和精神。将人上升到一个理性动物是古代古典主义的最高成就。

大约与此同时，在一小块叫做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存在着另外一种欲望：人们将宇宙理解成一个连贯而又有目的的整体。这种欲望导致了对神的崇拜，产生了西方人最为熟悉，具有丰富表达能力的宗教情感。这儿的人生观与众不同，他们将人颂扬成慈父的孩子，这位慈父创造了宇宙及其他宠爱的人类。要学会如何服侍上帝，要辨明是与非，要在造物主面前保持卑谦——这些就是希伯来的宗教领袖们对追随者所鼓吹的理想。这些布道中含有不少理性的成分，但是希伯来主义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 颂 扬心 灵 纯洁，而 不 是 智 力高尚。我们的七天一个星期，第七天作为休息日就来自希伯来主义。西方世界中大多数杰出的艺术成就以及英国和其它欧洲各国的诗人所使用的语言和意象都深深蒙惠于希伯来文学的灵感。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人们留心一下像卢梭这样有影响的现代思想家的理论以及随之而来的崇拜和那些偏重情感而胜过理性的哲学流派，人们就会意识到如果没有希伯来思想意识，那么许多“现代”思想是否能形成还是个疑问。

公元1世纪前，这一对互为独立的文化观念开始注意到了对方。公元1世纪、源于希伯来文化的基督教开始向古 典 世 界 渗透，并采用了古典传统，包括大量的柏拉图神学，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时，这两种文化的融合也就大体完成了，尽管由此产生的许多冲突使得一些有识之士甚为烦恼，甚至还导致了许多激烈争论。这种冲突从未得到圆满解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那连绵不断的科学与宗教争吵以及当代许多棘手的个别宗教怀疑和猜测中看出。但是我们每个城市都有些城市建筑和学校，这些足以象征我们那不可湮灭的古典传统，正像地方教堂证明了希伯来

人生观的持续一样。美国25分硬币上印着“自由”，一个古典式理想，在硬币的同一面还印着希伯来的“我们信仰的是上帝”。

哥特人的入侵带来了西方文明中的短暂挫折，即众所周知的黑暗时代。最明显的直接影响莫过于破坏和诋毁欧洲犹太——古典这一文化复合体。但是随着中世纪复兴的到来，新的思想和观念开始出现，从而证明哥特人的入侵对西方文明也做出了一点贡献。在这些贡献中，最主要的是那不停的活动，或者说好动性，但是那种个人自由观，那种对荒诞神奇的神往，对女人的神秘态度以及个人必须忠于首领的观念对形成中世纪以及随后的欧洲生活模式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伊斯兰教征服西班牙后重又将古典学问引进了欧洲，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随后的文艺复兴，这时古典主义似乎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宗教改革可以解释为希伯来宗教情感的复活。古典模式激起了新古典时代以及随后的启蒙运动的到来，但是浪漫运动以及19世纪德国的许多哲学家的理论却强调以直觉的方法去掌握知识，而希伯来主义正是基于此。同时，从中世纪开始，欧洲人的体育与智力活动明显地流露出对哥特风尚的渴求。

要对当代文明的每一个方向都进行分析，指出其所受这三种文化模式中的一种或更多种的影响也没什么特殊必要。不过，认清这三种力量的早期和更纯正时期以及辨明这三种力量是如何融合起来的却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在以后的章节里，我们将对此进行解释，开始先仔细分析一下这三种文化，然后再简略地叙述一下随后的文化运动和流派。作为一次对西方文化的漫游，这项准备工作还只是初步的，因此，如果我们运用亚里斯多德的术语将人的构成看作是心，大脑和意愿，观察一下现代人的心是如何受希伯来宗教情感的影响，其大脑又是如何受古典主义方法的熏陶以及不太确切地说，其活力是如何来源于或由哥特先驱所赋予的，那么我们将获益匪浅。

第一部分　古典主义

第一章　希腊主义：希腊精神

一、前希腊文化

大约在耶稣诞生前两千年，在没有记载的历史上，有一群目不识丁的游牧部落作出了一个司空见惯的决定，这个决定最终证明是世界历史上极为重要的。这群混杂部落的老家在多瑙河下游的草地上。多少年来，他们到处游荡，不断地寻找新的牧场。后来他们来到了爱琴海北岸的色雷斯，在这儿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是继续向西到亚得里亚海去呢，还是向南去开发爱琴海沿岸诱人的沃土？尽管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对这个普普通通的问题所作出的回答却大大地决定了未来的西方文明。

既然我们对这些早期游牧部落的了解主要取决于我们在诗歌和人类学上的推测，那么我们对他们所作出的选择也只有猜测而已。不过不管他们当时的想法如何，这个决定却是极其幸运的。通过向南转移，他们以及随后一千年里跟随他们而去的相同部落不知不觉地将他们的脚步迈向了悠久的地中海文明，在这里他们最终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伟大成就。当然，这离他们最初落脚已有好几百年了，后来中欧那些更加富有进取心的游牧部落来到了这里，他们融合了希腊半岛下游那伟大但却在衰败的迈锡尼文化。但是，通过吸收希腊半岛的文化，他们为西方历史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事实证明正是这次东方优雅，爱美以及印欧活力的融合才使希腊获得了如此光辉灿烂的成就，这些成就人类应该永远感恩不尽。

印欧世系和迈锡尼的姻合本身并不能解释后世希腊文化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当第一批游牧部落开始渗透到伯罗奔尼撒的时候，世界已经相当古老了。在这之前，这个世界已经编纂了一部社会和科学技术的优秀历史。例如，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那条长600英里的峡谷里，那连续不断的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以及亚述文明已经学会了书写、冶金、编织以及其它的一些手工艺术，而且这些技术已经相当先进，后世的人们只需对此稍作修改就可利用。此外，他们还取得了先进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他们的建筑优美，结构技术很高。碰巧的是，埃及也迸发出一股生动活泼的文化，其容量之大，耐力之强、技术之丰富，简直是世界一大奇迹。在农业、工业、科学、手工和文艺方面，埃及人所作出的贡献也是罕见的，甚至只有希腊人偶尔能超过它。到了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刚刚开始在地中海作为一个重要角色出现．而强大的波斯帝国那些穷兵黩武的暴君就已建立了先进的兵役制度，这种制度只有后来伟大的罗马时代才会有。希腊生活不断地从这些古老的文化中吸取大量营养。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甚至还吸取了过去的许多思想概念，在此基础上又加以发扬，从而形成了丰富多采的希腊精神。

希腊人留给人类的遗产何以那么与众不同？勿庸置疑，答案就在于希腊人具有注重个人地位和个人尊严这一崇高的概念。尽管前希腊文明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但是这些文明充满了专制和偏见。人的生活既丰富多采，又低级无聊，一大批目不识丁的民众实际上——或者说事实上——成了奴隶，他们屈服在一些特权贵族的严厉统治之下，这些贵族运气不错，成了一个全能的统治者

的门徒。不过，即使是这些贵族也没有真正的安全感。他们的特权，他们的财产以及他们的生命都是由国王恩赐的。因此，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国王心血来潮，所有这一切都会被褫夺。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这种独裁统治之下，诸如人的尊严之类的概念是不可能留存在巴比伦人、亚述人、波斯人、或者埃及人的脑海里的。诡辩派的论点，即人是万物之尺度，或希腊人的观点，即人对社会和众神之最伟大的使命就是发展他个人的聪明才智，在前希腊的人看来（他是否能理解这些概念还是个问题）不啻是渎圣、颠覆，或精神高度的错乱。

这种轻视个人才能的后果显而易见。尽管前希腊文化遗产非常丰富，但是这段早期时代却一直缺乏人文主义思想。他们的科学是应用的而不是纯理论的；他们的政治就是专制；他们的宗教和哲学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迷信；他们的文学几乎不存在。他们的文字大部分是象形文字，没有语言规则，这只能代表最基本和最标准的图片情形，而根本无法用作个人表达，或用来体现更为细微的意义。

但是至关重要的是，他们在心境上与世隔绝。对前希腊的人来说，保存秩序比不稳定的社交事务和智力试验更为重要。“埃及人的力量在于静坐。”希罗多德说，但是他的语调是讥讽的，因为他知道他所诊断的是一个正在衰败的文化，但另一方面，希腊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们认为秩序和进步是一同生存，并行不悖的。在他们看来，在一个既有理性、匀称、节制，又有相对自由的生活系统里，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的发展似乎都有可能。正是这种自我节制和社会职责框架里所出现的个人自由精神解释了希腊文化的明显现代性。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两百年不到的时间里，他们就能从政治和思想空白中发展成为一个开明的政体，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文学和思想宝库。在苏美尔人（约公元前3500年）发展的图解交流和印欧与迈锡尼文化在伯罗奔尼撒

的融合这两千多年里，只有一小部分零零碎碎的想象作品，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成就是无比辉煌的。

二、希 腊 精 神

一旦踏上这普遍化的危险海洋，我们就要将希腊主义中最引人注目的各种特征作一番归类，而这些特征就体现在浅显易懂的抽象观念里，这种抽象观念我们称之为“希腊精神”。要想对这些特征作一具体归类，我们就要设想出一位年轻而又聪明的希腊学者。在尚未成熟的性格中，他要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性格。

广义地说，他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回答将是：他的目标是areté，这个词希腊人一般用来指教育，但是将它译成卓越或许更为精确。首要的问题是，我们这位年轻的希腊学者希望尽其所能，出人头地，超越自己的同伴，甚至是自己的惰性。但是如果我们问他想超越哪一类的生活，他会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会觉得这问题提得不可思议。他会觉得舍弃其它，专门发挥一种能力将同卓越背道而驰，他会脱口而出：“哪一类，当然是各种类型喽。”他说这话时或许会大发雷霆，就像是对一个智力迟钝的小孩解释显而易见的事情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同他争辩，恐怕没人能够在各方面达到尽善尽美，甚至在很有限的范围内也不行。牺牲其它，专攻一个领域——一个专长——不是更好吗？如果他只满足于当个三脚猫，那么他怎么能同他的同伴竞争呢？

他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或许殷勤，但是口气却是不容争辩的。他会面带愧色地作出让步：至善至美是不可能的，甚至众神也达不到，但是他会坚持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其所能去力争最大程度的完美，这是他的职责，是对众神的细小模仿。至于发展专长（起先他连这个词的含义恐怕都没理解），你们这些绅士们是

不是指发展一些卓越的才能，就像公共场所里的魔术师、或杂技团里走钢丝的演员一样？你是不是指要一个人去鹦鹉学舌，只会吐几个词，而无其它作用？当然，你是在开玩笑，你是只见树木不见林。这些“特长”是野蛮人的，而不是希腊人的。一个人难道只有一只胳膊，一条腿，一个感觉器官？不，他有许多特征、许多感觉、许多潜力。他有责任去成比例地发展这些潜力，去维持身体和大脑的平衡与对称，否则就会铸成大错。

至于和同伴竞争，我们这位年轻的希腊人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因为自孩提时代起他就在体育馆和竞技场和他们展开过竞争。但是他会坚持认为这场竞争的目的主要不是要赢或将其邻人从种族中消除出去，相反，这是要测试一个人的成就，显示一个人的缺陷，激励他向更高层次发展。总而言之，他会暗示，你的aretê观有点天真。不错，外国人常常具有独特的单方教育思想，但这同希腊标准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回答虽使我们心烦意乱，但却击不垮我们。我们还想提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我们这位年轻的希腊人所受的教育项目主要有体育锻炼、军事科学、音乐、舞蹈、修辞、哲学和数学。这些课题的实用价值是什么？他们在成人生活中确实有用吗？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这位年轻朋友的回答同样是耐心的，但语气都是恼怒的。有用？实用？去做些无用或不切实际的事情还有什么意义吗？难道能够想象得出那毫无目的的办法吗？难道你不知道，希腊人所认为的最残酷的痛苦就是做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就好像做错了事的西绪福斯不得不在阴间地府里艰苦地将一块重石循环不息地向山上推去？当然，希腊研究有一个目的，这就是培养一个既美好而又有用的人。体育锻炼和军事科学保存人的健康，使他有毅力去保卫国家？舞蹈可以使人优美、举止文雅，这是维护一个人的尊严所必须的；修辞、哲学和音乐给他以口头训练，使他谈吐优雅、要言不烦，这是一个人要想成为公共讲坛

引人入胜的演讲者所必不可少的；而数学（还有音乐）则培养了他的比例观和匀称观，使他避免漫无目的地踏上前面所提及的“专业化”癖。

如果有人要他为这种教育的结果提供例子，他会举出索福克勒斯。索福克勒斯身材优美，体格匀称，而且还是个出色的将军、祭司、政治领袖、悲剧作家和生活热爱者。即使是到了九十岁的高龄，他还能创作出《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这样的戏剧杰作。或有柏拉图，他的体格更为健美，得过许多体育奖牌，写过音乐和戏剧诗（不错，他蔑视诗歌），建过学园。在这个学园里，他的哲学谈话录被用作教材，八十岁的时候，他还参加了一个愉快的婚礼晚会，并从此一睡不起。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索福克勒斯或柏拉图，但是他至少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生活的目的性，多面性和对称性方面同他们展开较量。这样表明了希腊人的个人荣誉观后，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伊迪斯·汉密尔顿评论的意义。汉密尔顿认为我们只有想象出这样一个现代社会，即所有的美国橄榄球队员同时也是最好的诗人、哲学家和政治领袖，我们才能彻底理解希腊生活的精神。①

从我们这位年轻希腊人的回答中，我们可以轻易地抽出希腊风格的精髓。我们可以从菲狄阿斯或普拉克西泰利斯的雕塑中看到对秩序，匀称和节制的追求；我们可以看到伯里克理斯雅典伟大的社会民主所带来的理性和实用人文主义；个人自由和政治责任的均衡感。对希腊文学艺术的进一步研究只能加深我们的印象，即希腊人追求整体性，个人完善性，纯粹的生活乐趣。传说和历史中的伟大英雄——奥德赛，伯里克理斯和苏格拉底——都是些教育人士。他们热爱生活，足智多谋，精力充沛，然而又节制有度，充分享受生活。而悲剧性人物——俄狄浦斯，阿尔西比厄德斯，亚历山大——则缺乏节制和均衡，而且特别自信，这成了他们的弱点。有人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上刻下了这么两句令

人难以忘却的箴言："了解你自己"和"节制有度"。这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相反，选择这两句箴言的人，凭借希腊人所特有的穷源究委精神，一定知道他是在用这几个词来解剖一个整体文明的精神。

有关古典美感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希腊人自己总是在谈论它，力争获得Kalos（美），竭力避免aischos（丑），所有这些词几乎达到了"善"与"恶"的道德内涵。如同所有的抽象物一样，对美几乎也不可能下定义。但对希腊人来说，阿波罗神殿上所刻的话就足以暗示出中庸均衡和谦卑所决定的人类抱负。

注释

①原注：伊迪斯.汉密尔顿：《通向西方文明的希腊之道》（导师丛书1948）

第二章 希腊历史背景

一、早期爱琴海文化

粗心大意的门外汉在阅读希腊作品的时候，常常情不自禁地幻想出一个崇高、美丽而又聪明的民族几乎在一夜之间神奇般地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形式，而同其它种族和国家之间竟无联系。事实上，希腊主义是一大奇迹，但不是不可思议，它是由地理、经济、军事和文化诸方面有幸融合的结果。和其它所有文明一样希腊文明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从最原始的部落社会到人杰地灵的伯里克理斯雅典，更为复杂的是，构成希腊主义社会的各个城邦的发展水平千变万化，早期是由伯罗奔尼撒控制，后来是米利

都（在小亚细亚）占优势，米利都的优势一直延续到公元前500年。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300年雅典人垄断了黄金时代，而马其顿和其它的一些地区则在漫长的衰微时期占据着优势，这种优势昙花一现，没有决定意义。

总的来说，希腊文化代表了漫长而又缓慢的发展。其间充满了政治混乱，混乱得足以阻止爱琴海世界获得国家统一或文化协调。事实上，古希腊是一个五彩缤纷的社会，一个发展迟缓的各种族融合的文明，充满了混乱和矛盾，为互相残杀的战争和误会所困扰。然而，总的来说，通过哲学家、诗人以及历史学家的帮助，这个社会取得了世所周知的空前绝后的思想成就。

我们已经见到入侵爱琴海的中欧部落并没有带来多少文化形式，相反，随着他们向南朝伯罗奔尼撒推进，他们遇到了丰富的迈锡尼遗产，从而发现文化正在等待着他们。和英国的诺曼人不同，他们通过征服获取文化，虽然他们夺得了前人的领土，但他们本身又为被征服者的成就所征服。不过，希腊主义的根基比迈锡尼还要深，他们通过爱琴海向克里特延伸，而且很有可能又转回古代埃及。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会认为爱琴海文明起源于所谓的米诺时期（公元前3400—1400）的克里特岛（或者说米诺斯岛，就像希腊人有时所称呼的一样）。克里特岛的居民来自北非，经海上去南部有四百英里的地方，从他们随后的文化中可以充分看出埃及的影响。考古学家鉴别出三种截然不同的克里特生活时代：无关紧要的早期米诺（到公元前2300）；和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时代同期的中期米诺（公元前2300—1800）以及和伟大的埃及庙宇时代同期的晚期米诺（公元前1800—1400）。这最后一种时代留下了一大批财富，有绘画、雕塑和金属制品，一些线性经文①和亚琴·伊文思爵士于1900年发掘的耸人听闻的诺索斯宫殿。

纵观其历史，这个岛上的政府似乎专横拔扈。如果我们相

信《伊利亚特》所提到的“九十座克里特城市”，我们就会觉得当时文明的主要形式是都市化。大概是内战的结果，再加上外国人的入侵，这些城市中最重要的一座诺索斯于公元前1400年毁之一炬。诺索斯的陷落标志着米诺文明的终结，这个灾难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岛上稀薄的自然资源的枯竭，同时也是由于军事征服。

除了考古学家所发掘的一大批艺术珍品外，克里特人还为我们留下了一批重要的神话，其中大多数为希腊人所采纳。米诺斯和达达努斯的英雄故事与忒修斯，阿里阿德涅和半人半牛的怪物传说都来自克里特，后来又在希腊文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到了公元前1400年以后，克里特岛尽管仍是军事目标，但她已不再起什么重要作用，对世界文化的进展也不再作出什么贡献。

后来，爱琴海文明的繁荣昌盛主要出现在两个城市，这就是希腊南部的迈锡尼和小亚细亚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伊利姆（广为虚构的特洛伊）。尽管在地理位置上这两个城市相隔甚远，但它们的文明似乎是共同的，迈锡尼人看上去和米诺人同属一个混杂种族，但是伊利姆的居民，就像最终征服了他们的希腊人一样，很明显是地中海和巴尔干种族的结合。然而，迈锡尼和特洛伊的生活模式如出一辙，因而我们有可能将它们一同列入迈锡尼文明这一总标题下进行考虑。

尽管迈锡尼的生活一点也不缺乏艺术成就，但这种生活却是高度商业化了的。迈锡尼和伊利姆垄断了重要的商道，而后来似乎是一个特别繁盛的商业中心，大多数居民都从事合法的海运和公开的海盗。这座城市座落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还一直是一条重要的海运要道，鉴于这些有利条件，伊利姆可以向一切过往外国船只征税，恐怕正是这种垄断权的滥用导致了特洛伊战争。在迈锡尼，挖掘表明这座城市不仅仅是个城堡，而且还是个贸易中心，她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还有高度的

生活标准，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来自北方的希腊游牧部落会为她所吸引。

我们所了解的迈锡尼文明主要来自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史雷曼的戏剧性发现。史雷曼深信荷马史诗至少有一部分是有史实根据的，于是于1868年组成了第一次对迈锡尼地区的考古远征。史雷曼冒着被同伴和有识之士嘲弄的危险，勇敢地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特洛伊城遗址。他最初的几次尝试都失败了，但是在1871年他获得了做梦也未想到的成功。因为他不仅发现了特洛伊城址，而且还发现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500年间就在这地方至少有九座“城市”。这些“城市”都不太大，有些只是些小村庄，另外的则是些中等的城镇。荷马史诗中所叙述的特洛伊一般被认为是第六座城市，② 中等规模，它于公元前1184年左右毁于大火，从而为荷马故事中希腊人战胜特洛伊人提供了历史依据。

随着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惊人发现，史雷曼将他的活动转到了伯罗奔尼撒。1875年他发掘出了迈锡尼城遗址。十年之后他又发现了附近的提林斯城址。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这最后几次发现的重要性，因为在揭示出这些古代村落的轮廓的同时，史雷曼还揭示了许多与迈锡尼历史和日常文明有关，而迄今为止尚无人所知的材料。恐怕最激动人心的是他发现了一座坟墓式结构，里面盛有六座装满了尸体的坟墓，还有许多金箔和其它金属装饰。这六座坟墓中有一座里盛有一具生前明显占据显赫地位的尸体，可能是国王。史雷曼认为是阿伽门农本人，这个观点引起了人们的争论。这位德国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座庞大建筑物的基础，好像是座皇宫，同时他还挖掘出几座比较小的蜂箱一样的大理石结构。尽管史雷曼有证据证明它们当中有一座曾经是“阿特柔斯宝库”，但是这最后几次发现的作用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史雷曼的发现证实了许多尚无人知的迈锡尼文化事实。很清楚，迈锡尼文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而且，在公元前

1400年左右她还是爱琴海一带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曾经成功地征服了克里特和特洛伊，而且还卓有成效地袭击了埃及的沿海城市。众所周知，希腊部落对迈锡尼世界的首次渗透是缓慢而平静的。这样一来这两个种族就有可能慢慢地融合起来，后来欧洲成分不知怎么硬是挤进了这个高贵的血统。根据希腊传统，阿特柔斯及其儿子阿伽门农家族是希腊血统而不是闪米特血统，他们在特洛伊战争前后恰好统治着迈锡尼。史雷曼的发现很有可能证实这个传说。

二、印欧人的入侵

现在该从迈锡尼的辉煌时代往回转，追溯一下欧洲的移民运动。本书开宗明义地提到了迁徙爱琴海决定的重要性，欧洲移民同迈锡尼文化的融合形成了随后的爱琴海世界的历史。到达希腊半岛南端的第一批欧洲部落是阿卡狄亚人。根据传说，他们的部落不大，而且明显喜好平静，过着一种田园般的生活，对迈锡尼社会似乎影响不大。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下一批希腊移民亚该亚人。这批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势力上都比阿卡狄亚人大得多，他们向伯罗奔尼撒稳步涌入，最后不动一刀一枪就成了迈锡尼的统治者。毫无疑问，亚该亚人对形成早期希腊文明起了催化作用，正是他们具有活力和实际性，同时还有高贵性和庄严性，而这正是荷马传说中所描述的希腊人的特征。荷马多次将希腊人称为亚该亚人，言下之意希腊主义的真正创始者就是这个部落。

在亚该亚人之后，多利安人又进入了伯罗奔尼撒。这个部落暴戾恣睢，他们于公元前1100年左右成功地洗劫了迈锡尼。③和亚该亚人相比，多利安人似乎没有什么更新精神，他们的文明远为原始，善于穷兵黩武，毁灭性很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化纪念。然而，一千多年来，多利安人成了伯罗奔尼撒无可争辩的统

治者，他们的都城斯巴达和雅典一样对后来的希腊历史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涌进爱琴海的还有其它的许多欧洲部落，但是所有这些部落似乎都没有进入伯罗奔尼撒。公元前1150年，一个部落很大但相对而言没有什么重要性的伊奥利亚人开始定居在北部以及小亚细亚。比伊奥利亚更为重要的是爱奥尼亚人，他们的部落不大，于公元前1030年前后到达了雅典和阿提卡一带，在这里他们大概同多利安人征服中所逃出来的亚该亚难民汇合了起来。这两个种族就这样一起定居在雅典城内和周围。当时雅典是座捕鱼和海运的城市，在随后的几百年里，对希腊历史没起什么作用。但后来随着她对爱琴海群岛和对岸的小亚细亚所进行的经济和殖民扩张，她变得繁荣昌盛起来。

公元前1000年左右，迁徙期结束了。随后的两百年的主要成就就是城市的缓慢发展。这些城市中最为重要的有色萨利，波欧特亚（Boeotia)、爱脱利亚（Aetolia），麦格拉（Megata)、科林斯，阿耳戈斯，斯巴达和阿提卡。尽管这些城邦属于同一血统，但是总的来说，这些城邦的人相互之间在政治上互为敌对，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也达到了一种合情合理的同族文化发展，他们自己将这种发展归结为“希腊化”。他们觉得这个文化将他们同世界其它地方的种族隔离了开来，他们称世界其它的种族为“野蛮人”。④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没能发展出一个和文化同步的政治统一性，因为正是这种政治融合的缺乏最终导致了希腊文明的衰亡。

三、荷马时代（公元前1200—900年）

前文所述的部落流动及其缓慢结合大部分发生在荷马时代前后，这段时期之所以被称做荷马时代是因为它体现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反映的时代。我们对希腊历史上这段开创时期的

史实所知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段时期充满了混乱和军事活动。很自然地在这段时期应该产生出伟大的领袖，惊人的冒险家以及壮观的英雄行为。希腊文学里充满了丰富的传说和史诗故事，毫无疑问，这些传说和史诗故事以夸张和理想化了的形式使众多的事迹以及为数不少的英雄和冒险家流芳百世。这些故事中大名鼎鼎的人物——伊阿宋，阿伽门农，奥德赛，阿喀琉斯，墨涅拉俄斯，赫克托，埃涅阿斯以及其它的一些人——恐怕实有其人，其中有许多人参加了历史上的特洛伊战争，其目的，正如我们所见，并非如荷马所记载的那样浪漫、那样高贵。

在希腊历史的这段形成期里，人们所期待的是一个男人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他的英雄行为及其体质。因此，作为反映这段时期事件的荷马史诗自然就该反映暴力和当时人们所抱有的高度个人标准。但是更有价值的是荷马对早期的希腊家庭文明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由于缺乏更为科学的历史来源，因此，我们只能极大地借助于荷马以及荷马的同龄人荷西俄德来了解希腊化形成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

除了军事活动，荷马时代的生活恬静，小村庄是最重要的经济单位。农业、畜牧业以及简单的手工艺品是主要的活动，贫富之间的财产分配合理。他们还不知道豪华奢侈，甚至连部落的头领都住在粗陋的屋子里，其生活标准与普通劳动者没有什么不同。由于生活必需品的公平分享，因而有可能人们生活充裕。奴隶和强制劳动的现象寥寥无几，人们享受着一种社会平等，这种现象一般只有在更为原始的社会才有可能被发现。比如，奥德赛和他的猪倌并肩战斗，在奥德赛的宫殿里，请求者可以在宴会桌上希望得到一名羊倌，没人反对。

服饰，食物以及社会交往简单而又拘谨，这段时期人们并没有陷入到破坏后期古典生活的道德败坏和骄奢淫逸之中。不过，到了这段时期的末尾，不可避免的经济混乱现象变得明显起来，

旧有的家长式和平均主义宗派统治渐渐让位于君主政体。随着君主政体的出现，又出现了阶级对抗，结果，财富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上，而多数人则成了雇佣工。

四、列王时代（公元前900—700年）

荷马和荷西俄德之后的两百年被叫做列王时代，将这段时期叫做希腊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或许同样合适，在这段时期内，希腊精神和希腊创作艺术里所强力反映出来的人文主义和个人自由受到专制的暴君政府的扼杀而奄奄一息。我们对列王时代的生活和历史事件所知甚少，可能是因为这个暴君式的统治扼杀了创造性的或有历史价值的作品。

这段时期几个主要的君主政体是在阿耳戈斯、斯巴达、雅典和底比斯。在这些城邦里，皇家管理尽管严格，但却卓有成效，而且公正无私，但是即使是在这些君主政体里，统治者的权力也逐渐为几个主要贵族所削弱，这些贵族最终将国王削弱为一个傀儡，或将他彻底废除。到了公元前700年，君主政体已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激烈的男人竞争。结果政治生活成了屠宰场，最终摧毁了贵族阶层。出身不一定高贵的强人开始挤进政治圈子，有时还僭取个人或超出法律之外的一人统治。随着这些暴发户统治者的出现，列王时代宣告结束，僭主时代开始到来。

五、僭主时代（公元前700—500年）

僭主在希腊文里，这个词指的是一个出身卑微但却控制政府权势的人。尽管从法律上来说他不是统治者，但实际上他却行使统治权。原则上希腊人也和今天的我们一样不喜欢这种篡权者，但事实是许多僭主，特别是雅典的那些，都是些出类拔萃之辈。

尽管他们以不正当的手段上了台，但他们却赢得了公众的支持。事实上，僭主不得不与人为善，因为希腊人认为他们有责任去废除甚至杀掉一个压迫者。

纵观历史，以各种各样不正当手段篡夺权位的人都来源于社会环境的不安定。在雅典——在这个历史概述的其余部分我们将集中精力讨论这个城邦——的统治中，我们发现无一例外。在列王的统治下，雅典处于一片混乱，没有法典也没有经济规划。而另一方面，财产与特权的分配却极其混乱。越来越多的农场主和小商人由于无法同富豪竞争而不得不沦为奴隶。而那些大的土地所有者则以怀疑的目光看着那些扶摇直上的富商，故意地将谷物卖给外国消费者而不是卖给本国人，由此希望能造成城市的不安，扰乱他的商业竞争者，这样一来加剧了经济混乱。更有甚者，在对外关系方面，雅典不断地进行争吵，打仗，尽管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常常是零零散散的，而且发生在农业淡季．没有造成大规模的伤亡，但是成年累月的零星战争却对雅典的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这些不安定的局面激励了人们推翻国王和贵族，支持“强人”即僭主，他们给人的感觉是一旦上台，局势就能转危为安。但是与此同时，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僭主必须统治有方，否则他就有可能立刻为另一位更能胜任的人所取代。

由于强制性建立秩序，僭主时代具有高度的建设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为伯里克理斯雅典的人民之机构播下了种子。在整个这段时期里，法典逐渐形成，亚里斯多德式的土地占有法被打破，土地被重新分给农场工人，殖民地开拓得到鼓励，以便支持雅典的商业，公共建筑不断发展，甚至教育和美术（诗歌、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都得到官方支持。

公元前7世纪，希腊人采用了东方的军事技术，令人奇怪的是，这对民主机构的发展多有裨益。希腊战争法的基础是方阵，或者说全副武装的步兵密集在一起，这种密集形对敌人的进攻形成一

堵可怕的障碍。和荷马时代精心培育出来的贵族之间的个人决斗制度相比，方阵要有力得多，因为它技术简单，刀来枪去，无需多少训练，因而有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将一般老百姓结合起来。相形之下，荷马型的个人决斗武士要经过多年的培养。

希腊人对东方的军事技术作了一番大修改，其重要一点就是：他们使用军队，这个军队的成员不是那些被顽固的军官所驱赶到战场上的无名奴隶，而是一些为了国家以及所钟爱的机构而战的自由民。这些机构给予他们的生活以相对的自由和个人机会。在希腊军事史上我们经常看到希腊军队纯凭爱国之心击败对手；希腊人真正的"秘密武器"就是希腊武士们对国家怀有真诚的爱。

僭主时代雅典的诸位领袖中，有四个名字显得特别突出，他们是：德拉科、梭伦、庇西特拉图和克利斯悌尼。公元前621年，在德拉科的领导下，雅典力图改变她的法律混乱状态。公元前621年之前，法律争执或公共利益举动主要由风俗习惯或一时的兴致所决定，任何人要想把这一大堆杂乱无章而且尚未成文的法律传、统诉诸法律文字就得承担一项巨大的工程。德拉科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即有名的《德拉科法典》，迈出了正确的一步，但是他的法典还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特别是在不负责任的农业和商务管理上以及允许奴隶还债这一条危险的风俗习惯上。大多数人的生活一如既往，改善生活条件希望渺茫，因为这种法制鼓励少数人的财产积累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

公元前594年，在梭伦的领导下，《德拉科法典》中的许多弊病得到了纠正。梭伦消灭了一切土地抵押，废除了奴隶抵债法，实行公民陪审团审判。富豪对这些改革牢骚满腹，声称贵族仲裁者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如果经济再这样混乱下去，连他们自己都有可能彻底毁灭，于是他们不得不默许这些新措施。梭伦还根据年收入将人口分成四等，然后根据各个等级分配特权和义务。在这个制度下，富者比穷人要多

交税，但有条件担任更高的职位。这种早期的收入税导致了纯富豪统治的产生，但考虑到这法律纠正了许多弊病，因而它仍是一大进步。梭伦立法的主要错误在于尽管他本人制法热情很高，但是法律条文太多，刑罚太重，完全实施根本不可能，这样一来人们对法典的尊重也就随之消退。

雅典历史上最有魅力的一个人物是庇西特拉图。此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于公元前546年至前527年成了雅典公认的领袖。一方面甜言蜜语，另一方面又正大光明，庇西特拉图就是靠这种戏剧性及建设性措施来吸引雅典人。据说他曾策划过一场政变。他和雅典的一位女人经过雅典街道，他对那些轻信者声称这位女人就是雅典娜女神．亲自赶来支持他的事业。还有一次他把衣服撕成碎片，上面涂满了血，然后出现在公众面前，说有人想阴谋陷害他，从而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尽管庇西特拉图有着极具煽动性的愚蠢行为，但他秉公统治，大施公共建筑，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他还将希腊戏剧组织建立成政府支持的机构，由政府出资举办荷马史诗朗诵会，重新唤起人们对荷马的兴趣，从而赢得了世人的感激。在这位僭主的领导之下，或许说在他的直接影响之下，荷马史诗得以编订成现在的形式，总而言之，我们必须说的是尽管低劣的恶棍行为常常给庇西特拉图蒙上一层阴影，但他的统治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在社会上都是雅典历史上最具建设性的时期。

公元前5世纪末6世纪初，到了克利斯悌尼统治的时候，立法改革得以实施，从而使雅典政府迈进了最伟大的民主统治时期的大门。克利斯悌尼结束了氏族选举的混乱状态，将人口分成demes，或区。他创建了Boule，或议会，每一个区里选几位代表，这样所有按地理或经济划分的区域在政府中都有一个合理的席位。他还建立了政治流放制度，在一年一度的公民选举中，如果有哪位公民的活动不符合公众的利益，那么他就会被短暂流放，从而扼制

了僭主的兴起。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里记述一下为克利斯悌尼所完善了的雅典政府机构。现在我们可以说在这位英明的、既有政治家风度而又献身于政治的领袖领导之下，雅典得以从有利可图但在政治上却由僭主和民众领袖统治的危险时期进入到一个无所畏惧、独一无二以及前所未有的民主制度里，史实证明这是古代世界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无与伦比的成就。

六、波斯战争（公元前497—479年）

在特洛伊战争和克利斯悌尼统治的700年里，希腊城邦主要忙于国内机构的缓慢发展。现在，到了光辉的公元前5世纪初，希腊世界第一次发现自己在国际上遇到了强大而又好斗的波斯帝国的有力挑战。居鲁士大帝（公元前550—529）统治时期，波斯达到了国内发展的顶峰，并且推翻了主要对手巴比伦，成了小亚细亚的主要力量。居鲁士死后，波斯仍然士气高涨，在居鲁士杰出的但神志不太健全的儿子冈比西的领导之下，波斯又征服并吞没了埃及，而且梦想有一天能够控制整个东地中海。要想实现这个梦想，障碍之一就是希腊世界，她控制了重要的商务和军事基地，而且无意屈服于强大东邻的无耻挑衅。公元前522年，冈比西自杀后，他的继承人大留士转移注意力，企图消除一切障碍，完成波斯对该地区的统治，特别是要彻底消除希腊的反抗。

大留士是一位伟大的将领，甚至还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他组织辽阔疆域的才能不同凡响。他将他的帝国分成20个省或辖地，每一个辖地由一位精心挑选出来，言听计从的地方总督管理。这些总督受到皇帝代理人和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他们一旦发现地方总督有什么不忠诚的个人野心，就即刻报告给皇帝本人。为了让这些消息传递迅速，大留士在从京城到遥远的边疆之间建筑了许多大路，这样朝臣可以在这些大路上来来往往永不疲倦地传递

国内一切大事。除了高效的传递系统，大留士还发展了一套警察系统，用以监视公众行为和公民私事，手段阴险至极，任何叛国举动或管理不善的想法都受到了扼杀。波斯力量的高峰是一支庞大的奴隶军，这是古代世界最为凶猛也最为残忍的团体。总而言之，在野心勃勃的皇帝的领导下，波斯人严重地威胁到了希腊文明的未来生存，而这种威胁看上去还难以消除。

到了公元前516年，大留士征服了京城东部和南部的所有土地，吞没了希腊在小亚细亚的领土爱奥尼亚、而且他还孤注一掷，决定穿过博斯普鲁士海峡进入欧洲，进一步征服西方。到了公元前500年，波斯大军已经站到了希腊的边境上，随时准备将这个半岛一举拿下。但是大留士已习惯于将政府仅仅看作一个力量统治，而对希腊人有可能抵抗任何想剥夺他们宝贵的自由遗产的威胁估计不足。当时希腊并没准备同波斯部落进行面对面的较量，而是鼓励他们的爱奥尼亚兄弟们起来反抗波斯的统治，并为爱奥尼亚的自由事业提供物质援助。反抗虽然失败了，但是波斯人艰苦决战打了6年才使爱奥尼亚人屈服，从而给希腊人一些准备时间，以反抗即将落到他们头上的袭击。

爱奥尼亚人战败后，雅典成了波斯人泄怒的另一个目标。公元前490年，一支带有140条战舰，10万名战士⑤的巨大波斯舰队勇敢地驶进了爱琴海，试图彻底摧毁这座曾经有力地帮助并且延长了爱奥尼亚人造反的希腊城。尽管雅典人早就作了准备，但他们还是大吃一惊，而且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军事上他们都不是波斯部落的对手。他们急急忙忙送信给斯巴达人请求援助，但是宗教仪式延缓了斯巴达的军队，因此当波斯人在马拉松平原登陆的时候，他们发现所面对的是一帮只有一万人、组织涣散、装备简陋的雅典人。尽管希腊人武器很差，但他们都决心誓死捍卫他们所钟爱的自由事业。正是这种监管奴隶的波斯将领所难以理解的决心，加上雅典人灵活地运用铁钳术，最终赢得了希腊的胜利。

希腊人故意使其要塞点被突破，并等波斯人一涌而入后，扎起口袋，将其包围，并一举歼灭。这样，装备轻巧的雅典人可以大批地屠杀这帮行动迟缓，装备有重武器的波斯人，最后大留士的远征大军伤亡惨重，一败涂地。

尽管雅典人已完全占有了马拉松平原，但是他们惊恐地看到波斯人已将舰队转向了毫无防备的雅典城本身。尽管他们已打了一天，疲惫不堪，但是雅典大军还是进行急行军，争取及时完成马拉松到京城之间二十多英里长的旅程，抢在波斯舰队进攻之前到达，阻止敌军登陆。在被认为是虚弱的雅典人手上连遭挫折后，波斯人放弃了远征。而雅典则由于她所取得的成就成了希腊城邦的主要势力，有力量去组织对付波斯侵略的进一步防守。

马拉松战役后，波斯人回了家，卧薪尝胆，以图报复。然而，大留士于公元前486年死了，他的儿子泽尔士一世需要花费些时间才能下定决心进行希腊远征。最后，泽尔士于公元前480年率领约18万人的大军南下，穿过色雷斯和马其顿，进入希腊半岛，他一路之上所向披靡，直到最后进入德摩比利关——山与海之间的一条狭窄通道。这一次是斯巴达人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一支由斯巴达人，底比斯人，菲希斯人(phocians)和狄斯比斯人(Thespians)组成的不足三百人的小分队，在斯巴达王列奥尼达的领导下，奉旨守卫在这里，阻止波斯人前进，直到希腊增援海军的到来。泽尔士徒劳地组织大军向那几个拼死抵抗的希腊人发动一浪高似一浪的进攻，但在这条狭窄的通道上，人数无足轻重，就像在马拉松一样，装备轻巧的希腊人能够在谋略上挫败那些行动迟缓的对手。最后，由于一个希腊逃兵的告密，波斯人知道了一条小道，从这条小道他们可以将列奥尼达和他的三百壮士包围起来。在随后的战斗中，列奥尼达坚守阵地，表现出斯巴达人无畏的勇气，直到全军覆没。最后波斯人终于控制了这道关隘。

从技术上来说，列奥尼达在德摩比利关是战败了，但是他的

英勇抵抗极大地鼓舞了希腊人的士气。在攻占德摩比利关的战争中，成千上万的波斯人被杀死，甚至泽尔士也为希腊人的勇气所吓倒。据说他在绝望之下曾发出感慨："我们如何才能征服这些人呢？"得到的回答是他的将领们有预感的不祥沉默。

德摩比利关一战还给了希腊人所需的时间组织海军反攻，正是在萨拉米的海战上，波斯人第一次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在这里希腊人运用更为灵活的战略战术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虽然波斯的人数已大大增加，但是他们有能力挫败波斯海军的精华。第二年（公元前479年）在帕拉提亚（Plataea）一支主要由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组成的希腊大军彻底摧毁了波斯军队。同一天，波斯海军所剩下的几条军舰也在米克利（Mycde）被焚。战争结束了，强大的波斯帝国遭到了惨败，从此一蹶不振，而在共同的敌人进攻时暂时组织起来的希腊则迈进了黄金时代的大门。

七、黄金时代的雅典（公元前479—431年）

诗人雪莱说："无论是从它本身还是从它对文明人后来的命运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伯里克理斯的出现（约公元前500年）和亚里斯多德的去世（公元前322年）这段时期毫无疑问是历史上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作为一位文学家，雪莱自然把他的黄金时代加以延伸，包括进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从文学观点来看，没人会反对他。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段时期在政治与社会上所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那么人们就会将雪莱的划分仅仅局限在波斯战争结束（公元前479年）和具有灾难性的伯罗奔尼撒冲突（公元前431年）开始这段期间的雅典历史上。在这短暂的半个世纪里，雅典人赢得了繁荣富强。这种繁荣富强的取得主要来源于她在波斯战争期间所努力赢来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巨大声望，同时也是她高度发展的商业和金融经济的结果。在国内，雅典神奇般地取得了一

种四平八稳的生活，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充分的机会，相对而言滥用权力和特权的现象比较少见。简而言之，在这段时期里雅典有能力维持一种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权威，自由、思想文化和个人机会这些反复无常的成分的均衡。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雅典在国内事务上取得了平衡，但在对外关系上却未获得类似的稳定。在外交事务上，雅典一错再错，而最大的错误则是在提洛联盟上的举动。波斯战争结束后，提洛联盟形成，其宗旨既是防范性的，又是触范性的，它力求保护爱琴海，免得再遭波斯人的侵略，与此同时他们又给爱奥尼亚的希腊人提供军事援助，使得他们最终赢得了独立，脱离了波斯征服者的统治。爱琴海中部地区大多数有影响的城市和雅典一道加入了联盟，但是斯巴达及其伯罗奔尼撒仆从都缺席了，从而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两个并肩抗击波斯人的超级力量之间的嫉妒和分裂最终产生了悲剧性的结果。但在目前来说，这种刺激性竞争还仅仅局限在商业方面，从而掩盖了外交上的花招。

希腊城邦联盟的优势一目了然，但纵观其历史，尽管希腊人清醒地意识到其种族上的统一，但他们并不想取得他们所急需的政治统一。对这种倾向提洛联盟也不例外。一旦波斯侵略的威胁消失，联盟里的那些小国家就开始抱怨一年一度所付的会员税，而且越来越反对雅典主宰联盟事务。甚至连肃清波斯残敌活动结束之前，就有几个联盟成员国，包括拿克索斯（Naxos）和萨托斯（Thatos），起来反抗，后被强制性地拖回联盟。后来，雅典不得不靠高压统治来维持联盟。最后她不再召集提洛议会，公元前454年她采取了决定性的一步，将提洛岛的财产移到了雅典本土。埃及人对爱琴海岛屿袭击的威胁使得这种移动成为可能，但同时也不要忽视雅典政策的真正动机，雅典已成为一个主要力量，而提洛联盟已经变成了一个雅典帝国。

八、伯里克理斯（约公元前500—429年）

这场雅典变革中的中心人物是伯里克理斯，其名字由于被用来代指希腊文明的顶峰时代而流芳百世。30多年来，作为军事统帅，他领导雅典人度过了和平和战争，通过漫长而缓慢的发展将雅典民主引导到了顶峰，从而给人留下了一种高贵感，这在古代世界是无人与之匹敌的。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伯里克理斯都是一位进步的领袖，但他决不是暴发的激进分子。他出身于雅典的名门望族，从幼年起就受到财富与文化的熏陶。本来他环境里的任何因素都有可能引导他加入保守的寡头政治派，但是随着他政治上的成熟，他清醒地看到时代的趋势是要扩大普通公民的特权。因此，他一身都致力于将民主权力扩大到特权较小的阶层，扩大雅典政府的基础，包括文化，社会福利以及传统的立法、军事和警察功能。

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建立军饷制和陪审服务费用制；另一个举动是每年给全体国民发一小笔津贴，包括看戏费和正式体育比赛费。他希望通过这些举动来培养人们的创造才能，加深人们对艺术的欣赏力，鼓励教育。那些富有的保守派气急败坏地认为政府的这些施舍将使道德沦丧，但是很难证明这有什么坏处。伯里克理斯还大兴土木，从而在一些地方遭到了人们的批评，他建造了八英里长的“长城”堡垒，保护城市不受岸基方面的进攻。他还兴建了备急用的战舰和仓库。同这军事计划相平衡的是，他还在全阿提卡兴建了美丽的庙宇和公共建筑。这一举动的后果是他可以雇佣一大批艺术家，建筑师和各个阶层的工人，这样，用普鲁塔克的话来说：“那一大批未经训练的技工……就应该分享到这笔公共基金，然而他们又不能只拿钱不做事。”

那些好挖苦的敌人将伯里克理斯称做“奥林匹亚人”。这位

“奥林匹亚人”虽然忙于国家事务，但也不乏风流韵事。虽然他已结婚多年，但他还是和阿斯帕莎打得火热。阿斯帕莎来自麦格拉，是一位智力出众，受过良好教育的名妓。她拒绝了高雅的雅典妇女所过的空洞而孤僻的生活，而羡慕尽管在社交方面暧昧不清，但却能带来她所希望的生理和思想自由的生活方式。阿斯帕莎中年创办了一所修辞学和哲学学校。尽管从名义上来说这所学校是为富家女儿办的，但是参加者还有苏格拉底，欧里庇得斯，阿尔西比瓦得斯，阿那克萨哥拉和菲狄亚斯这些著名的人物，当然还有伯里克理斯本人。最后伯里克理斯同他的妻子和和气气地离了婚，这样一来阿斯帕莎实际上成了这块土地上的第一夫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伯里克理斯并不能娶她，因为他本人制定了一条目光短浅的法律，禁止雅典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合法婚姻。不过，无论伯里克理斯的政敌对她怎样冷嘲热讽阿斯帕莎都是一位忠贞不渝，智力超群的伙伴，配得上她的保护人的伟大，而且她还积极地为他的民政建筑出谋划策。

然而，尽管伯里克理斯30年的领导令人鼓舞，但也不是尽善尽美。许多公共工程项目的资金都来自仆从国的进贡，这样一来雅典和弱小的提洛盟国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差。更为鲁莽的是，他征用了提洛联盟的资金，将这些原本用于联盟各国的资金全部用在雅典的改善上。这种明显的帝国主义态度又得到了伯里克理斯继承者的加强，从而使雅典遭到了各国的痛恨，最终导致了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

还有，伯里克理斯政府非常虚弱，没能设计出一个行政机构来处理日常工作。由于希腊人非常害怕产生官僚政治，所以这些工作只有留给业余爱好者，而他们的行动又常常受到政治或纯感情因素的支配。

但是最大的不幸就在于伯里克理斯的杰出统治。30年来雅典人已习惯于依附强人领导，因而在政治上无所适从，消极被动。

结果当伯里克理斯于公元前429年死于瘟疫后，竟没有一位出众的领袖来取代他。很快雅典政府堕落了，处于玩世不恭，机会主义煽动的状态，人们争权夺利，丧失了道德或公民应有的品格。伯里克理斯时代的正直，力量和哲学启蒙一去不复返了，接踵而来的是悲剧性的雅典荣耀。

九、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59—404年）

伯里克理斯的统治尽管出众，但无法阻止雅典和斯巴达之间那不可避免的殊死搏斗。早在伯里克理斯去世之前，提洛联盟的形成就已注定要进行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因为提洛联盟在军事上和商业上对斯巴达及其伯罗奔尼撒联盟里的同盟国构成了严重威胁。提洛联盟成立的头几年，雅典对斯巴达采取了绥靖政策，但是随着伯里克理斯的上台，绥靖政策被取消。伯里克理斯对伯罗奔尼撒诸邦采取了“大棒”政策。30年来（公元前459—431）提洛联盟和伯罗奔尼撒联盟一直处于冷战状态。而雅典则尽力去窃取伯罗奔尼撒联盟在意大利的市场，削弱斯巴达对其盟国的控制权。有时冷战也有热化，这就是提洛联盟实行海上封锁，并对斯巴达的仆从国发动几场零星的战争，但总的来说，伯罗奔尼撒冲突的第一阶段是外交和经济策略的较量。

公元前445年签订了《30年和约》，和约规定斯巴达对其领土享有主权，而让雅典人有海上自由，但是这个和约的效果只是维持现状。这两个竞争的城市互不相让，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公元前431年，耽搁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从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希腊卷进了一场残酷无益，毫无结果的战争，最终结果证明这场战争带来了希腊文明的自我毁灭。

在概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经过之前，我们先简单地描述一下斯巴达的社会性质，这样或许更为有用。尽管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

直线距离只有100英里，但二者在社会和政治体制上的距离却遥遥相对。雅典是一个公民民主国，斯巴达则采取了一种奇特的君主政体，由两个国王（只是傀儡）和一个五人委员会绝对统治⑧。两个城市都使用奴隶来进行必不可少的生活劳动，但是雅典对待奴隶公正、道德，而斯巴达则对奴隶采取强硬政策，残酷无比。这项政策在他们看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斯巴达人口中奴隶有20万人，而主人只有8千人。这些雇主阶层总是提心吊胆，害怕那些备受虐待，人数上又占优势的希洛人会起来造反。

如前所见，在训练公民团体中，雅典人力求培养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而斯巴达人则仅仅鼓励职业军人的气质。智力训练微乎其微，要有也只是死记硬背，正因为如此，斯巴达人的创作艺术才能难以见到。但另一方面，体育锻炼则得到了大力提倡，而且特别强调要培养毅力、耐性、纪律，以及忍受各种各样的贫困。年轻的男孩从小就被从家里抱出，送到公共社会去培养。他们住在营房里，一举一动都得遵循军事规则。甚至连妇女都被训之以军人气质。使有性别意识的雅典人感到吃惊的是，她们甚至还被要求定期到体育馆去参加锻炼和体育比赛。

这种培训的结果便产生了一个杰出的士兵社会，其战绩震慑了希腊世界。这样一个统治方式能够产生一个列奥尼达，他和他的三百壮士誓死守卫德摩比利隘口；它能产生一个波萨尼阿斯（Pausanias），他带领军队在帕拉提亚成功地打败了波斯大军的进攻。但它不能产生一个自由人的国家，不能产生一种思想，也不能产生一个易于进步和发展的社会。修昔底德在其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指出，刚性是斯巴达社会的一大弱点：

“他们都很保守，甚至在非常时刻都不紧不慢、谨慎得过分，他们从来不敢使出全部力气……别人考虑的是如何增加财产，而斯巴达人则提心吊胆，唯恐失却已

有的东西。”

然而，正是这种穷兵黩武的机器人国家在这场毫无意义的伯罗奔尼撒大屠杀中打败了自由的雅典人。但是于公元前404年陷落的雅典已经厌倦了帝国主义的煽动性，失去了伯里克理斯时代的荣耀，陷入了一种可悲的境地。这件事给人的教训似乎不是什么“可能正确”，而是“民主的代价就是永久警惕”。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事件只需稍稍提一下。战争的实际起因是：科布勒（Corcyla）起来反抗其祖国科林斯，雅典进行干涉。由于科林斯也是斯巴达的一个同盟国，所以雅典的这次举动被认为破坏了《30年和约》，不久，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爆发了一场大战，战争开始不久，雅典就遭到了一场瘟疫，这场瘟疫毁掉了许多人，甚至夺走了伯里克理斯本人的生命。在这紧要关头，雅典力量大为削弱，军事统帅这个伟大职务就由克利翁接替。克利翁是个英勇的士兵，但却是一个粗野而无知的煽动者。他无力鼓舞，甚至无法赢得公众的尊敬。战争一年接一年地拖下去，非决定性的战役一场连一场，双方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伤亡惨重，于是他们于公元前421年签订了《尼西亚斯和约》，然后各自郁郁不乐地回到了自己荒芜了的祖国。

《尼西亚斯和约》只不过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所签订的不顾一切的两派和约。两大力量都忽视了他们的盟国，而在两国之间互相瓜分有争议的力量和领土，从而极大地激怒了那些参加十年战争的其它国家。这种可以理解的不满迟早会发展成为新的武装冲突，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为了控制其盟国，雅典不得不借助极为强制的手段，包括彻底根除梅洛斯（Melos）城。

与此同时，国内的煽动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继续煽动战争热。这些战争贩子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是阿尔西比厄德斯。他是伯里克理斯的侄子，苏格拉底的学生，是历史上一位才华出众的天

才。由于他的非凡魅力和无可争辩的才能，阿尔西比厄德斯能够哄遍雅典人支持他的计划，袭击西西里岛，目的是包围斯巴达，将她同西地中海切割开来。结果，雅典人于公元前415年发动了鲁莽的远征，他们轻率地将其生命抵押在这场战争中。

西西里之战的故事是历史上一个极为黑暗的故事。那些誓死守卫家园的西西里人不断地给他们的折磨者以致命的打击，最后迫使一大批雅典军队狼狈逃窜，几乎是无食无水。许多人由于饥渴而死在路上；另有一大批人死于游击战中。最后，在阿西那鲁斯（Assinarus）河边的最后一次抵抗中，雅典军队的残兵败将不是被彻底摧毁，就是沦为俘虏，还有许多人拚命吸饮血水解渴，忘了个人抵抗，因而被杀。那些未被杀死的成了奴隶，其中有许多人在采石场由于劳动时不留心而死去。正如修昔底德所说：

> “依我看，这件事件的巨大性在我们所知的希腊历史上还没有哪一次战争能与之相比。这还是胜者前所未有的荣耀，败者前所未有的耻辱……军队，战舰，一切的一切都已丧失殆尽，一大批人中只有几个活着回去。”

好像西西里战败本身还不足以令人畏惧似的，战争，正如人们可能预料到的，带来了更为恶劣的形势——斯巴达人重又对雅典发动了战争。在叛将阿尔西比厄德斯的建议下，斯巴达人于公元前413年进入阿提卡本土，雅典人发觉他们处于围攻之中。他们尽力聚集同盟力量，十多年来，他们在国内精心策划，殊死抵抗众多的敌人，最后精疲力竭，人力与自然资源全部耗尽。公元前405年，在赫勒斯滂的一次海战中，他们被击溃，时隔不久，战舰被摧毁，食物丧失殆尽，同盟国也开始反叛，最后他们不得不目睹羞辱性的一幕：斯巴达海军不用抵抗就进入了雅典港，占据了这个城市，摧毁了城堡。随着这种摧毁，雅典人重建过去政治

和文化荣耀的希望也随之破灭。

十、希腊的衰亡（公元前404—146年）

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标志着雅典的失败，它还是希腊文明飞速解体的开始。诚然，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最好的作品还未出现，但是光靠哲学家们的教诲还不足以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从政治上来说，随着伯里克理斯的死亡和雅典的战败，雅典就已经开始衰败，而希腊世界的领导权也就落到了比她远为逊色的国家手上。斯巴达战胜后，领导的帽子自然就落到了她的头上，但是斯巴达保守和固定的生活方式几乎难以胜任此职。不久她的地位就受到了其它城邦的强烈反对，而底比斯和西勒克斯是最为激烈的竞争者。在随后的65年里，各种势力不择手段地图权谋势，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希腊化世界的衰亡。从公元前350年到公元前338年，随着斯巴达的短暂优势，底比斯，西勒克斯和雅典各自短暂地重新获得了从前的领导地位，但是伟大的时代结束了。

这时，随着希腊各城邦在混乱中摧毁自己，一个外国势力在马其顿北部兴起。到了公元前346年，一些雅典领袖，包括演说家德摩斯悌尼，意识到希腊化自由的真正威胁体现在马其顿国王腓力浦身上。经过没完没了的争辩，雅典对她新近的对手宣战，但是于公元前338年被轻易地打败，于是希腊迅速地落到了腓力浦的控制之下。两年后，腓力浦被刺，其杰出但乖僻的儿子亚历山大继承王位，又凶残地统治了14个春秋，在这14年里，他征服了几乎全部地中海世界以及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随着亚历山大32岁早逝，其巨大帝国迅速瓦解，但是，尽管如此，马其顿的优势依然持续了半个世纪，只是力量已大为削弱。

随着内部力量的分散出现了外部力量入侵的威胁。到了公元前275年，高卢人正在吞食希腊世界的边境，尽管高卢人的入侵寿

命不长，且不具决定性，但他们对守卫者的士气却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比高卢人威胁更大的则是正在崛起的罗马人。公元前270年之后的125年里所发生的故事极为悲惨，因为西方年轻而强盛的侵略者的到来加速了希腊的衰败。从公元前214年起，训练有素的罗马军队几乎可以随意地打败马其顿人，吞没越来越多从前是希腊和马其顿的领土，直到公元前146年，整个爱琴海地区——现已被削弱得在军事和文化上显得无关紧要——都被随意地并入到罗马那庞大的版图之中。

注释：

①原注：伊文思将有些经文又归类为线性B，这些经文被迈克尔·范特里斯（1922—1956）所译解，是公元前1400年用希腊文的形式写成的，比已知的希腊文体要早500年。自从伊文思第一次发现后，大约有5千块拓片被发掘出来。还有其它一些经文，称为线性A，尚待译解，尽管有些学者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已取得了一些进展。见约翰·查德威克：《线性B的译解》（剑桥，1958）和雷奥纳尔·B帕尔玛：《迈锡尼和米诺斯，从线性B拓片的角度来看爱琴海史前史》（1962）

②原注：近年来的发现表明这可能是在这个地方所建造的第七座城市。

③原注：这场毁灭性胜利的大火痕迹在史雷曼所挖掘出来的皇宫城墙上仍可看到。

④原注："野蛮人"这个词并不像今天所沿用的希腊文一样含有贬意。对希腊人来说，这词含有近似"局外人"的意思。尽管希腊人觉得他们的文化比野蛮人优越，但他们还是轻易地认识到一些外国成分的价值，欢迎他们加入自己的行列。雅典的许多技师和教育家实际上就来自"野蛮人"血统。

⑤原注：古典史学家对军队力量所做的估计出入很大。这样，波斯人的估算数字从3万人到2万人。无人知道确切的数字。

⑥原注：还有一个由人民，而不是从人民中所选举出来的28位老人委员会，但实际大权还是在5人委员会手里。

第三章 希腊宗教

一、起　　源

和希腊的总体文明一样，希腊宗教主要来源于克里特和迈锡尼，以后逐渐嬗变，以满足更为理性但很少神秘性的欧洲入侵者的需要。至于这些入侵者的原始崇拜类型，我们一无所知。但他们对精神思想极为敏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宗教在整个希腊生活史上所起的作用中看出来。很明显他们从前一定有过一些神圣的礼仪和信仰，否则他们只需全盘照搬迈锡尼的形式，而不必对他们先驱者根深蒂固的东方观作重大的改进。

克里特和迈锡尼宗教明显基于自然神话，即四季更迭以及植物和动物生活的具体繁殖现象所体现出来的孕育、成长，死亡和再世。他们的男神和女神代表了这个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主神则与谷物和人类生活的繁殖思想有直接联系。因为女神更为清楚地象征着繁殖观，所以克里特—— 迈锡尼的主要神祇都是女性，而大地女神库柏勒则是所有神祇中最为重要的。

初看起来，希腊宗教似乎同克里特和迈锡尼的原始自然崇拜大不相同。早期宗教强调女性的怀胎和分娩职能，而希腊宗教则歌颂男性的授精能力，提高了男性的气力，进取心和勇气，贬低了女性的被动性和爱好侍奉的癖好。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希腊宗教观所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复杂的道德问题，而不是自然现象。即使是在荷马时代，在人们的眼里，诸神所感兴趣的主要也还是战争，政府以及人类美德等问题，而不是四季更替，或田野或家庭的繁殖力这些基本的义务。

但是希腊与迈锡尼宗教之间的这种区别看似明显，实际不然。

学者们，特别是19世纪的那些学者，详详细细地指出了希腊和东方神话之间的平行关系，甚至还指出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无一不可以直接追溯到克里特和迈锡尼的自然崇拜上。奥林匹亚山上大多数神祇的名字很少来源于希腊，而且，尽管性别重点已从女性转到了男性上，但是和东方崇拜一样，繁殖主旨也是原始希腊人所必不可少的。

我们不必提供学者们对希腊和早期的地中海神圣信仰的共同性所作的结论。对前面的段落唯一要强调的是宗教也和文明的其它方面一样是一个动力机构。尽管宗教从表面上看来经常保守，而且不善变化，但它总是不停地在变，以满足以后年代的需要，而每一年代都有其自身独特的问题。对于这个过程，希腊宗教也不例外。它经过了许多阶段，从学者们所推测的早期自然崇拜，经过神话和寓言时代，到荷马英勇的奥林匹亚时代，而这个时代在希腊戏剧中又渐渐地变得更加抽象，更富教训意义，也更加深奥。在各种各样的变化中，个人宗教观有时理性，有时神秘，但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神圣的信仰终于达到了理性与情感，道德观与神秘观这一合情合理的综合。

由于希腊宗教从早期到伯里克理斯时代一直在演变，所以人们对其特性和思想内容所作的浮浅陈述应该小心对待。人们必须记住，希腊文学包括近一千年的历史阶段，因此，随着希腊文明遇到了正在消逝的岁月的挑战，这段时期所反映的思想也经历了许多变化。同时人们还应该记住，尽管细节和阐释在不断地变化，但希腊宗教信仰之河却是广阔、深远而且非常强大的，在指导希腊生活的言行举止方面没有哪一种力量能与之媲美。

二、希腊人的创世观①

和希伯来人的万物起始观一样，希腊人认为宇宙起源于黑暗

和混乱。或许是因为希腊人热爱形式，光亮和秩序的缘故，希腊人将前世界想象成否定的地方，缺乏他们所尊崇的特性。因此，从混乱之中走出了被人认为是种抽象实体的诺克斯（光亮）和死亡之所厄瑞巴斯。

然而，从诺克斯和厄瑞巴斯那儿，由于一种无法解释的神迹，产生了厄洛斯（爱），预示一个充满了秩序和美丽的世界。厄洛斯第一次生了埃特（光）和赫墨拉（白昼），以后又生了该亚（大地母亲）和乌拉诺斯（天父）。这些早期实体被同时看作自然现象和神祇，从而为人们了解希腊人将无生物和抽象思想拟人化这个共同习性提供了一个基本线索。由于人们喜欢设想出一些具体的人物来代替无形的和超人的生物，因而便产生了众神。

乌拉诺斯和该亚的孩子是巨人族泰坦，其中有几位成了希腊和罗马作家所津津乐道的主题。泰坦族中有一位叫克洛诺斯（萨图恩或时间之父）起来造他父亲的反，于是诸神之间爆发了战争。在这首次天国革命中，克洛诺斯赢得了胜利，于是他和他的妹妹妻子瑞亚（奥普斯）一起统治宇宙，支配他的同伴阿特拉斯，普罗米修斯、厄庇墨透斯和俄该阿诺斯。

克洛诺斯唯恐他的子孙进行同样的革命，于是每当孩子们生下来他就将他们吞下去。后来，瑞亚偷偷地藏起了第六个孩子宙斯（乔夫，朱庇特），将他和他的小弟弟哈得斯（普路托，迪斯）和波塞冬（尼普）抚养成人。宙斯长大后领导了一次反对泰坦的起义，成功地推翻了克洛诺斯的统治，他父亲一直耽心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从此他成了“诸神和众人之父”，将宇宙分给他的兄弟。他吩咐哈得斯主管阴间，即死人的住所，从此哈得斯神的名字就成了阴间的代名词。他指派波塞冬管理海，而自己则主管天地。众神住所据说是在高高的奥林匹亚山上，那儿从不落雪，也不下雨，在这里众神可以像其他的任何亲密朋友一样，畅饮美酒，欢笑，争吵，生气，相爱，尽情欢乐。

征服了克洛诺斯后，宙斯让其他的泰坦人去做各种工作。阿特拉斯被迫将世界扛在他的肩上，厄庇墨透斯则被指派去创造动物和人。同其名字（意为“事后的思考”）相符，他先创造了动物王国，然后赋予他们以各种长处，如迅速、力量，毛以及翅膀，结果反而没给人留下什么来同动物保持一致。最后他去求他的兄弟普罗米修斯帮忙。普罗米修斯(意为“事先的考虑”)已经小心地从宙斯那儿偷来了火（宙斯将它秘密地藏在空芦秆里）。他将这火送给了人类，这样，人就可以用它来制造自卫武器，创造自我改善的工艺美术。在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里，这件火的礼物被用来象征人类优于动物的所有特性。

由于对宙斯的蔑视，普罗米修斯被绑到一块大石头上。虽然孤独，但他毫不畏惧。他无情地嘲弄宙斯，告诉宙斯说他心中有一个秘密，可以预见到他最终的解脱以及宙斯本人的灭亡。为了强迫他吐出秘密，宙斯派了一只鹰每天去啃他的肝。但是这肝一到晚上又复原了，第二天再被啃掉。没人知道他的秘密，直到伊娥，一个和他一道受到宙斯迫害的同伴引起了他的同情。伊娥是一个凡人，宙斯曾想得到她，在大地上铺上了一朵云，这样他的妻子赫拉（米诺）就不会发现他在作爱，但是云本身引起了赫拉的猜疑。她突然来到这对恋人面前，宙斯想挽回困境，于是将伊娥变成了一条牛。赫拉请求得到这头牛，宙斯看到无计可施，否则要引起她更多的猜疑，于是只好胆小地同意了她的请求。赫拉于是将这头牛交给百眼巨人阿耳戈斯监管。宙斯想营救伊娥，派赫耳墨斯去给阿耳戈斯讲故事，为他弹琴，哄他百眼一起闭上睡觉，当阿耳戈斯最后一只眼闭上时，赫耳墨斯杀死了他。注重实际的赫拉用这些眼睛去装饰她的宠物孔雀的尾巴，在孔雀的羽毛上仍可看到阿耳戈斯的眼睛。赫拉还持续不停地迫害她丈夫的情人，给已成牛形的伊娥送去了一只大牛虻，使她片刻不得安宁，这只牛虻还追逐她飞过了整个地中海。

孤独的伊娥恍惚之间飘游到了缚绑反叛的泰坦的大石面前，普罗米修斯安慰她，预言宙斯最终会把她变回一个女人，她的后代赫拉克勒斯（海格力斯）会射下大鹰，把他拯救出来。他还预言宙斯会和海里的女妖忒提斯生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最终会推翻他的父亲。这个预言并未实现，因为赫拉克勒斯在解救了普罗米修斯后成功地软化了宙斯和普罗米修斯的傲性，使得二人和好如初，于是普罗米修斯也吐出了他的秘密。宙斯从普罗米修斯那儿学到了智慧后，中断了同忒提斯计划中的风流韵事，最终保住了王位。希腊人习惯于赋予他们的神以人性，这一点在这里再次得到揭示，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神祇和人一样可以积累经验，增长智慧。

与此同时，人性的创造已经造成了尘世间的烦恼和天国间的冲突。第一个女人就是神祇自己在奥林匹亚山上创造的。每一位奥林匹亚神都将自己的特长贡献一些给这位女性，有阿芙罗狄蒂的美貌，赫拉的家庭美德和雅典娜的智慧等等。由于这个原因，第一个女人取名为潘朵拉，或“众人之礼”。于是她被派到地球上去惩罚人类，因为人类曾经收到过窃物（宙斯之火），变得多谋善断，不同凡响。诸神给了潘朵拉一只盒子，不许她打开。但是，她无法控制她的好奇心，于是打开了盒子，放出了所有的罪恶，自此折磨着人类。慌乱之中，潘朵拉合上了盖子，成功地保留了盒子里的最后一件事物，这就是希望。另一个传说是希望是普罗米修斯赐给人类的礼物之一，这个传说似乎更合乎逻辑。

三、奥林匹亚山神

与此同时，众神之父宙斯与女神和凡俗女子之间的风流韵事不绝如缕。他妻子赫拉一直感到嫉妒，因此宙斯这位不朽的主宰常常发现自己扮演一个妻管严的角色，他有许多越轨的行为，而

且常常以逃避妻子的监视而自豪。

希腊文学研究者经常发现诸神之间的口角和婚姻上的不忠，这同神的形象和伟大似乎很不相称，但对希腊人来说这种情况极为正常。和许多早期宗教一样，众神之父既是自然精神又是英雄。宙斯不仅象征了权势和力量，而且还是男子特性的原型。所以，主张一夫一妻制的希腊人尽管不可能像东方人那样给他们的主神以众多的妻子来满足他的繁殖力，但他们还是自然而然地将他看作众人之父。

但是希腊人一方面拒绝多配偶制，另一方面又觉得婚外行为并没什么可怕的，特别是一个神有权去享有而且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在这方面，希腊人的反应是贵族式的。他们相信社会地位以及和社会地位平行的特权和职责。如果神祇不得不承担处理人类各种事务这一伟大义务，那么作为这些努力的回报，他们应该享有特权，这是再公正不过了。无论这些神祇做什么都是对的，因为他们的行动决定了他们的性质。

与此同时，希腊人认识到许多武断的举动，都是神祇特有的权力，凡人是无法模仿或企及的。如果一个人觊觎这些特权，那么他就犯下了倨傲这个弥天大罪。所谓倨傲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目空一切，把自己和神祇相提并论。希腊人根本不知道恐惧，怕神观对他们来说极为陌生，但在这一方面，他们用发怒和报复观来看他们的神祇。神祇嫉妒他们的权力，一刻也不能容忍人类去僭越神祇自己的特权。这种倨傲带来了难以逃脱而且常常是可怕的惩罚。尽管在希腊传说里没有几位罪人被描绘成受到永久折磨，但是那几位目空一切，无视神威的人一直有一种负罪感。

然而，尽管奥林匹亚众神享有一切势力和特权，但他们也不是无所不能的。尽管他们高高在上，比人类强大、聪明、高贵、美丽，但他们也决不是至善至美，天下无敌。他们还得屈从于命定论这一更高的势力。通常他们事先就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但与

此同时他们也无能为力。比如，尽管宙斯事先知道他儿子萨耳珀冬会死去，但在特洛伊围攻时他也无力挽救他那凡俗儿子的生命。他还无力完成同海中女妖忒提斯意念中的结合，因为他知道忒提斯的儿子命中注定要比其父强。

希腊神祇的另一个权力局限常为人所忽视，这就是，同其它国家的许多神祇不同，他们本质上不是创造者。他们没有创造宇宙。他们可以创造甚至摧毁低级生物，但他们既无权去塑造事物本身，也无力在任何想象的程度上去与开始就注定了的事情进行拼搏。必须牢记的是，奥林匹亚山神自己也历经了多年演变，来到这个世上不过几个朝代，因而根本不可能同犹太—基督教的造物主上帝观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因此奥林匹亚众神的神威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希腊人眼里，他们有局限性，易犯错误，即使这样，他们也高踞于人类之上，除了特权以外，什么都值得人类去模仿。对希腊人来说要想把他们看成是完美无缺那是很困难的，希腊人认为至善至美遥遥相隔，人类事务中不可能出现。他们倾向于认为神祇高高在上，人类难以企及，然而他们并不脱离尘世特征，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人类都可以从神祇的特征中看出自己的影子。

四、人类的降临

但是希腊人一方面用神祇来观照自己，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自己相对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不错，他们不像基督徒那样过分强调人类堕落的因素，但是同传说中的过去的荣耀期相比，他们对目前现状感到悲观。

根据赫西俄德的记载，人类经过了几个时代，且一年不如一年，在黄金时代，人类住在永久泉里，无须劳作，因为自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气候温和适宜，无须遮蔽。既然一切充足，战争

和冲突也就不存在了，私有财产无人知道。下一个时代为白银时代，这个时代引来了四季，因而人们必须工作方能获得食物和遮蔽冬寒的避难所。这样财产观开始出现，随之埋下了个人嫉妒和冲突的种子。第三个时代为青铜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冲突成分开始成形。但是这种冲突起初只是竞争活动，和现代生存斗争中的阴谋诡计相去甚远。青铜时代之后是半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神话和故事中的许多大英雄游历四方，其英勇事迹仍为诗人所称颂。但这光辉时代转瞬即逝，随之而来的是现在的铁器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已变得腐化堕落，醉心于金钱与权势。这样希腊人以其独特的方式吻合了希伯来的人类堕落观②。

五、阿波罗崇拜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希腊宗教中的荷马，或古典方面。现在我们必须考虑一下公元前6世纪以及后期的神圣信仰和实践，以便更清楚地了解黄金时代的生活和艺术所体现出来的道德伦理问题。

荷马以后的几百年，希腊文明日趋繁荣，所以人们期望宗教应该逐渐地强调从道德或寓意方面来阐释众神及其事迹，而不应过分强调早期的英雄神话风味。从公元前5世纪的作品中，人们可以明显看出受过教育的希腊人已不再将奥林匹亚众神看作是荷马观念上的实际存在，而是将他们看成理想的拟人化和人类行为准则的隐喻式楷模。比如在《普罗米修斯》里年轻的宙斯代表权势，而普罗米修斯则代表知识和狡诈。这两个人物都易走极端，只有历经艰难困苦方才缓和各自的态度。除了别的成分，这出戏主要告诉人们政府里的机制是宙斯原则和普罗米修斯原则的融合，权力和知识本身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并赋之以仁慈和怜悯方可行之有效。有关黄金时代希腊文学里奥林匹

亚众神的寓意运用而不是字面运用还可以举出许多其它的例子。总而言之，人们可以说，公元前5世纪之前，希腊宗教起源于民间，后来进入了理性和诡辩的时代。

在这第二次宗教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神是阿波罗，他代表了合理秩序，因而被看作道德与政治法律的施与者。要想行之有效地崇拜他，人们就必须紧密遵循社会或道德礼仪以及国家的约束，这种遵循的强制性更多地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更多的是害怕失去自尊，而不是害怕法律惩罚。德尔斐阿波罗神殿的墙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各种格言，以证明所需要的合理的自我约束教养："抑制你的精神"，"遵循限度"，"憎恨倨傲"，"保持一张虔诚的口舌"，"惧怕权威"，"臣服神祇"，"荣耀不在力量"，还有极为重要的"了解自己"，"不要过分"。③

或许阿波罗原则的最好解释是在希腊戏剧里。尽管戏剧起源于阿波罗的对手狄俄尼索斯的传说，但是大多数个别戏剧的信息在格调上主要还是阿波罗式的。在这些作品中，传说人物告诫观众不要骄傲自满，目空一切，要尊敬神祇，服从命运，特别重要的是，万事要遵循中庸之道，违背这些原则将导致个人不幸和毁灭，甚至还有可能引起阿忒④，这个诅咒决定着一个家庭或部落的命运，除非形势得到好转，神祇之怒得以平息，否则就要危及到几代人。就残存下来的希腊戏剧来说，几乎所有的戏剧都含有这个道德信息，所以人们几乎可以将戏剧看成是阿波罗的《圣经》，正像荷马史诗是"古典"奥林匹亚宗教的《圣经》一样。

除了道德准则来源外，阿波罗还被看成是政治法律的阐释者（在有些城邦还是施与者）。对各种法律的公然违抗被认为是对神的直接触犯，人们经常借助神威来审判各种违法者。惩罚之后是赔罪。罪犯必须偿还受害人的物品，或者等价物，另外还要加罚金，以安抚受害人的心灵所受到的创伤，以此来平息阿波罗的愤怒。遇到袭击或谋杀案时，原始希腊人的惩罚原则是以牙还

牙。如果不做这些补偿，那么受害人的心灵不仅死后难以得到安慰，而且还会被拒于灵魂王国之外，这样他们就会反过来折磨罪犯及其子孙。后来正义观渐趋完善，这种直接的以牙还牙方针得以改进，这就是要考虑到实际案情。要根据犯罪的程度及其意图进行惩处，要合理地考虑到犯罪行动后面的动机。如果罪犯身份不适，那就由公众来诅咒他，用这种诅咒来折磨他及其家庭，直到他认罪，并作出适当的补偿。

从这些笼统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阿波罗主要是扮演希腊文明平衡轮的角色，借以保持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平衡。人们可以运用理智来理解他，通过约束和中庸之道来崇拜他，如果有人违反了他的法律，那么人们可以通过慎重而合理的惩罚来对他加以安抚。在文艺领域，他的精神主要体现在超然冷漠，具有平衡匀称之美的神殿上，体现在其塑像高贵的平静上，还体现在丧葬雕塑有节制的告别姿式上，或悲剧背后所暗示的中庸之道上。和其他神祇不同，他的精神垄断了希腊人的思想和生活，正是这种精神的影响产生了我们所认为的代表了古典主义精华的平衡的、合乎逻辑的和有秩序的生活方式。

六、狄俄尼索斯崇拜

尽管阿波罗精神看上去垄断了希腊人的生活和艺术，但是如果有人认为希腊主义完全缺乏神秘主义、感情和狂喜这些人生所必不可少的成分的话，那么他是极不明智的。排除这些成分不啻于违背希腊文明所追求的平衡。尽管希腊表面上看去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但他们也绝不会拒绝一切安逸生活。希腊人对感官和感情的崇拜尽管由于过分而遭到人们的反对，但它在希腊历史上无时不在，最终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如果更加约束一点），后来几乎所有的希腊城市都将它列为官方的宗教礼仪形式。这些崇拜中

极为重要的崇拜是对葡萄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崇拜，对他的祭祀活动最终产生了戏剧。

狄俄尼索斯只是一个半神（他有一个凡人母亲），荷马没有把他看作神。他是宙斯和底比斯国王卡德摩斯的女儿塞墨勒的儿子，所以他的出世极不正规。宙斯疯狂地爱上了塞墨勒答应接受她所提出的一切，而天父的妻子赫拉则醋劲十足，她在塞墨勒做梦的时候促使她产生一种想见情人的天国荣耀的欲望，于是这个姑娘相应地提出了这个要求。宙斯想劝阻她，但她坚持不让，因为有约在先，所以这位天父只好同意了。宙斯一阵闪电出现在塞墨勒面前，结果将她击死，而赫拉则报复成功。塞墨勒死时已怀了宙斯的孩子，于是宙斯奋力抢救，从这位不幸母亲的遗体里抢出胎儿，将他藏在自己的大腿里，直到小孩出世。

塞墨勒的姐姐伊诺想把新生的狄俄尼索斯当作自己的孩子来抚养，但是老羞成怒的赫拉惩罚了这个不虔诚的愿望，将她和她的丈夫逼迫得发疯，又使得他们毁掉了自己的孩子。于是，为了保护孩子不受赫拉的迫害，宙斯将他送到尼萨（Nysa）谷给赫耳墨斯照管。在尼萨谷他被许阿德斯，即一帮仙女抚养成人。后来宙斯为了报答她们，将她们变成一座星团。

一旦成人，狄俄尼索斯的麻烦就来了。他的国家没人奉他为神明，他被迫在尘世间游荡，教人葡萄种植术，从而赢得了一帮名为迈那得斯或西勒诺斯的门徒（巴克斯为狄俄尼索斯的罗马名字，因此罗马人又称这些门徒为巴克斯的女祭司）。这些门徒醉心于成长和繁殖，但她们也桀骜不驯，纵酒过度，有时甚至还残忍好杀。我们现代人对醉鬼以及毫无节制的生活所怀的一些偏见恐怕就植根于古代这些狂热信徒所过的纸醉金迷的生活上。当然，狄俄尼索斯的同龄人不太欢迎狄俄尼索斯及其狂暴门徒的到来。他受到色雷斯国王吕科古斯的强烈反对，因而被赶出这个国家，来到了海上。在他的出生地底比斯，他被他的堂兄彭透斯国

王囚禁起来，出于无奈，他让底比斯所有的女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在一阵狂乱中，她们翻过脸来将她们的统治者撕得粉碎。还有一次，他被一群海盗捉住，为了拯救自己不受折磨，他只需做一下走江湖卖膏药的生意，那些捕捉者简单的头脑就一下子被这魔术吸引住了。他让海盗船在狂风巨浪中停止不前，让酒从船帆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滴，让绿色葡萄从桅杆上开花结果。后来，在那惊心动魄的最后一幕中，他变成了一只咆哮的狮子，那帮压迫者吓得魂不附体，纷纷跳入水中，一个一个地给淹死了。最后，他被诸神接纳为他们的一个成员，于是经过一生的尘世折磨，狄俄尼索斯来到了奥林匹亚山，在诸神中占据了一个合法的席位。⑤

直到公元前 6 世纪狄俄尼索斯才被希腊人完全认可。只有到了那时他那矛盾的特性才变得清晰起来。酒，繁殖，和生活的乐趣，所有这些都被视为人的宝贵财产，但是人们也意识到如果使用不当，这些就是无情的毁灭性力量。如果使用得当，他们可以给人以活力，狂喜和希望，而这些都是人们在处理生存困难时所必不可少的；他们可以给人一种创造力，一种成长观，从而使生活变得生气勃勃，而不会消极绝望。正是由于这种肯定观，公元前 6 世纪的希腊人才形成了伟大的狄俄尼索斯节，从而产生了戏剧。

在这些节日中，3 月份的大狄俄尼索斯节最为重要。这是一个 3 到 5 天的节日，主要是举行街道游行，上演喜剧和悲剧以及举行盛大仪式，祈求神祇保佑来年五谷丰登。另一个节日，小狄俄尼索斯节，在12月份举行。这个节日主要是庆祝狄俄尼索斯一年一度三个月的访问。⑥ 由于这个访问和阿波罗按照惯例到北极去做一年一度的旅游极为吻合，因此希腊人最终有可能将对这对神的崇拜合二为一，在冬季将阿波罗神殿暂时供为狄俄尼索斯神殿，到了 5 世纪，阿波罗成分和狄俄尼索斯成分的这种融合已渐完善，希腊宗教正式承认理智与情感，约束与迷狂这些真正的精

神满是所必不可少的成分。

七、神秘的宗教仪式

如果不简单地描述一下俄耳甫斯和厄留西斯的神秘崇拜，那么对希腊宗教的任何概括都难以完善。前者同意大利南部的毕达哥拉斯神秘秩序紧密相联。这个崇拜来源于俄耳甫斯传说。俄耳甫斯是个年轻的音乐家，他能弹善唱，其美妙的音乐可以使猛兽俯首，甚至连石头都为他的旋律所感动。但是他一旦失去妻子欧律狄刻，那么他就会变得萎靡不振，那时连神祇都为之感动，容许他到冥间将欧律狄刻带回人世，条件是他不能回头看他妻子的脸，直到她脱离冥间。不幸的是，就在尘世的门口，俄耳甫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结果，由于违反神祇的意愿，她又被从他身边夺走，回到了冥间，悲痛之下，俄耳甫斯操起了七弦竖琴，强烈地唱起了他的过错，结果神祇怜悯，将他所钟爱的欧律狄刻重又还给了人间。

这就是传说，而且是个美妙的传说，由于格鲁克歌剧那熟悉的音乐而变得更为美妙。但是对于俄耳甫斯崇拜来说，故事的主要成分倒不是其浪漫情节，而是将俄耳甫斯表现为一个访问冥间又回人间的人。故事不仅被解释为一个自然神话—在这个神话里，欧律狄刻的死亡与复活代表了谷物循环，而且被解释成永恒信仰的基础，在这个信仰里，一个人被视为在以后的化身中具有多重生命。人类生存中的不朽因素是灵魂，死后返回冥间，在那儿经过一千年的净化后，脱胎换骨，重返人间。俄耳甫斯派将人生视作一只可以旋转的轮子，这样，在其旋转过程中，有一半会在光亮中，有一半会在黑暗里。灵魂被视为依附在轮辐上，一会儿出现在光亮（生命）里，另一会儿又会沉到死亡的阴影里。然而，灵魂希望脱离这种不停的运动，从轮子中解脱出来，获得安

宁，而这种状态只有当灵魂达到完全净化后方能达到。于是俄耳甫斯派认为，个人应该正直善良，这样在以后的化身中他的灵魂才会变得日趋纯净，最终脱离轮子，进入永久的安宁。

在这条信仰上俄耳甫斯派嫁接了一系列广博而复杂的教义和权威，其基础据说是俄耳甫斯本人的作品。他们还设立了一个祭司班来解释这些作品，鼓励并支持人们严格遵守这些秩序礼仪。冥间不仅仅被解释为死亡王国，而且还是报复与惩罚之所。罪恶的灵魂被送到塔耳塔洛斯那火一般的地狱里去接受净化，犯罪轻的则被送到哈得斯，根据是非功过，他们可以享受相对的祝福或痛苦，等待下一个化身。最伟大的灵魂则被送到天堂之野，或福禄王国。尽管这地方可能被视作短暂的安息处，但她却代表了最高形式的天福，除了无限的，无始无终的无，而这种无只有完全净化了的灵魂才能得到。

尽管在希腊时代俄耳甫斯派相对而言不太引人注目，但他们的崇拜在公元前 5 世纪和 4 世纪脱颖而出，后来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变得声誉卓著。文学中最著名的俄耳甫斯主义出现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第六卷，即埃涅阿斯来到冥间这个故事。但是这种崇拜影响更为显著的标志则体现在俄耳甫斯派的宗旨和基督教神学几个最基本的要点之间的直接类似上。

希腊文学中比俄耳甫斯派更为重要但是尚未得到清楚阐释的是厄留西斯神秘崇拜⑦。这种崇拜在公元前5世纪成了雅典的官方宗教。这种宗教的信徒誓死保护这种神秘的仪式，这些秘密保存得如此之好以至于我们对这些宗教仪式的所有活动一无所知。毫无疑问，程序一定令人难忘，许多人在其作品中流露出了这种令人畏惧的礼仪。根据诗人品达。“见到这些事情的凡人必须蒙福；他知道人生的终极，他知道神赐的开始。”从这个陈述以及许多类似的暗示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厄留西斯神秘和俄耳甫斯神秘一样植根于季节神话，说不定还和灵魂不朽有关。然而，他

们所塑造的这个传说不同于俄耳甫斯传说．相反却和人所共知的五谷女神得米特之女普西芬尼的传说有关。普西芬尼被冥王哈得斯从她母亲那儿偷走，后来众神同意她在春夏播种季节回到尘世，条件是余下的六个月她必须同其丈夫在冥间度过。

然而，同俄耳甫斯派不同，厄留西斯的信徒们没有一套成文典据，没有世人皆知的教义，也没有世人皆知的专业祭司阶层。每年这些礼仪在固定的时间里由受过训练的业余活动者举行，这些业余活动者的固定职业同宗教毫无关系。但是这些神秘的宗教仪式给雅典的思想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而厄留西斯神秘主义则体现在从埃斯库罗斯到柏拉图等人的希腊文学里。

最后谈一谈希腊人对宗教崇拜的一般态度。很明显，希腊社会从一开始似乎就很虔诚，每一个希腊人所一直关注的是如何取得道德上的杰出和精神上的成熟。然而，正如今天所知，希腊人没有什么正式宗教。他们庆祝神圣的节日，用动物来祭祀他们的神，相信神谕和预兆。然而，尽管他们带有这些众多成分的礼仪崇拜，但是他们对正式建立起来的教会所具有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及其精神，甚至暂时的权威依然感到迷惑不解。同样使他们迷惑不解的是人的原罪观或度日受罪和自我克制这些来世生活的奖惩观，对大多数希腊人来说死亡代表着一种不受欢迎但也并不使人痛苦的迁移，即从尘世间来到模糊不清但并不是令人讨厌的哈得斯冥间。他们对这种方式并不感到惊慌失措，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意味着同其家人和朋友的暂时分别，使他们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大不了生活枯燥，无所事事而已。未来生活的报答和惩罚对他们毫无影响。这些事情只留给品德高尚者和道德败坏者；一般人与此无缘。

更令希腊人迷惑不解的是基督教教义中肉体和灵魂的搏斗以及前者的堕落本性。尽管柏拉图哲学多多少少倾向于这种区别，

但是一般的希腊人并不为自我轻蔑感所困扰。人当然有错，但并不是生来就坏。天生就坏恐怕是自相矛盾的，属于用词不当，因为一件事既是天生的，又怎么会是坏的呢？肉体的刺激是人类事务中的一部分，是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人应该享受生活，尘世方面或肉体方面的追求只是一大吸引力的几个部分。

这并不是说希腊人放浪形骸，或颓废堕落。事实上，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的道德，特别是雅典人的道德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尽管他们的人生观在我们看来有点模糊不清。我们已经见到他们的阿波罗并不提倡纵欲。他们全部的高尚观就植根于中庸之道上，无论什么时候，没有什么比不约束自己更令人憎恶了。醉鬼，饕餮，纵欲者以及傲慢的势利眼，所有这些在希腊人眼里都使人感到可恨，因为他们不美，而且愚蠢，因为他们违背了雅典伦理教义中两条极为重要的原则："了解你自己"，"不要过分"。

总而言之，希腊宗教主要还是伦理式的，而不是神秘式的或教条式的。希腊的年轻人从小就学伦理学，希腊文学和思想充满了一种无所不在的道德意识。他们热爱生活，追求尘世幸福，不为未来烦恼，但是这种对生活的热爱，这种幸福以及心灵的平静是根植在严格的公正原则上的。正如人类天性一样，他们并不总是遵循这些原则，但他们也决不掩盖这些想象中的自然丑陋，从而使他们的原则失去了社会效益。总的来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的"异教"思想似乎都不比人的想法坏，他们的行为举止非常激进，从而使这个民族充满了活力，他们追求人生的方式活泼健康，令人爽心悦目。

希腊神话中的主要神祇

泰坦族

乌拉诺斯（天父）和该亚（地母）的子孙。第一代由俄刻阿

诺斯、科罗斯、克里俄斯、许珀里翁、伊阿珀托斯和克洛诺斯这六个儿子和忒伊亚、瑞亚、忒弥斯、摩涅莫绪涅（记忆），福珀和忒提斯这六个女儿组成。伊阿珀托斯和其妹妹忒弥斯的结合生了普罗米修斯和厄庇墨透斯，而同海中仙女克吕墨涅的旁系结合生了阿特拉斯。克洛诺斯娶了瑞亚，成了泰坦族的领袖，宙斯、波塞冬和哈得斯的父亲。这三个兄弟后来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父亲，推翻了他的统治，建立了奥林匹亚王朝。

奥林匹亚山神："十二神"

奥林匹亚王朝大大小小的神祇中，最为重要的是12神。这群神由希腊人自己选取，是奥林匹亚神中的关键性神，成了希腊人大多数宗教礼仪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希腊法律还来源于12的观念，无论是在法庭诉讼中还是在日常会话中，希腊人的起誓都是"凭十二起誓"。

这群神有：

宙斯（朱庇特，乔夫）——奥林匹亚山神的领袖，闪电之神，权力原则的代表。

赫拉（米诺）——宙斯之妻，婚姻和家庭稳重之女神。

波塞冬（尼普顿）——海神，常被称做"震地者"，大概是希腊人将地震归之于海的缘故。

哈得斯（普路托，迪斯）——冥王，主宰死者王国。由于同普西芬尼（普洛塞尔皮那）的结合，因此他还同自然神话有联系，因为普西芬尼有一半时间在尘世度过（播种季节），一半时间在阴间度过（冬季）。哈得斯本人并不代表死亡，死亡这个功能被移交给了一个小神塔那托斯。

帕拉斯·雅典娜（密涅瓦）——智慧女神，但也同战争、工艺美术等其他观念有关。由于她全副武装地从宙斯的前额里蹦出来，因此她的出世不同凡响。她是雅典的保护女神，对他们来说，她象征着文明和艺术。

福玻斯·阿波罗——宙斯和莱托之子，莱托是泰坦克里奥斯和福珀之女。太阳神，弓箭手，主管真理，光明和医药之神。代表了智力美的原则。在德尔斐建造的供奉给他的神殿上，神谕宣示运用谜一般的语言揭示了诸神的意愿。

阿耳忒弥斯（辛西娅，狄安娜）——阿波罗孪生妹妹，月亮和狩猎女神。

阿芙罗狄蒂（维纳斯）——一说为宙斯和狄俄涅之女；另一说起源于波浪，爱和美的女神。

赫菲斯托斯（伏尔甘）——跛腿煅冶之神，煅造了宙斯的雷电。阿芙罗狄蒂的深受蒙骗的丈夫。

赫耳墨斯（墨丘利）——宙斯和阿特拉斯之女玛亚的儿子。宙斯的使者和仆人。商人，旅游者以及小偷之神。

阿瑞斯（玛尔斯）——宙斯和赫拉之子。战神。

赫斯提（维斯太）——宙斯的处女妹妹。灶神和家室之女神。在罗马，被信奉处女灶神的神圣妇女联合会所供奉。她在12人中的地位后被狄俄尼索斯所取代。

狄俄尼索斯（巴克斯）——酒神。宙斯和凡人女子塞墨勒之子。和得米特一样，同繁殖教义有关，和普西芬尼一样，秋季死，春天复活，代表了自然神话。厄留西斯神秘就是献给这三个繁殖神的。狄俄尼索斯节期间主要是狂饮作乐。由于戏剧通常在这些节日上演，所以狄俄尼索斯又成了戏剧神。代表了狂喜原则，和福珀斯·阿波罗的智力原则相反。

奥林匹亚小神

得米特（色列斯）——宙斯之妹，五谷女神。普西芬尼之母，繁殖的象征。

厄洛斯（丘比特）——赫菲斯托司和阿芙罗狄蒂永久的儿子，爱神，其顽皮的箭给世界带来了许多麻烦。

潘——赫耳墨斯之子，森林之神；有一对山羊似的触角和

脚，会吹笛，主管乡村娱乐。

尼米希斯——复仇女神，惩罚原则。

赫柏——青春女神，奥林匹亚山神的斟酒者。

伊里斯——彩虹女神。有时和赫耳墨斯一样，为诸神的信使。

许门——婚礼之神。

美惠三女神——阿格莱亚（灿烂），欧佛洛绪涅（欢乐）和塔里亚（花朵），宙斯和俄刻阿诺斯的女儿，海中仙女欧律诺墨之女。这三位代表幸福生活原则，而且总是被视作一个整体。

九缪斯——宙斯和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之女，学问和艺术女神；有如下几位：克利俄（历史），乌拉尼亚（天文学），墨尔波墨涅（悲剧）、塔利亚（喜剧）、忒耳西科瑞（舞蹈），卡利俄珀（史诗），埃拉托（情诗）、波尼许尼亚（圣诗）和欧忒耳珀（抒情诗）。

伊里逆司（复仇三女神）——提西福涅、麦格拉和阿勒克托，代表良心的痛苦，无情追逼做坏事的人。

命运三女神——配给每个人的命运。克罗托纺织生命之线，拉刻西斯将它织成图案以决定人寿长短，而阿特洛波斯则切断它，从而结束生命。

注释：

①原注：在以下的叙述里，主神的各个名字都放在括号里。有些神不止一个名字。有些神后来同罗马的神等同起来，因而获得了拉丁名字。

②原注：希腊人中还有大水的传说，讲的是宙斯由于厌恶人类的堕落，发了大水去毁灭人类。然而有一对夫妻，丢卡利翁和皮拉，事先得到了预告，于是他们造了一只方舟，安全地躲过了这场灾难。水退去之后，方舟停靠在帕耳那索斯山上，然后，丢卡利翁和皮拉重新造人，将石头从肩上往外扔，石头所到之处就会蹦出一个人，即刻长大。然而，这种异教繁殖法所产

生的人类是否就比大水以前的人类更为道德尚且值得怀疑。

③原注：除了展现这些说教外，德尔斐神殿还藏有阿波罗神谕，或祭司宣示所，以颁布诸事详细的忠告，从个人问题到主要政治方针，然而这些神谕常常模棱两可。

④译注：恶作剧和复仇女神，鲁莽蛮干，常给人带来灾难。

⑤原注：狄俄尼索斯的另一个传说——明显来源于克里特，但为希腊时代的俄耳甫斯崇拜所复活——将他同克里特神撒格鲁斯相提并论。撒格鲁斯是宙斯以一条蛇的形状访问冥间，和普西芬尼所生的儿子。由于受到嫉妒的赫拉的迫害，他不得不扮演各种角色。但他最终还是送了命，在扮演公牛的时候被泰坦撕得粉碎。这个故事解释了野蛮的克里特崇拜仪式，即狄俄尼索斯——撒格鲁斯袭击并杀死了一头活牛，从狄俄尼索斯死亡的重演中，崇拜者们象征性地分享了神本身的血肉。

⑥原注：有趣的是这两个节日和基督教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时间和功能相吻合。

⑦原注：这个崇拜之所以叫厄留西斯神秘崇拜是因为这些仪式在离雅典约二十英里的小城镇厄留西斯举行。

第四章　希腊神话和传说

一、特洛伊战争的起源

世界上最著名的传说就是特洛伊战争。没有哪一个冲突创造出如此众多的英雄或出现如此惊人的事迹，也没有哪一个主题为历史诗人所如此讴歌。《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鼓舞人心之处在于它不仅仅给我们提供了伟大的文学，而且在这些最早期作品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文化的泉源。

特洛伊为达达努斯所建。达达努斯是宙斯和海中仙女厄勒克特拉的儿子，他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达达尼尔海峡。特洛伊这座城是以达达努斯的孙子特洛斯命名的，尽管古典作家常常根据特洛斯的长子伊罗斯的名字将这地方称做伊利姆。这座为希腊人所攻陷的城堡是伊罗斯建造的。伊罗斯在一次摔跤比赛中赢得了

一头有斑纹的母牛，神谕吩咐他，只要牛一停下来休息，他就可以在这休息的地方建都。按照神谕，伊罗斯建造了这座城，并以其父的名字命名。这座城市受到了宙斯的祝福，宙斯还委派雅典娜女神来照料它的福利。

在伊罗斯的统治下，特洛伊过着一种宁静的田园般的生活。但是在伊罗斯的儿子拉俄墨冬的统治下，这座城市——也许是由于日趋繁荣和对外部世界渐渐关注的缘故——转向了保卫国家这一想法。在波塞冬和阿波罗神的援助之下，拉俄墨冬建造了特洛伊城墙，但是在工程完成之后却拒绝偿付他所答应给这些神圣帮手的报答。这两位神咕哝着些威胁的话离开了。出于同情，雅典娜也撤离了她对该城的保护。这样，特洛伊由于诈骗而遭到了神权的抛弃。

拉俄墨冬的王位后来由他的儿子普里阿摩斯继承。普里阿摩斯的妻子赫卡柏给他生了五个儿子：赫克托耳、帕里斯、卡桑德拉、波吕克塞娜和波吕多洛斯。就在帕里斯将要出世的时候，一个神谕告诉赫卡柏说她的第二个儿子会给特洛伊带来灾难，于是赫卡柏以国家利益为重，母爱退居其后，同意处理掉这个孩子。然而，正如神话惯例一样，幼小的帕里斯被一个牧羊人救起，并被抚养成人去照看羊群，他一点也不知道他的高贵血统。

与此同时，诸神已发誓要对特洛伊进行报复。他们采取高阶层外交圈子所惯用的迂回术慢慢向他们的目标前进。这个步骤开始于一个重大而豪华的婚礼，即珀琉斯王和海中仙女忒提斯，他们命中注定要成为希腊英雄阿喀琉斯的父母。奥林匹亚山上所有的要人都出席了，只有不和女神厄里斯的名字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从请帖单上除去了。为了报复，厄里斯向宴会厅扔了一只金苹果，上面刻有：“献给最美丽者”。于是女神们争吵不休，个个都想获得这个奖品。最后竞争者的范围缩小到三个女神身上，这就是赫拉，雅典娜和阿芙罗狄蒂。宙斯对女人了如指掌，因此

不愿冒这个险去评判她们的美貌，而是机敏地把在附近伊得山上放牧的天真的帕里斯叫来当裁判。为了帮助他做出决定，每一个竞争女神都向他保证，如果他能做出一个令她满意的答复，她会给他一个报酬。赫拉允诺他当地球上最富王国的统治者；雅典娜允诺给他智慧和男子汉气概，而阿芙罗狄蒂则精明得很，她充分了解年轻男子的冲动，许诺给他世上最美的女人做他的妻子。不用说，帕里斯发觉阿芙罗狄蒂的贿赂难以抵抗，于是爱情女神赢得了胜利。

帕里斯等待阿芙罗狄蒂兑现诺言等了好长时间，后来，他认为女神的话不可靠，于是娶了林中仙女俄诺涅，安居乐业。最后他来到了特洛伊，在那儿人们认出他是普里阿摩斯王丢失已久的儿子，于是他又恢复了社会中应有的地位。不过他仍和俄诺涅住在一起，直到有一天，皇家的一时兴致无意之中将他送上了获取阿芙罗狄蒂贿赂之路，并导致了预料中的特洛伊的摧毁。

多年以前，普里阿摩斯王的妹妹赫西俄涅似乎被赫拉克力士诱拐去送给希腊人忒拉蒙为妻。现在尽管时间耽搁已久，但是普里阿摩斯还是想去营救他的妹妹，于是就委派帕里斯去执行这个艰巨任务。帕里斯的弟弟得伊福玻斯警告特洛伊议会，这次任务将会使希腊人联合起来对付特洛伊，但帕里斯认为阿芙罗狄蒂会保护他，因此他向城市父老们保证他的努力一定成功。然后他配备了一艘大军舰和一支强大的军队离开了特洛伊。他们一路平安来到了斯巴达，发现墨涅拉俄斯王不在，他的王后，美丽的海伦正为他的不在感到烦躁不安，准备欢迎任何外国王子来散散心。海伦的天姿国色立即燃起了帕里斯心中之火，正像所有的男人见到她时一样，而她对这位英俊潇洒的武士也是一见钟情。很快帕里斯就忘掉了他的妻子俄诺涅，更不用提营救赫西俄涅这件事了。他带了几个亲信闯进王宫，将海伦当作战利品抢走了。斯巴达王后考虑到外交礼节，表面上还作了一些抵抗，但她的内心却

巴不得如此，很快她和帕里斯一道驶向特洛伊。不用说她对这个命运心满意足。

在回来的路上，海神涅柔斯诅咒帕里斯的行为，预言一场血战将会导致特洛伊的陷落，时隔不久，希腊人就开始实现这个预言。墨涅拉俄斯，这位深受委屈的丈夫，提醒几位希腊领袖他们在几年前所起的誓，即保护海伦的荣耀，很快全希腊都响应号召，全副武装起来，只有诡计多端的奥得修斯暂时撤销了他的支持。奥得修斯认为为了一个意志薄弱的女人而去兴师动众简直是白费精力，他假装头痛，这样就可以逃避诺言。当墨涅拉俄斯的使者前来征求他的援助时，他显得疯疯傻傻的，将一头牛和一头驴套在一张犁上，然后就用这对不相称的工具犁地，将盐而不是种子撒到犁沟里。然而使者并没有被这场滑稽戏所欺骗，他们将他的儿子忒勒玛科斯放到要耙的田里，从而结束了奥德修斯的表演。当他举起犁耙避开他儿子的时候，他便暴露了他的神态，从而被迫加入了军队。

未来英雄阿喀琉斯也是差点逃了兵役。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母亲忒提斯生怕他在战争中丧命，将他打扮成一个女孩。然而，到了海伦被拐的时候，年轻人的声音已经变调，开始长起胡须来，于是他不可能再继续扮演女孩了。当局很快认出了他的伪装，强迫他服兵役，于是阿喀琉斯同意应征，并向战争贡献50艘船。

于是为了这个光辉业绩，希腊人组织了起来，精力充沛的阿伽门农成了联军统帅。大军集结在欧力斯城的波依沙港，准备用一千艘船向特洛伊发起进攻，为希腊女人的荣誉复仇。

但是命运又给希腊人设下了另一个障碍。在一次狩猎远征中，阿伽门农不敬地杀死了阿耳忒弥斯女神的一只神鹿，出于报复，女神使海上风平浪静，这样希腊舰队不得不在欧力斯港停靠，一连就是好几个星期。绝望之中，阿伽门农向预言家卡尔卡

斯求教，卡尔卡斯预言只有牺牲阿伽门农所钟爱的女儿伊菲革涅亚方可平息阿耳忒弥斯的愤怒，恢复顺风。阿伽门农惊恐万状，不敢迈出这一步，但他的责任感和其他英雄的恳求最后敦促他付诸行动。他把女儿叫来，声称准备把她嫁给英勇的阿喀琉斯。他把她带到祭坛上，那儿卡尔卡斯正操刀相候。等到伊菲革涅亚意识到等待她的将是什么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于是她苦苦哀求她父亲饶她一命。但是阿伽门农毫不动摇，于是顺从的女儿只好等待着祭祀的那一刻。正在这时奇迹出现了。正当卡尔卡斯举刀向伊菲革涅亚的喉咙砍去的时候，女孩不见了，在她躺着的地方躺着一只羊，脖子上还在冒血。在这最后一刻，尽管伊菲革涅亚本人不见了，但阿耳忒弥斯替换了一个牺牲品。与此同时，风起来了，希腊人为这双重解脱欢呼雀跃，冲进战舰，起锚驶向特洛伊。

不用说对特洛伊战争最为精彩的描述是《伊利亚特》，但是必须牢记的是，那首伟大的诗歌只包括了十年战争的一个简短插曲。从离开欧力斯港到荷马史诗开始，几年过去了，在这九年里参加作战的希腊人历经沧桑。首先，英雄菲罗克忒斯在一次海滨远足中被一条蝰蛇咬伤，不得不留在后面等死。其次，希腊舰队误停小亚细亚海岸的密西亚，以为这些密西亚人就是特洛伊人，同他们展开殊死搏斗。还没等错误纠正过来，忒勒福斯王就被阿喀琉斯的矛击中，伤口很难治。后来他们弄清楚他们实际上是在同盟友打仗，于是希腊人想尽各种办法去弥补过失。他们请来了名医以减轻忒勒福斯的伤痛，并且等了好几个星期，直到这位不幸的国王痛楚有所缓解。最后，在神谕的指导下，矛的锉屑塞进了伤口，于是忒勒福斯得以痊愈。

这些不幸事件整整耗费了三个月的时间，等到千条战舰抵达特洛伊的时候已是早春了。他们搭了一个大帐篷，特洛伊人看到强大的敌军感到浑身发抖。这场战争一拖就是几年，双方都没得到多少好处。后来希腊人捉住并杀掉了特洛伊普里阿摩斯王的儿

子波吕多洛斯。这个暴行激起了特洛伊人的仇视，战争于是发展到一个高潮。正是在这儿，也即战争的第十年，《伊利亚特》开始。

二、阿特柔斯家族

纵观古今文学，在所有被诅咒的家族中，阿特柔斯家族是最不幸的。一代又一代，坦塔罗斯的后裔之间充满了谋杀、欺骗、通奸、亵渎、同类相食和精神错乱，但他们也保存了一种力量和高贵，几乎达到了悲壮的程度，在遭受真正悲剧的日常人看来，这种力量和高贵只不过是种反常的表现。除了家族的缔造者坦塔罗斯，大多数成员似乎在每一件事上他们都身不由己地陷入到罪恶的深渊里。不管怎么说，在古典文学里没有哪一个家庭如此出类拔萃，无论到了哪一个年代，读者们对坦塔罗斯，尼俄柏，珀罗普斯，阿伽门农，墨涅拉俄斯，克吕泰涅斯特拉，伊菲革涅亚，厄勒克特拉和俄瑞斯忒斯都不会感到陌生，他们的业绩和不幸形成了古典小说的核心。

和大多数古代希腊家庭一样，阿特柔斯家庭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宙斯本人。在神的许多凡人子孙中，坦塔罗斯最得宠，因为他可以和诸神一起品尝美酒佳肴，奥林匹亚山上的贵人有时甚至纡尊降贵，到坦塔罗斯家去做客。很明显所有这些荣耀使得坦塔罗斯昏了头，因为他变得傲慢起来，甚至玩弄了一个可怕的计谋去降低那些将他提高到众人之上的诸神的威信。在一次宴请奥林匹亚山神的宴会上，坦塔罗斯上了一盘炖肉，里面盛的是他的亲儿子珀罗普斯。他想不知不觉地让他的客人们变成食人肉者，从而证明他们并不是无所不知或一贯正确。很自然地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诸神立刻认出了恶心的炖肉，于是惩罚了这个堕落的罪人，将他送到哈得斯，让他永久受到饥渴的折磨。无论什么时

候他想喝水，水就会从他唇边消失；无论什么时候他想摘取头顶树上那丰硕的果实，树枝就会向上翘起来，让他够不着。这样他因为这傲慢一直受到可怕的折磨，希腊人认为这是一切罪恶之最。

惩罚了坦塔罗斯后，诸神又让珀罗普斯复苏，但是强力的诅咒依然缠住他们家族。珀罗普斯向希波达弥亚公主求婚，但得和她的父亲俄诺玛诺斯王比赛驶车。如果珀罗普斯赢了，那么他可以将希波达弥亚娶为新娘；如果他输了，那么他的人头就要落地。为了确保赛车的胜利，珀罗普斯贿赂了国王的车夫密耳提罗斯，让他用蜡做的制轮楔换掉国王车上原来的制轮楔。结果，在比赛中，俄诺玛诺斯的车子翻掉了，主人也落马身亡，而珀罗普斯则赢得了公主。和歹徒一样，得胜者将其帮凶密耳提罗斯扔进大海除掉了，认为他是个将来有可能泄密的揭发者。这个举动激怒了众神，从而给这个家族又增加了一连串的不幸。

坦塔罗斯的女儿尼俄珀似乎一度逃过了神谴，因为她幸福地嫁给了宙斯的俗子安菲翁，安菲翁是个杰出的音乐家，他的演奏使石头都为之感动。尼俄珀和安菲翁一起过得舒适、安逸，并为自己有七个英勇的儿子和七个可爱的女儿感到快乐。但是母性的自尊心很快使她变得神态失常，和她父亲坦塔罗斯一样，尼俄珀沉浸在壮观的幻觉之中。她轻蔑地命令底比斯的友人不要再去崇拜女神勒托，因为她只生了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这两个孩子，而应去崇拜她，因为她生了十四个。除此之外她还嘲笑说勒托只是一名孤弱的无名小卒，而她，尼俄珀，却是一位伟大而声势显赫的王后。她说得太多了。奥林匹亚山上的强大神祇从不会原谅这种自我主义，他们无情地惩罚了渎神者。甚至还在她自我吹嘘的时候，她就看到她的十四个孩子一个个死去。由于神祇报复，尼俄珀变成了石头，只有在石头上日日夜夜流出的眼泪还使行人想起她从前的模样。

在珀罗普斯的儿子阿特柔斯和堤厄斯忒斯身上，家族诅咒达到了极点。堤厄斯忒斯勾引他兄弟的妻子埃洛珀，而阿特柔斯则杀掉了堤厄斯忒斯的两个儿子，并把人肉做成肴馔宴请提厄斯忒斯。后来提厄斯忒斯知道他吃的是自己的亲骨肉时，吓得逃走了。诸神惩罚了邪恶的阿特柔斯，使他的国家遭受饥荒和干旱的袭击。阿特柔斯急于将土地从神谴中解救出来，于是去请示神谕。神谕告诉他要想使国家繁盛，只有请提厄斯忒斯回来。于是流放中的兄弟被召回来了，一同回来的还有他在流放中生的儿子埃癸斯托斯，他的出世又给这家庭恐惧之火浇了一层油，因为他勾引他自己的女儿。

两兄弟之间的和解为期不长，时隔不久这一家又开始了惯常的血战。阿特柔斯将堤厄斯忒斯投进监狱，而埃癸斯忒斯经过精心策划，将一柄剑刺进了他伯父的胸膛，从而结束了兄弟间的宿怨。除掉了阿特柔斯这块绊脚石后，堤厄斯忒斯登上了王位，但时隔不久他也倒下了，阿特柔斯的儿子阿伽门农为了报仇将他杀死了。出于某些原因，埃癸斯托斯得了一条生路；后来阿伽门农要为此疏忽懊悔不已。

前已说过，阿伽门农牺牲了自已的女儿伊菲革涅亚后又驶向了特洛伊，将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两个女儿，克律索忒弥斯和厄勒克特拉，还有一个儿子俄瑞斯忒斯留在家里。对她丈夫无情地杀掉伊菲革涅亚，克吕泰涅斯特拉则悲伤得摧肝断肠；这时一直伺机报仇的埃癸斯托斯看到除掉阿伽门农的机会到了。阿伽门农不在的时候，埃癸斯托斯一直和克吕泰涅斯特拉同居一处，不失时机地向她灌输伊菲革涅亚的牺牲，或阿伽门农在前线不可能过禁欲生活，以此来激起她的仇恨。特洛伊陷落后，这对作贼心虚的情人精心策划准备他们所憎恨的人的归来。阿伽门农一回国就发现首都张灯结彩，一片节日气氛。在臣民的欢呼声中，他走向宫殿，他不忠的妻子前去欢迎，并作了一番厚颜无耻的演说。

城里所有名人都被请来参加庆祝英雄国王的宴会。宴会后，阿伽门农由于长途跋涉的劳累，走进后宫想洗一个热水澡。他一脱去衣服就进入浴盆成了牺牲品。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埃癸斯托斯拿着一张网，几把匕首，向他扑去，轻而易举地刺杀了这个毫无防备的国王。

两位阴谋家并不想隐瞒他们的罪行。他们将这事公布于众，希望得到人民的支持。抗议是不可能的，因为克吕泰涅斯特拉是在向谋杀她女儿的人报仇，因而有法律依据。此外，埃癸斯托斯已完全控制了军队，任何反抗都会很快被消灭。就这样，这对声名狼藉的男女在这个不幸的国家又统治了多年。

但是阿特柔斯家族的血腥史又延续到了下一代。阿伽门农被杀后，他女儿厄勒克特拉正确地猜测到下一个被清除的牺牲品将是他的弟弟俄瑞斯忒斯。于是她偷偷地将他送到福喀斯，在那儿，斯特洛菲俄斯王将他当成皮拉得斯王子的兄弟好友而抚养成人。厄勒克特拉则留在家里，受到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埃癸斯托斯的虐待和仇视。随着岁月的增长，他们越来越怕俄瑞斯忒斯回来报仇。有一天，一个陌生人前来告诉罪孽深重的母亲说俄瑞斯特斯已死于车赛。王后欣喜若狂，最后一个危险又被除去了。但是她的欢乐正是她的末日。陌生人就是俄瑞斯特斯本人，受阿波罗神谕之遣前来为阿伽门农的被谋害报仇。在他母亲邪恶的欢乐声中，他发现了报复的最后动力，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埃癸斯托斯相继倒在他的剑下，成了牺牲品。

随着这对不幸者的清除，阿特柔斯这个不幸家族的传说本可告一段落。但是希腊人的神圣法律的严格运用观有必要使故事继续下去。尽管俄瑞斯忒斯遵照阿波罗的命令杀死了他的母亲及其情人，但他犯了杀母罪，因而必须接受神明的惩罚。他刚完成双重复仇，复仇女神厄里倪斯就降临到他跟前，将他变成了一个疯子。这种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良心折磨，逼得俄瑞斯忒

斯离开家园，浪迹整个希腊世界，寻求安慰。逃避是不可能的，无论他走到哪儿，复仇女神就跟在哪儿。最后，他出于绝望来到了德尔斐，跪倒在阿波罗神谕之前，祈求宽恕。神为之感动，答应给这个备受折磨的年轻人一次补救机会。他必须去以高度公正观出名的雅典，于是阿波罗准备把他送给雅典人去审判。最终判决权属于雅典娜女神本人。

阿波罗言出必行，在约好的那一天，雅典人听到了复仇女神的指控和阿波罗的雄辩。决定的时刻来到时，人们发现雅典公民的判决分成对等的两大阵营，但是雅典娜本人投了赞成俄瑞斯忒斯的一票。于是，在古代神话中第一次出现了根据是非曲直来断决道德问题，而不是根据神法的无情支配。这种神话式雅典法庭的启蒙用柔顺的公正观取代了旧有强权的惩罚原则，从而为我们现代的个人自由传统奠定了基础。

俄瑞斯忒斯被宣判无罪后，长期倒霉的阿特柔斯家族的命运开始好转，在传说中有一个好结局。俄瑞斯忒斯还没有从复仇女神的长期迫害中恢复过来，阿波罗吩咐他去陶里斯（Tauris），在那儿他可以从神殿里偷取阿耳忒弥斯女神的偶像，因此可以恢复健康，重获幸福。在忠实的好友皮拉得斯的陪同下，俄瑞斯忒斯开始去执行这个使命，但这不无危险，因为陶里斯人有一种可悲的习惯，即把所有到他们土地上的人杀掉供奉阿耳忒弥斯。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清醒地知道他们所冒的危险，但他们不知道误以为多年前被献祭给阿耳特弥斯的俄瑞斯忒斯的姐姐伊菲革涅亚实际上已被女神救出，并被送到了陶里斯。在这里，陶里斯国王塔奥斯强迫她执行令人不愉快的任务，即把捉到的外国人当作神圣祭品送去献祭。尽管伊菲革涅亚的职责冷酷无情，但她却是一个美丽而温柔的姑娘，深受陶里斯人的尊敬。

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一到岛上就被一个牧民抓到，并被送到伊菲革涅亚那儿。女祭司审问了俘虏。当她了解到他们来自阿

耳戈斯时，就向他们问起阿伽门农及其家庭的情况。他们告诉她说，俄瑞斯忒斯及其姐姐厄勒克特拉和克律索忒弥斯还活着。伊菲革涅亚为她家里还有人活着感到非常高兴，同意释放一个俘虏，让他为她送信到阿耳戈斯去。皮拉得斯和俄瑞斯忒斯相互争着去死，让朋友活下来。但是伊菲革涅亚选中皮拉得斯，从而结束了他们二人的争执。然后她给皮拉得斯一封致俄瑞斯忒斯的信，告诉他说他的姐姐伊菲革涅亚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就是想从陶里斯这令人不快的环境中解脱出来。皮拉得斯立刻把这封信递给了俄瑞斯忒斯，这对长期分离的姐弟就是以这种繁复的形式互相辨认出来而重新团聚了。

三个人打定主意一同回去。伊菲革涅亚借口给这两个献祭的陌生人净化，将他们带到海边，而且还带着阿耳忒弥斯的偶像。到了海边，俄瑞斯忒斯的船即刻载着伊菲革涅亚和塑像向前飞驶。一到本土，俄瑞斯忒斯就彻底恢复了健康，并登上了他父亲的王座。不久他娶了墨涅拉俄斯和海伦的女儿赫耳弥俄涅，而且还继承了斯巴达王国。厄勒克特拉嫁给了皮拉得斯，而伊菲革涅亚则将阿耳忒弥斯偶像放在雅典的神殿里，继续她的祭司生涯。俄瑞斯忒斯是一位英明的国王，统治有方，太平无事，直到90岁时脚后跟被毒蛇咬伤而死去。这样，坦塔罗斯的家族宣告结束，而阿特柔斯家族的暴力生涯也就成了这段传说的终曲。

三、底比斯缔造者卡德摩斯家族

西顿国王有好几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欧罗巴。有一天，宙斯化装成一头牛拐骗欧罗巴，将这位满心情愿的牺牲品驼在背上带到了克里特。在这里她生下了弥诺斯和拉达曼提斯。这时西顿国王还不知道他的女儿已成了宙斯的情妇，正派他的儿子到处找她，并吩咐他们找不到她就不许回来。

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卡德摩斯来到了德尔斐，询问阿波罗神谕有关他姐姐的去处。神谕建议他忘却欧罗巴，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城市。神谕吩咐他跟随一头小母牛走，这头母牛第一次停下来休息的地方，就是他建城的地方，取名叫底比斯。但是还没等他建好城，他就被迫去杀一条嗜血成性的龙。雅典娜吩咐他将龙的牙齿播到地里，很快这些牙齿变成了全副武装的武士。他们互相残杀起来，尽管卡德摩斯尽力去阻止这场残杀，但只有五个人生存下来。靠这五个人帮忙，卡德摩斯建立了底比斯。卡德摩斯统治底比斯有方，婚姻美满，生五女一子。尽管他能力非凡，善意待人，但他命中注定要有一群不幸的子孙。在他的家族中，没有谁比俄狄浦斯更为不幸的了，他那骇人听闻的命运在索福克勒斯创作的最伟大的希腊戏剧中得到了描述。

俄狄浦斯是底比斯王拉伊俄斯的儿子，卡德摩斯的第三代孙子。拉伊俄斯娶了一个远房表妹伊娥卡斯忒。婚后好长一段时间她一直不育。最后德尔斐神谕答应给这对不幸的夫妇一个儿子，但警告说，这个儿子会杀掉他的父亲。儿子出世后，拉伊俄斯命令将他的脚绑起来。送到两台农山上曝晒。执行任务的牧羊人很可怜这个婴儿，没有把他放在那儿送死，而是将他送给另一个牧羊人。那牧羊人为他取名俄狄浦斯，或肿踝，因为脚踝被皮带捆了的缘故。后来牧羊人将他送给科林斯王波吕波斯。国王膝下无子，百般喜爱小俄狄浦斯，把他收养。小孩长大成人，从未怀疑过自己不寻常的出世，直到有一次，在一次宴会上有一个喝醉了酒的客人不负责任地暗示他不是波吕波斯的亲生儿子。出于好奇，而且养父母对他的问题又闪烁其辞，俄狄浦斯立刻去请教神谕有关他的亲生父母。神谕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而给了他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即他要杀父娶母。俄狄浦斯在恐慌之下决定不回科林斯，以免神谕这令人阴郁的预言得以实现。他去了波依沙。

他在途中来到了一条狭窄的山关，碰到从相反方向来的一群

人，车上坐着一位老人。由于路很窄，车和年轻的俄狄浦斯难以一起通过，于是双方在谁先通过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车上的老人用棍子敲了一下俄狄浦斯的头。俄狄浦斯一怒之下杀掉了他，还杀死了另外一个人，其余的人都吓跑了。俄狄浦斯接着又上了路，对这场普普通通的混战丝毫没放在心上，因为在这场混战中他不得不保卫自己以抗击强力的袭击。他一点也不知道他所杀的这个老人正是他的亲生父亲拉伊俄斯王。这样，神谕预言的第一部分几乎立刻就实现了。

不久，俄狄浦斯来到了底比斯。他发现这里的公民在悲叹一种双重不幸，他们的国王拉伊俄斯被杀掉了，这还不算，一个半身女人，半身狮子，名叫斯芬克斯的可怕怪物正在折磨着这座城。斯芬克斯的怪习惯是栖息在底比斯前的一个悬崖上，向过往行人问一个无人能解答的问题："在早晨用四只脚走路，正午两只脚走路，晚上三只脚走路的是什么生物？"如果他们解答不出，斯芬克斯就会扑向他们，把他们撕得粉碎。老百姓深受其害，伊俄卡斯忒的弟弟——这座城市的临时执政官克瑞翁为此通告天下，凡消灭斯芬克斯者可得王国，并娶他的姐姐为妻。这个问题对俄狄浦斯来说似乎是小事一桩。当魔鬼问他这难题时，他答道："这是人。人在生命的早晨，用两手两脚爬行，在生命的壮年，挺胸而走，但到了暮年，则需要拐杖扶持。"斯芬克斯见谜底已被道破，大为恼火，从悬崖顶上跳下而死。被拯救出来的城民喜气洋洋，一致拥戴俄狄浦斯为国王，并把伊俄卡斯忒王后嫁给了他。

俄狄浦斯和伊俄卡斯忒统治国家达数年，国泰民安。他们的结合生了两个儿子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尼刻斯，两个女儿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直到孩子长大成人，命运女神才开始公开惩罚底比斯的这家王族。一场可怕的干旱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袭击这座城市，俄狄浦斯觉得有必要再去询问神谕。那位模棱两可的神谕的回答是：底比斯还要受苦，除非将杀死前国王拉伊俄斯的凶手缉拿

归案。俄狄浦斯一点也不知道是他杀死了他的前任国王，他诚实地着手去缉拿凶手。他还请先知提瑞西阿斯来帮忙，他的预见力可以同神谕本人媲美。当这位盲目老人知道召他的原因后，请求推卸这个职责，让他安宁地回家，然而俄狄浦斯不停地恳求，提瑞西阿斯不得已吐出了真情：杀拉伊俄斯的凶手正是俄狄浦斯本人。不用说，俄狄浦斯的反应先是惊恐，继而是怀疑，他谴责先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伊俄卡斯忒也嘲笑说，神谕和先知假装正确、正如神谕曾预言她的第一个丈夫的儿子会杀死他父亲，拉伊俄斯是在大路上同人争吵时被杀的，这不是同神谕的预言完全相反吗？当时的情形如何？他长得怎么样？俄狄浦斯疯狂地问道，伊俄卡斯忒的回答使一切都已明了。可怜的俄狄浦斯惊骇地意识到，提瑞西阿斯是对的，杀死拉伊俄斯的正是他本人。但是，说不定碰巧会出现一些差错。为了证实这点，他派人去找山关灾难的唯一幸存者。

正当他在等待那位突然之间变得重要起来的人物时，科林斯来了一位使者，告诉他波吕波斯王死了。这个信息给了俄狄浦斯一丝希望。在他看来神谕在这件事上错了，因为他不是预言他会杀死他的父亲，而波吕波斯王不是已经老死了吗？但这丝希望只是一种绝望的幻觉。使者让俄狄浦斯放心，说他不必担心会杀死波吕波斯，因为波吕波斯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他在山上被人发现，后来国王收养了他。正是使者本人从一个牧羊人手里接过那婴孩，并将他带到科林斯宫廷。到了这时，证明俄狄浦斯的最后一个证据便是他焦急等待的那位唯一幸存者了。巧合的是（这种巧合大概只有神话才有），那位幸存的老人不仅目睹了拉伊俄斯之死，而且还是把幼小的俄狄浦斯送给科林斯使者的牧羊人。此时一幅完整的图画已经被勾勒出来了，细节甚为可怕。尽管俄狄浦斯用意良好，但他毕竟杀死了生父，给底比斯带来了不幸。更为可怕的是，神谕当初的预言实现了：可怜的俄狄浦斯杀死生父拉伊俄

斯之后娶了生母伊俄卡斯忒，并且生了儿女。听到这一切之后，俄狄浦斯冲进了宫殿，寻找伊俄卡斯忒，但是消息走在了他的前头。他发现她为了洗清自己不知不觉中所犯下的罪孽，已自缢身亡。俄狄浦斯感到罪孽深重，在疯狂之下扯下了王服上的别针，挖出了自己的眼睛。

然后他永远地脱下了王服，向公众宣布他对底比斯人所犯下的罪过，并将王位让给了他的内弟克瑞翁，准备离开这座城市，到别的地方去度余生，做一个受良心谴责的瞎子流浪者。

然而，俄狄浦斯的流浪生涯被推迟了一段时间。克瑞翁怜悯这位备受折磨的亲戚，允许他住在舒适的王宫里，但是不久克瑞翁发觉俄狄浦斯的出现使他感到尴尬，成了他的政治包袱，于是送他上了路。一路上他由忠实的女儿安提戈涅陪同，次女伊斯墨涅留在家里照看他在底比斯的事务。浪游了好长一段时间后，俄狄浦斯和安提戈涅来到了雅典附近的科洛罗斯。这两个游客在这里受到了雅典高贵的统治者忒修斯的热情欢迎，他敦请俄狄浦斯在热情好客的雅典度其余生。

俄狄浦斯到科洛罗斯不久，次女伊斯墨涅也来了，并带来了兄弟俩在底比斯争吵的可怕消息。俄狄浦斯的儿子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尼刻斯为继承王位问题争吵不休。克瑞翁被迫放弃了摄政王位，俄狄浦斯的长子波吕尼刻斯自立为王，和次子厄忒俄克勒斯达成谅解，每年一次由兄弟俩轮流执政。但是厄忒俄克勒斯对此并不满足，鼓励底比斯人起来造反，将波吕尼刻斯赶走。结果波吕尼刻斯逃到了阿耳戈斯和阿德拉斯托斯王的女儿结了婚。在阿德拉斯托斯和其它强大同盟的帮助下，波吕尼刻斯正准备攻打底比斯，夺回王位。伊斯墨涅告诉她父亲说，这场危机需要他帮忙，克瑞翁眼下正匆匆向雅典赶来，准备劝说老人回去，如果必要，就将他绑架回去。俄狄浦斯对这个请求大为光火，这位被无情地折磨成一个乞丐的人现在居然被要求原谅一切，去帮助那些

曾经折磨过他的人。克瑞翁来后，俄狄浦斯无情地拒绝了他。当克瑞翁准备使用武力的时候，忒修斯王劝这位底比斯统治者立即离开，否则他就要遭到强大的雅典军队的进攻。于是克瑞翁小心翼翼地离开了。

克瑞翁走后不久，波吕尼刻斯来了，请他父亲保佑他进攻底比斯，但是被激怒的父亲是不可能被劝和解的。两个儿子对他不孝，虐待他，现在两个人都会遭到他的诅咒，而且他还可怕地预言，弟兄俩都会倒在对方的血泊中。

这痛苦的一幕过去后，俄狄浦斯觉得他去世的时间已经到了。一个可怕的风暴袭击了圣林，俄狄浦斯宣称，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他要独自一人进入复仇女神欧墨尼得斯的树丛。他那忠实的女儿和忒修斯王伴随他来到了丛林边。他们洒泪告别，随后，在一阵风雨雷电之中，老人独自进入了丛林，他很快就消失不见了，而风暴也神奇般地停止了，俄狄浦斯的痛苦也终于告终。

但是底比斯的苦难并未了结。这座受尽了折磨的城市很快被投进到兄弟间的残杀之中。这座城有七扇城门，波吕尼刻斯和他的六个同盟首领一人攻打一扇城门。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在父亲死后回到了祖国，惊恐地等待着她们父亲诅咒的实现。战争漫长而残忍，无休无止。最后双方停战，决定由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尼刻斯两人决斗，以解决争端。在随后的决斗中俄狄浦斯的诅咒实现了，兄弟俩都受了致命伤。底比斯的力量落到了围攻者的手里，但最后还是击溃了围攻者。底比斯保住了，但却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消耗了大量的生命和力量。

于是克瑞翁再次接管这座城市，负责掩埋底比斯人的尸体。这位新国王的儿子墨诺扣斯在战争中第一个丧生，激怒了克瑞翁，于是他吩咐所有成人的尸体都留在那儿，不得掩埋。他遇到了安提戈涅的强烈反对，她要求她哥哥波吕尼刻斯应有隆重的葬仪。克瑞翁回答说，掩埋底比斯的敌人的处罚是死亡，安提戈涅全然

不顾这条严厉的法规和她胆小妹妹的胆怯规劝。她蔑视她的舅舅，为她死去的哥哥举行了被禁止的葬礼。为了这，她被无情地判处死刑，但是还没等法规付诸实施，这位心烦意乱的姑娘就已在墓穴里自缢身亡。克瑞翁对手的死亡并没有给他带来安宁。他那位和安提戈涅相爱的二儿子海蒙冲进监狱，死在她的身边。当克瑞翁的妻子欧律底斯听到她儿子的死讯后，她也自杀身亡。结果，由于他的傲慢和固执，克瑞翁变得威信扫地，精神颓唐。

故事结束之前，底比斯人面临着一个更为丢人的羞辱。克瑞翁的法规传到了雅典，雅典人对克瑞翁废除神圣的埋葬法甚为惊骇，坚持要求出兵，除非底比斯人将其敌人的尸体全部埋葬。克瑞翁已被悲痛和战争搞得精疲力竭，无力和雅典人抗衡，不得不废除了他的法令，于是底比斯人为死者举行了适应的葬礼。十年后，攻打底比斯的七勇士的儿子们厄庇戈诺伊组织了起来，为他们父辈的战败报仇。他们挺进这座战痕累累的城市，发现全城人已吓得逃掉了，于是他们进入城市，将这块长期受难的地方夷为平地。

四、伊阿宋和金羊毛

名闻遐迩的阿耳戈英雄远征据说发生在特洛伊战争前十年。故事的背景是一个希腊国王阿塔玛斯抛弃了他的妻子涅斐勒，转而娶伊诺。他的第一个妻子有理由害怕这个取代她的位置而深受丈夫宠爱的女人还会杀掉他们的儿子佛里克索斯，这样她自己的儿子就可以继承王位。伊诺经过精心策划，将佛里克索斯送去祭祀神祇，以避免她本人所造成的饥荒。但是当小孩被放到祭坛上的时候，一只长有金羊毛的公羊奇迹般地从天空出现，抓住了佛里克索斯和他的姐姐赫勒，将他们带往亚细亚。在他们穿越达达尼尔海峡的时候，赫勒坠入海中，为此希腊人将这个海峡命名为

赫勒海峡，或赫勒斯滂。佛里克索斯则被带到黑海中的喀尔科斯，娶了一位公主，将公羊宰杀祭献给宙斯，又把金羊毛送给他的岳父埃厄忒斯王。

接着故事转向了佛里克索斯的叔叔埃宋王。他把自己的王位让给了他的弟弟珀利阿斯，条件是他可以继续执政，直到埃宋的儿子伊阿宋长大成人。但是当伊阿宋长大要求王位的时候，珀利阿斯却不愿放弃王位，声称除非伊阿宋重新夺回据说是这个家族的合法财产的金羊毛，否则无权继承王位。

伊阿宋召集志愿者跟随他远征，并命人建造了一条大船，取名阿耳戈号。古代世界最勇敢的英雄，包括赫耳枯勒斯和阿喀琉斯的父亲珀琉斯，组成了一支冒险队伍。他们响应伊阿宋的号召，登上了那条大船，被称为阿耳戈英雄。到喀尔科斯的航程漫长而又艰难，经过一连串危险的经历和死里逃生后，伊阿宋和他的大多数同伴终于登上了喀尔科斯海岸。

在受到国王的热情款待后，伊阿宋提出只要能换回金羊毛，无论国王吩咐什么他都愿意效劳。国王出人意外的回答是，让他将两头吐火的牛套到犁上去犁一块地，然后将一颗龙齿播到地下。他解释说，龙齿会产生一批全副武装的武士，只要种子一种下去，他们就会立刻蹦出来去袭击播种者。如果不是认识国王的女儿美狄亚，那么伊阿宋很可能彻底失败。美狄亚是个女巫，善于各种魔术和计谋，幸运的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美狄亚就被他征服，疯狂地爱上了他。伊阿宋了解到她对他的迷恋之后，便请她帮忙，接受了她传授给他的魔术，以做到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与此同时，伊阿宋也为她的风姿和魔术所迷，向她吐露了爱慕之心，发誓永远忠实于她，并且请求她在赢回金羊毛后和他一同回希腊。美狄亚尽管由于背叛了父亲而感到心神不安，但对伊阿宋强烈的爱使她别无选择，将命运投掷到他的身上。

竞赛时间到了，伊阿宋在身上和剑上涂满了美狄亚赠给他的

战无不胜的油膏，然后成功地将疯狂的公牛套到犁上，犁了一块地，接着又播下了龙齿。当那些全副武装的武士一拥而上向他扑来时，他按照美狄亚的吩咐，将一块石头向他们中间扔去。结果武士们掉转武器互相残杀，最后全部死去。国王并不想兑现诺言，开始玩弄新的花招对付伊阿宋。当美狄亚得知她父亲的密谋后，她偷偷地跑去告诉伊阿宋必须夺取金羊毛当晚逃走。在美狄亚魔术的再次帮助下，伊阿宋杀死了守卫金羊毛的龙，和美狄亚及其他阿耳戈英雄一起离岸逃到海上。

他们被穷追不舍，但在痴心的美狄亚的帮助下，他们再次逃过了灾难。美狄亚预先将她的小弟弟阿波西尔托斯一同带走了。当追逐者快要追上阿耳戈号的时候，她把他的弟弟砍成碎片，然后一片一片地扔到船尾。喀尔科斯人停下来收集人肉碎片，耽搁了追逐时间，这样阿耳戈英雄得以逃生。

在美狄亚的大力帮助下，阿耳戈英雄历经艰险生存了下来，终于回到了希腊，队伍旋即解散。伊阿宋将美狄亚带回去索取王位，却发现在他不在的时候，珀利阿斯王密谋杀死了他父亲埃宋，母亲悲愤而死。伊阿宋再次请求美狄亚帮忙。美狄亚设法使珀利阿斯的女儿们相信使用她在老公羊身上所施的魔术，她们可以使她们的父亲恢复青春。她先把羊剁成碎片，将碎片丢进开水锅里，然后口念咒语，一只小羊立刻从锅里跳了出来。珀利阿斯的女儿们信以为真了，高高兴兴地给父亲吃了安眠药，然后将他剁碎，将碎片扔到开水里。但是需要美狄亚念咒语的时候，她却不在了。由于这邪恶的谋杀，伊俄尔科斯的公众舆论转过来反对伊阿宋和他的女巫新娘，结果他们不得不逃离这个国家。

这样，尽管伊阿宋和阿耳戈英雄历经艰险，但他从未登上伊俄尔科斯国王的宝座，而是带着妻子躲避到科林斯，在这里美狄亚为伊阿宋生了三个儿子。在这段时间里，伊阿宋和美狄亚一直是相亲相爱，但时隔不久，从未登上王位的挫折促使伊阿宋进行

野心勃勃的密谋。他抛开了为他尽了一切力量的妻子不管，又同科林斯国王的女儿订婚。为了使他的未婚妻免遭被他抛弃而心力交瘁的美狄亚的报复，他命美狄亚离开科林斯。美狄亚对这个心狠手毒，忘恩负义的家伙感到怒不可遏。她给新娘送去一件有毒的礼服和王冠，新娘一穿上就被烧死。她当着吓呆了的伊阿宋的面杀死了她的儿子，然后登上用魔术变出来的有翼战车逃离了现场。她发现暂时可以在雅典埃勾斯王那儿躲避一阵子。但是她臭名昭著，雅典人纷纷要求将她流放。她只好再次漂泊，最后到了小亚细亚。她在这里平安无事地度过了她的余生，在她不幸的记忆里，这个地方后来被命名为美狄亚。

伊阿宋的结局同样悲惨。有一种说法是，伊阿宋看到儿子们的尸体后，在一阵悔恨与痛苦之中，拔剑自刎。另一种更令人心碎的说法是：他一直活到老，生活平淡，脑海里充满了对未完成的希望和梦想的回忆，直到有一天，当他站在腐烂了的阿耳戈号船边冥思苦想的时候，船上一根横梁断了落到他的头上，结束了他的生命。

五、忒修斯

埃勾斯的儿子忒修斯，这个将美狄亚从科林斯拯救出来的雅典国王，是一位极为高贵而又备受推崇的希腊英雄。他母亲在希腊南方将他抚养成人。埃勾斯曾在希腊南部的一块大石下放了一双鞋和一把宝剑，并且留下旨意：如果孩子长成人，身体强壮，可以举起巨石，得到宝剑和鞋子，那么就将他送到雅典他父亲那儿。

忒修斯长得身强力壮，轻而易举地举起了石头，然后出发去寻找他的父亲。在去雅典的路上，他斩妖除怪，声名大震。他父亲高兴地接待了他，并且骄傲地向雅典人表明他让忒修斯继承王

位，这个荣耀是他历经艰险取得一系列英雄业迹而赢得的。

他最著名的事迹是使从前雅典人败在克里特王弥诺斯的手下。当时弥诺斯没有彻底摧毁这座城市，唯一的条件是雅典人必须每年向克里特献童男童女各七人，给一个可怕的怪物吞食。这个半人半牛怪物名叫弥诺陶诺斯，是弥诺斯的妻子帕西淮和一头公牛所生的后代。雅典每年都要抽签选出14个牺牲品，直到忒修斯在为了杀死弥诺陶诺斯而自告奋勇前去献祭。他和其他人一道起帆远行，心情沉重地离开父亲时说，如果他成功地完成了使命，他将把船上传统的黑帆变换为白帆，以便他们尽可能早地得到他安全归来的消息。

忒修斯极为幸运地赢得了弥诺斯的女儿阿里阿德涅的爱。强健的忒修斯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杀死弥诺陶诺斯，因为他相信他强大的力量足以轻易地完成这项使命。复杂的是，弥诺陶诺斯躲在一所由建筑大师代达罗斯精心建造的迷宫里，任何人一旦进入迷宫就无法出来。后来阿里阿德涅给了他一团线，提供了他逃脱的办法。他将线头系在门上，然后进入迷宫，一边向前摸索一边解线，最后碰到了怪物。他赤手空拳消灭了弥诺陶诺斯，顺着线回到了门口。然后，在阿里阿德涅和其他当作牺牲品的同伴的陪同下，忒修斯偷偷地驶回雅典。

在回来的航行中，阿里阿德涅晕船，于是他被带到那克索斯岛去养病。一阵风暴突然将船掀进大海，当时忒修斯正站在甲板上。当忒修斯将船驶回小岛时，阿里阿德涅已死了。忒修斯悲痛欲绝，忘了变换船上不祥的黑帆。埃勾斯一直在看望儿子的归来，当他看到黑帆，绝望之极，从悬崖边投海而死，为了纪念他，这个海被命名为爱琴海。

雅典人曾恳求阿波罗让忒修斯平安返航，每年都要送一条相同的船到德洛斯的阿波罗神殿，履行他们当初所许下的诺言。在船安全返航期间，雅典人保证不开杀戒，船不回来不搞死刑。这

条法律后来拖延了对服罪的苏格拉底的执刑。

结果证明忒修斯是一位超群出众的王位继承人。他只掌管军权，把政府交给人民，从而建立了雅典民主。俄狄浦斯由于发现自己命中注定的罪孽而逃出底比斯，忒修斯庇护了这位瞎老人。当克瑞翁拒绝掩埋那些在失败的城市革命中战死的将士时，忒修斯成功地击败了底比斯。胜利后，他只命令掩埋尸体，然后率军返回雅典，没有将底比斯夷为平地。

他许多类似的英雄事迹都有记载。他唯一不幸的是爱情。在从克里特返回的路上，他失去了阿里阿德涅。她的第二个情人是亚马孙女王希波吕忒，这是他远征著名的女武士国的战争中所获得的。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希波吕托斯，但引起亚马孙人入侵雅典，营救她们的女王希波吕忒。后来他又娶了阿里阿德涅的妹妹斐德拉，她使他的爱情继续不幸。她和希波吕托斯调情作爱，造成了一系列的灾难。这事在拉辛的剧本《斐德拉》里有所描述。忒修斯最后被他自以为是朋友的国王吕科墨得谋杀。在有关他的所有故事里，强调他的显著品质是心灵伟大。

第五章　黄金时代的雅典民主
（公元前500—322年）

一、社会分工

到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达到顶峰，取得了世所见到的最有启发作用的政府形式。尽管它远非代议制，更非纯民主，但它却是一个极为公正的机构，诸事由公众负责，人们诚实正直，没有多少官僚政治。这时阿提卡城邦（主要城市是雅典）覆盖面近一千平方英里（比大纽约和韦斯切斯特县总和略大一些），人

口约315,000，其中约有一半人住在首府，这315,000人可以明确地分为以下几种阶层：

甲、平民（43,000人）

凡自由的雅典父母生的年属21岁男子都被划为平民，他们关注的主要是政府职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平民都有权利直接参与法律制定和国家管理。对于这些权利的回报是平民机构必须承担国家的经费，并且负责保卫国家。根据财富划为四种阶层平民，每一阶层根据其财产多少来支付税率。从理论上来说，平民层自由、独立，不过这个阶层里还有许多绅士、农民，甚至还有一些商人。

乙、非平民

非平民，或无投票权的平民团体包括约28.500名在外国出生的自由人，被称为metoikoi，或metics，115,000名奴隶，还有130,000名其他的人，包括平民妇女和刚刚脱离奴隶而获得平民阶层的自由工人。metics并非是多余人，他们在雅典的出现甚至还得到鼓励，但他们不参与国政。

自从梭伦改革废除了当奴隶还债制后，希腊人很少当奴隶。到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有一种成见，不愿将同胞变成奴隶。所以这些奴隶只是些战俘，罪犯，遭遗弃而被救出的婴儿，或无以为生自愿来做苦役的外国人。奴隶负责城邦里许多必不可少的工作，包括手工劳动，办公室工作以及许多次要的商业职务。他们还在政府中担任一些小官，包括警察，因为希腊平民仇视官僚主义，不愿对希腊同胞行使强制性手段。奇怪的是，服从外国或奴隶警察监管的想法一点也没有扰乱这帮平民，大概是一般希腊人尽管具有高度的自由感，却知道何时限制自己的个人妄想，以维护公众的利益。

奴隶没有法律权利，在大街上被公开买卖，标价用现代的货币来算从50美元到1000美元不等。然而，在阿提卡，一般奴隶的

命运并不悲惨。他不戴什么特别的区别标志，也没有人希望他们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他常常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富裕的平民家里担任家庭教师。他不会被主人杀死。如果他的苦役太残酷，他有权逃到神殿去求援。在这种情形下，通常是将他卖给另外一位主人。许多奴隶最终被主人释放，或允许去赎释，所以阿提卡的许多工人，还有为数不少的教师和哲学家从前都是奴隶，或是奴隶的儿子。允许奴隶结婚，因为尽管阿提卡的自由人不到一半，但平民阶层并不担心遭到围攻，或担心可能被反叛奴隶推翻。奴隶受到公正的待遇，因而雅典人从不担心阶层之间存在互相残杀的幽灵，这是对人性的一大称颂。

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像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这么开明的一个民族居然允许奴隶存在，但是必须记住，在这之前的所有文明中，强制性奴役被视为理所当然，人们对此也习以为常。雅典人所做出的不朽贡献是对奴役道德标准的最初质问来自其思想家，无论是犬儒学派还是斯多葛学派都一致谴责奴役制，戏剧家欧里庇得斯也在他的剧本里对此大肆攻击。然而，强制性的苦役在古典时代从未被废除，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普通的老百姓——不管是奴隶还是理论上的自由人——才享受到特权和相对的人道待遇，而这种待遇在伯里克理斯时代甚至连最低等的奴隶都可以享受到。

二、国 家 机 构

雅典致府由两个立法机构和一个负责司法、执行、军事和总监的机构组成。立法机关由议会和立法班子组成。议会一共有43,000名军民，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选举权。从理论上来说每一届立法会议都要求所有的平民参加，但这条规则实际上行不通。为了使这个立法机构尽可能地大，每到集会的日子，全副武装的警察就会手执浸过硃砂的皮鞭在市场和其它一些闲散场所去巡逻。

每看到一个人就用这浸过硃砂的武器敲一下。如果有谁被发现衣服上带有硃砂印，那么他就得付一小笔罚金，还会受到同伴的嘲弄。但是，尽管立法机构竭尽全力去吸引群众，但实际上也只有两三千人参加每周一次的立法会议。由于旅途不便，所以大多数诚心实意的立法者都是雅典本地的居民。结果郊区农村常常发现他们在政治上受大都市商业利益的支配。

议会的集合点在平克斯山腰。破晓不久即举行开幕式，作一番简短的祈祷和祭司仪式，然后开始例会。所有参加者都具有很高的批评眼光，感情容易外露，所以演讲者需要赢得人们的认可，充分表现自己的言论。讲话打顿，音量小，表达不当或令人难以信服的演讲者常常会遭到一连串的进攻、诘问、嘘声以及其它一些口头嘲讽，使得意志坚强的政客都感到心惊胆颤。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年轻的希腊学者那么热衷于研究修辞学，雄辩术和逻辑表达。从另一方面来说，好的演讲者常常使人赞不绝口。如果有哪一位深受欢迎的演说家被安排去对公众进行演讲，就没有必要动用硃砂棍到市场去赶人。

议会介绍一系列的法案和议案，最后经过筛选，编成条文。但是由于这一机构过分庞大，所以许多实际立法工作都是在500人的立法班子里进行的。公元前507年，作为一部分改革项目，克利斯悌尼根据区域划分，将平民分成十个部落，或市区。他还建立了经议会抽签选举的500人立法班子。起先议会成员随意从平民中抽选，后来建立了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制度，从每个市区中抽选50名议员。每个议员只任职一年，这样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可能担任这个重要任务。立法班子的职能是检验议会所提出的各项议案，然后将正反两方面意见汇报给更大的机构。这样，议会在许多方面同我们的众议院和参议院立法委员会相一致，但没有"领袖由资历高的人担任"这一陋习，因为所有的议员任期只有一年。

立法班子除了有咨询功能，还行使重要的行政权。它控制国家金融，公共工程和建筑，宗教仪式以及其它的城市项目。它还负责指导议会的立法工作。为此它分设十个行政官，每一个行政官任职一个月，任职期间负责掌管议会和立法班子。每一个选举日人们都要选一位新的主席来负责两个立法机构的工作。所以，从理论上来说每一个雅典公民在其一生中都会有一天担任国家最高行政职务。

尽管这个制度高度民主，几乎不可能出现立法人员的贿赂行为，但它动摇不定，难以产生强大的个人领导或集体领导。不久，国家的军事部门掌握了真正大权。这个机构由10个将军组成。十将军会由公众投票选举，任期一年，但可重新选举，再从这10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担任首席将军，而这位首席将军也就成了国家的实权人物。伟大的伯里克理斯当了十多年的首席将军(公元前463—431，中间有几次中断)，在他的领导下雅典实际上成了一个民主君主国。

政府的其它职能由 9 个稚康，或附属执政官负责，他们掌握金融事务，公共工程等的实际工作。还有一个庞大的陪审法庭，由 6 千名抽签选出的公民担任，任期一年。这些陪审员被分到各种各样层次不同的地方法院。他们既当法官又做陪审员。每一次审判所需的陪审人数取决于案件的重要程度；一件小的诉讼十几个陪审员就够了，但是重大案件有时需要几百人，以消除贿赂的危险。一般是100名陪审员，但在审讯苏格拉底时征募了501名陪审员。

和议会成员一样，陪审员对受审案件反应坦率。由于没有专业律师，因此需要原告和被告当面对质。那些语言能力较差，或逻辑表达不强，难以满足陪审团标准的人是最可悲的。为了帮助开不出口的人，专业演讲作家常常事先准备好一个答辩词。诉讼当事人然后将演讲稿背下来，再背诵(而不是宣读)给陪审团。

即兴辩解技巧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必须品，因为现在的盘问制度在当时还未通用，审讯苏格拉底是个例外。然后，每一个竞争者都允许有一定时间的辩驳，有时他会直接向对手诘问，要他讲清一个有争议的论点。辩论会上有两只坛子，代表诉讼双方。辩驳结束后，陪审人员就将贝壳或一些其它小东西扔进其中的一个，以表明他是赞成原告还是赞成被告。一般情况下，根据大多数人的投票作出决定，但严重的案件需要三分之二的差额。指定的惩罚形式通常是罚款，剥夺选举权，流放或死亡。最后一条很少实施，如果需要，罪犯只需服用毒芹（一种药），这种药可以使罪犯毫无痛苦地进入睡眠状态，永不苏醒。作为一种惩罚形式的监禁很少使用，部分原因是监狱设施昂贵，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任何形式的监禁都被希腊人认为是残忍的，因而是多余的。

另一个立法机构是雅典最高议会，一个半荣誉性的组织，成员是那些在执政期间政绩卓著的人，在德拉科和梭伦的领导下，雅典最高议会主要是一个法庭，用以审理谋杀，殴打，纵火和放毒案件，但在伯里克理斯时代，它已成了一个监督机构，用以检验地方官员和教育家的行为，而且还松散地审查公共道德。在紧急时刻，它还可以用来行使独裁权，因为它的成员都是国家最有经验的人，作为雅典最高议会的终生成员，他们不会犯政治上的机会主义。

总而言之，雅典的政府系统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极其先进的组织。它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它发展缓慢，是演进和改革的结果，而不是暴力革命的结果。另外，它的功能只局限于一个小国家，其社会阶层分明，每一阶层都有其特权和职责。对希腊人来说，一个没有阶层的社会是极为荒谬的，因为人的能力参差不齐，许多人明显地不胜任公共生活中的重要事务。他们觉得最好是将一个人分到一个具体的小组，概述出他在那个组的职能，这样，如果他的能力得以保证，那么他就有可能脱颖而出。

不幸的是，尽管雅典制度合情合理，但它也埋下了自身覆灭的种子。庞大的立法体制使得人们越来越依赖于一位强人——首席将军。只要雅典有一个伯里克理斯作为领导，那么就会国泰民安，但是一旦小人物爬上了领导宝座，那么灾难就向这座城市袭来。波斯战争前后雅典的对外方针也变得更加帝国主义化，本质上地方型的雅典政府难以胜任主宰世界力量这一工作。还有，雅典等级制度机动灵活，从理论上讲，连奴隶的子孙都可以成为平民。但它已渐渐僵化，在特权阶层中产生了嫉妒，偏见以及一种自杀性的欲望，及维持其等级区分中的现状。时隔不久，雅典人就认识到一个民主政府的生命线就是不停而缓慢地扩展那种民主，一旦民主特权失败或走回头路，煽动和衰退就会乘虚而入。但是当希腊人清醒地意识到这条原则时，这座城市踏上了衰败之路，已无可挽回。

三、军事组织

除了政治职责外，雅典公民的责职就是服国家的兵役。从早年起，雅典人就认识到保卫城邦的责任。他所受的许多教育，包括大量的重体力训练，都在清楚地让他适应至少一部分军事生涯。一个年轻的雅典人满了18岁，完成了正规学业后，就被征募到青年军里服两年兵役，其中有部分时间是在远离家乡的兵营里度过的。一般认为，到了20岁，军训生涯结束，以后公民可以积极从事各种活动，直到60岁。由于雅典主要依赖征兵，所以相对而言没有几个年轻的职业兵，但是所有的雅典人都要防患于未然，一有战争立即应召。雅典人对体质看得很重，每天下午各种年龄的男子挤满了体育馆，参加有规则的训练。

每个人要求自配武器。基本的武器有：头盔、胫甲、胸甲、盾和短矛。有钱的人可以配备一整套轻盔甲和其它精良武器。分

配到哪一个部门主要由一个公民所占有的盔甲类型来决定。这样一来，个人财富成了雅典军事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除了进入具有同等经济地位的部门这一特权外，富人在雅典军队里没有多少优势。富人装备良好，训练一般也较别人强，条件也比别人好，因此他很清楚在战争中他得首当其冲。

战争本身几乎并不具有按钮式变化。相反，它遵循上述的一个接一个的方阵战术，有点像一场争夺橄榄球的混战，又有点像一场星期六晚上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赛跑。战略战术主要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战场和战前合理分布部队。一旦交战，什么事都会发生，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后勤和训练有素的策略，而主要取决于实力和耐力。雅典的军队差不多全部由步兵组成。在狭窄的希腊峡谷，骑兵是不实用的，而石弩和撞墙钟之类的战争机器又太原始，没有什么价值，除了偶尔进行的围攻。

尽管希腊战争一般不受禁令约束，但他们还得遵循一些细则。不杀战俘，不把希腊同胞降为奴隶。战争不得在宗教节日或丰收季节进行，不得在人们睡觉，吃饭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不过还是有人经常违反这些约束，因而被认为是很坏的行为。

雅典是个海上大国，许多年轻人选择海军作为他们军事活动的分队，不过在那儿服役没有在陆军里有意思。海军不需要昂贵的装备，贫穷的阶层常常当海军，有时甚至连奴隶都被征募当海军，条件是服役后可以获得自由。雅典的战舰都是些轻型的大帆船，每条船由60位经过训练的划手，三人一排地坐着划行。为了使整个划手动作协调一致，不致相互碰撞，他们需要大量的练习和体力合作；特别是雅典海战战术主要依靠速度和灵活行动，而不是力气和体重，海军所使用最有效的策略是从船侧或船尾猛撞敌人。在萨拉米战役中，希腊人就是运用这种策略彻底摧毁了行动迟缓的波斯海军。一旦证明这种策略有效，旧有的船上肉搏战

就显得过时了。只要战争继续依赖用桨来推进，碰撞便是海上进攻的主要方法。

四、经　济

雅典自然资源并不丰富，但在黄金时代，雅典的农业、手工和造船业发展都比较平衡。雅典栽种了各种谷物，橄榄和葡萄，还饲养了许多羊。尽管如此，谷物还是不能满足需要，粮食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进口，而另一方面，手工品，特别是铁器和陶瓷则有利可图，不过很少成批生产。

雅典致富的主要来源是造船业。造船业一直扩展到整个地中海，对雅典成为海上大国以及成为希腊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起了决定性作用。雅典银行业高度发展，硬币成了整个地中海一带商品交换的标准媒介。雅典银行借贷有方，利息从12%到30%是常事。银行业和造船业的不断发展不可避免地将雅典推向帝国主义，其本性既有政治成分又有经济成分。爱琴海一带的弱小国家既为雅典的金融压力，又为雅典的军事力量搞得提心吊胆。

雅典的货币单位是德拉克马。银元的面值有1，2，4，10德拉克马，还有被称作欧波尔的小银币。一个欧波尔等于1/6德拉克马。100德拉克马等于1个弥纳，60个弥纳等于一个泰伦特。不过这些面值的硬币并未发行，很难用今天的价格标准去衡量雅典的货币价值，因为现代世界的生活标准和伯里克理斯时代的生活标准大相径庭。劳动者一天可以得到三个欧波尔，或半个德拉克马，这被视为是维持生计的最低工资。有技术的工人一天可以赚到1个德拉克马，而名匠一天可以赚到2.5德拉克马。在审判中，苏格拉底提出他可以付30个弥纳的罚金。他之所以能提出付这么高的罚金主要是他的那些富有的朋友们答应资助他。他承认他本人只付得起1个弥纳。在希腊文学的其它著作里，我们还可以看

到一个有50个泰伦特的人被看作是富翁①。

如前所见，雅典人口中的大多数是工人和手艺人，而平民阶层里有许多是有闲阶层。靠技艺维持生计的平民是很少的，因为没有律师，没有全日制的祭司，没有专业政客，也没有几个职业军人。教师通常是奴隶或外国人，杂耍者，占卜者和星象学家也如此。在雅典，只有医生具有真正的专业地位，尽管有许多关于他们误医致死的陈腐笑话。事实上这些笑话是冤枉的，因为希腊人对解剖学和药理学已经有了很深的认识，诊断技术也非常高明。

但是不管一个雅典人的职业和收入如何，他对税收不抱什么怨言。政府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由奴隶、低薪水的职员以及几乎不计报酬的公民负责的，因此他们的收入很低。所需要的收入主要来自通行税，关税以及波斯战争后，随着雅典帝国的扩大，雅典向仆从国所征收的高昂的捐税。雅典政府很少向个人直接征税，不过战时有时也会征收收入税。雅典迅速衰败的一个原因是无情地榨取仆从国。一俟机会来临，这些受奴役的小国家就同雅典的敌人联合起来，推翻他们所憎恨的迫害者。

五、日常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希腊人绝妙地阐明了人类学理论：人的生存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气候这一简单因素决定的。在气候无常的土地上，人们必须建造坚实的房子以防备强大的风暴，必须给房子加热以防冬天的寒流，必须具备几套不同的衣服以适应季节变化，必须在温暖的季节努力工作，储备粮食以防备严寒来临。如果土地不再有农业收获，那么必须设计出农业以外一些复杂而又有用的活动来维持全年经济的发展。据估计，在北温带的国家，比如美国，一个人有一半以上的精力和收入用于简单地建造避护所，

而另一部分薪水则用于食物；因为在淡季，人们所食用的粮食都经过加工或储存，所以价格相对而言比较高。

但是希腊人却没有为这种气候问题所困扰。在这个国家里，夏天炎热而干燥，冬天短暂而温和，一年四季几乎都可以栽种。因此希腊人不必去操心防风暴的房子，集中供暖和各种规格的衣服，或易腐烂商品的暂时短缺。果园可以栽培水果，粮仓则可以储备简单而又均衡的饮食所必需的牛奶和肉。由于社会生活主要在户外进行，所以这里所设计的房屋只需满足吃睡这一基本要求。娱乐活动主要是散步，竞技和谈话，没有什么在室内举行的开销大的聚会和娱乐玩艺儿。总而言之，希腊生活艰苦朴素，备受人们的称颂，这倒不是因为这个朴素稳重的种族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事实很简单，在这个宜人而又可以预报的希腊气候里，复杂的生活标准是不需要的。

希腊生活的主要特征是节俭，这体现在服饰上。男人穿一块简单的长方形白布，一直到膝。肩上用别针别着，腰间系一根腰带。如果天冷，再加一块相同的布，看上去像斗篷似的。鞋子和凉鞋常常交替使用，但是帽子却很少。运动时赤身裸体，干重体力活几乎也是如此。现代人对服饰多样化的追求在希腊人看来荒诞无聊，他们倒宁愿通过运动或智力成就来表现个性。

然而，女人的服饰却丰富多彩。染料昂贵，而且还得进口，但是有钱人的妻子还是穿戴五颜六色的织物。女人服装的主要成分和男人一样仍是披戴长方形白布，但每个人的个性可以通过对颜色和式样的安排来体现。理发是一项精湛的女性艺术，化妆品也得到了审慎的使用。热衷于自我打扮和消磨时光是希腊女人的一大乐趣，男人对此也能容忍，部分原因是这样一来，他们的妻子变得更加迷人好看；另一部分原因是在有身份的女人中更高的智力追求被认为是不切实而且不受欢迎。

从现代审美观来看，伯里克理斯时代的希腊住房简朴得也太

过份了。他们的住所通常用太阳晒干的泥砖砌就，有时一遇风暴就被水冲走。外面没有窗户，通常只有一扇门。如果说外面有什么装饰的话，那就是有一个门廊。但总的来说，希腊人认为没有必要将住房打扮得像神殿或公共建筑似的。在一个大的庭院里，通风和通光程度都很好，这个庭院还可以用作起居室和餐厅。庭院四周所建的房屋主要用于睡觉和存货，有一侧专为女人使用。有钱的人会在院子里铺砖地，但地面肮脏是常事。门主要由帘构成，家具是最简单不过的了。椅子特别稀少，希腊人认为坐是一种浪费时间的野蛮习惯，因此他们在白天大部分时间都是站着的。抽水马桶是不存在的，大街上连便桶都没有。不过，希腊人对个人卫生却特别讲究，如果不到公共澡堂去洗澡，便认为这一天没过好。还没人知道肥皂是何物，但是人们用橄榄油来擦洗身子，然后再用一种平坦的擦身工具将油擦去，结果证明这是一种良好的肥皂替代物。

膳食很节俭，但在希腊社会生活中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许多古代的人一样，希腊人认为半躺着吃饭帮助消化又有助说话。吃饭的时候客人总是在场。为了助兴，人们喝大量的酒。一般的饮料是稀释了许多水的甜酒，这种酒的效果常常使人兴奋，而不会令人醉。不过他们也经常进行烈性酒较量，在这种场合，通常由司仪来决定酒的掺水量，并且主持祝酒仪式。在这些较量中的娱乐形式一般是谈话和唱歌。有时还雇佣职业舞蹈家，杂技演员或音乐家。当然，女人是不准参加的，他们根本不许在客人面前露面。

一般来说，在希腊家庭里，女人的地位是操持家务。妻子应该伺候丈夫，抚育孩子，她们很少被允许加入到丈夫生活中比较严肃或智识性的圈子里，也不允许她们占有财产。希腊女人的一生都在父亲、兄弟、丈夫或儿子这几个男人的监管之下。婚姻由契约撮合，如果有谁从这种武断式的婚配中获得浪漫式的满足，

那是极为稀罕，而且也极为美妙的。另一方面，希腊男人又不能没有浪漫时刻，因此高等妓女和情妇是公认的，而且还是希腊生活中深受人们尊敬的一部分。雅典人以高度的道德观著称，但这种道德并不禁止男人的婚外活动。不过，这种活动应局限在高等妓女范围内。如果有一个妻子在通奸时被捉到，那么她会被立即休掉，永远蒙受耻辱。一个男人如果专爱玩弄邻居的妻子，那么他就会失去社会和同伴的尊敬。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标准使得雅典的家庭生活和睦平稳。一般的雅典人似乎是一个爱好家庭生活的人，他爱他的妻子和儿女，婚外活动适中有度。而且，同这些高等妓女在一起并不一定都是为了肉欲方面的需求，因为这些女人中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既可爱又美丽，在她们家中聚会就像是一次既令人尊敬又非常优雅的18世纪沙龙聚会，而不是19世纪的妓院，她们当中的阿斯帕莎就成了伯里克理斯不成文法的妻子，对这个城市的思想和政治生活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连苏格拉底本人都称颂她那杰出的思想。然而阿斯帕莎和她的阶层只是例外，除了在家里，一个社会所能容忍的外部边缘几乎全由男人垄断。在家庭这一狭窄的圈子里，雅典的妻子们只有少许影响。在外部事务中——在社会上，在法规前——她们的地位极为低下。相比之下，奴隶的特权似乎都比她们高。

注释：

①原注：有些教科书认为1个德拉克马近似于25个美分，如果这个标准能为人们接受，那么就有必要将希腊货币的购买力至少增加20倍，以使其价值同现代的价格相等。

第六章　希腊戏剧的发展

一、狄俄尼索斯节

戏剧从一开始就和宗教紧密相联。它起源于古代希腊的崇拜节日，到了古典时代像宗教仪式和娱乐形式一样兴旺发达。又过了几百年，到了早期基督教时代，它又在中世纪的礼拜仪式，神奇剧和神秘剧中得以复活（同样作为神圣崇拜的一部分）。这种关系不断地给教会出难题，这种难以预料的联姻不断地引起教士的愤怒，但是布道坛和舞台在作用和感召力方面的关系一直是纠缠不清，直到现代麦克斯韦尔·安德森才有可能将戏剧和教堂进行一番比较，并且明确声称：作为一种人类精神的改善力，舞台已取代了教会。

有趣的是，苦苦折磨人的传道士常常嘲弄戏剧，认为它是罪恶的孩子，而它偏偏起源于神明的过错，起源于对私生子神——希腊的繁殖与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崇拜。

纪念各种各样的合唱节是希腊文明的一个早期发展。这些节日起源于乡村，后来逐渐传播到城市，在城市环境中获得了最长久的发展。这种原始的唱歌崇拜对戏剧的影响究竟有多少，专家们尚有不同的看法，但勿庸置疑，希腊悲剧是一种献身于繁殖神话的合唱节的直接分枝。必须记住的是，希腊戏剧不是全年都有的，它的表演只局限于狄俄尼索斯节期间。在一年一度庆祝繁殖与酒神的五种仪式中，有三种与戏剧直接有关。乡村的或小型的狄俄尼索斯节于12月在乡村举行，榨酒节在1月份举行，3月份所举行的大型狄俄尼索斯节的标志是戏剧表演。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戏剧表演在深度和复杂程度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早先的戏剧主要是些酒神赞美歌，由一个经过训练，身着森林之神服并在上面涂满了酒的合唱团齐声合唱。表演常常在街道或公共广场上举行，因为剧院直到公元前5世纪才出现，赞美歌的主题主要是狄俄尼索斯的磨难以及在尘世间的痛苦。大概是因为这些表演者一个个都打扮成山羊（tragodoi）模样，或者在背诵过程中用一只山羊（tragos）来祭祀，所以tragodia，即山羊之歌这个词被用到这种戏剧以及以后的严肃戏剧的发展上。（顺便提一下，戏剧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一个行动”，和许多其它戏剧术语一样，来自希腊语。）

到了公元前6世纪中叶，戏剧迈开了一大步。当时有一位叫狄斯比斯（Thespis）（现代词thespian即悲剧演员）的诗人将主要演员从合唱团中分离出来，让他在叙述和哑剧中扮演主要角色。通过如此强调动作，狄斯比斯建立了个人表演的概念，而且，通过增加故事表演的第二个成分，引进了对立或斗争这条生命线，舍此真正的戏剧不会存在。难怪后人称他为戏剧之父。公元前5世纪，埃斯库罗斯又增加了第二个演员，一代以后，索福克勒斯又增加了第三个，这样一来，戏剧表演的机动灵活性得到了大大的提高。然而须记住，尽管希腊戏剧里的主要演员从未超过三个，但没有哪一位戏剧家只创作三个单独表演的部分。通常由一位演员担任主要角色，其他的则“串演”，就是说在整部剧中有许多次要角色。狄斯比斯创作了许多剧本，但是一部也没有留存下来。同样，公元前6世纪其他的戏剧家，如考瑞留斯，普拉提纳斯和菲里尼科斯的作品都已失传，或只剩下一些残稿。

戏剧的繁荣昌盛是在公元前5世纪，当时出现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这样顶天立地的人物。他们所创作的作品至今仍可名列一切文学最伟大的创作之中，到了这时，古典形式的戏剧创作已趋完善，直到两千年后，我们在莎士比亚那儿才找到了与之相媲美的作品。那种粗糙的、

森林之神式合唱的即兴街道表演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戏剧已成了一种复杂、微妙、宗教气息很浓的艺术形式，人们还特别建造了剧院，充分发挥戏剧的功能，收容一批技艺很高的演员，舞台监制，剧作家，导演和合唱演员。对这公元前 5 世纪成熟的艺术性质，我们须加重视和探讨。

二、希腊戏剧的性质

应该强调的是，对希腊人来说戏剧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而且还是一种崇拜神祇的方式。因此希腊人所创作的戏剧主要是用精神意义来打动观众。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剧本都是一个布道，强调约束和谦卑的道德观，因而远远超出了对奥林匹亚诸神的崇拜，形成了真正的希腊宗教。古典悲剧中所出现的最频繁的道德观是傲慢，或盛气凌人造成垮台。

如果由技艺精湛的演员表演，希腊悲剧仍有很高的感染力，但主导剧本的常规和表演已与今天的截然不同。恐怕现代学者最难理解的就是这些剧本的故事情节一成不变，都是观众非常熟悉的。普罗米修斯，阿伽门农，安提戈涅，美狄亚和俄狄浦斯的故事对于一字不识的希腊人来说家喻户晓，就像摩西、基督、哥伦布或华盛顿对于我们一样。因此判断雅典剧作家不是根据新颖或奇特的成分，而是根据戏剧技巧，人物刻画以及处理家喻户晓的题材的浓郁诗意。同这个常规最为接近的现代剧目大概要算歌剧了，聪明的听众事先熟悉歌词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欣赏音乐结构，展开部和表演这些更重要的成分。

这些戏剧通常保留了所谓的时间、地点和动作的“古典三一律”，就是说他们上演一段戏剧插曲，没有“插科打诨”的次要情节或插入部分，布景单一，动作应在可以想象出的24小时内发生。舞台上的身体动作受到限制。希腊人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听朗

诵优美的诗篇，而不是舞台效果。此外，悲剧演员所穿的高统靴（厚底鞋）虽然给他们一种庄重感，但却显得荒谬可笑，给快速动作带来了许多不便。正是这后一个原因（不是过分拘谨），希腊悲剧里的流血事件才在舞台外表演。希腊人喜欢想象所发生的残害人体的事件，不愿目睹缓慢而近于滑稽的剁碎人体的情景。

诗人不仅要遵循三一律，从民间传说，神话和当时的历史事件中去创作悲剧，而且还要按照习惯遵循一条非常严格的戏剧结构形式：1. Prologus，即由主要演员朗诵的开场白。一般来说，这个开场白是全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发挥了将场景和剧情安排在戏剧框架里的功能。在欧里庇得斯的一些剧本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独立的、纯解说的、缺乏戏剧性的开场白，但这种技巧直到罗马时代才开始普遍使用。2. Parodos，即合唱入场。合唱团有12人，后增至15人。他们一边咏唱，一边缓慢舞动，以适应戏剧的严肃性。使演唱的合唱段落都已风格化，但并不死板，所创作的诗行本身很有规则，非常注重所使用的字的语音和节奏效果。合唱结构中最常用的类型是先由一半合唱演员从右向左舞动歌唱，然后再由另一半合唱演员从左向右舞动应答，最后双方联合起来合唱终曲（epode）。3. 戏剧的主体就是遵循合唱入场和由主要演员运用合唱曲进行点缀的戏剧插曲（episodes）。这些插曲一般有5个，尽管他们很短，但却同现代戏剧里的幕大致相同。插曲和合唱曲之间的关系变化很大。在埃斯库罗斯的早期戏剧中，合唱直接评论动作，常常牵谈到戏剧本身。在欧里庇得斯的后期作品里，合唱段落似乎仅仅是表现气氛的诗的幕间表演。有时，为了取代合唱曲，剧作家加进了一个commus，即改变主要演员和合唱演员的对白段落。

4. 最后，一系列的插曲和合唱幕间曲表演完毕，接下来是exodus，即合唱演员全体离开，这同从前的意大利歌剧极为相似。事实上，作为一种融合了表演，歌唱和舞蹈艺术的希腊悲剧更接

近歌剧而不是现代戏剧。

一般说来，希腊悲剧以四部曲，即四联剧的形式上演。前三部很严肃，而第四部，或森林之神戏，则是一段轻松的剧终余兴。同一般想法不同的是，这四联剧并不一定连贯，甚至在主题上也不一致。事实上，只有埃斯库罗斯似乎是一直按照系列剧的形式来创作他的四联剧的。没有一部完整的四联剧幸存下来，但在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肖佛利》和《欧墨尼得斯》里，我们仍可看到世界最伟大的戏剧创作之一的三个主要部分，不重要的森林之神戏丢失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俄狄浦斯在科洛罗斯》和《安提戈涅》遵循了一个剧情顺序，但我们知道，它们是作者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因而不能算在同一个四联剧里。

希腊戏剧最令人愉快的一个风俗就是有奖竞赛。在这种竞赛中，戏剧诗人为了一小笔钱但主要是为了伟大的社会声誉而展开竞争。这些竞赛在 3 月份举办的 6 天狄俄尼索斯节期间举行。节日的第一天主要限于游行和欢庆，有点像四旬节前的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但是这种强烈的感情一旦发泄出来，接下来的五天就会用于诗歌竞赛：一天用于赞美酒神歌，一天用于喜剧，还有三天用作悲剧。在最后三天里，每天上演不同的诗人创作的三部四联剧。由十位裁判投票选举，然后随意从中选取五张选票来决定名次，其余的选票则不用审查就被毁掉。从理论上来说，裁判是纯洁而又公正的，但实际上听众的反应对奖品的裁决起了很大作用。雅典的听众认真对待他们的戏剧，对演员，剧作家和裁判畅所欲言。一般说来，最后提名的人还要考虑到他们的健康状况，选举时要经过观众的许可。雅典人感情丰富，但也很有眼力，这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他们授予埃斯库罗斯28个一等或二等奖，索福克勒斯30个，欧里庇得斯 6 个。除了这三位巨人，没有哪一个悲剧家得到认可，也没有哪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得以保存。

三、希 腊 喜 剧

和悲剧一样，希腊喜剧来源于早期狄俄尼索斯节。正如所见，这些宗教仪式的开头通常是些壮观的表演和毫无节制的狂欢，喜剧就是从这种欣喜若狂的狄俄尼索斯崇拜中发展而来的。这种起源解释了希腊喜剧里几乎难以使人相信的粗俗和污秽，还解释了喜剧的粗鲁滑稽和近似即兴式的幽默。

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喜剧比悲剧发展得迟，所以它很自然地吸收了悲剧的正规形式，如三个演员制，合唱和总体文学结构。在这种正式轮廓里，有几点同悲剧的区别。比如，合唱团很大，人数从18到24，他们一个个打扮得奇形怪状，不像旧的形式那样沉闷庄严。此外，喜剧里的动作激烈而不断，演员免去了那双高跟厚底鞋，所以行动自如。在情节上，喜剧一般围绕两个主要角色之间的争论而展开。在剧本的第一部分，演员先将论点提出来，到了第二部分，这个论点经过一番打闹、粗鲁滑稽的对话和一般的淫猥言词而得以解决。在这两个主要部分之间还有一个Parabasis，即合唱演员“出场”。这段冗长而荒谬的合唱段落成了一种幕间表演。它通常遮盖了场景和时间的变动。

现代学者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像希腊喜剧这样言论自由的一种艺术形式会同宗教有什么联系，但是须记住希腊的人生观助长了人们对人生各方面的享受，条件是他必须体面地约束自已。狄俄尼索斯本人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纵情狂欢，享受生活的乐趣，作为节日的一部分。为纪念他而创作的喜剧不仅表达了那种乐趣，而是还成了一种替代性泻药，用以净化观众中那种所谓的“低劣感情”。

我们不应该认为希腊喜剧动作自由，但只是表现了一些无聊而喧闹的小丑。阿里斯托芬的所有戏剧，除了愚蠢的行为外还包

含了很多极为严肃的政治或道德思想，剧本运用嘲笑作武器来摧毁作者所认为的社会弊病或智力陋习。阿里斯托芬的继承者只是在喜剧效果上不像阿里斯托芬那么成功，但在处理当时的社会问题上同样是严肃的。在阵阵嘲弄声里，希腊喜剧家触及到了人生最为神圣的部分。这是对希腊言论自由和幽默观的礼赞。正因为如此，像阿里斯托芬这样苛刻的政治评论家才从未受到市政官员的骚扰。希腊人身心健康，心情愉快，决不可能容忍一个盖世太保或一个昼夜警戒协会的存在。

根据阿提卡喜剧的前后发展，人们通常将它分成三个阶段。盛行于公元前 5 世纪的旧喜剧主要成分是政治讽刺。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是阿里斯托芬，从他那儿我们得到了唯一完整保存至今的希腊喜剧。100年后出现的中期喜剧明显地表现了现实和日常问题，如结婚，道德或伦理选择，还有其它，这同我们今天的喜剧大为相似。这个流派的代表作家有安提芬和阿莱克西斯，但是他们的作品没有一部留存下来。最后一个阶段是公元前 3 世纪出现的新喜剧，这是对人类缺点的夸大式讽刺。这种戏剧最优秀的代表是菲力蒙和米南德，从后者几部残缺不全的剧作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希腊喜剧渐渐地克服了其粗俗滑稽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也失去了幽默和新鲜活力。

四、希腊戏剧的表演

我们已经见到在戏剧出现之前的早期合唱表演是在公共广场或街道边举行的，没有舞台和座位，也没有现代剧院所提供的一切使人愉快的环境。然而时隔不久，希腊人需要更大的空间来容纳观众，表演也从城市街道移到了旷野。这儿依然没有剧院结构，但是在skene，即帐篷里出现了一种最早的“道具”。演员在帐篷里乔装打扮，然后在帐篷前围成一个合唱队席（orkestra)的圈子

来上演他们的戏。由于帐篷档住了人们的视线，所以观众习惯于在帐篷的对面围成一个半圆圈，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在演员周围围成一个圈子。为了改善视线，他们还习惯于将座位放到山坡上，这样他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观看表演。随着这些发展，下一步必然是建造一座永久性剧院，借以保存帐篷和合唱队席的一切基本惯例和山腰边半环形的座位。这个永久性结构大概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但是这种结构没有留下痕迹。著名的雅典狄俄尼索斯剧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尽管它很可能是公元前5世纪一个不太牢固的大建筑物的改建。时至今日，它仍保留着昔日完好的状态。不妨说，狄俄尼索斯剧院典型地体现了当时其它的希腊剧院。

为了使狄俄尼索斯剧院特征具体化，我们只需想一想一座半环形的足球比赛场，比赛场的两侧容纳了27,000名观众，结果运动场缩减成了一个78英尺的圆圈。观众的对面，圆圈的后面是一个支柱式的结构，后面敞开，两边是化妆室。这是帐篷的一个实际发展，成了动作的背景。戏剧的主要部分在合唱队席圈子里上演，中间有一个纪念物，代表狄俄尼索斯祭坛。希腊剧院里没有凸起的舞台，直到罗马时代才有了这个戏剧习俗，但是希腊人在车轮上设立了一种叫做ekkyklema的平台，有时被推出来代表一种内景，其功能与伊丽莎白时代的内景差不多。很明显，帐篷为旋转式和三棱柱式的舞台布景提供了一些机会，还有活动门和把演员从背景结构的上部降下来的机器。由于演员使用了据说是由狄斯比斯发明的persona即演员戴的面罩，使音响效果和演员化妆问题得到了部分的解决。这种面罩不仅夸大了他们所必需的特征，藉以同合唱队席拉开一段距离，而且由于在嘴里装了一只小扩音器，声音也得到了扩大。扮演双重次要角色的演员往往以换面罩来表现他们角色的改变。顺便提及的是，这些演员（被称做hypokrites），还有一帮唱诗班歌手，受到政府的补贴和培训，享受很高的荣誉，被免去了税收和兵役。没有女人出现在舞台上。女人

的角色明显地由成年男人扮演，而不是像莎士比亚时代那样由尚未变声的男孩扮演。

观众通常在黎明时分进入剧院，准备一直看到日落。起先不收入场费，但是后来收了一小部分的费。每天至少上演三部四联剧，观众鼓掌欢呼或非难演员，他们根据情形需要将花或石块扔到合唱队席里。结果一天下来，观众感到精疲力竭。如果考虑到集会的宗教性质，希腊观众的行为在我们看来似乎一点也不虔诚，但另一方面，希腊人也决不会理解我们去做礼拜时的那种静穆态度。然而，不管他们的行为举止如何，毫无疑问，雅典观众是鼓励戏剧的。在公元前480到380年间，他们目睹了2000多部戏的首映式，这还不算一年一度持续 6 天的戏剧节。

第七章　苏格拉底前的希腊哲学

哲学这个词意为“热爱智慧”。一般认为哲学家，或“智慧的爱好者”，追求真理的目的有三：第一是为了了解人及其宇宙的本质，第二是为了决定人和宇宙的关系；第三是为了发现生活得明智而美好的方法。哲学的主要分类是：

（1）玄学，即对人及其经验之外的事情的研究，或给他一个更为通俗的阐释，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2）物理学，即对宇宙的自然本质的研究。现在物理学已发展成一门“精确”的科学，而不是哲学。

（3）伦理学，即人与尘世经验及其同伴的关系。

一、唯物主义者

甲．米利都学派

各种各样的哲学思索大概和人本身一样古老，但是作为一门系统化了的思想努力的哲学，在历史上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迟。西方哲学最早的“学派”于公元前6世纪起源于希腊爱奥尼亚的米利都这个繁荣昌盛、具有高度文明的城市。米利都学派是第一批“万物有生论”或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们主要所关注的是物质的本质，为了决定宇宙的基本要素，他们的思索有时显得极为荒谬，有时又具有惊人的现代性。不幸的是，他们的原始作品没有一部留存下来，对于这些哲学家，我们所知道的主要来自后期作家对他们的评论。此外，我们通常只知道他们的信仰，但不知道他们何以得出这些结论。

米利都学派哲学家

泰勒斯（约公元前640—546年）被认为是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西方哲学之父，尽管他一部作品也没有留下来，甚至还不知道他是否写下了自己的思想。从亚里士多德那儿，我们知道了泰勒斯相信水是宇宙的基本要素，地球浮在水上面，万物皆有神性，因而都有一个灵魂，或生存原则。

比泰勒斯更有趣也更具想象力的是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11—547年），他拒绝了他老师水的理论，提出宇宙的基本要素是一种无形成分。他称之为“无限者”（apeiron）。一切有形之物皆来源于这个公分母，而最终又复归于这个公分母。甚至我们所看到的天体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只是更大的星系中的一个分支。这种世界多元论具有惊人的现代性，同古代世界通行的哲学思想迥然不同。阿那克西曼德还预见到了进化论思想，声称万物皆由水出，改变形状，发展种类，使自己适应环境的变化。他还认为地球是一个圆柱形的旋转物体，悬浮在“无限者”这一涡旋体上。

第三个重要的米利都学派哲学家是阿那杰西米尼（约公元前6世纪）。他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公元前6世纪末的一个哲学

教师。他和两位前辈的观点不同，认为世界的本质是aether，即气（空气和蒸气），他的结论依据大概是呼吸的构成方式。不仅万物赖此生存，而且它还变化无常，在不同的情形下，它会以气体、液体或固体的形状出现，从而构成了一切物质的潜在要素。他认为世界是平的，天体是由其表面水分产生的，在超高温和稀薄化了的气体中变成固体，高高在上。

公元前6世纪末，爱奥尼亚落到了波斯人手里，她的大部分文化都被入侵者毁掉了。阿那杰西米尼之后，米利都再没有产生哲学，要了解唯物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必须转向希腊世界的其它地方。

乙。“物力论”哲学：赫拉克里特

米利都学派之后的万物有生论思想家所关注的主要是物质本质的变化问题，而不是物质本身的构成。米利都学派敏捷地认为，世界的基本要素在不断变化，并提出了物质变化的各种可能性，但后期哲学家开始怀疑事物是否真的能改变其明显实体，而其基本成分仍和从前一样。促使种子成长的水到了成熟植物里还是水吗？浓缩成水分的气体还是气体吗？抑或变成了其它物质？

对于这些问题，一个贵族爱非斯派赫拉克里特（约公元前500年）简单地回答道：尽管表面不同，“万物皆一体”，一个共同的实体形成了甚至最明显的生存对立面的基础。在这方面，他和米利都学派的观点相一致，但从这一点开始，他和他的先驱们分道扬镳，声称“万物皆变”。事物从不存在，相反，万物总是在变化，从未达到休息或平衡点。这种“变化”原则使得一切事物都不静止，瞬息万变，不断地改变形状和实体。赫拉克里特在其著名的比喻中指出：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因为水总是在变化，而人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同刚才不可能一模一样。因此，除非人通过未必可能的奇迹将记秒表法运用到宇宙上去，否则任何事物现在不存在，过去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相反，在宇宙的

"变化"过程中，一切只不过是一部过去形态史，一种无限的未来潜力。

为了使人相信这种宇宙观，赫拉克里特认为一切变化之公分母一定不是水，气或"无限者"，而是火，这种火通过变化产生了光和热。他还进一步认为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而是遵循一套有规则的逻辑秩序，至少在理论上来说，通过理性分析可以使人理解，并可得到预测。因此他不喜欢神秘的或礼仪式的宗教，认为荷马与荷西俄德的作品只不过是一堆垃圾，和人类的理性分析格格不入。

丙．"静态"哲学：埃利亚学派

同赫拉克里特相反，埃利亚学派的哲学家（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他们盛行在意大利南部的埃利亚）认为变化是不可能的。

这一学派的领袖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50年）认为一件事物不可能既是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事物，要么是这种事物，要么就是另一种事物，没有"变化"这一中间领域。他认为真正的世界一定是一个同一而无限的实体，没有更换，没有多样化，也没有变化。如果我们的感官告诉我们不同的观点，那么，一定是我们的感官错了，没有反映出真正的现实。这种现实和感觉之间的区别，加上对超出人类感觉的真理的生存的强调，之所以使人感兴趣，是因为它预见了柏拉图的理想主义，在这一点上，柏拉图和唯物主义领域里的巴门尼德一样，对理想王国里的真实和表面作了相同的区分。

后期埃利亚哲学家有以辩证的悖论而著称的埃利亚的芝诺（约公元前475年），还有撒姆斯的梅利修斯（约公元前5世纪），他对巴门尼德的争论没有提出什么本质的东西，但他在反对多元论者妥协努力中雄辩地捍卫了自己的观点。①

丁．多元论者

在赫拉克里特和埃利亚学派截然不同的两极之间存在着多元

论者，他们活跃在公元前5世纪，由于他们介绍了物质原子论，所以他们的观点特别使人感兴趣。

这些哲学家中第一位是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500—430年)，西西里人。他将一切物质分成地、气、火和水四种要素。这四种要素本身是同一的，不可毁灭的，但它们可以结合成一大批或多或少的临时形式。因此，实体和形式，正如我们所见，只不过是这些基本要素的临时融合。这样恩培多克勒阐述了变化的因素，而没有抛弃埃利亚学派宇宙牢固而同一这一基本学说。至于造成这些元素千变万化的动因，恩培多克勒显得不太唯物主义化。他提出宇宙不断为爱和憎这一对立势力所横扫，这两种势力的千变万化造成了这四个基本要素的融合。

随着阿那克萨哥拉（约公元前500—428年）的出现，多元论思想进入了下一个发展阶段。阿那克萨哥拉是士麦那人，伯里克理斯的一个亲密朋友。他大部分生涯是在雅典度过的。阿那克萨哥拉抛弃了恩培多克勒的四种要素论，认为这种理论太武断。他则提出一切物质皆由“种子”构成，每一粒种子都含有其它种子的要素，但每一粒种子之内都有一些支配其余种子的物质，所以，一切物质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种子的混合而呈现各种不同的特质，而这些种子本身却一点也不同一。当然，这些种子小得难以觉察到，因此阿那克萨哥拉部分地同意埃利亚学派的观点，即感官是有限的，不可能达到基本的物质真理。与此同时，他的理论为10年后留基伯（约公元前5世纪）和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362年）的物质原子论铺平了道路。

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是师生，他们的观点极为吻合，所以很难将他们的思想分开。我们对这两位哲学家的生活所知甚少，但是他们的声望在古代世界仅次于亚里士多德。所有的多元论哲学家都力图调和赫拉克里特思想和埃利亚派思想之间的对立关系，而这两位哲学家作出的贡献最大。和埃利亚学派一样，留基伯和

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的基本要素不是永存不变，不可毁灭的，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如果降低到最低限度，都可以变成一个同一实体。然而，他们还进一步同意多元论先驱的观点，认为在埃利亚学派宇宙的框架里，看不见的小粒子的旋涡运动不断产生物质的结合。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称这些小粒子为原子，认为和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不同，原子是基本物质不可分割的单位。

同他们的先驱进一步相悖的是，他们认为宇宙并未“满”，相反，这些原子在这空旷的空间里不断地作旋涡运动。而且，这种永不停息的运动尽管令人费解，但它并不是毫无目的或混乱不堪的，而是遵循着一个有规则的模式。德谟克利特说：“没有任何事物的产生是无缘无故的，万物的产生都有其根源，都是必然的。”由于提出了宇宙的基本现象是运动的模式，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为现代科学创建了两个重要假设。而另一方面，他们的牢不可分的原子观当然也是错的，同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质变论相比，他们的想法离现代科学思潮更远。

二、神秘论：毕达哥拉斯

从泰勒斯到德谟克利特所有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都试图通过对物质成分的分析来了解宇宙。其他一些哲学家则通过神秘的非物质性的手段来探讨同样的问题。这些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是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2—507年），撒姆斯人，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而后者于公元前530年左右移居意大利南部，根据俄耳甫斯的神秘故事建立了一个修士会。毕达哥拉斯信徒遍及意大利，后来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叶，意大利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骚乱，许多会员呆不下去，被迫逃到了希腊，因而将毕达哥拉斯哲学也带去了。许多希腊人加入了该协会，毕达哥拉斯思想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思想倾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毕达哥拉斯派相信灵魂转世，希望通过净化灵魂来达到高贵的轮回转世。他们认为这种净化不仅可以通过善行得到，而且还可以通过研究宇宙，全面了解它的秩序和美来获得。出于这个目的，他们转向了数学，认为这是打开“天体音乐”的钥匙。他们觉得万物皆可由数来解释，而数只不过是宇宙空间甚至道德准则的象征。他们显然是通过观察自然里的数字现象而获得这个信仰的：大北斗七星和小北斗七星，七颗明星，人的头颅上的七个穴和尼罗河的七个河口等等。毕达哥拉斯哲学的追随者们对这种数字象征法的宇宙含义作了无限加工，尽管这个系统对希腊的思想并没有多大影响，但它到了中世纪却意义深远。当时毕达哥拉斯更重要的贡献是纯数学，天文学和音乐，还有神秘的灵魂转世论，这对柏拉图灵魂不朽思想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实用主义：智者派

同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截然不同的是智者派实事求是的唯理论。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变得越来越重要，与此相适应，雅典抛弃了实验和思索，转而注重实际。随着雅典突如其来变得伟大，雅典人发觉雅典不知不觉地成了希腊世界的领袖，伴随其垄断地位的则是一切责任和危险。这项庞大的领导工作吓倒了许多雅典人。到那时为止，他们的生活还相当简朴、偏狭，甚至与世隔绝。在飞速发展的世界里，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他得为这项新工作做准备。这样一来，他就承担了大量的特殊教育，包括讲授实用政治术。

于是雅典相应地出现了一群人，其中许多是外国人。他们以讲授实用修辞术为生，包括公共演讲，阐述和争论。在这些被戏称为“智者派”的教师之中，有一些人才华横溢，兢兢业业，但大多数人只是起招徕作用的机会主义者，自愿迎合学生的那种个

人长进、故弄玄虚的低级欲望。比如，在讲授辩论术时，他们不太注重寻求事实，而只是想获胜；在玄学方面，他们相当倾向于怀疑或忽略任何超出感官世界的思索；他们的同伴之一普罗塔哥拉（约公元前481—411年）是这样评论他们在宇宙中的地位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在道德问题上，他们倾向于这种观点：善就是一个人合法地避开惩罚；不管怎么样，美德是相对的。但时隔不久，即使在那些雇佣智者派教师来辅导他们的个人进展的雅典人脑海里，诡辩术和恶棍几乎成了同义词，雅典人极其错误地将苏格拉底和智者派相提并论，这或许加重了公众对他的不满，导致了他的死亡②。

然而，必须公正地承认许多诡辩家，如普罗塔哥拉，都是些正直而勤勉的人，一点也不应为智力恶棍行为受责。本来这些辩论家只是想讲授交友和影响别人这一必不可少的实用艺术。此外，诡辩家们有益地强调理性和力量的发展，鼓励学生进行"答问"式演说，发展智力灵活性。通过这种传授形式，诡辩家们期望学生在经验丰富的传授者所提出的一连串主要的而且常具破坏性的问题面前能够陈述并发挥理性的并使人信服的观点。这种讲授法也为苏格拉底所用，尽管他抛弃了诡辩家对尘世和"实用"事物的兴趣，苏格拉底法在后世得到了高度发展，成为教育过程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基本技术。

注释：

①原注：不要将埃利亚的芝诺和斯多葛哲学的奠基者芝诺（公元前336—264）混同起来。

②原注：这种相提并论主要是由阿里斯托芬的通俗喜剧《云》所引起的。这部喜剧欢闹地但却恶毒地攻击苏格拉底为诡辩家、骗子。

第八章　罗马精神

一、罗马三位一体：责任、纪律和成就

正当希腊处在缓慢而悲惨的衰败的时候，西部的另一个国家正在崛起。她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虽然步履维艰，但却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意大利，罗马人已将整个半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与此同时，她又在蠢蠢欲动，想通过对外征服和开明的殖民政策这一持久计划，将努力扩展到整个地中海。这一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几百年间，莱茵河和多瑙河南部所有欧洲国家，英国、北非以及同黑海接壤的所有亚洲国家都被并入了这个庞大的罗马帝国，成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奇迹。不用说希腊成了这些新征服者的一个早期牺牲品。就像是一只饿蟒的捕食物，她被整整地吞了下去——慢慢地，静静地，其功效冷酷而不可避免。不过这倒是一顿美餐，因为罗马人急于想采用希腊的生活方式，模仿希腊的艺术。

教授们习惯于将希腊和罗马文明融合成一个共同文化，称之为古典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使人误解的做法，是将油掺合到水里。因为罗马人确实在勇敢地模仿希腊方式，他们的姿态也相当适合，就像乡村新娘所租用的华丽服饰一样。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对待阿提卡讲究智性的态度也只不过是用一种玄耀的方式来表明他们的文化同希腊人的文化相等。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则是些诚实而受到鼓舞的模仿者。不错，罗马对西方世界的成长所做出的贡献有许多，而且惊人，但他们是罗马人，不是希腊人。罗马人有自己的个性。他们呼吸的是自己的空气，传播的是自己的精神。这种精神确实没有希腊人的那么崇高。它

所给人的印象是散文而不是像希腊先驱者那样给人以诗。但是，如果说它贡献的是散文，那么这就是一种优美而稳健的散文，丰富而感人，其本身就值得人们的注重。

在开始分析罗马精神的一些主要特征之前。我们想再一次提醒读者，这样一种程序至多只会产生一些面面俱到的概述。有许多罗马，历史上的，文化上的、社会上的和地理上的。一个文化覆盖了文明世界的大多数地方，而且经历了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从石屋的原始风尚到颓废的豪华奢侈。因此要想选择几个世所周知的形容词来描绘这种文化，所需要的恐怕不是技巧，而是蛮勇。在有限的篇幅里，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最佳方案就是将文明罗马统治的最佳时期，将后期共和国和早期帝国在艺术、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主要特征精选出来。

要想了解罗马最可靠的方法当然还是道德法。初听起来这似乎自相矛盾，一个征服者的国家，由于奢侈罪恶而臭名昭著，居然被人用道德媒介来进行极为有效的分析，但是即使是匆忙地浏览一下罗马人的生活就可证实这样一个事实：罗马主要还是一个贡献性国家，兢兢业业，力图种族的更大荣耀。即使是在帝国时代，当势力与财力的获得毫无疑问地在削减领袖们那充沛的行动能力的时侯，罗马人也从未丧失那种奉献感，那种对国家、对神所安排的命运的神秘贡献。遵循这种道德办法，我们就可以将罗马的内部生活分成三个抽象部分：责任，纪律和成就。从传说中的城市建立到哥特人的最后入侵，这个三位一体作为罗马人的良心和生活准则的理念成分从未停止发挥它的功能。

甲。责任

从一开始，罗马人就认为人是一种附属物，屈从于更高的势力，并为这些势力所束缚，去绝对依从道德法律。如我们下章所见，他们相信众多的神祇——大大小小的神灵出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有谁犯了法，那么这些神祇中的任何一位都会使

他的生活不愉快。按照常规，所有神祗都应得到有固定的抚慰。在这种情形下，任何罗马人都不会长久忘记：在这个充满高等神灵并为严格的道德法所控制的宇宙里，他只不过是一个人，一个小动物。但是尽管处于这种附属地位，他从不轻视自己，自怜似地将自己看作时代的牺牲品。相反，他骄傲地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工具，通过这种办法，他可以行使权力去照料整个人类，特别是罗马人的舒适和福利。这样他很乐意地行使职责，认为在神明的指导下，他也可以为更高势力的愿望去积极改善人类的境遇出一份力。这种对更高等势力的屈从从未被视作一种羞辱，一种负担或一种惩罚。他觉得没有人能够独断独行，但是在神明的帮助下，他可以统治世界。通过他那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责任感，罗马人发展了思想，身体和精神这几个素质，至少有一段时间，这三个素质使得这个国家成了世界的实际主宰。

2。 纪律

作为这种责任感的自然结果，罗马生活的特征就是纪律精神，以它行之有效，合情合理，激励人民忠心耿耿，而卓著于世。罗马不是斯巴达。尽管它有时对奴隶和战俘相当残忍，但它对本国公民或战败国中一般的人却很少实施压迫或表现粗暴。它允许各种各样的崇拜，只要这些崇拜不具煽动性或公开不道德性。它还慷慨大方地将公民这一昂贵的礼物赠送给并入到罗马版图的外国人。它尊重一个家庭单位，允许孩子的抚养和教育大部分在家庭进行。除了全体服兵役这一习惯外，罗马没有努力去将一个人改变成斯巴达人似的机器人，一台只为国家服役而毫无思想头脑的机器。最后，人人都可以在经济、政治、甚至外交上有所作为。只要他有能力，无人反对。

罗马政府可以慷慨大方地赋予这些特权，因为它知道它要依赖这一历史悠久的奉献职责来提供大多数的补偿性纪律。众所周知，大多数罗马人从婴儿时代起就开始学习自我控制，从幼年时

代就开始习惯于接受权威，从一呼吸就接收了爱国主义和罗马荣耀这些教育。政府无保留地接受了尊敬权威的传统，只希望它的子民完全臣服于它。那些只想分享罗马公民的利益而又不想接受它的职责的人，真是悲乎哀哉！

总而言之，罗马政府的地位就是严厉的父母亲的地位，公正、宽恕、甚至开明地对待孩子，但它也顽固地要求尊敬和完全臣服。它并不实行恐吓，但对违法者却是严惩不贷。它强求服役，但也慷慨施与，这种强求并不被视作过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其臣民纯真的爱国热情和邻国对它的公开称颂中看出。纵观古典世界，在人们所能获得的特权中，罗马公民的特权被公认为是最伟大的，无人堪与媲美。

然而，罗马人的权威观并不仅仅来自政府。如前所见，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对诸神的义务。此外，从幼年起，他就受训去接受他父亲的严格统治，只要父亲活着，他就得臣服于这种统治。从幼年时代起，他就接受教育，将家庭的利益放到个人利益之上，无论做什么都得事先征求家庭成员的许可。他的教育，他的生涯，他的婚姻，孩子的命名，甚至为儿子选择职业——所有这一切都得经过家庭的精心审议。他很乐意接受这些限制，因为他知道别无选择。即使长大成人，他也不想起来反抗习惯，因为理智告诉他这样会犯错误。他会将家庭看成是国家的缩影，服从家庭对秩序和效率的欲望，这也是他对整个国家的期望。

除了神权、政权和家庭权外，罗马人还很乐意地接受公众舆论的指责。他天生就是一个遵奉者，不想与众不同，在一个安排得很好的民众之中，唯恐被人认为是一个持异见者。他住的、穿的和想的和其同伴一模一样，急于想赢得公众的同意，尽管他看上去比赞尼思、弗洛尔海兹的乔治·F·巴比特要高贵得多。但是，尽管他同辛克莱·刘易斯按照社会标准所刻画的著名讽刺人物有点相像，但他同刘易斯的道德标准截然不同，他有一个明确

规定的道德准则，像本杰明·富兰克林或江奈生·爱德华兹似地为培养这种道德准则勤勤恳恳地工作。他的美德包括虔诚、职责、目标坚定、勤劳、男子汉气概、节俭以及礼貌待人。理想的罗马人还寻求获得社会的恩惠，通过培养一种幽默感来补偿过分的严肃性，但是与此同时，他也避免有时由于过分雕琢而引起的卑微，变化无常或玩世不恭的态度。他在追求这些品格的时候常常显得愚不可及，不过很少是漠不关心或软弱无能。罗马人的特性很少显耀自身，他精力充沛，目标坚定，从而赢得了人们的注意和尊敬。罗马社会的基础正是由道德严肃性所奠定的。这种严肃性一旦丧失，就像在罗马处在糜烂的生活时期，国家的生命也就随之而去，罗马的大门也就向前来的哥特人敞开了。

丙、成就

不用说罗马人并不住在神秘的真空里，一方面温顺地接受纪律，另一方面又在思考对社会的职责。和希腊人一样，罗马人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去建立一个毫无目的的方法。对理想的奉献是可以理解的，只要这种奉献能够产生某些明确的结果。然而对于希腊人来说，在多种情形下，一个智识结论就已足矣，但是罗马人没有他们的希腊先驱那样善于抽象思索，因此他们希望他们的结果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对希腊人来说，一个原则就是一个完美的产物；对罗马人来说，这只是创造实际利益所使用的一种工具。所以罗马人不喜欢幻想家、理想家或有知识的体育家。对于这些人罗马人的反应大概是："走下云头，让我们讨论实质问题。"如果说罗马精神是反智力有点夸张的话，那么将罗马精神的主要特征归结为实用主义恐怕也毫不过分。

这样一来，他的创造天性就体现在实用领域里。他是个高超的建筑师，他所建造的房屋、桥梁、高架渠和公共体育场看上去既实用又美观。他的城市和公园设计优美壮观，人行道舒适平坦，风景美丽。他的家宅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有点寒碜，但在

古代世界却是一大奇迹，深受人们的羡慕。

罗马人还是一个杰出的组织者。他的机构，他的军队，他的政府办公署和他的法庭被管理得井井有条。经过最小限度的思考与争吵，他创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社会，这本身就是件艺术品，证明罗马人有头脑、有能力，能够使自己的原则适合实用目的。不错，这些原则中有许多在其它地方—在埃及、希腊、迦太基，或更远的亚洲—也有所发现，但在罗马时代以前，它们没有一个得到全面发展。伊迪丝·汉密尔顿认为："在罗马，真正的艺术家是工程师。"①他言之有理。

不幸的是，这种实用性隐伏了一种固有的缺陷，培养了一种实利主义的生活方式，从而最终导致了传统罗马道德的崩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罗马理想的成功成了罗马最终失败的因素。征服带来了财富，罗马的工程带来了舒适。罗马人发了大批横财，贫富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最后，即使是罗马这个训练有素的社会也变得道德败坏，最终失去了平衡。到了帝国时代，纯金钱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道德标准。诗人贺拉斯不断地嘲弄贪财，声称罗马的真正统治者不是奥古斯都，而是金钱皇后。奥古斯都本人也为臣民的实利主义而忧心忡忡，不停地想在他们的内心里和生活方式上重新建起"旧有的道德"。但是警告和规劝收效甚微。讲求实际的罗马还不够实际，达不到那种指导希腊人的中庸之道，即使是罗马纪律和责任感也无法永远抵挡一系列的物质成功所带来的诱惑。罗马最终陷落了。它的陷落一方面是由于哥特人对城市的洗劫，而另一方面则是它本身堕落的实利主义的必然结果。

二、智 力 影 响

罗马的伟大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它善于向别人学习。

尽管罗马人为其本身的传统而感到自豪。但他们从不为此而沾沾自喜。他们不断地搜集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用的思想和实践。一旦征服一个国家，他们就像评价和吞没它的物质财富一样地自动捡起它的思想。罗马人没有独创性，他们引进了大部分思想和理论，然后将他们自己的奇才用在这些舶来品上，以求获得实际发展。在罗马文明中，运用折衷方法引进最好的外来文化在智力活动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在教育、哲学和艺术上，他们创作甚少，或者说毫无创造，但是这些学术活动在罗马却极为盛行。事实上，如果不是罗马人对其它国家文化的热心，那么现代世界就会丧失一大批文化，因为我们今天对拉丁前文明大部分智力成就的了解主要还是来自罗马的复制、改编或对他们作品的翻译。

当然，最丰富的艺术和智力材料来源还是希腊主义。人们常说罗马的军队征服了希腊，而希腊的学问最终又征服了罗马。这种说法尽管不太精确，但它却是适时适地，因为罗马人确是急于把自己维系在希腊文化上，他们请来了希腊教师和诗人，将他们的年轻人送到雅典去完成学业，将希腊的诗歌、哲学、戏剧、宗教、绘画和雕塑当作自己智力和精神生活的楷模。在把整个希腊领土并入罗马共和国（公元前146年）之前，他们就已开始向希腊学习。早在公元前8世纪，正是在意大利南部丘梅这个希腊殖民地上，他们初次接触到了字母，从此他们同希腊主义的关系就从未终止。尽管他们直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才知道伯里克理斯时代最伟大的作品，而当时从希腊到拉丁这一显著变化已经使得这些崇高的作品变得庸俗起来，但他们还是将古代的文章作为楷模，并接受了他们的形式，他们的技巧以及他们的艺术模仿标准。他们从未想到希腊创作艺术里内省、精致以及优雅很难适合于真实地表达那种坦白实用，潦草塞责的罗马精神。他们知道所引进的文化是好的，但是他们不注意这种文化是否合适，就像19世纪美国的工业主义者引进古代的哥特式城堡来建造在伊利诺斯

和加利福尼亚的庄园一样。

总而言之，罗马的伟大不在于她的智力。作为古代作品的细心守护者和传播者，她值得后人的感激，但她自己对艺术的贡献，有些当然很出色（贺拉斯和维吉尔则更伟大），但主要的还是模仿，而且模仿得不太自然。罗马的最高遗产在其心中，而不在脑袋里，在她的爱国主义、对罗马种族的骄傲和在对自己命运的信仰上。从这些品格中发展出了纪律，对秩序和正义的热爱，公民的义务感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从而使罗马在政治和社会上成了西方世界的导师。

注释：

①原注：伊迪丝·汉密尔顿：《罗马之道》（1932）

第九章　罗马历史

一、种族背景

与希腊相比，意大利的文明显得姗姗来迟，而且她在地中海中部的发展也远比爱琴海的缓慢，其原因在于很简单的时滞现象，而不在于希腊半岛有什么适合于殖民化或经济发展的优内在势。和希腊一样，意大利气候宜人，南部全年都可种植谷物。此外，在这800英里的土地上，它还有适合农业多种经营的气候。意大利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比希腊辽阔，耕种面积相对言而也比较大。但是，由于移民地中海的风波来自东部，意大利半岛的发展也就自然受到了耽搁，直到靠近移民源的领土被移民居住了下来。

意大利最早的居民约在公元前3000年来自北非。他们是一帮非常原始的部落，没有留下什么文明纪念物，有的也只不过是一些粗糙的石头武器和工具，表明他们主要是一个耕作种族，懂得一些制陶术和编织术。1000年后，从克里特和其它东部地中海地区来的商人到达了这个半岛。多年以后，大约也就是在公元前1000年后，希腊冒险家开始向意大利领土渗透，结果他们当中有些人在南方建立了一些殖民地。

与此同时，在北方，也即公元前1800年后，一个和早期希腊入侵者有类似来源的印欧部落开始到来，并逐渐渗透到亚得里亚海。这帮人中最为重要的是意大利人，其组成有三个部落：翁布里亚人，撒姆尼人和拉丁人。最后一个部落定居在中部的低地，不久即成了早期罗马人的先驱。

然而，意大利早期最有力的种族成分是埃特拉斯坎人。埃特拉斯坎人，或特斯坎人，大约于公元前800年来自东部，他们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所定居的地方。他们征服了意大利中部的大部分地区，200年里发展了高度稳定而且军事强盛的文明。他们于公元前6世纪征服了拉丁人的主要城市罗马，并在此统治了100多年。最后他们又被拉丁人赶走，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极大地统一了领土，并为后来的罗马政府奠定了一些基本结构。

同其它文化，特别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东方文化的接触，大力帮助了早期罗马人，使他们从野蛮风尚中脱离出来。在意大利，各种各样不同种族之间的相互竞争或许淘汰了一些弱小种族，甚至还防止最强大的部落进入到心满意得，安全无恙和最终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去。和希腊文明一样，拉丁文明主要是生气勃勃的印欧种族和更为先进的文化，特别是埃特拉斯坎，腓尼基和希腊诸文化融合的结果。从人类文化学上来说，许多——如果不是所有——路都通向罗马。

二、早期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09—146年）

李维的史学巨著《从城市的建立》认为公元前735年是罗马的建城日，但实际上自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罗马七丘山上就已有人定居。这座城市的战略位置适合于穿越台伯河，因而在经济上极为重要。这种战略位置从一开始就鼓励城市向军事大国发展。然而，从公元前655年到公元前509年，罗马屈从于埃特拉斯坎人，由一个单独的埃特拉斯坎王朝——塔昆王朝——统治。但是到了公元前509年，在各个拉丁城市的联合之下，埃特拉斯坎人被打败，并被赶出罗马。一个由两议院轮流选举的罗马共和国诞生了，从一开始她就垄断了几乎整个半岛的事务。拉丁邻近的城市最早被并入到罗马版图，在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埃特拉斯坎人和撒姆尼人也被彻底打败。公元前390年，凯尔特和高卢人的危险入侵也被彻底击退，到了公元前265年，希腊在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地也被吞没，整个半岛被有效地并入到罗马统治之下。

穿过地中海是富有的城市迦太基，这是腓尼基人建来作商埠用的，现在它成了罗马最终征服地中海世界的主要障碍。第一次迦太基或布匿战争（公元前264—241）迫使迦太基将西西里岛让给罗马。公元前201年结束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是争夺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所有权，结果是西班牙又成了罗马的一个省份。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布匿战争之间，东部又发生了一系列战争，包括征服希腊的马其顿。出于对希腊学问和性格的尊重，罗马人对待希腊人和其它被征服的省份有所不同。政府主要还留给希腊人管，只要他们作一点进贡就行了。最后，第三次布匿战争摧毁了迦太基，从而又增加了一个非洲省份，使罗马成为世界帝国。

三、早期共和国政府

早期罗马的原始政府大概是一个寡头政治，时隔不久，它就让位于权力有限的君主统治，由一个由贵族组成的议会或元老院来辅助国王。这些贵族都是些富有而古老家族的族长。宗教是国家的一个功能，由国王作领袖，贵族作祭司。罗马家庭的强大粘合力似乎也起源于早期这些日子，由父亲绝对支配其妻子，儿女和奴隶。罗马与众不同的特色是她融合了勇气、忠诚、爱国主义和享受带有斯多葛式忍耐的残酷。所有这些成了一个国家的基础。而在这个国家，军队支配了一大批农民，后来又支配了手工匠和商人。

公元前509年共和国建立后，罗马仍由一小批贵族统治，他们控制了执政官的选举。随着城市的扩展，一批由平民组成、最初由贵族领导的军队开始在政治中显露头角。后来下层贫民不断参加军队，逐渐扩大了选举范围，但这并没有削弱多少上层阶级的力量。多少年来，罗马政府历经各种演变，直到公元前 4 世纪，它才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而且目标明确的形式。

罗马根据财产多少将平民分成各种不同的等级，分成森图里亚或百人团，从而产生了共和国罗马的军事和贵族风格。比他们略低一等的是元老院议员，或征募来的贵族，随着他们财力和势力的增加，他们可以不时地被吸收到贵族阶层里。这些人都是一些杰出的商人，他们从国家的发展中获利。在底层的是一大批农民，小商人，工匠等等，他们被称作庶民。尽管庶民人数比高阶层人数多，但他们在选举执政官和贵族的公民大会上实际上没有多少权力。在这里，选举是由百人团控制的。每一个罗马平民自然而然地成了军队一员，选举由指定的个别军队单位进行。由于贵族控制了98个百人团，其余的阶层只控制了95个，因此底层老百姓除了受贵族反对外没有机会发表言论。为了弥补这种政治上

的不平衡，庶民被允许选出10名护民官，他们坐在元老院里，握有否决权。护民官和罗马的其他官员一样，没有薪水。由于这个因素，再加上人们对元老院的普遍尊敬，因此人们通常也选贵族当护民官。

一年一度选举出来的还有政府首脑，两个执政官。他们相互之间享有否决权，而且又不可继任，每人任期只有一年。一般来说，他们只有当过低一级的地方长官方可参加选举，比如：

执政官：掌握军权，行使法官的权力；

会计官：主管金融；

民政官：负责街道和建筑。

不定期选举，任期8个月的还有一些其它特别官员，比如负责人口调查的监察官，他们将平民委托给百人团，后来成了道德监护官。

执政官的顾问元老院由前执政官和前监察官组成，他们期满后成了元老院的终身议员。尽管只有在执政官需要时，元老院才聚会，而且只具建议性，但它成了罗马政策的真正制定者，因为同短期的执政官相比，它是一个固定而持久的机构，因为它的议员是具有垄断地位的贵族家庭。

各个省份的管理则委托给军事执政官，他们从当地人那儿强征贡品，部分用作地方开销，其余的则送往罗马。同时，由于一系列的军事战争，罗马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人口由于阵亡而减少，元老院势力便增加了，而且由于向军队提供资助和征收贡品，因此罗马产生了一个大的商团。商业领袖作为元老院议员而加入到贵族阶层，并形成了最初的18个百人团。与此同时，贡品的涌进使得庶民穷困潦倒，他们的产品和各种各样的自由进口商品相竞争。同时，这种唾手可得的财富使得贵族阶层腐化堕落，因为一大批财产落到了少数几个人手里，而他们又缺乏管理，从而很容易造成过剩。

四、百年革命（公元前146—44年）

连绵不断的征服使罗马的经济彻底失去了平衡。从各省掠夺来的赃物流进了富有的贵族手中，从而使一大批人穷困潦倒，因为他们无力同国内的奴隶劳动相竞争，也无力同从国外掠夺来的进口商品竞争。革命的威胁不断增加，贵族有时使用一些施舍办法以作平息骚乱的权宜之计。到了公元前1世纪，格拉古兄弟在公元前133至公元前118年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这些改革被贵族取消了。深受欢迎的领袖马留进行了同样的改革。在公元前118年至公元前100年间，他曾六度当选为执政官。由于他作为政治家而存在的缺陷，所以改革收效不大。与此同时，政府的堕落已经成了一个公共丑闻。努米底亚省的独裁朱古塔通过贿赂罗马官员将努米底亚占为己有。

公元前90年，一场酝酿已久的社会战争爆发了。意大利中部和南部联合起来反对罗马。这场战争持续了9年，后来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将领苏拉，并且颁布了一项法令，将罗马公民转让到罗马的山区，方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这场胜利使得贵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选民的增加加强了公众团体。作为军团首领，苏拉率军返回罗马，并行使军队职权，当上了罗马的执政官。由于职位之便，苏拉建立起专政、并在罗马不断灌输领导原则。在这种情形下，民主与法律设施为个人崇拜所取代。他的军队只忠于将领而不是共和国，他的“选举”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形式，他处理反对派的方法是公布死囚名单，将个人的敌人当作国家的敌人而处死。死囚财产充公，其子女不许做官。

由此而产生的仇恨和长期不和削弱了共和国的政府传统，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野心勃勃的家伙和集团的争权夺利，他们相互竞争，最终摧毁了共和国的政府形式。

公元前70年，作为镇压西班牙起义的报酬，苏拉最好的军官之一庞培被选为执政官。一同当选的还有富有的克拉苏，他也曾镇压过由奴隶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强大的奴隶起义。与此同时，作为民众团体的领袖，儒略·凯撒的名字也开始脱颖而出。公元前67年，庞培离开罗马去征服海盗，这些海盗曾在地中海一带破坏罗马的贸易。在他出走的情况下，凯撒和克拉苏结成同盟，由克拉苏提供必要的资金。公元前65年，他们扶持没落贵族喀提林竞选执政官，结果遭到了失败。但在公元前63年，喀提林又站到了Novae Tabulae（新纪录或新政）台上参加竞选。他的对手是西塞罗，一个来自中等阶级的新人，但西塞罗雄辩的口才，敏锐和声望以及蓬勃发展的商团使他成了贵族派的候选人。

西塞罗赢得了公元前63年的竞选，喀提林想尽了各种办法，这些办法既可以说是密谋，也可以说是抗议性示威。不管是什么，西塞罗不失时机地在元老院前谴责他为叛徒。喀提林逃走了，后来的结局是，他和他的许多追随者被罗马军队处死。西塞罗为此自鸣得意，称那天为“我拯救罗马的日子”。与此同时，庞培在东部大获全胜。回来后，他对西塞罗的殷勤友好反应冷淡。大概是对西塞罗妄自尊大，自封为罗马的拯救者感到不满。他加入了凯撒和克拉苏，形成了第一个三人执政。公元前59年，三人执政设法为凯撒和比布鲁斯赢得了执政官席位。比布鲁斯是个贵族，看上去显得无足轻重，因而人们常将他俩的执政称为儒略和凯撒执政。西塞罗由于没有经过审判就判了喀提林阴谋集团的首领们，因而被放逐。

对罗马的控制一直掌握在三人执政的手里，直到公元前33年克拉苏去世。正如他的《高卢纪事》所述，凯撒仍在参加竞选活动，执政官期满后自封为高卢的地方长官。公元前57年，西塞罗应召而来，成了三人执政的代言人。公元前55年，庞培和克拉苏二人执政，而克拉苏死后，重新革命的迹象使庞培于公元前52年

重新选举，由自己一人执政。强大的庞培和在外地的凯撒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尽管西塞罗竭尽全力去调解双方，但凯撒还是决定破釜沉舟，于公元前49年亲率大军穿过卢比孔河，向罗马挺进。

凯撒大军一路势如破竹，消灭了庞培的军队，庞培本人在埃及避难时被杀。时隔不久，凯撒来到了埃及，代表克娄巴特拉参加了一场内战，在这场冲突中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部分被毁。为克娄巴特拉赢得了战争后，凯撒和她在一起生活了九个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凯撒隆，然后将她嫁给了他弟弟、全家返回罗马。经过选举，他当了罗马独裁者，以后是终生当选。凯撒是一位高超的管理家，他进行了重大的社会改革，在广场的墙上公布"每日事件"，从而创造了第一张报纸。他还对我们现在的年历进行了基本调整（即儒略历，一年有365天，闰年366天）。

然而，由于他没能制定出一个寿命比他长的政府，因此他的这些成就也就显得相形见绌。而且，在勃鲁图斯的领导下，贵族们经过精心策划，于公元前44年谋杀了他，从而预示了15年的混乱和战争。这时西塞罗和谋杀者合成了一伙。马克·安东尼，一位护民官，召集凯撒的老兵回罗马。元老院反对安东尼，根据凯撒的遗嘱，他们选了他的侄孙屋大维为他的儿子和继承人。西塞罗又和屋大维联合在一起，在14篇《菲力匹克》演说中，他试图煽动人民起来反对安东尼。这种联合制削减了安东尼的抱负，但是屋大维发现元老院是在把他当工具使用，于是就和安东尼以及凯撒的一位将军李必达形成了第二个三人执政。在随后的恐怖统治中，西塞罗被杀，由勃鲁图斯和卡修斯密谋的反革命活动也被粉碎。安东尼为他的新政权洋洋得意，沉湎于声色之中。在他游玩到了亚历山大里亚后，他去寻找克娄巴特拉，成了她的情人，并让她和凯撒隆分别当上了埃及和塞浦路斯的统治者。屋大维对他这种专横行为极其不满，从而对克娄巴特拉宣战。作为克娄巴

特拉的将军，安东尼于公元前31年战败，据说自己用剑刺入胸口，死在克娄巴特拉的怀抱。克娄巴特拉自杀，而凯撒隆则为屋大维所杀。此时屋大维成了罗马无可非议的主宰。

五、罗 马 帝 国

1、黄金时代（公元前30年—公元14年）

从有名无实的共和政府到由皇帝来统治这样一个转变被一位具有远见卓识且善于管理的人完成了。屋大维自封为帝王，恢复了元老院的职能，但保留了政府首脑、常备军总司令以及各省的管理人这几个头衔。各省的官员由他任命，并且要忠实于他。他还创建了一个禁卫军的军事机构，挑选那些忠实于皇帝本人的军队。由此而产生的和平与稳定使得元老院感恩不已，他们授予他奥古斯都的称号。在此之前，这个头衔一直是留给神明的。这样一来，罗马皇帝的神化传统开始了，而且旧有的国教也相应地受到了削弱。虽然祭司和执政官依然存在，但他们的权力必须服从皇帝的控制。

屋大维足智多谋，从而使奥古斯都时代或黄金时代文明得到高度的发展。他不再寻求新的征服，而且巩固过去的成果，巩固罗马的政权和威望。为了罗马的利益，他所关注的是城市的改观和公民的福利。最好的建筑师、艺术家、学者和文人云集罗马，他们的努力得到了相应的报酬。他们的薪水和荣誉由屋大维本人或支持他的计划的富有保护人授与。从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学园里，希腊的文化和天才被带到了罗马，帮助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罗马的天才也同样得到鼓励和补贴，特别是那些朝爱国主义和美德方向发展的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和李维的《历史》不仅称赞了罗马，而且恢复了古代罗马的美德，引导一个堕落而且过于世故的民族回归到合理而健全的道德生活中去。

2、白银时代（14—117年）

公元14年，屋大维去世。由他所建立的政府繁荣富强，后世仍可看到一个兴旺发达的帝国，只是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既没他的能力，又没他的理想，所以这个帝国的荣誉多多少少地受到了一些削弱。由于缺乏直接继承人，继承权就落到了奥古斯都的第一个妻子与另一个男子所生的儿子底比留斯手中。从公元14年到公元37年，他行使了一套严酷但不可否认行之有效的统治。他的被杀使得精神错乱的卡列古拉登上了王位，而卡列古拉耽于声色，坚持自身的神权，从而导致了他本人于41年被暗杀。他的继任喀劳狄博闻强记，但却软弱无能，结果在54年被他的妻子，尼禄的母亲阿格丽品娜用一盘有毒的蘑菇毒死。尼禄的疯狂是传说的，他沉湎于声色，荒淫无度，亲自参加竞技比赛，当过演员，表现过音乐才能。一场大火以后，他重建了更富艺术美的罗马，用以自娱。军队中渐渐而起的敌视迫使他68年自杀。

所有这些皇帝只有经过军队的许可和支持才能坐稳宝座。尽管皇帝本人碌碌无为，但政府的管理还能应付，因为真正的工作是由他手下人干的，他们的爱国热情使得罗马的福利仍然走在世界前列。

尼禄的死造成了一年的冲突，四个皇帝候选人之间勾心斗角，但是随着弗莱韦恩的上台，又恢复了平静。韦斯巴芗，狄度和多米提恩一个个都是开明的暴君。公元96年他们的帝位由安东尼斯，内尔瓦和图拉真继任。这是第一批“哲学家帝王”。他们的专制主义的目的是想给他们的臣民在社会和文化上形成最好的气氛。尽管奥古斯都所提倡的直接鼓励学术的风气已消，但总的来说，政府的稳定，黄金时代一般传统的延续以及言论的相对自由为一大批作家提供了各种机会，从而造就了各种各样的人才，如哲学家塞内加和艾尔科蒂塔，讽刺短诗作者马希尔，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辛辣的道德家塔西佗（历史学家）和朱文纳尔

（讽刺家），还有艺术爱好者普林尼。

3、罗马的衰败（公元117—476年）

公元117年图拉真去世后，罗马已明显出现了衰败的迹象，贵族阶层对政府已失去了责任心，主要沉湎在个人享乐之中，而像元老院这样的古老机构又被淘汰。取而代之的官僚统治已日薄西山，皇帝们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东方的专制君主，但是他们对外既无法抵挡野蛮部落对帝国边境所进行的侵犯，对内又不能改变社会与经济上的不平衡。图拉真的继承人哈德良肩负重任，不停地在帝国各地奔跑，但他把政府的责任集中在皇帝一人身上，而不是分配给罗马城市，最后弄得精疲力尽。同样，马卡斯·奥里欧斯亲率大军反击入侵者，并在国内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但他的继任者们缺乏他的诚实与头脑，结果，希腊主义在埃及复活了以后，哲学、科学、艺术和文学都离开了罗马，因为罗马的领袖至多只是些士兵皇帝，头脑里考虑的主要是拯救帝国免遭分裂，而且还常常被迫和各地兵团所选出来的宠将竞争帝位。

在戴克里先的领导下，罗马结束了一人政府的巨大压力，于公元284年将帝国分成东西两部分，两个皇帝各自为政。公元313年，君士坦丁重又将帝国联合到他的个人统治之下，但是他的一系列举动清楚地预示了未来的趋势。君士坦丁看到从3世纪以来基督教的势力蒸蒸日上，于是就把它定为国教，从此正式结束了旧的罗马传统。他将首都迁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廷，撤离了罗马。后来人们用他的名字将此重新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将罗马本身扔给入侵的野蛮人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公元364年帝国再次分解。公元410年，西哥特人占领并洗劫了罗马。公元455年，城市落到了汪达尔人手里。公元476年鄂多亚克废除了西部的挂名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成了"意大利王"。他还告知君士坦丁堡西方帝国结束了。从法律上来说，"罗马"仍在君士坦丁堡延续，直到公元1453年被土耳其人推翻。

第十章 罗马文化

一、经济和日常生活

从共和国早期开始罗马的生活就受到军事、管理和农业这三大势力的支配。在这三大势力中，最后一种最古老，也最根本。从一开始，罗马就必定向农业国发展。由于缺乏建立和维持工业经济所需要的矿物原料，而且还由于她富有丰富的——如果说不是广阔的——耕地和宜人的种植气候，所以她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农业，并以此为重要生计。传统上她那最简朴的平民耕种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她那最富有的贵族也只是一些乡绅。直到帝国时代罗马才发展了一个庞大的商业或制造业经济．即使这样，农业在罗马生活中远比这些活动重要。有意义的是尽管都市罗马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但是直到共和国末期她的人口也从未超过50万。

但是，尽管农产丰富，罗马远非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从国外进口货物的需要一开始就激励着一种军事征服生涯。这项活动几乎全是由平民军队完成的，从而使兵役成了每个罗马公民最为重要的义务。不管他的家庭生计如何，共和国每一个身强体壮的男人都被分配到一个永久性部队（百人团）去。从幼年起他就接受军训。在其一生中，人们期望他有一个良好的体魄，能够处理好个人事务，从而能立即响应国家的征兵号召。

罗马军事战役的不断成功带来了罗马生存的第三个方面：行政官员。被并入到罗马统治之下的一大片领土不仅要接受监督，而且要有人管理。于是罗马造就了一大批公务员来处理日常事务、管理不断扩大的国家。等到国家形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官僚

统治后，办公人员出现了，成了犁和剑之外拉丁文明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罗马人的生活主要奉献给了军事职责，奉献给了法定权威，奉献给了与自然和土壤的斗争，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纪律感以及同样强烈对权威的尊重，甚至连家庭关系都带有军营的严格和强制性。事实上，罗马家庭就是小部队或氏族的一部分，其渊源追溯到一个共同祖先，在这种家庭里，一家之父是绝对统治者，其他的人没有法律权力。他自己可以做交易，占有财产或决定儿女的婚姻。他甚至还可以要求子女不定期地为他服务，直到他觉得该给他们自由为止。因此，他对家庭的约束力几乎毫无限制，尽管他很少滥用职权，而且由于风俗习惯和公共舆论的影响，他的言行通常有所收敛。在这种宗法制度下，家庭几乎发展成了一个宗教观念强的单位、一个更高权威的象征、一个超越个别部分的总和的整体象征。因此，蔑视一家之父的意愿就不仅仅是造反，而且是一种亵渎。

由于建立了命名法制度，罗马的宗教关系得到了加强。每一个男孩都有三个名字，他的nomen即中间名字和基本名字，是这个宗族的标志。他的cognomen即姓，是一个特定家庭的标志。只有他的 praenomen 即本名，才是他自身的标志，而且只有15个本名供他选择。有时加进一些其它的名字作为描述性称号或荣誉称号以便将一个人同另一个人区别开来。女人的名字一般取宗族姓名中的女性形式。比如，凯撒的全名是该尤斯（praenomen）·儒略（nomen）·凯撒（cognomen），他女儿的名字很简单，就是儒略亚。女人没有教名（praenomina），也没人尽心尽力去将她们当作个人区别开来。她们的宗族之姓所取的名字就像是给牲口打上烙印。

事实上，在这些家长制的家庭单位里，女人除了人格应得的东西外没有什么权利。她们被轻易地休掉，并且永远在父亲，丈

夫，兄弟，甚至儿子这些男人的法律控制之下。如果所有的男性亲属都死在她前面，那么人们就给她派一个监护人。实际上女人并不真的像法律所暗示的那么温顺。和今天一样，她们经常垄断家务，而且似乎还受到丈夫和孩子们的尊重和赞美。她们并不像东方人一样死守闺房，就像希腊女人那样，而且人们对她们接受一些基础教育或参加些社交活动似乎也没有什么偏见。人们也不希望她们做过多的家务，因为罗马人从被征服的土地上带回了大批俘虏，他们习惯于让俘虏做这些工作。

和在希腊一样，奴隶所干的活很多，从最卑下或最压抑的义务到高级的土地监管、记帐、教书和复制图书。这种风俗将男人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去参加战争和政府工作，而在和平时期这种风俗又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享乐时间或丰富的智力活动。不幸的是，一般的男人对文化不感兴趣，而对一些无聊小事兴趣更浓。他们的闲暇时间主要消磨在社交活动、大街和公共澡堂谈话，参加游戏和宗教仪式。在最坏的情况下，罗马的享乐既残忍又淫荡，从豪华的宴会和酒宴到格斗，甚至将罪犯和战俘送去喂竞技场里的野兽。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对体格健康很感兴趣，这种兴趣一直延续到中年。他们还喜欢有一个愉快的家庭生活，晚上在家谈谈话，弹弹琴或读读书。由于罗马生活受到希腊的影响而变得更为优雅，所有贵族的孩子都接受拉丁文的阅读和写作教育，并受到高度的雄辩术训练。家庭娱乐最见用的形式是让孩子朗诵诗文，有时还会邀请一帮朋友来听贵族本人的作品或演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姗姗来迟的对文化的兴趣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更为可叹的是，奴隶给了他们闲暇和娱乐，但他们对待奴隶的方式却不如备受称颂的希腊前驱那样体贴。

有关罗马人豪华的生活习惯，特别是黄金时代豪华的生活习惯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但是实际上除了几个富有的家庭外，大多数罗马人没有什么机会去表现或炫耀自己。用现代的标准来

看，罗马的房屋很少有舒服的。这些房屋是一个内院，周围用石头砌成，光线、通风和取暖条件都不好，没有什么装饰家具和其它讲究。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富人之中，他们所吹嘘的是自来水和“现代化”的盥洗设备，但是，同我们现代充满了新发明的家庭相比，即使是这些进展也不能将一般罗马人从原始类型中解放出来。同时，一大批的家庭奴隶弥补了机械设备的缺乏。

然而，罗马的市政工程却是技艺过人。在后期，他们的城市经过科学规划，街道纵横交错，宽阔舒适。城镇一般分成四个正方形或长方形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有明确的功用，如政府，商务和住宅等等。公共建筑尽管在建筑上模仿性很强，但却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每一个城镇都有公共澡堂和市政供水系统。罗马的导水管充分显示了它高超的实用工程技术，有些导水管能将水送到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许多一直沿用到今天。罗马的桥也显示了高度的工程技术。总而言之，罗马城赋予了许多现代特色，她的秩序观，空间观以及建筑辉煌观对现代市政规划的尝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罗马戏剧

在罗马戏剧里，我们可以找到现代舞台发展的线索。尽管罗马戏剧和其它的大多数文化设施一样来源于希腊，但它引进了一大批的技巧和文学形式，中世纪戏剧复活的时候，这些技巧和形式成了戏剧的标准。有些形式，比方说那些控制舞台实际本质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没有多少改变。其它的形式比如说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分配，得到了加深和扩充而没有损害它们本质上的罗马基础；少数的则基本丢掉了。英国16世纪和17世纪的戏剧家——莎士比亚、琼生、韦伯斯特，基德和马洛等都将罗马而不是希腊的戏剧当作他们的楷模，用普劳图斯、泰伦斯和塞内加所留下

来的作品素材去创造自己的作品。莫里哀也从古典先驱中吸取了大量的素材，他的有些剧作只不过是对拉丁戏剧的改编。

但是，尽管罗马戏剧对后期的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它本身却是既没有什么高度独创性，也没有什么惊人的文学成就。尽管罗马戏剧家竭力去模仿希腊先驱的作品，但他们却缺乏这些先驱者们的悲剧气概和富有诗意的壮观。罗马悲剧（就像塞内加作品里所体现的那样）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崇高的悲剧以及普劳图斯和泰伦斯的喜剧并列在一起就显得浅薄而浮夸，尽管它逗人，而且舞台效果很好，但同阿里斯托芬和米南德的戏剧相比，在机智方面并没有多大进展。希腊戏剧家都是些诗人和哲学家，而罗马戏剧里的诗歌只是些聪明伶俐，故作庄重的警句，如果说有什么哲学意味的话，那也不过是种空洞的道德和枯燥无味的爱国主义。一句话，从文学角度来说，罗马在戏剧编年史上的真正地位就是它起了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文学和莎士比亚，莫里哀的伟大时代之间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作用。如果没有这个环节，没有罗马人对演剧技巧和戏剧结构的新颖贡献，那么现代戏剧恐怕还处在一片混乱和无法预言的挣扎之中。

罗马文学戏剧同希腊戏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所关心的不是宗教。尽管如此，第一次有记载的在伊特鲁里亚上演的激动人心的罗马民间戏剧仍和庆祝圣仪有关。和希腊一样，最早的表演形式是在婚礼上，丰收季节或其它的节日期间进行游行、跳舞和朗诵诗文。起先这些活动是群体的，后来更为熟练的参加者被挑选出来进行表演，而主要的人群则变成了自愿的或感情外露的。罗马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的戏剧表演是在公元前364年发生一场瘟疫期间举行的，当时，一群埃特拉斯坎演员载歌载舞，背诵诗文，希望抚慰神明，恢复城市的健康，这些叫作Fescennine（淫猥）的诗文明显地受到了罗马民众的欢迎[①]，就像前来探望的埃特拉斯坎舞蹈演员（histriones）所跳的舞一样[②]。

罗马人也发展了他们自己的职业歌手和舞蹈家，而且他们的娱乐活动在情节和戏剧冲突上也变得更为复杂，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些演员所上演的最重要的娱乐形式是fabula·Atellana和哑剧。前者是一个简短的笑剧，有点像歌舞杂耍表演，剧中每一个角色都分了类，人们很容易认出。这些角色中有Macco（弄臣），Bucco（吹牛大王），Pappus(老傻子)和Dossenus(狡猾的驼背)。这些戏剧的情节非常陈旧，就像现代的滑稽表演，其杰出之处恐怕更在于诲淫而不是真正的机智。笑剧都很粗糙，它所描述的也是陈腐的低层生活，因而很容易落入诲淫的俗套。笑剧的进一步发展是哑剧，剧中所有的角色都由一位表演大师扮演，他通过其手势或许还有面罩来表明角色的变化。

从传统上来说，文学戏剧成形于公元前240年，当时李维·安德罗尼柯翻译了一部希腊悲剧和一部希腊喜剧，并在Ludi RO-mani节期间上演。无论在哪一方面，这些戏剧都远比罗马人从前所知道的戏剧形式要优秀，从此改编希腊戏剧成了罗马舞台的一道主菜。喜剧取材于米南德、菲力蒙和其他的一些希腊小作家，而不是阿里斯托芬，但是在悲剧方面，伟大的三巨头——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还是最受欢迎的。在李维·安德罗尼柯有幸革新的100年之后，罗马戏剧进入了全盛期，尼欧斯·内维斯（约公元前270—201年），昆特斯·昂努斯（公元前239-169年）和琉修斯·阿裘斯（公元前170—约86年）都拿出了自己创作的伟大的希腊神话悲剧的改编本。在喜剧方面，最为重要的名字是提图斯·玛求斯·普劳图斯（约公元前254—184年），西塞琉斯·史塔修斯（约公元前219—166年）和普布留斯·泰伦提乌斯·阿菲尔，通称泰伦斯（约公元前195—159年）。在这个黄金时代之后，唯一伟大的罗马戏剧家是悲剧作家塞内加（公元前4年—公元65年）。不幸的是，这些作家与同伴的一大批作品中，只有30多部普劳图斯、泰伦斯和塞内加的作品以完整的形式

流传下来。这真是一个双重遗憾，因为这数不清的失传作品恐怕不仅仅具有本身的文学价值，而且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些戏剧的来源找到许多失传了的希腊戏剧。

在内战期间，罗马文学戏剧急剧衰落。随之而来的是哑剧，而此剧又变得相当粗糙，有伤风俗。大约在这一时期，女人第一次出现在罗马舞台上，扮演一些精妙的角色，就像是廉价夜总会的华服表演。基督纪元开始之前，即使是这些暧昧不清的娱乐也仅限于车赛、格斗以及竞技场里其它的血腥和堕落场面。尽管舞台娱乐还未全部消失，但是塞内加一死，它也就基本上不存在了，直到900年后，它才从这行将灭亡的状态中浮现出来，再经过宗教和民间风俗的联合努力，缓慢而痛苦地演变成了现代戏剧。

同戏剧本身同样重要的是罗马人的舞台表演方式。由于罗马剧团的经理想用一切借口来上演戏剧（在罗马的黄金时代，有一半以上的日历都标上了“节日”，以适合戏剧表演），所以意大利的戏剧季节既没有希腊的那么短，也没有希腊的那么传统庄重。这样一来，罗马有机会去发展新的舞台技巧，尝试新的舞台形式。希腊较早的一个形式就是演出圈，在这个圈子里演员和坐着的观众齐平或低于观众。在罗马，戏剧则是在一个凸起的平台上表演的，上演的剧目包括各种各样的娱乐，而且通常持续一整天，而观众就坐在或站在平台的前面。③观众知道舞台代表一条街道，戏剧家因而也就尊重这个习惯，他们所描述的动作全在户外进行，除非舞台事务可以明显地通过门或打开的窗户来处理。舞台的后边有两个粗糙的门面，代表房屋，在这两座房屋之间通常还有一个通道，表示一条街一直延伸到舞台前。演员可以从房屋或三条街道入口中的一个进进出出。观众不用解释就知道右边入口通向乡村，中间入口通向市中心，左边入口通向海港或国外。有时或许还借用彩画幕布来取代木制门面，道具被减少到了

最低限度。早期罗马剧院给人的感觉是临时草率建成的，因此人们怀疑这些剧院结构的寿命有没有他们所设立的戏剧节长。直到公元前145年才建造了一个永久性剧院，又过了90年庞培大将建造了一个建筑优美的石头剧场④。但是，即使是这些永久性剧场——其中有些废墟仍然存在——也只不过是些露天结构。直到17世纪剧院才有屋顶，从而使戏剧赢得了室内表演的尊严。

演员的服饰仿照希腊模式，自由民在传统的希腊短袖束腰外衣上又加上了大披肩或围巾。老人戴白围巾，年轻人喜欢戴红色的或紫色的围巾，而奴隶只有短袖束腰外衣。扮演女性角色的男演员穿长袍。尽管奴隶角色习惯于留红头发，但是各种颜色的假发还是得到了运用。面罩明显用得很迟，大概是在泰伦斯死后。据说到了后期，罗马的宽外袍取代了希腊的化妆服，随着罗马光辉时代的到来，人们竭尽全力，力求使舞台表演丰富多采，看上去令人爽心悦目。

后期的一些罗马戏剧或许还有戏幕，但总的来说，舞台一直是公开的。动作之间的间歇一般是唱歌，或演奏音乐，或跳舞，但没有正式的幕与幕的区分。作为戏剧的一个有机整体的希腊合唱，在罗马戏剧里根本不存在，尽管主要角色偶尔也唱些歌，罗马演员的社会地位也与希腊的迥然不同。尽管他们的表演很受欢迎，但舞台人员并不受欢迎，如果有谁从事这种职业，他的公民权便会被剥夺。有时像昆特斯·罗修斯这样的一个大演员可能会和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名流过从甚密，但总的来说，演员远远在外面，进入不了那个圈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罗马公众虽然残忍凶恶，耽于声色，但对皇帝尼禄和演员一起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表演依然感到震惊。不过，从职业上来说，这些明星演员也有一批热情的追随者，那些没有追随者的演员也不想去雇佣一帮喝彩者来为他们的表演鼓掌欢呼。

另一个奇怪的偏见使得罗马戏剧家无法在舞台上表现纯洁的

年轻女人。只有几个老妇人和高级妓女的场面，即使出现了几个为社会所接受的姑娘，她们的行动仅局限于幕后，而且一个假定的高级妓女如果被认出是某个富豪家失散已久的女儿，那么她就有权和一位少年英雄结婚。

罗马观众大概是戏剧史上最难讨好的了。早期看戏是免费的，即使到了后期收费也很有限，所以，甚至最穷的人都能参加。罗马剧本里经常提到这帮混杂民众粗鲁而喧闹的行为举止。要想开戏就得花很大的力气去平息这帮观众，剧本里经常语含讥刺地提到这些大蒜味十足的诘问者和不愿将啼哭的孩子留在家里的母亲，从而表明演员的命运并不受人羡慕。如果戏不讨他们的喜欢，他们就会无缘无故地扔垃圾，毁坏剧场，甚至还会对演员施行暴力。但另一方面，如果有什么感伤的情节，他们也会嚎淘大哭，即使是最粗俗的幽默也会令他们兴高采烈。如果他们的不满是残忍粗暴的话，那么他们的颂扬则是雷鸣般的掌声，这对企求喝彩的演员来说特别悦耳。但是罗马观众的粗暴最终毁灭了严肃的娱乐艺术。他们只习惯于明显的和粗俗的题材，如果剧作家将趣味或文雅降低到通俗的标准上，那么他们会大声喝彩。由于越来越求新奇，他们很快将戏剧拉到自身低劣的水平上，毁掉了它的机智、伶俐和它所能产生的一切真正的诗歌。从此以后，他们彻底抛弃了戏剧，而去享受竞技场里那些猥亵的行为举止，留待未来的学者和史学家去将罗马戏剧从遗忘中拯救出来，恢复它在西方戏剧艺术发展史上应该占有的崇高地位。

三、罗马宗教

要想了解希腊和罗马特征之间的区别，最好的线索之一就是希腊和拉丁双方大相径庭的宗教观。希腊宗教——从最简单的神话到最复杂的神秘仪式——的特征是想象，优雅，机动灵活，富

有魅力。此外，它还有一个牢固的——如果不是武断的—— 神学内容，这个神学内容遍及所有希腊创作艺术。除了一些抒情诗，现存的作品几乎没有一部不反映一些神圣信仰。如果没有宗教所引起的强大的伦理－－哲学刺激。希腊的智性生活恐怕只是一个虚弱无用的东西。

而另一方面罗马宗教不太令人感到亲密，也没有希腊宗教那么随和。早期罗马宗教的神祇不赋予人形，而只是些神灵，因此对传说和神话帮助不大。它的仪式简单到了机械化的程度，由于仪式的贫乏，所以它只有一点点的神学和思想内容。这些仪式中大多数所关注的是抚慰，因为所祈求的神缺乏人性，所以这些仪式没有什么道德影响。只不过是直接了当地去买取神的恩惠。因此我们毫不奇怪地发现，直到罗马开始培养希腊方式，将希腊观念引进到他们自己的思想生活的时候，宗教在罗马的艺术中也没起什么大作用。特别是在文学上，罗马作家所经常思考的不是神，而是他的真正精神灵感，是国家。

由于罗马是一个农耕民族，所以他们最早的宗教自然而然地就集中到了田野生活和个人家庭上。他们已习惯于相信人类在各方面都屈服于更高的权威，因此他们将一切生活都归之于神灵的旨意。如果没有神灵的旨意，那么即使是最简单的生活方式也难以想象得出。与此相对应，他们认为每个地位或每个事物都有它的神祇。家里有一群家庭神祇看护，这些家庭神祇是：保护神，即家庭的监护者；阴间诸神，即祖先的精灵；家神、保护家庭财产。每个家灶都由维斯太管理，每道门都由两面神伊阿诺斯守护，田野有一群家神拉瑞斯保护，拉瑞斯被分去主管农业的各个方面，其中波莫拿主管果园，法乌诺斯主管动物，刻瑞斯主管谷物。甚至还有一个守护神斯忒克罗斯被分去主管肥料堆！除了灶神和田野神，罗马人还想象出许多神灵用以控制感情和抽象的人性，生气，害怕，美德和正直等等，一家之父的职责就是当家庭

祭司，主持抚慰众多守护神的仪式。由于有那么多的神要抚慰，所以这种过程也就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迷信而毫无思想的仪式。这些仪式一般有日常祈祷，烧香以及饮奠酒，但是忙时只要多念念诸神的名字以示崇拜也就行了。

随着罗马的城市化和高度发展，罗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以控制各种农业守护神的扩散，并将他们定成国教以适应城市和乡村人的思想。国家的官方宗教集中在三个神上：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朱庇特是主神，他的妻子朱诺是智慧和工艺女神。后来，由于从其它国家又引进了众多的神祇，因此又加上了玛尔斯，赫丘利和墨丘利之类的小神。他们的专门庆祝活动塞满了年历，从而使一年有100多天圣日。罗马官方宗教由祭司团主持，祭司团的成员主要是贵族，每一个祭司团都有其特殊的功能，祭司团长主管记录并负责各种宗教事务。祭司监管祭品的焚烧。占卜官的职责就是通过观察飞鸟，检查祭献动物的内脏或使用其它的神秘占卜法来预测未来。还有神圣的撒利族舞蹈家和神圣的牧神兄弟会——狼祭司，他们驱邪保佑妇女繁殖。由信奉处女女灶神的虔诚服务，使城市的圣火一直在燃烧。

如同乡村的神灵崇拜（但它从未成功地取而代之），国教主要还是形式上的，没有神学色彩，虽然它更富想象力，而且，为了纪念神祇，罗马国教还允许设立丰富多采的节日。此外，由于吸收了希腊文化，罗马国教很容易同希腊的奥林匹亚山神融合起来。比如，朱庇特同宙斯、朱诺同赫拉，密涅瓦同雅典娜联系起来。希腊神话很快并入了罗马的宗教和文化模式。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尽管这国教是官方的，但它却不是强迫的。罗马人能够容忍各种形式的宗教，而且通常认为只要一个人没有明显危害公共安全或道德的行为，只要他喜欢，他信什么都可以。这种容忍的结果是官方国教对一般市民的影响只是在已有的一群守护神上再加上几个神祇。

但是，不管罗马宗教看上去多么混乱，智力上多么贫乏，但它却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结果，就是提供了一种稳定感，这就是罗马生活的典型。这是一个绝对的宗教，它没有让人怀疑或感到不安全的余地。一个人善恶分明，知道如何表现自己，如果他犯了一个错误，那么他知道用什么仪式去平息被触犯的神祇的愤怒。这样，一种宗教或许不会发展智力，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人在处理繁忙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时所需要的精神安全感。然而不幸的是，这样一种宗教并不能繁荣兴旺下去。随着一系列的征服，罗马变得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奢侈。人们所关心的是舒适的生活以及对金钱的贪婪，道德观念因而也就淡薄了。甚至连枯燥的抚慰礼仪也遭到了忽视。随着这些观念和礼仪的衰退，一个习惯于从权威中寻求指导的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也就消失了。到了奥古斯都时代（公元前30年—公元14年），人们对失去“旧有的方式”抱怨不已，皇帝本人也竭尽全力想让罗马民众具有更新了的道德活力，但收效甚微。为了达到此目的，他自封为神，从而使对皇帝的崇拜成为新的国教。

有关崇拜罗马皇帝的颓废文章已经写了很多，但是实际上这项设施并没有多少宗教价值。没有哪一位皇帝，不管他的头脑多么混乱，真正相信自己是个神，大概也没有哪一位罗马公民会赞同这种借口。崇拜皇帝只不过是对领袖的尊敬，一种元首至上感。从儒略·凯撒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大多数军事独裁的特征就是如此。罗马社会一直以英雄崇拜著称，一直浪费感情和精力去称颂一位征服者或一位伟大的领袖，而不是去遵守宗教仪式。崇拜皇帝不过是一种有效地行使独裁主义原则的方式，一种事实上的认可。归根结底，罗马真正的宗教就是国家。

注释：

①原注：Fescennine的来源仍在争论之中。有人认为它来自Fescinnium，伊特鲁里亚的一个镇名；其他人则认为它取自fascinum，一个生殖器象征。由于罗马的民间戏剧大约来自伊特鲁里亚，而生殖器象征在原始宗教仪式中又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成分，而且在早期希腊民间戏剧中也很突出，所以两种意见都有可能，读者可自行选择。

②原注：罗马人将histriones（我们从中得到了形容词histrionic）的名字当作ister的拉丁对应词应用到埃特拉斯坎演员，ister，埃特拉斯坎意为跳舞者。

③原注：专家们对罗马剧院是否有座位尚有不同看法，卡图时代有一项法令禁止建造公共娱乐座位，但是很难确定这项斯多葛式的法令执行得如何。

④原注：庞培聪明地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剧场，将它奉献给维纳斯神殿，从而躲避了不许造座位的法律。为了使它合法化，这座大剧院的顶端还放了一座盛有女神偶像的神龛。从此，那一大批座位被正式视作通向神龛的台阶，而舞台则被解释为一个祭坛。

第一部分编年史

希 腊 时 代

（公元前700年以前的一切日期都是概数）

一、前荷马时代（公元前3400—1200年）

米诺文明在克里特开始（公元前3400年）；第一次已知的特洛伊定居（公元前2870年）；传说中的英雄西克罗普斯和女神雅典娜建立雅典（公元前1582年），迈锡尼文明开始（公元前1500年）；克里特的黄金时代（公元前1400——1200年）；亚该亚人从中欧移入并统治了希腊地区（公元前1300——1100年）。

二、荷马时代（公元前1200——900年）和列王时代（公元前900——700年）

甲、历史事件

多利安人入侵希腊（公元前1104年）；伊奥利安人迁徙（公元前1100年）；爱奥利亚人迁徙（公元前850年）；第一届奥运会（公元前776年）；贵族开始上台（公元前750年）。

乙、传说和文学事件

寻找金羊毛（公元前1225年）；七将攻底比斯之战（公元前1213年）；阿伽门农成了迈锡尼之王(公元前1200年)；围攻特洛伊（公元前1192—1183年）；“荷马”写出了围攻特洛伊（公元前900—840年）；诗人荷西俄德盛期（公元前750年）。

三、僭主时代（公元前700—500年）

甲、历史事件

执政官制在雅典建立（公元前683年）；德拉科在雅典改革（公元前620年）；梭伦修改德拉科法典（公元前594年）；庇西特拉图在雅典的独裁统治（公元前561—560年；公元前546—527年）；波斯的居鲁士征服巴比伦（公元前538年）；居鲁士去世（公元前529年）；居鲁士之子冈比西征服埃及（公元前525年）；大留士成了波斯的领袖，继续波斯征服（公元前521年）；克利斯悌尼增加了雅典民主自由（公元前507年）。

乙、文学事件

萨福在列斯波斯岛的盛期（公元前600年）；伊索盛期（公元前560年）；狄斯比斯“发明”了希腊戏剧（公元前534年）。

四、黄金时代（公元前500—322年）

甲、历史事件：公元前5世纪

伯里克理斯诞生（约公元前500年）；波斯战争：爱奥尼亚人反叛波斯征服者（公元前499年）；大留士征服了马其顿（公元前497年）；马拉松之战结束了波斯人对希腊的第一次入侵(公元前490年）；泽尔士再次入侵希腊；塞莫皮莱和萨拉米斯之战动摇了波斯的士气（公元前480年）；提洛联盟建立（公元前477

年）；伯里克理斯成了雅典政治的中心人物（公元前463—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公元前459年）；雅典夺取了提洛财富（公元前45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阶段结束（公元前446年）；战争的第二阶段开始（公元前431年）；雅典瘟疫（公元前430—429年）；伯里克理斯去世，克利翁成了雅典的领袖（公元前429年）；克利翁战死，尼西亚斯和约结束了战争第二阶段（公元前421年）；阿尔西比厄德斯冒险远征西西里（公元前415—413年）；斯巴达人在伊古士波德米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公元前405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雅典由三十位僭主统治（公元前404年）；色诺芬率领万人大军（公元前401年）。

乙、历史事件：公元前4世纪

斯巴达阿杰西雷斯王（公元前399—360年）；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死亡（公元前399年）；雅典帝国的复活（公元前378—354年）；腓力浦成为马其顿的摄政王（公元前359年）；雅典与马其顿开战，战败（公元前357—346年）；亚历山大诞生（公元前356年）；腓力浦被暗杀（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摧毁底比斯，进攻波斯（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建亚历山大里亚城（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在印度（公元前327—325年）；亚历山大去世（公元前323年）。

罗　马

一、共和国早期（公元前509—100年）

共和国的建立（公元前509年）；罗马和拉丁联盟（公元前493年）；罗马遭高卢人洗劫（公元前390年）；重建罗马，势力扩大（公元前387年）；彻底征服意大利和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241年）；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西班牙成了罗马的一个省（公元前201年）；希腊被置于罗马

"保护"之下（公元前194年）；向东地中海扩张（公元前189年）；庶民中的广泛贫困已成了一个国家问题（公元前157年）；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146年）；马其顿和亚洲（小亚细亚）成了罗马的省份、迦太基被毁，罗马控制了地中海世界（公元前146年）；底比留斯·格拉古的社会改革（公元前133年）；该尤斯·格拉古继续改革（公元前123年）；贵族成功地反对改革（公元前118年）；深孚众望的马略六度当选执政官，在他领导下，社会冲突再起，凯撒出世（公元前100年）

二、百年革命（公元前100—30年）

意大利南方的社会造反被苏拉镇压（公元前90年）；奴隶起义（公元前73年）；庞培和克拉苏当选执政官（公元前70年）；喀提林竞选执政官失败（公元前65年）；西塞罗执政和喀提林阴谋（公元前63年）；第一个三人执政（公元前60年）；凯撒和比布鲁斯执政，西塞罗被流放（公元前59年）；凯撒当选高卢总督（公元前58年）；西塞罗应召回来（公元前57年）；庞培和克拉苏执政（公元前55年）；庞培独自执政（公元前52年）；凯撒穿过卢比孔河（公元前49年）；凯撒成了罗马的独裁者（公元前47年）；凯撒遭暗杀（公元前44年）；西塞罗被第二个三人执政处决（公元前43年）；安东尼战败自杀（公元前31年）；屋大维成了罗马的主宰（公元前30年）。

三、奥古斯都时代或黄金时代（公元前30年—公元14年）

奥古斯都（屋大维）成了罗马的独裁者（公元前30年）；政府被重新组织成帝政，帝国正式开始（公元前27年）；罗马政权的巩固，广泛进行社会、经济和文化改善，鼓励颂扬罗马的文学艺术天才，广泛称颂雅典的黄金时代。奥古斯都死后、黄金时代结束（公元14年）

四、白银时代（公元14—117年）

甲、皇帝：底比留斯（公元14年）；卡列古拉（公元37

年）；喀劳狄（公元41年）；尼禄（公元54年）；狄度（公元79年）；多米提安（公元81年）；内尔瓦（公元96年）；图拉真（公元98年）；

乙、时代基调：维持现状；极少首创、灵感、发明、或进步；整个士气逐渐低沉、传统的罗马爱国主义衰败。

五、罗马的衰败（公元117—476年）

甲、皇帝：哈德良（公元117年）；安敦尼·庇乌（公元138年）；马可·奥勒留（公元161年）；孔茅多斯（公元180年）；戴克里先（东部）和马克西米恩（西部）（公元284年）；君士坦丁（公元313年）；随后是一连串无能的统治者。

乙、历史事件：帝国分解（公元284年）和君士坦丁领导下的重新结合（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堡建立（公元328年）奉献给基督教（公元330年）；帝国再度分解（公元364年）；西哥特人洗劫罗马（公元410年）；汪达尔人洗劫罗马（公元455年）；意大利王鄂多亚克废西部帝国最后一个帝王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公元476年）。

第二部分　希伯来主义

第十一章　上帝的选民

一、希伯来主义与古典主义

在探求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的秘密方面，古典文明已经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与此同时，希伯来，这个远离地中海文化，而且几乎与世隔绝的一小部分民族，也在探求世界的本源。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见，古典模式从总体上来说是客观的，外露的；它力求使普遍原则形式化，而希伯来的意向则截然不同：它神秘，直观，寻求同神灵的交流，而不是公开表明它的宇宙观。圣·保罗曾经指出这种区别，写道："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①

沿着保罗的简语，以便强调各个文明对西方世界的持久影响，人们可以说，古典主义非常尊崇雅典娜（智慧）和赫淮斯托斯（技艺），而希伯来则臣服于宇宙的造物主。在西奈山上，造物主对他的特选子民颁发了戒律。古典世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常常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答案。尽管希伯来世界也经常提问，但它并不穷原究委，因为它觉得最后的答案毫无疑问是在上帝的手中。这样，通过和宇宙的造物主以及统治者的内心交流，加上造物主对其以色列选民子孙的关注这个神奇观念，我们发现了希伯来感情主义的核心：一个单一家族（亚伯拉罕和以色列〔雅各〕的子孙）的后裔和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天父的造

民的神秘的部落统一。

因此 围绕这个单一的上帝恩赐概念所形成的希伯来文化的本质和古典文明的本质截然不同，这是不可避免的。古典思维集中进行宇宙以及人类活动本质的外部研究，而希伯来人则在内心深处聆听上帝的教诲。古典世界的成长意味着阐明、组织和增加原理宝库，而在希伯来世界，这意味着更加深层，更加纯洁，更加清晰地幻见造物主以及他同常人的关系。古典主义提倡广泛而又有用的社交行为，而希伯来人的头脑里则充斥着他们认为能取悦于上帝的礼律。希伯来人对强调技艺的体育竞技兴味索然，他们所感兴趣的是吟歌曼舞，因为这一切都是心迹的表露。希腊与罗马人力求文明政体的完善，而希伯来人则将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由上帝选派或上帝的牧师所授权的领导人身上。古代的犹太人知道天国的统治并不民主，于是就拜伏在上帝在地球上的代表基督面前，这样便产生了西方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君主神权的理论。有趣的是，两种文化都有一种对个人的尊敬，不管他的社会地位如何。但是古典世界特别乐于尊敬有技艺的人，而希伯来人则怀着崇敬的心情去聆听代表上帝的声音的人。

两种文化上的文学成就也迥然不同。古典这个词和注重形式、精雕细琢的艺术同义；而希伯来文学则是自发的，简单的，自然的。他们的杰出之处在于他们的人性，在于他们的内心感染力以及阵阵迷狂和超自然的宏伟。或许是因为感情主义和悲观主义互为联系，或者更可能的是，因为希伯来所受的漫长的多种压迫，因此希伯来文学作品的主导格调和古典作品所通常流露出来的乐观主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值得注意的是，希伯来的悲观主义来源于奇特的环境，即：希伯来的一天开始于夜晚，希伯来的一年开始于秋天。希伯来人认为（和希腊与罗马人不同）他们知道宇宙的基本秘密，所以非常热衷于日常生活的细节和祖上的故事，而不屑于其它任何种类的精心分析。如果人们要想获得

形式完美，前后连贯，以及鞭辟入里的演讲，充满幻想但又训练有素的想象力，深深地感觉到但又节制有方的谈吐，那么他可以去读古典文学。如果人们要想获得狂喜、抒情性、激发起来的神秘主义、富丽堂皇，丰富的形象化描述、感觉上的温暖或者简单而又感人的家庭生活的场面，那么希伯来文学在所有文学创作中是无与伦比的。

两种文化都具有高度的理想，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且二者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无论是希伯来文明还是古典文明都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识和家庭意识，而且深信自己优于别人。古代的犹太人，作为“一个被上帝选中了的种族”，作为一个单一祖先的后裔，由于施行割礼而疏远了所有的外国人或异教徒，因此他们比起希腊人或罗马人来更为排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古典主义本身并没有免于这些相同的排外主义态度，只是他们的表达方式或许没有那么强烈，频率或许没有那么快罢了。同样，神秘主义也并非为希伯来人所垄断，它还繁盛于希腊和罗马，这一点在厄留西斯和俄尔甫斯崇拜中特别突出。古典世界也有一神教，而对希伯来人来说，多神教也并不陌生。

但是，在两种文化所取得的独特成就上，希伯来主义和古典主义却泾渭分明。作为两种文明的最终产物，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柏拉图理念世界里极其合理但又极其残酷的社会，或者奥古斯都统治的罗马实际文明机构的独特古典风味。相反，如果人们要想获得希伯来文化的精髓，那么他可以列出两个准则：热爱上帝和热爱邻居，这两条是耶稣从希伯来经文中挑选出来的，耶稣将它们指定为两条最伟大的圣训。基于这样高度的成就，人们完全可以说古典主义是思维的产物，而希伯来主义则是心灵的产物。

二、古代犹太人的历史

“希伯来”（意为浪游者）的称呼来源于迦南人，而犹太人

的全部历史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一部浪游故事史。由于别的部落的迫害，他们在漫无边际地过了一段游牧生活后，开始形成一个规模很小但个性很强的民族。这段早期历史特别模糊。他们自己的早期记载，尽管在个别细节上丰富多采，也很详细，但却缺乏日期，这种日期直到以后的故事才出现。他们的群体很小，以致于邻近的国家对此也没有记载，甚至他们本族历史同其它民族之间的重大事件的相互参明也很难见到，因为古代的犹太史学家对异教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不屑一顾。甚至同希伯来亲密相联的埃及君主也没有被称做个人，而是简单地冠之以“法老”（意为统治者）。结果早期希伯来历史的所有日期都很相似，对此史学家们仍在争论不休。

犹太人的祖先是居住在阿拉伯沙漠边缘的贝都因人，他们和亚述人，巴比伦人和腓尼基人一样同属于闪米特族。他们大概以很小的家庭单位或部落形式移动，所以到处带着粗糙的皮制帐篷和稀少的财产，到处寻找牧场，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是绵羊，山羊，牛奶和乳酪。从很早的时候起，他们就同巴比伦文明有所接触，在他们的早期历史中可能从类似的巴比伦传说中吸取了一些故事（比方说大水）。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700年左右，类似亚伯拉罕这样的先驱开始向地中海周围更为富饶的地区靠近。他们当中有些人定居在迦南，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候赢得了“希伯来”的称号，另一些人则被吸引到更为富饶的埃及文明中去。没有理由去怀疑《圣经》的描述，即迦南的饥荒导致了向埃及的大批移民，在那儿，政府的粮仓帮助他们度过了“荒年”。这时的埃及在一个名叫海格索斯或牧羊王的外国王朝统治之下，牧羊王对犹太人非常友好，所以有可能记载了迦南和埃及之间的这段友好关系史。无论如何，不管他们是何时或怎样来到埃及的，很明显在公元前1700到公元前1500年间，这一大批闪米特族人发现了美丽富饶的

歌珊地（埃及的东北部）。

当一个新的埃及王朝推翻了外来的统治之后，闪米特族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奴隶，被迫去做苦力，做些国家工程之类的无偿劳动，或许这是新王朝对早先的法老们施予他们的各种恩惠的一种报复。如果说他们还未自我意识到一个特殊的群体的话，那么这段漫长的奴役生涯也无法将他们聚拢成一个相当固定的社会单位。

公元前1290年左右，希伯来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位有根有据的领袖——摩西。他的埃及名字并不能证明一些史学家们的推测，即他是某位国王女儿的私生子。如果正如那栩栩如生的犹太故事所叙述，即他确实由一位公主在蒲草箱里捡到，并被她抚养成人的话，那么他会毫无疑问地取埃及人的名字。这个留传下来的部分故事总的来说千真万确。据《出埃及记》记载，摩西是在杀了一个殴打希伯来人的埃及人之后被迫逃离埃及的，鉴于他以后的宗教领导，因此熟悉一下他逃离埃及以后的故事是相当有趣的。他逃到了米甸，在那里娶了祭司叶忒罗的女儿，和他的岳父一起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在野外荒地里，他对叶忒罗言听计从。

在米甸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后，摩西回到了埃及，征得法老的同意，将希伯来人带出埃及。在令人难忘地穿过苏伊士湾里的一条湾，即红海上游的西海湾后，他们显然想回到迦南。可能是由于部落之间发生龃龉，他们被迫南行，在红海上游的西奈半岛边上逗留。《出埃及记》和《民数记》里对饥荒和反抗领袖的威胁的生动记载加强了摩西的形象。他带着他们来到西奈半岛南端，当时火山正活跃的西奈山。在一片烟雾，雷电和大火中，他将一群奴隶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创造了一个国教，让他们将耶和华置于众神之上，在摩西十诫里又给他们颁布了宗教和民法典，并将他们组织成明确的社会和军事单位。同样，这次所涉及的时间

并不明确，但是《出埃及记》里有一段线索表明，从出离埃及到定居迦南共用了四十年。② 足够新的一代长大成人，训练成为武士。可以合理推测到西奈山之行只占用了一小部分时间，而余下的时间主要忙于在圣山东北部作长期的休整和组建。

摩西此时也明显地心满意足，因为他的臣民可以进攻迦南，于是有组织的北上开始了。同样，那杰出的现实主义式的希伯来文献充满了对不忠，倒退以及遗弃的记载。就在这时，历史上伟大的领导人之一摩西去世了。他的继任约书亚是一位武将，他带领人民征服了迦南部分未确定的疆土。

对这次入侵（公元前1225年至1025年）后两百年历史的记载断断续续，难以辨认。当时的迦南由一群衰败的埃及君主统治，无力保护臣民免于邻近部落的屡屡侵犯。同样，希伯来人似乎也失去了使之屡战屡胜的动力和团结。部落单位组织松弛，而且由于迦南人和其它当地部落的扰乱，他们之间相互分离，再加上米甸人，亚玛力人，腓力斯人，以及其它一些部落的吞食，他们不得不逃出他们的疆土，因而看上去已处在分崩离析的严重危险之中。许多人转去崇拜当地的神（巴力，亚斯他录，以及其他）。以色列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有一个勇敢忠诚的核心，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南部的犹太部落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出现了一批被称做士师的领袖，他们不停地将一个混乱而又忧郁的民众重新组织起来。犹太历史的杰出之处就在于每当他们濒于崩溃，看上去希望渺茫的时候，他们就会接连不断地涌现出一批赋予神灵的领袖。

这段黑暗时代临近结束时，杰出的祭司撒母耳成了宗教的临时领袖，并且显而易见地把这个国家又重新组织了起来，使她获得了新生。在这期间以色列最头疼的敌人是腓力斯人（意为"海的子民"，巴勒斯坦名字的来源）。这帮来自地中海的入侵者祖籍可能是米诺或希腊，他们成功地挑起了反对希伯来人欲在此安

家的战争。当年迈的撒母耳任命他的两个儿子替他统治时，遭到了元老们的反对，面对着腓力斯人的入侵，他们需要一位类似其它国家的国王，特别是要有一位强大的军事领袖。撒母耳无可奈何地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任命扫罗为国王。扫罗是个引人注目的军事领袖，但他常常莫名其妙地发火，泄气，这也许是他被提拔到他力不能即的地位的结果。

扫罗战死后，撒母耳选了大卫作他的继任，大卫是一个深孚众望的军事领袖，帮助扫罗屡战屡胜，以致于国王撒母耳嫉妒得发狂。上帝曾经答应亚伯拉罕，让他的子民成为一个伟 大 的 国家。现在，在大卫的领导下，这个承诺似乎最终得到了兑现。这位多面手君主（诗人，音乐家，勇士，将军，领导，宗教领袖）扩大了以色列的地盘，占据了其整个历史上最为宽广的疆土，迫使像叙利亚这样的一些邻国进贡。他最辉煌的成就是选择了耶路撒冷作为新近联合起来的强大王国的国都。这个城市座落在锡安山周围，风景优美，军事上坚不可摧。此外，她还有一个居于巴勒斯坦中部的有利条件。由于这是一个新近获得的城市，其它12个部落从未占有过她，所以她呈现了一种中立性，不会引起别的国家的嫉妒与不满，否则他们就将选择一个以政治为中 心 的 地点。大卫还把王国分成12个部分，使人想起原先的十二个部落。他还把契约的约柜带进了耶路撒冷，从而使这个城市成了这个国家的精神和政治中心。

大卫和他的继任所罗门的统治（公元前970—930年）标志着希伯来力量的登峰造极，腓力斯人只占据了地中海边上的一小块地盘，附近的王国被迫屈从，至少也得友好相处。希伯来王国从过往商人的友好往来中获益不少，所罗门（已享有宫殿，庙宇和一群妻妾）把皇家建筑搞得金碧辉煌，足以与邻近的东方君主媲美。

然而，在这一切荣耀背后存在着许多内部摩擦与不和。尽管

大卫不断提醒犹太人要注重自己的文化整体性，但是北方各部落还是各行其事。即使是在他生涯的高峰，他的儿子押沙龙就已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为时不长的公开叛乱。大卫去世前不久，他的次子亚多尼雅在北方势力的支持下接管了政权。押沙龙又进行了一次叛乱。先知拿单和大卫的妻子拔示巴，在耶路撒冷一些领袖们的支持下，劝大卫将所罗门选做他的继承人。大卫死后，所罗门对其死敌进行了血腥清洗，自己挑选任命了一个大祭司，从而加强了他的统治。尽管他以智慧著称，但他背叛了希伯来宗教准则，个人生活奢靡，从而在他内部不断树敌。所罗门的政绩在于支付低工资，索取高额税款。此外，他还组建了一个贸易舰队，进行商业冒险，进行大量贩马生意，开矿，这些冒险还需要大量的低工资，或者更为可能的是，奴隶劳动。所罗门此时的地位已摇摇欲坠，迹象很明显，他将12个城市拱手献给腓力斯人，而且，进贡者不断造反，最终导致了叙利亚的丧失。

所罗门死后，他儿子罗波安继位。罗波安的专横比起他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随着他的上台，北方各个不满部落终于爆发了内战。在耶罗波安（所罗门早先在埃及避难时的敌人）的领导下，北方的10个部落退出了罗波安的领导。耶罗波安在撒马利亚人所居住的整个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北方王国。从前，耶路撒冷曾被指定为礼拜的主要地方，此时耶罗波安公开鼓励人们不再去崇拜耶和华，以此来削弱耶路撒冷的威望。结果北方的十个部落取名为以色列王国，而犹太王国的南方两个部落则成了支持耶路撒冷威望的唯一力量。

在随后的两百多年里，两个王国之间充满了争吵，嫉妒，以及断断续续的战争。更糟糕的是，南方埃及和北方叙利亚的屡次袭击削弱了两个王国的力量，叙利亚强迫北方王国进贡，甚至强迫犹太人提供大量的礼物作为继续独立的代价，以此来报复从前的奴役生活。

公元前733年，亚述（Assyria）（不可混同于叙利亚Syria）又反过来征服了叙利亚和以色列，迫使许多居民沦为奴隶，并且统治了以色列和犹太两个地方。为了抗击亚述，夺回以色列，以色列国王何西阿到埃及去谋求帮助。为了惩处何西阿的这个密谋，亚述人于公元前721年发动了一次直接攻击，彻底摧毁了撒马利亚，结束了北部王国。征服者将许多领袖伦为俘虏，用亚述帝国各地抽来的人取代他们的领导地位。那些遗留下来的人失去了犹太人的身份，成了混合撒马利亚人的一部分。因此，在犹太，"撒马利亚"成了一个被蔑视的词。但与此同时，犹太人以浪漫主义手法来缅怀和悼念那丧失了身份的10个部落。

南部的犹太王国（现在被凄惨地描述为"残存者"）由于向亚述进贡所以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从前的荣耀一去不复返了，犹太人对此感到奇耻大辱，先知煽动说，以色列之所以失败是由于耶和华对他们的道德以及精神上的松弛感到震怒。于是犹太人渐渐加强了宗教信仰。在这个时期的开初以，赛亚体现宗教教义的教诲以及此后耶利米的规劝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公元前7世纪末，约西亚王领导了著名的"申命改革"。约西亚摧毁了异教圣殿，惩处了其它神的祭司，全力争取回到纯洁的耶和华礼拜中。所有这一切都归之于公元前621年"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神殿里所发现的"③一本书（被认为是《申命记》的全部或部分）。就在这同一重要的年代，约西亚还利用亚述力量的衰败来恢复犹太的独立。但是自由的间歇是短暂的，公元前608年，约西亚在同埃及人的战斗中丧生，自由也就宣告结束。他的继承人统治了三个月后，向埃及人彻底投降。

在这个时期，亚述和埃及双方拼命争夺巴勒斯坦，犹太人则时而转向亚述，时而倒向埃及，以图生存下来。与此同时，第三大国巴比伦开始在近东出现。公元前60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打败了亚述和埃及，犹太又成了巴比伦的一个省份。当由埃及扶

持的傀儡王约雅敬拒绝向巴比伦年年进贡时，尼布甲尼撒率军进入耶路撒冷（公元前597年），将许多领导人虏到巴比伦。后来，西底家王于公元前586年领导了一次叛乱，最终导致了耶路撒冷的毁灭，许多剩下来的犹太人都成了俘虏，其余的则逃到了埃及。

在有名的巴比伦囚虏50年里，许多像耶利米这样的著名宗教领袖将犹太人聚集到一起，鼓励他们进行更为严格的宗教礼仪。这样，一个团体自我意识的复兴部分重复了早先埃及囚虏的经验。尽管在流放期间，一大批犹太人生活明显安逸，但他们的宗教热情以及作为"上帝选民"的特殊荣誉感并未因此而减退。到了这时，许多犹太人毫无疑问地相信他们命中注定不是做政治领袖，而是提供像以赛亚所传播的作为上帝"受难奴仆"的精神领袖。④

公元前538年，波斯征服了巴比伦后，波斯王居鲁士允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一个在波斯管辖之下但可以自己行使行政职权的殖民地。在外国人面前重建城市给犹太人带来了许多艰难困苦，因而整个工程的进展缓慢。但是，正如希伯来历史上多次发生的事件一样，受到鼓舞的领袖们最终成功地将许多犹太人带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市，重修城墙，并且重树了一个神殿，以取代当初所罗门所建造的那一座。

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的征服标志着犹太希腊化的开始。他们第一次接触到了古典主义文明和文化。尽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还墨守成规，但总的趋势很明显是走向世俗化，世故化。许多人迫不及待地抓紧机会学习新的西方知识；许多人模仿新颖的希腊服饰，行为举止，以及风俗习惯。随着这些新的生活习惯的出现，人们的道德情操和精神上的热诚已全面退化。祭司们变得更加世故，更加腐朽堕落，一心想抓特权，更加坚持严格的礼仪形式，而不是出自内心的虔诚。在这种情形下，有许多犹太人移到亚历山大里亚和其它一些地中海文化中心，有些人是为这些地区

的思想、经济、和文化所吸引，其它的则是对耶路撒冷的腐败感到厌恶。此时的耶路撒冷已逐渐成为一个国际的城市，而不是一座圣殿。这是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的开始。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后，巴勒斯坦的控制权落到了希腊有名的统治者托勒密家族手里，他们是亚历山大王的一个将军的后裔。公元前198年，另一位将军的后裔塞琉古王朝又从托勒密家族手中接管了政权，这个王朝的统治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67年。

古代犹太历史上最后一个政治成就是由犹大·麦克比斯开始的伟大革命，后来他的继承者们“麦克比斯王朝”继续了这个革命。这是一个宗教和民族运动，它导致了公元前165年神殿的净化和公元前142年希腊统治的彻底灭亡，以及随之而来的吞并和强迫撒马利亚人皈依于北方，伊多姆人皈依于南方。重新获得独立后，人们的热情必然开始放松，世俗的祭司和一个名叫法利赛人的严格宗教组织之间的裂痕也逐渐扩大，但是79年来耶路撒冷一直保持独立，直到公元前63年才被罗马人征服。

从公元前40年到公元前 4 年，巴勒斯坦由罗马的傀儡王希律统治。希律有一半犹太人的血统，是一个堕落的暴君。由于他的暴戾恣睢，犹太人重又相信总会有一位弥赛亚或救世主来帮他们至少恢复到所罗门时代的荣耀。当拿撒勒的耶稣（用我们现在的公历算大约生于公元前 4 年）被宣布为预言的化身的时候，人们热切地把他当作了弥赛亚。公元30年，在犹太人的夹道欢迎之下，耶稣胜利地进驻了耶路撒冷。罗马当局和祭司（他曾攻击过他们空洞的仪式主义和世俗观）理所当然地对他深表怀疑。五天之后，在罗马执政官彭修斯·彼拉多的许可下，他被钉上了十字架。

耶稣之死以及他没有作为政治领袖重新露面使得许多人（其中大多数也许是他的追随者）深感失望。结果，当基督教开始成为西方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时，许多犹太人拒绝这种新的信仰。他们回到过去的正统观念中，等待着真正的弥赛亚的到来。

公元66年，犹太人反叛罗马。由于韦斯巴芗之子狄度的长久围困，犹太叛乱遭到了失败，耶路撒冷和神殿悉为狄度所毁。大约有一百万犹太人被杀，其余的则成了奴隶，还有一些则分散到各处，希望能在世界各地建立起犹太人的殖民地。因此犹太人分散的正式日期是公元70年，这时的耶路撒冷已被征服。由于祭司已不再掌权，所以法利赛人接受了拉比（教师或法学阐述者）的领导，以便将希伯来的历史，学问和宗教传统保存下来，并将他们同心惊胆颤的异教徒隔离开来。

尽管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但他们不断地给他们的宗教概念增加新的内容。公元 2 世纪末，拉比犹大将希律王统治下希乐尔⑤开始精心编纂的法利赛教义汇编成Mishna（“教义”）——部长长的文件，里面包含了人生每一方面行为准则的精确指南。6 世纪前，这部教义里又加进了波澜壮阔，支离破碎的评论，组成了著名的Talmud（犹太教法典）。

这部法典里没有记载犹太人的迁徙以及所遭受的迫害这一漫长历史，但是如果要想获得一幅完美无损的图画，那么就应该在本书里再添上几笔。公元 3 世纪，巴比伦提供了临时避难所。在这里，人们创建了各种学派，并在充满辅音的经文里加进了元音符号，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基本的犹太教作品。由于得到穆斯林的许可，许多犹太人于公元1000年迁徙到了西班牙。1215年教会所强加给人们的《犹太标志法》禁止犹太人占有土地，从而迫使他们以经商和金融为生。1290年他们被逐出英国，1394年被逐出法国，1492年被逐出西班牙，1497年被逐出葡萄牙，而在德国和意大利他们则被围困在犹太人区。西班牙的犹太人迁徙到了土耳其，那里希伯来文字中的西班牙方言是有名的拉地诺语。在波兰和俄国避难的德国犹太人采用了同样的混合语言，称为意第语。直到20世纪，多少年来建立“家园”的积极努力才导致联合国于1949年成立现今的犹太国以色列。

三、希伯来宗教

希伯来主义对西方文明最杰出的贡献是宗教。事实很简单，基督教诞生于巴勒斯坦，主要由犹太人传播到西方，而且建筑在牢固的希伯来灵感上。同样重要的是西方世界所继承下来的与众不同的宗教敏感特征，以致于今天说起“宗教”就意味着应该持有记载中的早期犹太主教和先知所秉赋的那种虔诚而神秘的态度。

世界上宗教林立，但是古代犹太教有几个重要方面是其它宗教所不可比拟的。它基本上是一神教，这在古代世界比较罕见。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国教，因而大多数希伯来节日都是纪念国家大事的。它能变善化，能够满足变化中的社会的需要。在古代巴勒斯坦，它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因而成了政府形式，道德风俗，行为准则，经济法则和卫生法规的权威。事实上，它控制了个人的全部生活，创造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神权政体。它将个人完善的标准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紧密地结合起来；它的一贯宗旨是保护贫弱。它培养了人神之间的一种亲密感，这在基督教之前的其它信仰中是不可思议的。它是一种唯一的古代宗教，正如弗雷德里克·B·阿茨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它提供了“一个追求人的上帝”，⑥它创造了最具人性的道德行为标准，个人虔诚最严格的测试以及古代世界最深沉的宗教感情。基督教的最终成就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这就是基督教的缔造者所指定的两条最伟大的诫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至三十一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申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和“你要爱邻如己”。（《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八节）

希伯来的上帝观变通性颇大，正如人们对一个以研究上帝本质为人生宗旨的民族所期待的那样。由于这种宗教坚强牢固，因

此神明千变万化且常常自相矛盾的启示为神的本质提供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任何犹太人（或基督徒）都可以从中找到至少一个神性观以适应他个人的精神需要。这些不同的解释同时并存，由于早斯的希伯来作品日期不明，所以人们只能去推测他们的来源。但是人们可以冒险去找出一条可能的发展线索来。

早先，所有的邻近宗教都是多神教，后来这种多神教明显地向一神教转变，这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大批杰出的宗教领袖的产物。⑦最早的犹太“一神”大概是一种自然神祇——西奈山的内在精神。这个神叫雅赫维（英王钦定本里误译为耶和华，具有火山一般的性格，是一种雷电，毁灭，和火焰之神，一种动辄惩罚的怒神，一种易于嫉妒的神，虽然知道其他神祇的存在，但却让他的选民只忠实于他。和希腊神祇一样，他喜欢用动物，鸟、或粮食进行祭司，喜欢用礼仪来安抚他的愤怒。他感情冲动，盛怒之下发了大水，摧毁了所多玛和蛾摩拉城，造成了各种苦难，奴役、瘟疫、饥荒以及军事失败，以此惩治这群不受管束的民众。

在伊甸园里，神与亚当和夏娃交谈，与亚伯阿罕进行交易，允许摩西看他的背，喜欢可口的熟祭品。⑧这个同荷马神话里的众神平起平座的亲密神祇渐渐地变得高大起来，远远望去成了宇宙唯一的创造者，人类万能的，或者说唯一的神祇，而以色列人则是他的选民。摩西之神已不再是一个武断的东方君主，而是一个百折不挠的统治者，侍奉他的最好方法就是遵循他的法律，这些法律体现在摩西十诫以及随后的增加和润色的条文里。对主要的也是最持久的希伯来宗教的总结体现在以下这段声明里：“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诅咒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⑨

这部犹太宗教信仰的记载尽管可能带有教士编纂者的个人偏见，但它却是一部不断倒退，迷失到其他神祇上去的记载。然而，犹太人的奇迹就在于，尽管他们为不太严厉的宗教所包围，而且很想去安抚那些可以增加农业和人类繁殖力的繁殖神祇，但是他们所忠实崇拜的主要还是这个法律神。为了侍奉这位神，祭司，礼仪以及道德行为互为交错，灵巧的闪米特族人特别强调卫生法，但是罪孽几乎可以指代任何事物，从违反道德法到缺席指定的礼仪形式。在人生几乎每一个行动所应遵守的堆积如山的礼仪和法规中，最为突出的是强调安息日为休息日，这是历代最伟大的社会发明之一。

犹太主义的中心概念还包括众多的天使，他们是上帝的奴仆，有时还兼做人类的信使。这群天使中有一位名叫撒旦，据说他能够判断人类正义。他的辨别方法是引诱个人去作恶。因此他同伊甸园里的蛇密切联系起来，后来，受到波斯宗教信仰里上帝具有善恶二重之分的影响，他又成了一位堕落的天使，现在则成了恶魔，不停地同上帝进行斗争。《以赛亚》里有一段描述，将巴比伦比作星星路西弗，这个象征性的段落后来被人们错误地理解为撒旦对上帝的反抗，后来魔鬼从天堂降到地狱的故事就是从此而来的。人类死后可以将自己托付给这两个区域之中的一个区域以求永恒的观念后来主要被基督教发展了。总的来说，古代犹太人认为报答和惩罚是暂时的，物质的；死亡之所席尔是一个充满阴影的地狱，甚至还没有荷马所描写的哈得斯那样清晰。

这些宗教观念在成形过程中还出现了许多更热情，更接近神学的解释，特别是那些诗篇。而且以色列人还发展了一种双重的宗教领导。一方面是祭司——亚伦后裔所继承下来的法定僧侣统治，主要责任是维护严格的传统；另一方面是耶和华的先知（或代言人）。先知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认为自己直接受命于上帝，有责任去揭示神的训谕。[10]实际上他们当中有些人预测的

是未来事件，但用我们的观念来看，他们之所以叫先知，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运用惯技为那些拒不听话的人预测灾难。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先知是拿单，他大胆指责大卫的不端行为，后来成了国王顾问，创建了一个后人经常追随的模式。公元前930年，两个王国分开后，祭司在数量和口才上都有突飞猛进的增长，大约在巴比伦囚虏期间达到了高峰。

每一个祭司都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尽管大多数祭司惯于谴责，其他的一些祭司爱恳求宽恕，还有一些祭司被赋予神秘的幻觉，但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是一样的。他们谴责社会的不公正，他们谴责空洞的礼仪，他们痛斥虚伪，他们强调上帝与人在精神上的亲近，其中有些人，如以赛亚以及《以赛亚书》后半部的作者或无名氏，创造了希伯来作品所能提供的最为高贵、最富灵感、也最为雄辩的劝善书。在某种程度上，先知成了宗教信仰的中心人物，因为这个宗教信仰所强调的是上帝将人一个一个地召唤到他面前。

先知的教义还在希伯来宗教团体中产生了罅隙，随着祭司继续依附于原始宗教礼仪和献祭法规，这种罅隙也在扩大。而另一方面，作为耶和华意愿的高级代言人，先知声称正确的生活比空洞的礼仪更为重要，并借此提出了许多“上帝对人之道”的新的解释。许多祭司由于虔诚而受到尊敬，但是先知的话却被记载下来，因而成了上帝直接与人交流的宝贵财富。

第一位文坛预言家阿摩斯（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所关心的主要是道德行为和对穷人的宽宏大量，与此同时，何西阿提出了以色列为上帝新娘这个唤起人们高度遐想的观念，后来基督教对此加以修改，将教堂描述为耶稣的新娘。旧的信仰认为报答和惩罚都是暂时的，有形的，何西阿对此提出了革新，暗示善人必有来世的荣耀，恶人必有来世的惩罚。这些暗示很快为许多后来的先知所采纳，他们越来越关心以色列的精神领导，而不是暂时

领导，而且，同波斯教一样，他们为死者设想出了一个天堂和一个地狱。天堂在他们的作品里没有明说，但是地狱却被描绘为苦难之地（Gehenna），这是耶路撒冷南部“希诺 姆谷”（GeHi-nnon）一词的讹误。“希诺姆谷”是一个异教神殿的名字，在这个神殿里，孩子被当作祭品，烧死献给异教神祇。

至关重要的是先知们的预言，即一位弥赛亚（第十三章对此有更为详细的探讨）即将到来，他将惩处恶人，将上帝的选民提高到世界领袖这个应有的地位上。在希伯来历史的最黑暗时代，这些预言使得犹太人继续坚持他们的信仰，他们希望受苦受难所得到的涤罪会将他们一个个带到天堂，会将整个国家引向政治上的繁荣昌盛。对此先知撒迦利亚又加了一条教义：以色列人是“被上帝选来”在世界各地传播一神的福音的，这个想法很快被基督教所采纳。

预言布道的全部结果就是将摩西法规“遵法者必蒙福”改编成许多人认为是基督教法规的“内心无邪恶者必蒙福”。顽固的祭司墨守过去的传统，而且，他们的位置通常是由国王任命的。公元前4世纪，犹太教的中心结构里开始出现了宗派竞争。到了公元前1世纪，撒都该人强烈地反对那些不断给诫律增加新解释的法利赛人和埃森斯人。

同样，祭司权力的减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巴比伦囚虏及其后期疏散的结果。当在耶路撒冷神殿里供献祭品第一次成为不可能的时候，耶利米成了现代犹太教的缔造者。他授权将犹太教堂（或集会地点）变成一个可以为人所接受的礼拜堂，以取代神殿。他还强调个人与上帝之间的重要关系，从而将犹太教的中心从国教转向个人教。

与此同时，耶和华的概念已渐渐地从拟人说中消逝了。公元前6世纪后期，“无名先知的作品”（《以赛亚下》）将上帝称作永久的精灵，万物唯一的创造者，人类之神。后期的犹太教无论是在教

义上还是在训诲上都同基督教宗旨相去不远。随着最后一个神殿的毁灭，以及犹太人散居的结束，神殿礼拜已成为过往烟云，而摩西十诫教义选以及由拉比阐释的先知启示则成了犹太教的核心。

四、希伯来作品

和希腊、罗马文学不同，希伯来文学的保存以及一部分创作都控制在祭司的手上。希伯来的文学遗产就是所编纂的 一 系 列书，基督徒称为《旧约》，犹太人则称为《圣经》。结果，宗教作品占据了支配地位，不过文学价值并没有丧失多少。因为，首先，宗教言论构成了以色列人的特殊才能，其 次，保 存《传 道书》这类反对偶像崇拜的作品，保存《雅歌》这类有明显美感的诗歌，以及没有编出无论是国家情感还是宗教情感都为之厌恶的段落清楚地表明祭司编辑不愿意毁掉古代希伯来心灵和思维里任何有价值的表达方式。《旧约》（《正经》）教 规 由39部 书 组成，由于宗教不同，这些书也略有区别。后来犹太人又将这39部书分成三个部分，即首五卷，先知和圣文。

法规。即首五卷（基督教《旧约全书》的首五卷）由五部书组成，其作者一般被认为是摩西，而且早在公元前 4 00年就被看作是上帝之道（上帝的话）。《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希伯来标题为《荒野里》）和《申命记》这五部书工程浩大，作者试图描述从宇宙创始到迦南入侵的整个犹太人历史，包括历史，传记、宗教教 义、法 律、礼 仪、歌、家谱，短篇故事，奇迹记载 ——简言之，几乎所有同古代犹太传统和文化有关的事物。这几部书的创作过程相当长，开始是一代代人的口头流传，后来由无名作者述诸笔墨。

近代《圣经》学者一致认为首五卷于公元前 4 世纪达到现在的形式。当时的祭司编辑至少参考了前三部文献才编成了首五卷。

其中南方犹大王国所用的那个版本的作者或作者群都不为所知，因此人们简单地将这本书的作者称为“J”，因为书中一直用耶和华（JHVH）为上帝的名字。据推测，这部富有诗情画意的叙述是公元前8世纪的成果，第二部书由于作者使用艾洛辛（Elohim）。意为上帝，而被称为E文本。这部书更加神秘但也更为精致。据说源出于公元前8世纪的北方王国。J和E文体经祭司编辑的综合，再加上他们自己的作品（P）构成了首五卷的前四卷。第三部，也即独立的一部，《申命记》（希腊意为“第二法”）似乎是一群同公元前7世纪有名的“申命改革运动”有联系的作者的作品，这部书“出版”于公元前621年。为了强调宗教意义，公元前500年前后一群名为“P”的祭司作家开始对这些作品进行进一步的编订和扩充，整个校对工作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50年左右。

《旧约》第二部分为先知书，由21部书构成，其中有六部（《约书亚书》、《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以及《列王记上·下》）继续了迦南征服到巴比伦囚虏这段时期的历史。剩下的一些“主要的”和“次要的先知书”则是对后期宗教领袖的个别叙述和布道。这些作品早在公元前1200年就已有了口头传播的片断，后来到了公元2世纪出现了知名作者的作品。

和前六部书一样，余下的13部书的创作时间也相当长，因此人们将这13部书简单地称为“圣文”，它们由各种各样的历史、歌曲、故事、哲学、赞美诗和箴言以及一些基本的戏剧（在《约伯记》和《雅歌》里）所组成。

同希腊文学作品相反，希伯来文学一般来说比较简单，朴实，文体自然流畅。它结构松散，形式贫乏，文笔不谨严。而另一方面，希伯来文学作品的内心语言有力地体现在跳跃的意象上（“那时晨星一同歌唱”），⑪体现在明喻和暗喻的形象使用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⑫体现在路得似的简单而又动人的故事所流露出来的温暖人性上，体现在无所不在的高度感情主义

上，体现在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人们的错误以及无与伦比的高贵感上（“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⑬

由于这种自发性，希伯来文学不像古典主义那样注重形式。许多散文和韵文一样丰富多采，富有节奏感，诗歌依赖的是节奏和重复，而不是严谨的格律安排。散文和韵文互为交融，没有严格的区分，它们之间的区别常常要由编辑来决定。无论是散文还是韵文都频频使用自然明喻（大量的后期西方文学都受惠于其灵感）和叫做平行结构的特殊技巧。平行结构组成了词群，意群或节奏群的重复或近乎完全重复，从而产生了华滋华斯所称的“异中存同的感觉”的美感。有时同样的思想不断得以重复，但是所使用的词则多少略有不同，就像《底波拉之歌》里所描述的：“在她脚前曲身，仆倒，在她脚前曲身倒卧。在那里曲身，就在那里死亡。”⑭在大多数情形下，节奏和语法群不断重复，但是表达同样或类似的思想所使用的词句则各不相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是《诗篇》第19篇的开头一行，这种相同的重复结构在第十九篇《诗篇》里层出不穷。有时一系列互为对立的词组成了一个前后一致的独词模式，如《传道书》第3章：“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用这样一种重复群来表达思想似乎是希伯来作家的天性。

古代犹太人还不知道有更大的艺术形式（如颂歌，戏剧、史诗），但他们的许多作品和古典世界所创造的体裁相差无几。尽管严格说希伯来没有史诗，但是它的历史文学包含了（有许多插话）一个单一民族的叙述，人们完全可以称之为“希望之乡的史诗”。这首史诗运用对位手法对一个寻求家园的民族进行了希望，失望以及重获希望的描述，从而在精神上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非常相似。史诗以创世纪开始，上帝许诺亚伯拉罕，让他当一个大国之父。这个承诺在他以及他的子孙身上得到了不断的

重复 。但是这个允诺由于一系列的外部不幸以及妻子们的不育而遭到了妨碍，直到晚年，这些妻子们才神奇般地怀孕。这个故事后半部的意义常常为现代读者所忽视，他们不了解这些不育妇女（或者丈夫，对他们来说生儿子是极为重要的）抵抗她们周围异教生殖崇拜的引诱所涉及到的道德问题。这个大讲英雄的故事从埃及囚虏开始,一直延续到征服迦南,以大卫的胜利生涯和所罗门的荣耀而到达顶峰，从而实现了上帝的允诺。故事以王国的分解而告终。同样，尽管希伯来没有戏剧文学，但《约伯记》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一部哲理剧。在深度上，人们常常把它比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圣诗或世俗诗和圣歌或世俗歌是希伯来天才的一个特殊成就，但是古代犹太文学上的突出成就却是叙述艺术。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叙述起来清晰，简洁，生动，这些故事在《旧约》里比比皆是。约拿和路得的故事非同凡响，东方的说书艺术（如《一千零一夜》里所见到的）毫无疑问是通过《旧约》里的这些叙述传到西方的。

寓言和启示录这两种文学体裁似乎是希伯来天才的独特发明。寓言是一种打比方式的布道，借助日常生活中一些简单明瞭的平行结构表达其要旨。最早的有记载的寓言是《士师记》第九章里树的故事，但是最好也最为人所熟悉的却是拿单的寓言，由于大卫让拔示巴的丈夫战死疆场，所以拿单就给他讲述了这个富人的故事。⑮ 值得注意的是耶稣的大多数布道都是采取寓言的形式。

希伯来的另外一个明显发明则是创造出一种启示录式的作品。apocalypse这个词意为“启示”，而启示录式作品（最出名的启示录是希伯来的《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还有基督教书《圣·约翰启示录》）则起源于受压迫时期一些富有灵感的先知的恶梦。这些恶梦里有千奇百怪、异想天开、而且根本解释不通的人物和事件的幻觉。其中有些作品从前（现在依然如此）可

以根据他们创作时期所发生的实际事件来解释．而另外一些作品则只有一部分受压迫者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知道阐释这些奇怪想象的“密码”，而他们的压迫者则不能，最为明显的趋势是。他们成功地将这些幻觉笼罩在神秘的气氛里，从而暗示上帝的启示大概是难以理解的，或许上帝的选民例外。译解这些神秘的寓言对了解中世纪的人们对寓言的爱好或者对神秘字义的兴趣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旧约》里的篇目

首五卷

早在公元前500年，《旧约》里的头五部书被视作圣书，犹太人称作Torah（法律），而基督徒则称为Pentateuch（五卷）。尽管传统上将这五卷书的作者归于摩西，但它们明显出自众人之手，创作的日期从公元前9世纪（或更早的口头传统）到公元前4世纪前后，而修订工作又持续了150年。这五本书的现今版本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犹大国王约书亚在公元前621年领导的申命改革运动，这个运动标志着一个高度的宗教敏感，而这种宗教敏感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

《创世记》（开始）是《旧约》里有名的首篇。《旧约》有个宏伟的计划，就是要追溯犹太人的整个历史，从创世开始，所以《创世记》构成了这个宏伟计划的第一篇章。通过一系列的故事（许多学者认为只是传说），包括创世，该隐和亚伯，洪水，巴布尔之塔以及奇怪的非希伯来式的对上帝之子和人之女儿所生的巨人的描述．“希望之乡史诗”开始叙述亚伯拉罕，以撒，约伯以及约瑟夫时期向埃及的迁徙，看上去就像一部真正的历史。

《出埃及记》（出路）是对摩西领导的出逃埃及所做的具有

戏剧性的压缩记载。它描述了自约瑟夫时期以来犹太人在埃及的繁衍以及所受的压迫，摩西的斗争和他的兄弟亚伦促使法老保证让他们逃出埃及以及奇迹般地穿过红海后的西奈山之行。在西奈山，摩西开始创建一个神权国家，人们将这个国家视作 祭 司 王国，一个神圣的民族。摩西十诫为其基本诫律，此外还有一系列的辅助诫律，士师被任命为各个部落的领袖，经过40年的筚路蓝缕，一个组织起来的军事、民政和宗法国家总算建立了。亚伦和他的后裔被任命为祭司，利未人（亚伦的部落）当副祭司。

《利未记》是一部精心编纂的法律和礼仪文献，里面记载了祭品，祭司献祭，“贞洁”与“不贞洁”的区别，性行为、健康和伦理以及慷慨的告诫。违法者将赔偿，同民众隔离，或者被处死。如果不遵循法律，整个国家及其繁荣都将消失。掩盖在这一大叠诫律里的是耶稣所称为的第二个最伟大的诫律：“你要爱人如爱己。”（第十九章第三十三节）

《民数记》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的开头是对各个部落的人口普查。希伯来标题《在荒野里》则更好地描述了这种《出埃及记》的延续。迦南之行重又开始，一路上的艰苦和嫉妒不断引起反叛。摩西死后其职由约书亚担任，一场成功抗击米甸人的战争开始了犹太胜利的记载。在这本书里，作者对这场战争的胜利和挫折作了栩栩如生的记载，与此同时还穿插了更多的法规叙述和巴兰与会说话的驴这一引人入胜的故事。

《申命记》（第二法）。公元前621年大祭司将一本 新 发现的法书献给约书亚王，现今的这本书，或这本书的一部分，似乎就是大祭司所奉献的那个文本。书里所描绘的是摩西死前所发表的一系列演讲。和原始记录法规相比这个指令和法规文体雄辩，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准则也更具人性，更加文明，因而代表了犹太宗教发展的一个高峰。这本书的结尾部分答应给虔诚的以色列以多种的祝福，而给不忠实的以色列人以加倍的诅咒，从而绝妙地

体现了教徒悔改法的力量。公元前7世纪的申命改革运动别无它解，其中心概念就是一切人类只有一个上帝，以色列就是“上帝的选民”。除此以外，这场改革运动还责成严格的道德，热爱上帝（“尽心尽性”——施玛篇，这是每个犹太人每天祈祷的一部分，是耶稣的第一条诫律），以及对穷人和陌生者的慷慨大方与多方关注，许多基督徒认为这是他们宗教中独一无二的。

先知

按照《旧约》的传统安排、“首五卷”之后是另外34本书，而这34本书又被分成先知和圣方两部分。在这21本题为先知的书里，前六本继续了以色列到巴比伦囚虏的历史，因而被称做“前先知”，“后先知”包括3个“主要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和《以西结》）和12个“次要先知”，到了公元前2世纪，《旧约》中的这一部分已被明显地视作教规。

前先知

《约书亚》被认为是公元前500年完成的早期文体的又一汇编，它捡起了《民数记》结尾的叙述，描写了征服迦南的过程。作品的基调是英雄崇拜，它主要称颂了战无不胜的领袖约书亚（一个希伯来名，意为“耶和华是拯救”，而耶稣只是这句话的希腊文变体）。根据书中描述，整个征服在25年内完成（这个声明同其它地方有所出入）。在这25年里，神奇事件层出不穷，如约旦河水一分为二，好让以色列通过，耶利哥城垣倾圮，以及日月停止，阳光普照，约书亚大败五王。

《士师记》是《圣经》最早的篇章之一。其中有许多内容也许和原始形式非常相近，至少说《底波拉之歌》这一部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士师记》是历史记载中最零散的。书的开头栩栩如生地描述了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在迦南的实际情况。当时以色列人已明显地处在崩溃的边缘，不过他们不时地被一群叫做士师的领袖们重新组织起来。这些领袖的个别小故事（最

著名的有底波拉，基甸和参孙）编织在一起，构成了这本书的实体。所描述的时间大约包括公元前12和11世纪。

《撒母耳记上》开始了或许可以称之为精确的历史，事件发生后不久就给记下来，或者将当时的记载再进行汇编。它详细地描述了宗教领袖撒母耳对复活了的以色列的统治，他选择扫罗和大卫为以色列的第一批国王（《士师记》里所叙述的亚比米勒对一小块地方的三年短暂统治暂略不算了）以及大卫和约拿单之间的感人故事。

《撒母耳记下》的开头是大卫对约拿单和扫罗死去所做的美丽而动人的哀悼，因此它有力地揭示了大卫杰出的多重性格。这一系列深入浅出的故事充分地表现了他的感情，例如，当耶和华的约柜被带到耶路撒冷时，他在它面前疯狂跳舞；他极想占有拔示巴；他还对反叛的儿子押沙龙之死表现无限的悲痛。这本书还记载了先知拿单的精神领导，拿单对大卫引诱拔示巴的严厉痛斥成了《旧约》最好的寓言之一。

《列王记上》，这部历史除开头几章描述大卫之死以及所罗门的光辉业绩外，其余的部分则平淡而混乱地叙述了王国北方的十个部落以及以色列和犹大的一大批国王。直到书的结尾，随着以利亚的宗教领导、预言和神迹的叙述，活泼有趣的说书形式才重新出现，而以利亚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希伯来最伟大的先知之一。这部书强调了以利亚对各种不同统治者的高度道德观，从而暗示这部书以及下一部书是由祭司写的，他们运用的素材是早期的，或许是官方的宫庭材料。

《列王记下》继续了对以利亚的叙述，直到他神奇般地升天。接下来这部书又叙述了他的继任以利沙的神迹和服务。随着以色列为亚述所夺，犹大进贡以保持独立，申命改革运动，以及犹大最终为巴比伦所获，对列王统治的进一步记载也就宣告终止，从而结束了对一个民族所作的近似连贯性的历史记载——从

先驱亚伯拉罕创业到其后裔被俘遣返到出生地附近，这的确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后来对撒母耳和列王材料的重新改编（约公元前300年）组成了两部《历代志》，里面加进了居鲁士恢复耶路撒冷的叙述。

次要先知

先知作品对后期的古代犹太教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传统上被分成3个主要先知和12个次要先知，但是对这部先知作品汇编的一个更有趣的探讨是按照推测中的历史顺序来进行调查的。每一位先知言谈的精神主旨都是个别的，无始无终的，但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经常给他们的辩论和斥责以特殊的光辉形象。按照历史顺序法，人们还可以追寻出所罗门之后混乱不堪的犹太历史。

《阿摩司书》，阿摩司是一位活泼有趣且视野宽广的先知。他是一位牧人，公元前8世纪住在犹大，后来受神感悟，梦幻到了一个纯洁而高贵的犹太国家。他明显知道北方王国的危险处境，于是来到以色列，言词激烈地预言，如果他不忏悔，不回到纯洁的崇拜上，那末它的末日就将来临。一个合理的推测是他被赶回犹大，在那儿他创作了一本印有他名字的小书。他较为有名的宗旨是谴责没有道德行为的礼仪。他还强烈提倡社会正义以及耶和华对受苦受难者的特殊关心。

《何西阿书》，何西阿是北方王国的最后一位先知。他遵循比他早几年的先驱阿摩司的总要旨，但将恳求替换成强烈谴责，这是大多数先知的典型特征。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将以色列描绘成一个妓女，抛弃了她所钟爱的配偶耶和华。这个极富想象力的寓言成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观念，为后期的犹太和基督教作家所津津乐道，成了但丁《神曲》中象征手法的一部分。上帝的新娘就是教会这一基督教爱恋观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对这个寓言的重复，这同早期西奈山上雷鸣似的神明观相去甚远。

《以赛亚书》是《旧约》里意味深长，诗意盎然而且理想十足的一篇先知作品。实际上，它至少有两组灵感作品融合而成。前三十九章主要是以赛亚本人的作品，而后面的一系列诗篇则是两百多年后的作品。这本书的后半部(40—66章)有时被称作《以赛亚下》，或《无名先知狂想曲》。以赛亚精神和人们头脑中的基督教观念几乎等同。以赛亚一边怒斥他的同代人，一边重申阿摩司的教义：一个纯洁的心灵高于礼仪，此外他还加进了个人不朽观(第二十五章第八节)，包括躯体复活观（第二十五章第十九节）。他还保证“以色列遗民”必归主拯救（第十章第二十一节；第二十八章第十六至十八节），行恶者必入地狱（第十四章），从而表明了天堂和地狱的暗示。在一篇由后人窜改的章节里，路西弗（明亮之星，用来象征巴比伦的荣耀）被认为同上帝展开竞争，后被打入地狱（第十四章第十二至十五节），这篇叙述由于曲解而产生了天使堕落的故事，这个故事经过弥尔顿的《失乐园》的传播使得英国读者尽人皆知。以赛亚在一篇最完整也最理想的预言（第十一和三十二章）里预示了弥赛亚的到来。他是唯一有门徒的文学先知；他特别不喜欢轻浮的女人（他指的可能是所有的女人）；他似乎过着洗礼者约翰、耶稣和圣保罗似的禁欲生活。这本书的结尾部分将在后面的《以赛亚下》里加以描述。

《弥迦书》　另一部公元前八世纪的作品。这本简短作品的声望主要在于它谴责了富豪和暴虐的地主，并将最好的先知教义进行雄辩的总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第六章第八节）

《那鸿书》　和大多数先知作品不同，《那鸿书》实际上是公元前621年巴比伦征服尼尼微后所产生的一首简短的颂诗，因而被认为是上帝的正义战胜了以色列从前的敌人亚述和邪恶。

《俄巴底亚书》是《旧约》中最短的一篇，它痛斥犹大南部的以

东省站在巴比伦一边。因此它似乎是耶路撒冷陷落不久后的作品。

《玛拉基书》是一篇略为长一点的无名布道，明显和《俄巴底亚书》同期。它的开头是对以东的又一谴责。它还痛斥犹大的罪恶，然后又转向弥赛亚（“玛拉基”，希伯来语，意为上帝的使者）预言，此外它还有趣地预示到审判日那天以赛亚将作为先驱回来。

《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是最长的先知作品（如果《以赛亚》被正确地细分）。人们常将这两篇归之于同一作者，这是错误的，不过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祭司的堕落和对其它神祇的崇拜，上帝将以色列人遣散四处，为此耶利米哀痛不已，而我们的词汇里则又多了一个词：“哀歌。”耶利米生活在巴比伦囚虏前后，被特别视作流放先知，他将这个灾难看成是一次清洗过程，他强调在教堂而不是在耶路撒冷神殿举行崇拜，而且传授一种上帝和人的个别关系的教义（而不是“上帝的选民”这一国家义务），而这则成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基础。除了耶路撒冷为妓女这个比喻外（何西阿提出），《耶利米书》还有许多这种丰富多采的比喻语言，使得《旧约》里的作品经常为人引用，耶稣从中吸取语言用以攻击神殿前的货币兑换商（第七章第十一节），但丁在《地狱篇》里从中借用了三只野兽的形象（第五章第六节），爱伦·坡在《乌鸦》里则借用了“基列里的乳香“（第八章第二十二节），还有许多其他作家从中吸取了令人难忘的词语。

《西番雅书》是耶利米的同龄人所作的一篇短文。它的名望主要在于它成功地预示了天罚之日，后期宗教家将此日视作对最后审判日的描述。天罚之日后来成了一首著名的中世纪拉丁文赞美诗，《最后审判日》。

《哈巴谷书》是另一篇先知作品，作于耶路撒冷陷落前后。人们通常认为罪孽是犹大受难的原因，在此基础之上，哈巴谷又提出了上帝惩罚的程度这个问题。结语是按信仰生活，这一点被

圣保罗广为使用。

《以西结书》　这本书参差不齐而且常常使人迷惑不解，里面比喻牵强，所指模糊，至于它的作者和创作日期学者们至今仍在争论不休。不过它指的是巴比伦囚虏时期，因而有力地传达了那种保存以色列精神团体的领导。由于被称作“人子”，所以先知先让上帝神秘显圣，然后又转回到传统的谴责上去。结尾是弥赛亚式预言，即基督会恢复以色列。

《以赛亚书下》《以赛亚书》原书的第40章的开头是一系列宏伟的诗篇，表现了公元前538年波斯王居鲁士帮助犹太人恢复耶路撒冷时的喜悦。二者在文体和内容上的不同使学者们将这部作品的作者归于当时的一位无名先知或一群有名先知。但是无论它的真正作者是谁，同前面39章相比，它明显地属于另一个时期和另一种气质，因此应当将它视作一部独立的作品。这部作品诗篇优美，想象瑰丽，而且格调欢快，这在希伯来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除此之外，《以赛亚下》还提出了一个深受感悟而又鼓舞人心的上帝与其“选民”关系的理论。上帝被看作一个永久精灵，万物的创造者（包括罪恶），他选择以色列人做他的“受难奴仆”。经过历史上多种折磨的洗涤，以色列现在应该恢复其世界精神领袖的地位。基督徒们在这本书里发现了许多广为人知的受难拯救者的预言（特别是第五十三章）

《哈该书》　这本小书里所提到的事件或许比书本身更有趣。犹太“遗民”恢复了耶路撒冷后并没有立即着手重建神殿，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工程艰巨，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害怕会激起波斯君主的愤怒。但是大留士统治的波斯帝国的早期内乱促使哈该勇敢地宣布，完成上帝伟大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向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直接提出了这个请求，他的请求获得了成功，工程于公元前520年立即开始，几年以后得以完成。

《撒迦利亚书》很长，创作时期也比《哈该书》长。撒迦利亚的故事解释了他，一个先知的孙子，如何在两个月后和哈该联合一处，共同主张重建神殿。他不是进行直接陈述，而是运用了启示录式的预示体，结尾是另一篇弥赛亚式的预言。基督徒认为这个预言预示了棕榈星期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的事件（第九章第十至十一节）。

《约珥书》的创作日期不明，这篇简短的预言所包含的内容在其它预言里几乎都可找到，包括谴责罪恶，最后的审判以及另一篇弥赛亚式的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第二章第二十八节）

《但以理书》 公元前168年，叙利亚国王安提奥克斯三世妄想彻底根除犹太教。一般认为，这篇著名的启示录式叙述作品就是在那个时候写成的。书中弥赛亚的神秘梦幻和死者的复活，再加上对在巴比伦囚虏时期维护耶和华法规的但以理的胜利所作的叙述对于深受迫害的人来说一定是莫大的安慰。尽管这本书比较小，但它却是最著名的篇章之一，这主要是因为书里有许多杰出的故事，如火红烟囱里的孩子，墙上的笔迹以及被扔进狮子窝里的但以理。

圣文

《旧约》的第三部分叫圣文，包括希伯来真经《但以理书》。这十三部书包括历史，诗歌，短篇小说和智慧书，构成了古代犹太文学宝库的余部。

历史

《历代志上·下》（见《列王记上·下》）

《以斯拉记》 一部公元前5世纪的文献，是一篇耶路撒冷陷落后犹太历史的稀有记载。前面六章讲的是重建神殿，后四章则是文士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种族纯洁和严格法规的个人记载。有些人认为他还是教堂——一个用于阅读和解释法规的集会

场所——的缔造者，是现代犹太教规的创始人。

《尼希米记》是给波斯王亚达薛西一世斟酒的犹太人的个人记载。它描述了尼希米获得许可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所遇到的困难以及最终的成功。作为《以斯拉记》的姐妹篇，这部书还描述了尼希米当上耶路撒冷的省长后全力支持以斯拉的改革方案。作为公元前5世纪末的作品，这篇高贵而谨严的记载听上去更像现代作品而不像典型的希伯来作品。

短篇小说

《路得记》　最著名的《圣经》短篇小说，据说是5世纪的作品，作为对以斯拉和尼希米所提倡的种族纯洁理论的温和抗议。路得为摩押人，是犹太人拿俄米的孀居儿媳，她和拿俄米回到以色列后又找了一个犹太人丈夫。这样一来他们的后裔一直追溯到大卫王，从而暗示即使大卫本人也并不是纯犹太血统。

《约拿书》是一篇想象瑰丽的寓言，创作日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年。这在犹太宗教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和以斯拉和尼希米这样有群体意识的作家规劝不同，它所教诲的是以色列人有责任将真正的上帝知识传授给外国人。约拿想逃避这种义务，但在著名的“鲸鱼”插曲后，他倒是向尼尼微城的异教徒布了道，并且得到进一步指令：耶和华是所有人类的上帝。

《以斯帖记》　据说是公元前2世纪的作品。这篇小说独出心裁，东方色彩浓厚。它描述了犹太人的压迫及其血腥报复。可能是因为它对普珥节作了解释的缘故，这篇短篇小说被并入了犹太法规里。这是一篇很有趣的短篇小说，因为它详详细细地描述了东方女眷的行为举止，还因为它描绘了阴谋与反阴谋这一中心环节的聪明的戏剧性转折。

智慧文学

《箴言》　这部著名的箴言集，从谚语到道德和神秘布道，有一段时期被认为所罗门所作。现在人们已相信这是一系列格言

的长久积累，公元前3世纪达到了现在的形式。

《传道书》　公元前200年左右的作品，包括更多的箴言。这是《旧约》中最玩世不恭，最怀疑，也最郁郁寡欢的书。布道者是一位老人，他发现生活中没有模式，也没有意义，“一切都是空虚”。在犹太教的法典里附上这部非宗教，甚至反宗教的作品大约也是由于当初将它归之于所罗门之手的缘故。

《约伯记》　作为一部哲学剧，它被比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至于它的准确创作日期则无法确定。它似乎是公元前5世纪或公元前4世纪的作品，但没有证据证明犹太人已了解这种半戏剧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直到希腊征服之后才在希伯来文学里出现，因此它的日期可能还要迟。为了解答所有教徒都感到困惑的问题，即为什么罪恶永远盛行，好人总是受罪，无名氏作者将撒旦想象成一位诱惑天使，在征得上帝的同意后，将各种各样的灾难施加在约伯——一位极为善良的老人——的头上。约伯的三位“安慰者”坚持认为邪恶是他受难的原因，而约伯则拒绝认罪，坚持认为罪恶经常盛行，而好人则要忍受艰难困苦，他还指控上帝对此不是漠不关心就是远远躲避，结果受难的人民无法将其情况禀明全能的上帝。于是以利户，这个一直保持沉默而从未提到的第四个安慰者，由于年少气盛而与众不同。他指责老人的傲慢和反叛精神，暗示谦卑是通向上帝恩惠的必由之路。这场辩论的结尾，上帝旋风一般将神权和人的无能作了一番比较，指出上帝之道意味深长，而人的思维太弱，无法理解天意。然后他嘉奖了约伯，否定了约伯朋友们的解释，从而驳斥了陈旧的犹太物质奖励和惩罚教规，取代了那种尘世审判是一种考验过程的先知理论。作者提出的最新颖的教义是人有权责问上帝的企图，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上帝同意约伯的埋怨和自我辩护中清楚看出。约伯最后得到的尘世报酬与前面的争论互为矛盾，因此许多人认为最后七首诗是后来加进去的。以利户的评论也被视作后来加进去的，因为前面

一直没有提到他，直到他的演讲开始。

诗歌

《诗篇》　这部含有150篇圣诗的诗集构成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宗教诗库，整部诗集错彩镂金，言简意赅，生动地表现了希伯来的宗教情感。《诗篇》创作日期漫长，反映了希伯来断梗飘萍似的国民生活，同时也表明了各人不同的上帝观。这部诗集的最终声誉是我们可以在《诗篇》里找到各种情感或人类处境的表现方式。各种各样的诗篇勾勒出古代希伯来文明的一幅简要断面图。

《雅歌》　“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这是《旧约》里这本异乎寻常的书的开头诗行。这本书之所以异乎寻常主要是因为，尽管其它教规作品也有世俗诗篇，但是在古代希伯来作品里却还没有这样大胆袒露肉欲的诗篇。它最接近后期希腊诗人如忒俄克里托斯（公元前275年）的田园诗。忒俄克里托斯的《牧歌》还为揭开一系列看上去由不同角色（至少两个）和一个合唱队所唱出的诗行提供了线索。如果这首诗确实是犹太人对希腊田园诗的模仿（而且是一篇绝妙的模仿），那么它的创作日期不会早于公元前3世纪。编辑们对各个不同说话者所做的诗行分配主要取决于看它是婚礼作品还是像人们所巧妙设想的，一个少女虽然为所罗门掠入后宫，但她仍在思念从前的牧羊郎。整个诗篇意象丰富，异国情调十足。所以即使把它当作一篇未经解释的断片来读，它的爱情表达法依然是一篇从古到今最令人难忘，也最为诱人的。

《哀歌》　一部哀悼耶路撒冷的陷落的挽歌诗集，强烈地表现了希伯来人的感情。希腊文献的译者认为作者是耶利米，巴比伦囚虏的先知，这是很合适的。不过有一首作于事件发生后的哀词似乎激发了后来四位无名作者的灵感，使得他们在原文的基础上又加进了自己的悲痛表现法。

《旧约伪经》

伪经（Apocrypha）意为“模糊”，用于一些其它的犹太作品，其中大多数作于公元前2世纪或1世纪，因而被认为感悟不足，或不够悠久而未被收入真经。然而，这些伪经中有一些却有历史，宗教，或文学价值，甚至三者皆有。这里对其中比较杰出的几本书作一番简介。

《麦克比斯前书》是一篇杰出的历史记载，描述了从公元前166年犹太人重新获得独立到公元前135年恢复了国势而达顶峰的这段历史。《麦克比斯后书》则独立地叙述了公元前175年到公元前165年这段历史，重点放在用宗教解释当时的事件，包括法利赛人的来世观。《透比书》是一篇想象丰富的短篇小说，描述了天使拉斐尔对囚虏时期一家贫苦犹太家庭的细心照料。《朱迪丝书》也是一篇叙述，大约作于公元前2世纪。它赞颂了法利赛人的美德，并集中叙述了美丽，勇敢，聪明而贞节的寡妇朱迪丝砍杀敌将霍洛芬尼斯的脑袋的故事。简短而非常聪明的故事《苏姗娜》记述了苏姗娜及其逃避老人们的算计，它大约是公元前1世纪的作品。有法学头脑的人特别喜欢这篇，因为故事的结尾证明了假装看到苏姗娜通奸的人的证词不足为信。《不经之书》是一本很长的箴言集，作于公元前2世纪，是后期犹太人和早期基督徒特别喜欢的一篇。《所罗门的智慧》作于公元前1世纪，是一部布道集，里面融合了希腊和希伯来的传统。这大约是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个犹太人的作品，充分体现了正在融合的两种文化，而且，随着基督教的出现，这种融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犹太圣日

犹太安息日开始于星期五的日暮持续到星期六的日暮，除此之外，犹太的安息日主要是纪念历史事件，因为古代犹太教主要是一种国教。很难说出这些节日的确切时间，因为他们的依据是古

代犹太人的太阳月历，结果和基督教的复活节一样，节日是可以变动的。

RoshHashanah，犹太新年，庆祝于早秋。它迎来了为期十天的忏悔和良心上的自我反省，最后以Yom Kippur，赎罪日告终。

Sukkot，结茅节，发生于赎罪日后的第五天。为了纪念逃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所过的临时的天幕生活，犹太风俗要求建立一个类似的篷子，然后进行装饰，并在里面短期生活，以示纪念。圣幕的顶必须有一个通口，这样可以观看群星，因为星星代表祝福和希望。但丁在其《神曲》的每一首赞美歌的结尾运用了同样的象征。

Simchas Torah，"欢庆法典"，定为每个安息日首五卷阅读周期完成之后，也就是说在这一日，《申命记》的最后几行诗念完之后，再从《创世纪》的开头念起，这种仪式象征着法规无边。每个特定的安息日都有指定的阅读段落，因此这个节日一年一度有规则地发生在结茅节后的一天。

Chanukah，"供献"，"光节"，通常发生在12月，和圣诞节季节大致相同。这个节纪念麦克比斯的成功反抗，特别是公元前165年事件，当时犹大的麦克比斯征服了耶路撒冷，清除了神殿，然后根据传统在那儿安放了一只可以烧燃八天的献祭油罐。为了纪念，一连串的烛蜡给点上了，第一天夜里点一支，第二天夜里再点一支，以此类推，一直到第八天感恩节夜晚。最后，这段欢庆季节以互赠礼品而告终。

Purim，普珥节，二月或三月。这一天主要是欢天喜地纪念犹太人的宗教独立。其依据主要是《以斯帖记》里所记载的希伯来人的胜利。

Pesach，即逾越节（Passover）是为期八天的春节盛庆，以纪念以色列人逃避埃及的束缚。逾越节的名称来源是死亡天使越过涂有羊血的家庭，所以节日的开始是一种家庭晚餐，晚餐上的

苦草使人想起在埃及的奴役，宰希的羊使人回忆起解救，无酵饼则象征了“荒野”里严重的食物问题。家庭晚餐成了耶稣最后的晚餐。

Shavuos，五旬节，是一种丰收节，类似美国的感恩节。它不仅庆祝谷物丰收所带来的物质赐予，而且还庆祝首五卷所带来的精神礼品，受戒仪式或按手礼常常伴随着这个圣日。

注释：

①原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

②原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三十五节。

③原注：《列王记下》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节。

④原注：《以赛亚》第五十三章第三至第十二节。

⑤译注：希乐尔（约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巴勒斯坦的拉比，第一个提出明确的阐释学理论。

⑥原注：《中世纪的思维》第62页。

⑦原注：正如A·C·鲍克特在他那本杰出的宗教概论《比较宗教》里所阐释的，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含有一神教和多神教的倾向。官方希腊教有众多的神，但它却推崇宙斯为众神之父，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斯多德都相信一个神。另一方面，虽然基督教将自己看作一神教，但它也清楚地认识到这里面的三元神成分，即半神（天使），超凡的众神（撒旦及其追随者）以及在天主教里天后和一群圣徒。A·C·鲍克特，《比较宗教》，特别是第60—115页。

⑧原注：必须注意，《旧约》里希伯来作品的次序同这些书里所荟集的叙述次序并不等同。

⑨原注：《申命记》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至第二十八节。

⑩原注：有关“先知”的确切含义，最佳线索是经文记载，即当摩西认为自己在法老面前难以表达时，耶和华任命亚伦为他的先知或代言人。

⑪原注：《约伯记》第三十八章第七节。

⑫原注：《诗篇》第二十三章第一节。

⑬原注：《诗篇》第二十四章第七节。

⑭原注：《士师记》第五章第二十七节。

⑮原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早期基督教

一、希伯来主义和古典主义的融合

截至公元前4世纪，古典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似乎还是各自独立地发展。后来，这两种文化在基督教中得以融合，从而使我们获益匪浅。基督教不仅主宰了西方世界的宗教，而且还主宰了中世纪的文化，而我们现今就植根于这种文化之中。中世纪教会里的精神成份主要是希伯来教，同时也糅合了一些希腊思想，而这思想中大多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就已和希伯来教融合了起来。但是教士以及教士的门徒所受的教育主要还是来源于古典主义灵感。

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大帝开始将希腊文化介绍给整个西亚领域，从而使这两种文化第一次获得了确切而富有戏剧性的会合。巴勒斯坦以及其它地方的许多犹太人急不可待地采用了希腊的风俗习惯，他们对希腊的这些思想宝库感到心驰神往。亚历山大里亚附近所创建的一个伟大的新的文化中心不仅吸引了许多犹太人，而且还吸引了许多别的民族。时隔不久，在这儿创立的一个庞大的犹太人殖民地就产生了菲罗这样的新柏拉图主义学者以及一批将《旧约》译成名为septuagint的希腊文本翻译家。这项翻译工作开始于公元前3世纪，之所以取名septuagint（意为70）是因为从传统上来说这是72位希伯来学者的成果。希腊文本的传播使得散布在地中海和西亚一带的犹太人有可能继续阅读经文，因为在这些地方希腊文是通用的学术语言。它还为异教徒皈依犹太教铺平了道路，其中有许多人在犹太教中发现了一种比古代世界其它宗教更为牢固的传统和更为高尚的伦理系统。

与此同时，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给虔诚的犹太人的基本信仰提供了一个更为理智化的样本，为灵魂不朽添加了一些诱人的“证据”。后期的犹太宗教作品（包含在《伪经》里）不仅受到永恒生活的预言式承诺，而且还受到柏拉图和新柏拉图理论的启发。这样，在基督教出现之前，犹太人就已沐浴在古典主义传统里，而受过古典教育的异教徒则在读犹太文学作品。和拿撒勒的耶稣的一生甚为巧合的是，亚历山大里亚的菲罗，朱迪亚斯试图调和柏拉图和《旧约》里的教义。基于有学问的希腊人应该了解犹太作品这样的理论基础，他广泛运用寓言形式来进行互相阐释。例如，由于天使的上上下下，雅各之梯（《创世记》第二十八章）被重新命名为爱之梯，因为这同柏拉图在《会饮篇》里所提出的爱是天地之媒介的理论相符。

尽管古典主义和希伯来主义之间的会合就这样发生了，但是真正的融合却是在基督教出现的时候。当时的世界还没有统一在罗马帝国的庇护之下，各大城市的犹太殖民地为传教活动提供了各种方便中心，而且各地都有一大批人明显地希求这样一种来世宗教，由于这三方因素的巧合，所以，作为一种纯犹太教的变种，它很快地被传播到世界各地。

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的正式宗教。整个希伯来传统被强加到古典文化的上面。早期的基督教学者，包括不很早但却很有影响的圣奥古斯丁，起初几乎全是柏拉图主义者，他们给这个新的宗教注入了一种类似希腊和希柏来式的神学以及得之于罗马传统和犹太神殿礼拜的礼仪，这样一来，这种融合就有可能实现。从此，西方世界受过教育的人就会从古典来源中获得世俗教育，从希伯来和古典之根的融合中获得宗教训练。

二、基督教的起源

要想知道基督教何以这么快就在罗马帝国征服了其它一切宗教，人们就必须考虑一下这个新的宗教诞生时的特殊背景。基督教的准备工作可以说起始于公元前18世纪，当时的阿摩司就暗示出在耶和华的眼里，心灵的纯洁和举止大方比空洞的仪式更能为人所接受，从而贬低了神殿仪式和无休止的礼仪的重要性。后来许多先知接受了这个观点，而且，随着神殿的摧毁，它在犹太教中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早期基督教的特殊道德特征就是强调犹太教的这一方面，而不是什么革命。

随着有关弥赛亚（基督）到来的许多预言，基督教的神秘特性也在形成之中。在预言里许诺给以色列的救世主的确切特征通常都很模糊。起初，他大概被视为另一个摩西式或大卫式精神的和世俗的伟大领袖，帮助以色列人恢复从前的伟大荣耀。但是很快地他又被认为会披满荣耀而来，使得尘世各国感到惊慌失措。许多学者认为有关这个伟大降临的闪着光耀的预言段落指的是最后的审判。在一些没有确定的时代里，死者的复活和这件惊人的事件紧密地联系了起来。随着人们神秘地将弥赛亚等同于上帝（《以赛亚》第九章第六节）或将他描述为“人子”（《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节），基督教的基础至少说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奠定。

耶稣诞生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正受到罗马傀儡希律的残酷压迫。他的暴政还加强了希伯来人的仇视，至少有四个主要派别或党派已经建立。希律的谄媚者和他所任命的祭司以撒都该人出名，他们构成了巴勒斯坦的贵族成分。法利赛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宗教教义（不受祭司权力的约束），有自己的拉比在犹太教堂解释诫律和预言。这些拉比以严格的宗教礼仪和相信不朽而著称。① 一个更小的群体埃森人和穷奢极欲的撒都该人形成了极端的对比。他们过着严厉的禁欲生活，提倡独身和群体生活，随着洗礼仪式和信仰不朽，他们预示了基督教信仰的许多特征。第四派

为狂热的犹太教信徒，他们猛烈反对罗马的统治，将希望完全寄托在预言中的弥赛亚的到来上。他们对希律的积极反对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希律及其继承者对一个新出现的“犹太王”表示出那么大的关注。根据约翰的叙述，在基督被钉上十字架之前已有两名伪装的弥赛亚被处死。

在这些有组织的群体之外，还有许多普通老百姓，被法利赛人轻蔑地称做“大地的子民”。他们有时也很虔诚，但主要的还是失败主义者，在宗教信仰上也是无精打采的。这些分散在各地的犹太教追随者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是耶稣所关注的特别目标，福音书中的“收税人和罪人”。

在这种紧张的宗教气氛里，一大群心烦意乱的民众急不可待地在等着承诺中的弥赛亚的到来，于是洗礼者约翰（大概是个埃森人）向他们指示了拿撒勒的耶稣，从而实现了预言。福音书②对他一生的记载（按现在的年历算，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29年）似乎编纂于公元1世纪末，其来源有口头传说，或从前存在但现在丢失了的书写文献—这些文献叙述了他的出生、传道、死亡和复活，或者口头传播与书写文献二者兼有。

本书作者并不想以寥寥几句话就将这些情节简单，赋有圣灵，而且唾手可得的关于救世主一生的福音书文献遗珠沧海。但是在追溯犹太教对我们文明的影响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指出：和耶稣一生有关的各种有记载的事件都和先前的希伯来传统紧密相联。洗礼者约翰神奇般地降世（《以赛亚》第四十章第三节，“在旷野有人声喊着”）就和以撒，约瑟和撒母耳的出世一样。马利亚的“赞美歌”可以同撒母耳母亲的颂歌相媲美。圣灵的降临以及几乎所有记载耶稣生活的其它各种事件实现了《旧约》中的预言。神迹，教义、寓言、一群门徒，禁欲生活，强调尘世贫困，将货币兑换商逐出殿外，所有这些都可以在《旧约》的文本里找到先例。

与此同时，没有人能够否认耶稣的一生及其教义所具有的革命天性以及耶稣对其追随者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作为基督（救世主），作为人子和上帝之子，他的口气“带有权威性”。尽管福音书记载里有些不连贯，甚至前后还有矛盾，但是这权威性所产生的根本含义却是勿庸置疑的。为了避开流行的犹太仪式（就像许多先知所做的一样），耶稣将预言式的斥责换成了规劝："你要像天父一样做个完人"。在耶稣看来，完人的要素是热爱上帝和热爱自己的同胞，甚至包括自己的敌人。遭人轻视，出身卑微，甚至穷困潦倒，所有这些都无足轻重。所以不管用意如何，追随基督就是获得永生。上帝的王国并不是以色列的政体，它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

但是这些空洞的教义声明并不能传递什么思想，而福音书里所大量传递的是基督的精灵，这对基督教来说至关重要，所以一段简单而又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值得一引：③

>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法律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样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手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小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说，妇人，那些人哪去了？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大约于公元前4世纪出生在加利利，其父母约瑟和马利亚是犹太人，他早年曾学过木匠手艺。要想对他一生中所发生的主要事件作一番客观描述，就不可忽视他的出生和学木匠手艺。他在自己的才能受到洗礼者约翰的赏识后就开始布道，前后持续了约一年。后来希律·安提珀（在耶稣诞生时就统治的希律王之后的一个傀儡统治者）害怕约翰会煽动民众起义，因而将他监禁起来，这样就剩下耶稣一个人去传播他的爱的教义。他的教义和神迹吸引了一大批民众，他们成群结队地跑来看他，听他布道。在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的途中，他受到了热情观众的欢迎，他们在他经过的道路上铺满了棕榈（棕榈星期日就是纪念此事）。但是和他前面的约翰一样，他引起了政府的怀疑，而且他暗示出礼仪相对而言并不重要以及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所以他还激起了犹太教领袖，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的敌视。由于造成了执政官之间的不和，他被罗马军事长官彭修斯·彼拉多逮捕。他们表面上对他进行了一次审判，然后将他当作罪犯钉死在十字架上。据说埋葬他尸体的坟墓于第二个星期天（复活节）空了。后来他在其门徒面前显现使得他们相信他已死而复活。这个传说以及他后期升天的记载成了基督教的神秘基础。

他的许多直接门徒对此深信不疑，但也有许多在他生前紧紧追随他的热情的犹太人对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深感失望。他们从此得出结论，他只是另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因为他并没有带来“天国的荣耀”。但是那些忠实的信徒并没有忘记他的预言：在最后的审判上，他将再度出现，所以他们开始了一次热情而又成功的传道运动，其根本教义包含在约翰那段著名的声明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使徒行书》记载了集体皈依，持续不断的神迹以及其他犹太人对这一特定派别的残酷迫害。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部落开始

皈依弥赛亚耶稣，不过他们还没有建立一个独立教堂的明显迹象，这一方面可能是耶稣主要还停留在犹太的神殿和教堂崇拜传统上，另一方面可能是他的一些言论使得他的门徒相信基督再临已为期不远。

基督教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宗教而建立起来主要是由于保罗的布道活动。保罗原名扫罗，是一个笃信宗教的犹太人，大概在耶稣出生后不久降临人世。他曾积极参与早期迫害耶稣信徒的活动。在公元33年前后，他本人也皈依了这个新的宗教信仰，而且至少承担了三次小亚细亚，希腊和意大利的伟大的传教活动。无论他到哪儿，他似乎都留下一些基督教组织。后来他在给这些组织的信里又给正式的基督教教义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保罗以及其他的基督教领袖的信得到大量复制和传阅，以便给这些组织以指导和灵感。这些，再加上四部福音书，《使徒行书》和《圣约翰启示录》（所有这些很明显都是公元1世纪末的作品）形成了早期基督教的本旨，随后又成了《新约》的教规。

这种新的宗教从这些规模不大的犹太团体以及为保罗所皈依的异教徒中逐渐开始向外散布，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当时的罗马帝国有一种对现实的厌恶感，对来世则无限向往。神秘崇拜（对选民承诺不朽），灵知崇拜（对那些能获得神秘直觉或柏拉图理念知识的人提供永生）、在神学上虽然相似但都不太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小组和摩尼教④（相信来世的天堂和地狱生活）都吸引了一大批宗教皈依者。官方的罗马异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已寿终正寝。在混乱不堪、模棱两可的宗教祭祀中，犹太团体的稳定和相对的善恶感（有丰富的宗教作品背景）对于多数人来说似乎像一个辩诡派风潮里的一个精神避风港。早在公元2世纪，可信赖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就勉强地称颂犹太殖民地“相当真诚，而且乐于怜悯人”，⑤还说：“犹太人有纯洁的神学观，本质上如同一体”。⑥这教义并不是官方的罗马宗教。但它同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斯多葛派、新古典主义者和灵知学派[7]的教义相吻合。后来在这牢固的基础上又加进了《新约》这极具说服力的文献，紧跟着又出现了基督教殉教者。这样一来，基督教的感召力已势不可挡，特别是当它作出决定新皈依的异教徒不必施行割礼就可加入基督教团体。

这些早年的实际记载模糊不清，不过总的趋势还是一目了然的。不错，这儿那儿确实存在一些断断续续的残酷迫害，但是尽管如此，仍有许多新皈依的教徒从异教世界源源不断地涌来。严格的犹太教习俗普遍遭到遗弃，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仪式。从简单的洗礼仪式和纪念耶稣及其门徒最后的晚餐开始，基督教渐渐地采用并改编了一些敌对宗教里的节日、穿着和礼仪。同样，以保罗的书信和《约翰福音》开始，基督教创建了一种神学。这种神学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其基本宗旨是耶稣就是逻各斯（“道”，柏拉图神学的精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斯多葛派的“灵魂”，以及新柏拉图派的理念）的化身，即抽象的上帝赋予了人的形象。另外，希伯来和福音书来源里又加进了圣灵的观念（圣灵好像留居于人的内心或从上帝降临到选民中的上帝的灵魂一样），从而完成了基督教三位一体，而这种三位一体成了新毕达哥拉斯和新柏拉图哲学的依据。由于这些原因，有些学者认为基督教是一种折衷的宗教。或许将它描述为犹太教的延续和变种更为合适，在此基础上，非犹太人和希腊化了的犹太宗教皈依者又加进了自己的阐释和礼仪形式。

公元4世纪，基督教和密斯拉教[8]正竞争着宗教的领袖地位，君士但丁大帝选了基督教为官方的罗马宗教。这个发展对基督教事业有很大的益处，同时也有很大的伤害。很明显它对提高教会的声望大有帮助，但是那一大群虚伪的“宗教皈依者”的增加毫无疑问地削弱了基督教团体的灵性。教会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当牢固的组织，每一个地方首府都由一个主教统辖，大主教控制

更大的辖区，而教会的顶头上司则是罗马、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里亚一带的最高一级的主教，但是到那时为止，博学的教士常常为教义问题而展开激烈的论战（这种倾向后来在新教改革中得到重复），这种情形鼓励了古典世界式的学术活动自由，而同即将到来的严厉刑罚运动迥然相异。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呼吁召开“尼西亚会议”，以制定官方的基督教教义，基督教因而成了中世纪的权威信仰。

从学术上来说，人们还可以同这权威性发展展开争议。与此同时，人们还可以对罗马天主教使得欧洲在哥特人入侵之后得以联合起来这一观点展开争论。公元451年，罗马主教列奥一世宣称罗马的主教是耶稣的主要门徒彼得的继承人，教会从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于是他们在罗马设立了教皇职位，以模仿耶路撒冷圣殿里的高级祭司。当罗马政权在西方衰败时，教会不可避免地成了它的继承人，因为这不仅是唯一幸存下来的组织完好和受过教育的机构，而且还占有一部名为《君士坦丁赠品》（公元1440年被证明为伪作）的文献。据说君士坦丁曾授权给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让他对罗马帝国西半部享有主权。⑨

随着教会势力的增加，人们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此之外，教会还不可避免地利用自己的职权，重新强调《圣约翰启示录》里所描述的最后审判的恐怖。这样，通过不断重复经过国王正式同意挑选出来的犹太教祭司的故事，中世纪的基督教变成了一种消极宗教，它着重惩罚不服从教皇和祭司法令的人。

总的来说，这个记载是灵性削减，世俗性增加。但是，在记载中的犹太祭司的堕落的同一个时期，许多真挚虔诚的基督徒为了逃避世俗世界，建立起了寺院制度，以仿效埃森人的禁欲生活，其它信仰里的隐居生活或包括大约保罗在内的原始门徒的模式。公元4世纪，这些组织开始对成员强加灌输公有生活和虔诚生活的明确法规。最著名的寺院体制是诺西亚（Nursia）的本尼

迪克（Benedit，约公元480—550年）所建立的蒙地·卡西诺（Monte Cassino）寺院。在这个寺院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安排就是祈祷和工作，外加显而易见的吃饭穿衣。尽管这些寺院免除不了时代堕落的影响，但它至少为基督教理想中圣洁而静观的生活树立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象征。在这些以及其他一些虔诚的基督徒周围吸引了一大批学者，他们不断地为这一新的宗教书写评论，进行辩护，并作出阐释。在基督教的初级阶段，所有这一切努力在圣奥古斯丁（354—430）的光辉著作中达到了顶峰。具有极为重要历史意义的是，不管如何堕落，早期的基督教教会组织严密，结构牢固，从而得以保存古典主义和希伯来主义的精髓，度过哥特人的入侵所带来的黑暗时代。

三、基督教神学

基督教神学的基本结构完成于早期教会时期，这其间经历了讨论，争辩以及对耶稣降临人世使命的特殊意义所进行的认真探讨。幸运的是，为了延续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传统，一系列的教会会议产生了几个文献，这些文献至今仍代表着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早期教规中最为重要的是《尼西亚信经》，公元325年为“尼西亚会议”所采纳，公元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上得到了扩充，公元451年又得到了“凯尔西顿会议”的批准。它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阐述如下：

> 我们相信唯一的上帝，无所不能的天父，天与地，有形物与无形物的创造者；我们相信唯一的基督耶稣，上帝的独生子，是天父在太古时代所生，光中之光，真正上帝之中的真正上帝，是生出来的而不是制作的，和

天父同属一体，通过他万物始生；为了我们的人，为了我们能被拯救，他从上天降临人世，被圣灵和圣母马利亚孕育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为了我们而被彭修斯·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埋入坟墓。根据记载，他在第三天又死而复活，升入天堂，坐在天父之右侧，尔后又带着天国的荣耀而来，审判人间的生死，他的王国不会有尽头；我们相信圣灵，即来自天父的基督，生命的赐与者。圣灵、圣父和圣子一起受到人们的崇拜和赞美。他们通过先知来说话，我们相信一个神圣的天主教使徒教堂。我们承认洗礼可以赦免罪孽。我们寻求死而复活以及来世生命的到来。

公元529年"奥兰吉会议"同意了圣奥古斯丁提出的罪孽以及赎罪观，其要旨可以在下面的教规中看出：

由于第一个人所犯下的罪孽，自由选择已成乌有，因此如果没有上帝的恩惠，没人能够按其本意去爱上帝，或相信上帝，或为上帝行善事。

所有受过洗礼的人，在收到上帝的恩惠后，在耶稣的帮助和合作下，如果忠心耿耿地劳作，都有权利和义务去做一切可以拯救灵魂的事情。

我们不相信由于神权的作用有些人命中注定就要犯罪。

在这些基本的神学道义上，人们又附加了几个中世纪基督教传统的重要成分：

三位一体的特征：权力（圣父），智慧(圣子)和爱(圣灵)。

圣礼：通过具有精神意义的象征标志，基督徒分享耶稣的团契的各种仪式，“通过外部的可见标记来窥测内心的精神恩惠”。这些仪式有：

1. 洗礼：浸洗在水里，或用水泼撒在身上，表明原罪的涤除和被纳入教会。
2. 按手记：施洗礼时将手按下，表明有能力承担基督教义务。
3. 忏悔式：在神父面前忏悔，神父以上帝的名义赦免洗礼后所犯下的罪孽。所以，一个施过洗礼的人如果犯下了罪孽，偏离了基督教正道，那么他可以通过忏悔，悔悟、通常是通过一种，包括因犯错误而自我贬低的果报，来定期地和耶稣团聚。
4. 圣餐，即最后的晚餐：分享神圣化了的面包和酒以纪念耶稣及其门徒似的最后的晚餐，从而表明受圣餐者已神秘地收到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躯体和血。
5. 授职仪式：牧师授职仪式。
6. 神圣婚姻：向一对夫妻一生一婚制式结合所作的祝福。
7. 临终涂油礼：由一个牧师将特制的献祭油涂在临终者的身上，以赋予恩惠，求得对罪孽的宽宥。

最后的审判：在世界末日的法庭上，所有的人，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都将受到耶稣的审判，最终作出善恶之分。

天堂：星际之外上帝的住所，由天使和赎罪者的灵魂栖居。

地狱：被惩罚的永久之地，撒旦的住所，座落在地球上，据说由火、黑暗和难以想象的折磨构成。

炼狱：死后的一种暂时惩罚状态，以消除别的办法无法赦免的罪。惩罚的期限视罪孽大小而定。在炼狱受罪的灵魂可以得到神父的礼物和生者所作的弥撒。

弥撒：正式的宗教礼拜仪式，其程序包括一系列的准备仪

式，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十字架法规，圣餐仪式，一个总的感恩祈祷以及最后解散。有四种循序渐进的简单形式：由主教级教士主持的弥撒、庄严弥撒、大弥撒和小弥撒。小弥撒是朗读的，其它则自始自终是唱的。

七种美德：基督教的七种美德由柏拉图和斯多葛派的四种"主要美德"（谨慎、节制、坚忍和公正）组成，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三个"神学上的美德（信仰、希望和爱）。"

七种致命的罪恶：这就是骄傲、嫉妒、发怒、懒惰、贪婪、暴食和淫欲。和盲目崇拜、谋杀以及通奸这些"不可宽恕"的罪孽不同的是，这七种罪孽是"可以宽恕"或者说可以原谅的。可以宽恕的罪并不疏远罪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但是犯下了不可宽恕的罪后，罪人就有可能被开除教籍，要想重新加入教会团体就得承受严格的忏悔。

圣徒：已去世的基督徒。由于生前非凡的圣洁而被教皇宣布封为已享受到天堂待遇。所谓守护神是由一个人或一个组织选中的保护人或人与上帝之间的特殊调解者。

圣日：每个星期天：到了12世纪已经有了36个特别节日，诸如圣诞节（耶稣的诞辰），棕榈星期日（耶稣胜利挺进耶路撒冷），耶稣受难日（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节（耶稣复活）和五旬节（复活后的第七个星期日，纪念圣灵的降临）。而四旬斋（大斋期）或四旬斋季节则是指从圣灰星期三到复活节前夕40天的忏悔期（星期天除外）。

开除教籍：部分地或全部地逐出基督教团体，通常伴随有公民权的丧失，而且还暗示被永久地罚入地狱。

《新约》里的篇目

《新约》是一本27卷本的文献或"书"的荟集，写于公元1

世纪后半叶或2世纪的前半叶，都是些对早期基督教的回忆。最早的手稿所使用的是希腊语，但这可能是从当时巴勒斯坦的通用语言阿拉米语翻译过来的。这些书同《旧约》不同，有四部简短回忆耶稣生活的福音书，一部描述早期基督徒的传教活动的《使徒行书》，一部《圣约翰启示录》，还有一些在早期基督教团体中流行的短信。然而，尽管《新约》篇幅不长，但它在传播上帝与人为善的启示录上却是雄辩有力，前后连贯。

《福音书》。《新约》理所当然地以四部福音书开始，叙述耶稣的生活及其教义的要点。在这四部福音书中，马太，马可和路加这三部福音书被视作对观福音书（“用相同的眼睛去看”），因为它们有许多平行之处。最合理的解释是《马可福音》最早，其它两部福音书是在《马可福音》和其它今已失传了的资料来源基础上创作而成的。第四部《约翰福音》则是一部独立的篇章，别树一帜。

《马可福音》。据信它是四部福音书中最早的一部。它言简意赅，直截了当，而且不加修饰地叙述了耶稣一生的主要事件。尽管它没有其它福音书那样诗意盎然，但它叙述生动，文笔酣畅，且具戏剧性。《马可福音》的开头是洗礼者约翰为耶稣洗礼，从而省去了耶稣的出生和早期生活。随着高潮的渐渐推进，它又描述了约翰的被捕以及耶稣一系列的布道，召集门徒和表演神迹。一方面，法利赛人对他极为仇视，而另一方面在他的周围集结了一大批深受压迫的热心追随者和疯狂的病人，从而加强了全书的戏剧性效果。在赞扬声中对约翰死亡的描绘，预示了耶稣胜利进驻耶路撒冷，清洗神殿，为犹太出卖，对他的审判，在十字架上钉死以及最后复活。早期传统根据使徒彼得的回忆，这部书的作者是约翰·马可。近年来的研究没有发现确切作者的证据，他们认为这部作品很可能创作于公元175年。

《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作者善于思考，喜欢将耶稣

生活中的事件同《旧约》中的预言联系起来，从而又增加了不少细节。他将约瑟的家谱追溯到大卫，又加进了圣灵感孕，贤哲出现，逃到埃及以避希律的暴怒，魔鬼对耶稣的引诱以及其它许多令人难忘的细节，如耶稣预见到了他即将到来的死亡和复活。他还加进了许多寓言和五篇布道。《马太福音》重复了《马可福音》里的大部分事情，而且里面有许多添加物和《路加福音》里的材料极为相似，所以学者们认为《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取材于《马可福音》和其它一些至今失传的题为《耶稣的言论》的材料。《马可福音》创作于公元90年左右，作者似乎是一位犹太基督徒，他创作这本书的目的是想让其他的犹太人皈依这新的信仰。

《路加福音》似乎完成于同一时期，作者是一位伴随保罗进行传教活动的希腊医生。这是对观福音书中最为优美也最具诗意的一篇。它精心叙述了约翰的出世、天使加百利的万福马利亚、马利亚的颂词、马槽里的婴儿，天使在牧羊人面前的出现以及结尾耶稣在以马忤斯的显现。此外，他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叙述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几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寓言，正像人们对一个异教作者所期待的那样，他还把耶稣说成是世界的救世主。

《约翰福音》。它是第四篇福音书，尽管它重复了许多相同的材料，但在耶稣传教活动的许多细节上却同其它福音书有很大的出入。它用新柏拉图式的方法将耶稣和“逻各斯”，“化身之道”等同起来，而且坚持认为耶稣确实实现了救世主的预言，从而使这部书与众不同。起先这部福音书的作者被认为是“心爱的门徒”约翰，但究竟谁最有可能是它的作者，这个问题激起了人们无限的兴趣和争论。书内的大量证据暗示这部作品可能创作于公元 2 世纪初。对耶稣就是救世主的坚持，对崇高的耶稣的神秘表现以及富有哲理性的讲解，所有这一切暗示了基督教教义的发

展。所以它的创作肯定是在其它福音书的简单陈述之后。

《使徒行书》。作为福音书的续篇，路加直接而生动地叙述了耶稣死后不久的基督教传教活动，从而使这篇叙述成为无价之宝。书的开始描述了耶稣在和门徒享受了40天的圣餐后升天而去，接下来所描述的是圣灵于五旬节降临使徒中间，继续显现神迹，大众皈依和随之而来的迫害。这部书具有很高的宗教价值，因为它用圣灵的出现来取代看得见摸得着的耶稣。它还描述了建立一个确切的宗教机构，由新皈依的门徒捐款。它叙述了领袖们之间的偶尔猜测，嫉妒和争执。书的后半部主要描写保罗的传教旅行（保罗认为自己是异教徒的特别使徒），直到他被罗马人监禁。叙述到此突然中断，使得保罗的后半生成了一个谜，引起了人们的推测。

《新约全书》的一般安排是先叙述早期基督教，然后再叙述保罗和其它早期基督徒写给个人或早期教会组织的21封书信。这些书信生动地记载了早期基督教的思想以及奇特的基督教法规和风俗的发展，其中有一些还不知不觉地清楚地刻画了早期基督教领袖的形象特征。这些书信的创作日期和次序颇为模糊，所以这里只谈谈对这些简短文献的习惯安排。

《罗马人书》保罗最长的书信之一，写于公元58年前后。在这封信里保罗通知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教会有关他本人即将前去的访问。和其它书信相比，这封信更为正式，它阐明了保罗的许多基本宗旨，包括接纳未施割礼的异教徒进入基督教团契、由亚当传下来的原罪教义、通过耶稣来替代赎罪（因为“罪恶的报酬是死亡”）、拒绝物质生活发扬精神生活以及将摩西十诫归纳在耶稣的第二条诫律上：“你要爱邻如爱己。”

《哥林多前书》（约公元54年）。保罗在科林斯住了18个月。他对这个城市极为关注，因为它丰衣足食，从而有可能提供各种各样的尘世诱惑。保罗给科林斯的教堂写了两封信，这是第一

封，在这封信里严厉斥责和雄辩声明互为交织。他祈求团结，祈求开会将罪恶之徒除出教籍，请求暂时终止各种礼仪细节，诸如女人礼拜时应将头遮盖起来而男人则应该将头裸露等等。此外，他还给基督教传统加进了三个神学美德（信仰、希望和友爱），歌颂精灵与洗礼的巧合，歌颂爱（第十三章），宣扬死者以“精神躯体”复活的教义，从而使他的叙述充满了诗情画意。

《哥林多后书》。这第二封信（约公元56年）的主要格调是斥责同一教会。这封信之所以有趣是因为保罗提到了他所受的迫害以及模糊不清的身体疾病，同时还因为这是现存的最早提到教会就是耶稣的新娘（第十一章第二节）和三位一体（第十三章第十四节）的文献。

《加拉太书》。这是保罗于公元52年左右写给加拉太罗马省教会的一封短信。当时加拉太明显地为“割礼争议”搞得焦头烂额。保罗向这些异教徒讲述了他过去的传教活动，然后大胆地宣布：基督徒不仅不需要割礼，而且还可以免除摩西法典，他只需信仰基督就可获得拯救，从而牢固地奠定了他的传教士地位。这种“信仰辩护”理论后来在马丁·路德的新教教义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以弗所书》。这封信的日期、作者，甚至收信人至今仍在争论不休。它带有保罗的思想色彩，主张妻子应当服从丈夫。或许这是一封通函，籍以加强所需要的基督教教义。除了规劝道德生活和信仰力量之外，它还提出了一个联合教会的重要意义。在作者看来，这将是上帝在尘世间的权威代表。

《腓力比书》。这封信字里行间雄辩有力，所以常为布道所用。很明显这封信是保罗从罗马监狱（约公元61—64年）写给他在欧洲所组织的第一个教会（在腓力比，罗马在马其顿的一个殖民地）的。最著名的段落（第二章第五至第十一节）将以色列是“受难的奴仆”这一预示思想运用到耶稣身上，从而加强了化身

约翰的教义。

《哥罗西书》。同样写于监狱，这是保罗写给科罗希(colossae)教会的一封短信，藉以反驳那儿正在增长的一种趋势，即将灵知以及其它的一些思想融进基督教传统。保罗重申，上帝的化身基督是宇宙唯一而永恒的创造者和统治者。

《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写于公元51年，据说这是现存最早的基督教文献。保罗所创建的最早教会之一，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一直背信弃义，于是提摩太将此事汇报给保罗，这封信就写于此时。它表明了作者的极大喜悦，同时又加进了几个典型的保罗式布道，而这封信预示的报偿是最后审判日死者的复活。

《帖撒罗尼迦后书》。它继续了最后审判的争论，指出只有出现一个反基督（假装是上帝）而最终又为基督所毁的人物才有可能出现最后的审判。这封信可以说标志了一个威严而又恼怒的基督观的开始，这种观念在《圣约翰启示录》里再次得到重复。

《提摩太前书》。这是三封“田园信”的第一封。这三封“田园信”是写给其他教会领袖，讨论管理事宜和道德行为法典的。这些书信的作者起先被认为是保罗，但是现在人们一般认为这是一个后期宗教领袖的作品，创作日期约为公元100年，因为这些书信表明教会组织已经进入了一个高级阶段。第一封信描述了旧的摩西法典与新的恩惠教义之间的对比，讨论了女人顺从的必要性，提出了主教，副主祭和长老所应遵守的规范，警告人们不要误入灵知信经。同时，这封信还包含了人们经常引用的格言：“贪财是万恶之根。”（第六章第十节）

《提摩太后书》。它似乎是一封更早也更具个人色彩的保罗式书信，里面包括了信仰坚定，继续传播福音书等优秀建议。在这封信里，保罗预见到了他的死亡，于是请求提摩太速去，声称路加和他在一起，他还要求书，斗篷，羊皮纸，并且请求马可陪

伴他，所有这些使得这封信具有极强的个人色彩。

《提多书》。收信人为保罗的一个门徒。这个门徒曾在克里特组织了一个教会。这封信强调了“合理教义”以及男女基督徒朴素生活的重要性。

《腓力门书》。与其说它是一封信，倒不如说是一个便条，它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是保罗在狱中写给腓力门的。腓力门从前的一个奴隶阿尼西母逃到了罗马，保罗使他皈依了基督教。保罗在这封信里请求腓力门宽恕阿尼西母，并将他纳入基督教团契。除了保罗和他朋友之间的私事外，这封信还提到了保罗希望个人自由，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访问腓力门。

《希伯来书》。其作者起初被认为是保罗，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它的创作日期不早于公元90年。这封信显然创作于罗马人对散居的犹太人的迫害时期，因为它强调希伯来和基督教关于世界有七个时代的理论，而且书信里有些经文段落使人想起带来安息日的耶稣。此外，这封信还将耶稣描绘为一位永恒的大祭司，他所提出的新契约得到了沐浴仪式和按手礼这样的礼仪的隆重纪念。这位新大祭司以在最后审判日那天死而复活作为他生涯的顶峰。第11章的信仰演说非常雄辩，经常为人引用。第13章则开创了不知不觉接待天使的著名引语。

《雅各书》。它明显地创作于1世纪末，作者是一位精力充沛，注重实用价值的宗教领袖，对“没有作品的信仰”漠不关心，而且他宣讲直截了当的神性教义，以预示基督再临。

《彼得前书》。它似乎创作于公元96年，作者是一位无名宗教领袖。他劝告人们服从异教徒统治，鼓吹善行和心灵纯洁作为真正基督教的标志，并且重复了保罗的婚姻忠告。特别使人感兴趣的是他用诺亚和大水这个寓言来预示基督的洗礼，这个暗示为后来的基督教作家所扩展，成为《新约》中为数不多的寓意之一。

《彼得后书》。据判断，这封信属于最后一批书信。它描述了堕落天使的故事，并对基督再降临的耽延提出了解释，指出主者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从而给那些担忧者以极大宽慰。

《约翰一书》。很有可能它是第四篇福音书的作者所作。它的教义中心是爱和通过前来摧毁魔鬼作品的耶稣进行宥罪。它还提到了反基督的即将出现以及接踵而至的最后审判。这封书信显然是对早期基督徒在其教义里融进灵知思想的一种反击。

《约翰二书》。它有几段具有个人色彩，向某一位无名女士提出爱和安慰。

《约翰三书》。另一封个人便函，写给某一该尤斯，以驳斥一种灵知论或其它一些正在得宠的异教教义。

《犹太书》。它为无名氏作者所作。这封简短但却具有权威性的布道要求人们坚持真正的信仰，避免"不知不觉爬进来"的异教教义的诱惑。

《圣约翰启示录》。它是《新约》里最后也最杰出的一篇。这篇类似《旧约·但以理书》的启示录明显地创作于公元96年，也就是在罗马人迫害时期。由于约翰是个普普通通的名字，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引起了人们无穷的推测，至今仍未得到解决。书里神秘的象征，寓意和在七位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效系统以及怒神战胜敌人的预言——所有这些堆积起来的言论使它与其他早期基督教作家所惯用的平铺直叙而且相对直率的陈述迥然不同。无论它的起源是什么，它都是一篇富于曲尽其妙，无与伦比的想象性文学杰作。然而，对于尚未入门的读者来说，这是难了一点，所以我们在这里对它进行一番逐章逐句的简要评述。

第一章：拔摩的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告诉他们即将到来的显圣。显圣的开始是耶稣为七只灯台（七个教会）所围，他右手拿着七星（七个教会的天使）。在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利剑，这是耶稣发怒的第一个暗示，预示他掌管死亡和地狱的

钥匙（成了关于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和复活之间入地狱的教义基础）。第二章和第三章打断了主要叙述，加进了七个教会的特别会议和相互指责。第四章和第五章重又回到宝座梦幻上。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坐位，上面坐着24位长老（12位以色列的子民加上12位使徒）。宝座前面有七盏灯（《以赛亚书》里圣灵的礼物，）宝座周围有四只生物，即一只狮子，一头牛犊，一个人，还有一只六翼飞鹰（为以赛亚所暗示，后被解释为四部福音书的作者们）。宝座的右边有一个封有七印的书卷，这七印后为羔羊（耶稣）成功地打开了。

开启前四只印揭开了著名的"启示录四骑师"（象征袭击罗马的灾难）。揭开第一印时有一匹白马出现，马上骑师头戴冠冕，以示征服（或评是威胁罗马的帕提亚人）。揭开第二印时出现一匹红马，马上骑师象征内乱。揭开第三印时出现一匹黑马，马上骑师手里拿着称食物的天平，象征饥荒。揭开第四印时出现一匹灰色马，马上骑师是死亡，象征瘟疫。第五印的揭开表明了不同的殉道荣誉观。第六印的揭开预示了地震，要人们提防即将到来的恐怖。在第七章里，从东方（七个教会的所在地）来了一位天使，他命令四位骑师中止伤害，直到他印了12个部落14400[0]位信徒的前额（12个部落乘以12个使徒，再加上成千的人口，包括所有的上帝选民）。第八章描绘了第七印的开启，预示了最后的审判事件。

在这篇预言里，七个天使手中拿着七把号。第一位天使吹号暗示地上三分之一被烧。第二位天使吹号时，扔在海里的一座大山摧毁了海洋生活的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时一颗星星从天而降，毒化了地上三分之一的鲜水。第四位天使吹号时，天体的三分之一都暗淡了。第九章里，第五位天使吹号时，一颗星（路西弗）从天而降，打开了地狱大门，释放出一群折磨异教徒的"蝗虫"。这些"蝗虫"是人，动物和鸟儿的合成物，由亚坡伦

统治。第六位天使吹号时，从伯拉大河（伊甸园里的四条大河）出来的四位天使释放了“二万万”神奇马军，杀掉了人类三分之一。

第十章描述了另一位大力天使，手中拿着一个小书卷。七雷发声，这时天上有个声音告诉约翰偷偷地封上七雷的奥秘，吃掉天使手里的小书卷，然后再说预言。与此相对应，第十章还预示外帮人将践踏圣城（基督教全体教徒）42个月（三年半），两个见证人（基督教领袖）将有权布道1266天（同一时期，似乎指公元65年大火之后尼禄对基督徒的残酷迫害），然后撒旦（帝国罗马）杀掉他们，再过三天半（纪念三年半？）他们将死而复活，升天而去。结尾的第七位天使吹号带来了上帝王国到来的异象。

第十二章带来了一系列涉及过去基督教历史的新象征。取材于原始太阳神话，一个怀有身孕的妇人出现了。她“身披日头”（马利亚），头戴12星的冠冕。一个七头十角的大红龙（罗马）想要吞没妇人的孩子（耶稣），妇人生下的孩子为上帝所救（复活），而妇人（遭迫害的基督教）则逃到旷野（基督徒寻求安全）过了1266天（同样是三年半）。后来天上发生了战争，那逼迫妇人（早期基督教）的撒旦被摔到地上，而那妇人则披着神赐给她的两个翅膀飞回到自己的旷野（逃避），又过了“一载二载半载”（同样的三年半）。除此之外，书中还多次出现了向基督教开战的龙，后来这条龙站到了河边上（是小亚细亚？）。

第十三章描述了一头从海中（罗马）来的野兽，他从龙（在这个寓意里撒旦和罗马可以互换）那里接过能力，又同基督徒打42个月（又是三年半）。随后又从陆地上来了一兽，作第一兽的帮手（尼禄的辅助祭司试图加强皇帝崇拜？）。这头兽的手上印有神奇的666（六百六十六天）数目。在第十四章里，约翰看见羔羊（耶稣）站在锡安山上，周围有十四万四千上帝选民。有一位天使宣称最后的审判时辰已经到了，第二位天使宣布巴比伦城

（罗马）倾倒了，第三位天使规定了对拜兽者（罗马异教徒）的惩罚。这一章的结尾是耶稣手拿镰刀获得心灵的丰收，而另一位天使则收取邪恶的一切，丢在上帝忿怒的榨汁机里。

第十五章到第十八章描述了末日的七灾，以巴比伦（罗马）的陷落而告终。第十九章是最后审判的异象。在第二十章里，一个天使将撒旦拖到无底谷，用链子将他锁在那儿一千年。一千年后他将被释放出来预示生者和死者在天堂或地狱里所接受的审判，只有殉道者可以享受天国的荣耀。第二十一章则幻见了一个新天地，一个赋予了神的荣耀的耶路撒冷。结尾的第二十二章热情地描述了生命之水从上帝的宝座流出来，灌溉着天国。《圣约翰启示录》的结尾预示，完成这些预言的时间已经为期不远了。

《圣经》的版本和翻译

犹太人和基督徒神圣的作品荟集于公元2世纪，首次冠以《圣经》的名字（Biblia，意为“书”）。公元367年，一个犹太法学博士会议正式确定了《旧约》的教义。然而，这些早期文献并没有留传下来，现在的版本则是后人在早期各个版本复制品基础上相互比较，择优而取的。现存最早的《旧约》希伯来文手稿是9世纪和10世纪的复制品。最早的希腊文《圣经》是2世纪3世纪和4世纪的文献。早期的希伯来和希腊版本残片不断被发现，从而为学者们与后期的经文比较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旧约》最早用希伯来文写成。《新约》的语言则是通俗易懂的希腊科伊那语（koinê）。在早期的《圣经》翻译中，最著名的两个版本是希腊文本（Septuagint）和拉丁文本（Vulgate）。前者意为70，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从传统上来说它是72位住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希伯来学者的成果，他们于公元3世纪开始把《旧约》译成希腊文。这项工程大概到公元1世纪才完成。Vulgate之

所以这么命名是因为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普遍使用这个名字。在4世纪，圣·杰罗姆（St.Jerome）花了25年的时间，将这部作品全部译成拉丁文。这个版本经过公元1592年的修改（克莱门汀版，Clementine）成了罗马天主教的权威性《圣经》。

基督教改革运动后出现了更多的现代欧洲语言译本（新教）。在英语方面，公元1535年的廷德尔-科弗代尔译本(Tyndale-coverdale)为最著名的英语《圣经》，它为钦定英译本打下了基础。钦定本是詹姆士一世委托近50名学者完成的。通过三年的努力，这个译本于公元1611年完成，从而为世界提供了最雄辩、最具诗意，也最为动听的英语文学作品。

一个重要的新教修改本，即《圣经》钦定本的修订本，完成于公元1895年。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将深僻古奥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词现代化。这个版本的美国变体，即《圣经》标准译本的修订本出现在公元1901年，里面所收录的作品特别为美国经文学者所喜欢。

与此同时，拉丁文本的第一部天主教英语译本，即《雷姆斯—杜埃圣经》（Rheims-Douai Bible），于公元1610年出版，公元1750年查洛勒（challoner）主教的改编本成了标准英语《圣经》，至今仍为天主教所用。

到了20世纪，人们渐渐改变了那种特定版本或译本神圣不可改变的理论，从而推出了更具可读性，更加精确，也更为新颖的译本。现代英语《圣约》的新译本出现了，比较著名的有《穆法本》（Moffat，1935）和《史密斯与古德斯彼得本》（Smith and Goodspeed，1931），一个新的标准译本的修订本，也即人们常说的《纳尔逊圣经》（Nelson Bible，1952），则是美国新教学者的成果。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纠正从前版本里的“不准确和错误”。《作为生活文学来读的圣经》(The Bible Designed to be read as Living Literature,1936）则明显脱离了大多数的前版本，

省去了重复，家谱，礼仪和其它非文学的材料。而且它还细心地将韵文和散文区别开来，去掉了诗歌编号，为现代许多世俗出版物提供了诱人的大号铅字面和版面编排。对这一优秀版本所进行的改进产生了1950年的《达特茅斯圣经》（Dartmouth Bible），这个版本金碧辉煌．除了前面提到的特色外，它还增加了出色的绪言和解释性材料，还有一大批浅显易懂的注解，此外，它还为研究或随意了解《圣经》作者的真正意图提供了各种有益的帮助。《达特茅斯圣经》是罗依·B·钱伯林和赫尔曼，费尔得曼（ROY B·chamberlin和Hermam·Feldman）多年学术研究和精心安排的结果，本书的作者从这两位学者那儿获益匪浅。这本《圣经》可以说是美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用意好，趣味性强。

注释：

①原注：尽管基督被描述成同法利赛人有公开冲突，因为后者强调诫律的字面意义，但是他们对来世信仰的坚持却和基督教教义有许多共同之处。

②原注："福音书"被译成"福音"或"喜讯"等多种形式。

③原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至第十一节。

④译注：摩尼教为波斯幻想先知摩尼（约公元216—276年）所创建的宗教。摩尼殉道后，他的宗教迅速传遍罗马帝国和亚洲。摩尼教综合了早期的灵知学派，沃教和基督教的成分，主张善恶二元论，灵魂转回以及拯救。

⑤原注：《历史》第5卷第5页。

⑥原注：同上

⑦原注：灵知学派似乎起源于基督教之前，到了中世纪前期，它将许多基督教教义融进了自己的神学，从而继续繁荣昌盛。

⑧译注：密斯拉教起源于古代波斯和印度的密斯拉神。到公元前5世纪，密斯拉成了太阳和智慧之神，对它的崇拜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宗教，这就是密斯拉教。到公元2世纪，密斯拉教在罗马帝国比基督教更为盛行。和基督教一样，密斯拉教宣扬善恶之战，通过礼仪和一套道德系统来

提供永生的希望。公元 3 世纪后期，密斯拉教迅速衰败。

⑨原注：公元451年教皇职位设立后，罗马早期主教被公认为是以前的教皇。

第二部分编年史

古代犹太史

（所有日期都是公元前，否则另外标明）

阿拉伯沙漠地带的先驱移到迦南和埃及（2000—1700）；埃及的歌珊领土繁盛时期（1700—1500）；在埃及的奴役（1500—1290），摩西领导下的出走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征服(1290—1225)；士师统治下迦南的混乱时期（1255—1025）；扫罗统治，给撒母耳任命成为以色列第一个国王（1025—1005）；大卫统治，耶路撒冷成了新的政治和宗教首都（1005—970）；所罗门的荣耀，宫殿和神殿的建立（970—930），耶罗波安统治下的内战和北方王国的退出（930—925）；两个王国同为亚述征服，犹太所得的有限独立（733）；亚述放逐"十个失散了的部落"（721）；约书亚王领导下的申命改革运动开始（621—608）；尼布甲尼撒王将犹太领导人放逐到巴比伦囚虏里（597）；耶路撒冷的毁灭，又有许多人加进了巴比伦囚虏（586）；居鲁士征服巴比伦，允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538）；第二个神殿建立（516）；亚历山大领导巴勒斯坦的希腊统治（333—198）；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和巴勒斯坦（323—198），巴勒斯坦为塞琉古王朝统治（198—167）；麦克比斯反抗（167—142）；麦克比斯王朝统治下犹太国的复活（142—63）；罗马人控制巴勒斯坦（公元前63—公元66）；犹太人反叛罗马（公元66）；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和犹太人分散（公元70）。

第三部分　中世纪的融合

第十三章　哥特人的贡献

一、哥特人入侵的影响①

我们已经见到古典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互为融合，共同创造了公元 4 世纪新的基督教文化。这种复合型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由于 5 世纪哥特人或日耳曼人的入侵而突然中断。这些移民迁徙的直接后果是：过去的各种成就广泛遭到毁灭，欧洲文明堕落到了一个粗野混乱，几乎是部落式的境遇里。希腊知识渐渐消失，甚至连有能力阅读拉丁文者都变得凤毛麟角；各种书籍遭到毁灭，遭人遗弃，或藏起来被人遗忘；学校几乎不复存在。将这一时期命名为黑暗时代真是再恰当也不过了，因为公元 5 世纪， 6 世纪以及 7 世纪标志着欧洲发展的低潮。

尽管当时形成总的文化沙漠，但是教会——这个带有牢固的过去传统而唯一幸存下来的组织一尚存一点学问。唯有教堂礼仪还和过去息息相关，使人想起过去的光辉。尽管教会人员无知度很高，但拉丁文仪式还是在进行，如果需要的话，由神父背诵一些拉丁文词句，但是他们对这些词句的意义却不甚了然。不用说迷信观念滋生繁衍，基督教的真正含义常常受到歪曲，不过教会倒是保存了一丝学问。这主要是在寺院里，一些深受推崇的异教书籍，一些基于古典源泉的基础教科书以及一大批基督教作品得以保存和复制。而且总的来说，还有足够的教育，得以产生出格列

高里大帝（540—604）和圣伊斯多尔（死于636年）这样的基督教作家。

从通常的意义上来说，半开化的哥特人对西方文化贡献甚少。他们被慢慢同化，接受教育，并被引导到在中世纪恢复起来的文化主流上。但是前哥特基督教欧洲和后哥特中世纪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些显著的区别，从而表明哥特人带来了一些态度和传统的更新。从儒略·凯撒和塔西佗这些早期日耳曼人观察者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更新很有可能来自哥特人。在《高卢战争》中，凯撒记下了他们的怪异之处。大约两百年后，或许是罗马最为杰出也最值得信赖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写下了一部书，对罗马帝国的这些潜在入侵者作了一番描述。

在所有记载下来的哥特人特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强调活动。哥特人的迁徙史表明了一种强烈的种族好动性，这似乎暗示了他们对运动的爱好。塔西佗暗示这是他们自我表现的唯一方式。在塔西佗的笔下，他们的特征是具有"一双凶猛的蓝眼睛，红头发，宽大的骨架，只适合于突然发挥"，②塔西佗得出结论："懒散对一个种族来说是极端可憎的。"③谈到他们的将军时，他又说道："如果他们精力充沛，如果他们引人注目，如果他们战斗在前方，他们领导，那是因为他们受人尊敬。"④早些时候，凯撒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的整个生活都为狩猎和研讨军事技术所占据，从小时候起，他们就置身于艰难困苦之中。"⑤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里，吉本不无嘲弄地说古代日耳曼人只有两种竞技状况，懒散和激烈运动，而运动则是厌恶长期懒散的必要解脱、这些评论或许有理有据．但是既然凯撒和塔西佗主要为日耳曼人精力充沛的追求所吸引，既然日耳曼人来世的理想是白天永远战斗，晚上永远狂饮，那么公正的说法似乎是行动是他们的明确理想，就像希伯来人的特点是神性，古典主义的特点是唯智力论一样，虽然许多文献记载了每一种文化在实现

这些理想时的失败。

在随后的中世纪里，我们可以从个人侠客和集体侠客（十字军战士）中看出这种通常采取好战的形式来表现对激烈运动的爱好所引起的直接后果。这种爱好还出现在中世纪的马上比武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和个人宿怨里。更使人感到难以捉摸的是，它还出现在中世纪史诗和“事迹之歌”里，出现在同古典的静谧精神相距甚远的不安静的诗行里和哥特式建筑的装饰上。在但丁的《地狱篇》第三章里那些既不好动又不好战的“骑墙派”被申斥为“从未活过”，作者将他们蔑视为“上帝的仇恨者，甚至上帝的敌人的仇恨者”，以后的西方文明中所出现的好动当然不能看作是哥特遗产的唯一产品，值得注意的是但丁的天堂（与以前类似的概念不同）在不断运动，哥德的《浮士德》在其哥特式研究中翻译了《约翰福音》的开头一句话：“太初有道。”随后的文学家如拉伯雷、塞万提斯和勒萨日等都是些不安定的英雄，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使得理性的力量屈从于某些更为能动的原理。近来的社会评论家沮丧地认为那没有思想伴随的好动性已成了20世纪生活中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特点。

这些原始部落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热爱独立。塔西佗对此深感好奇，特别强调了这点，即他们没有城市，“甚至也不能容忍毗邻相居⑩。”希伯来主义和古典主义珍惜独立性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是自从多年来屈服于威严的罗马帝国后，这个特性就需要入侵者的促动来产生直接效果，从而使他们拒绝在中世纪教会的权威面前卑躬屈膝，尽管这个垄断了教育宗教以及公认的传统的教会看上去享有绝对特权。尽管左道异说不断，但中世纪的欧洲人还是接受了教会教义的宗旨，不过他们对教会企图将自己托付给前罗马帝国来全权管理的野心却毫不屈从。近来，这种同样顽固的独立性在创建西方世界的民主传统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哥特人的第三个特征就是日耳曼人对妇女的尊敬，这对欧洲文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有一个名叫兰戈巴迪的部落所崇拜的不是男性神，而是大地母亲(一个在《浮士德》中复活了的概念)，另一个部落将一位女性维勒达当作神祇，正如塔西佗所归纳的，“性别有一定的神圣性，”⑦，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奇特的态度。中世纪对马利亚的崇拜和对女人的殷勤尽管有可能受到穆斯林思想的影响，但主要根基还是在日耳曼传统。当前我们对女人所作的浪漫化描述似乎也来源于此，这想法不大可能是古典主义或希伯来主义的产物。

一个不太确定的哥特式贡献似乎是他们对离奇怪诞，陌生和神秘莫测所怀有的心驰神往。教堂里的阴暗部分和奇形怪状的雕刻像，但丁在《地狱篇》里所刻画的米诺这个人物，⑧恐怖的魔鬼、巫婆以及妖怪似乎都是原始想象的产物。他们对未知的和充满敌意的世界感到恐怖，从而创造出一些奇怪的想象性怪物，以为他们是漆黑的森林、有暗藏危险的沼泽、耀眼的白雪以及北欧强劲的暴风雪的产物。在《格雷悌尔英雄传说》里，格莱姆的魔鬼横冲直撞，弄得房屋吱吱嘎嘎地响，全村人都深受其害，这显然是人们睡觉之前听津津乐道的故事中的主题。

简而言之，哥特人没有贡献出书写文学，没有艺术形式，没有文化装饰。但是他们的性格（好动）、他们的态度（独立性，尊敬妇女）以及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些神秘莫测的东西）里的某些基本特性对西方人的生活和思维产生了直接的而且是持久性的影响。

二、哥特人和其它的日耳曼部落

在凯撒和塔西佗所描述的“日耳曼”部落当中，哥特人是最凶暴也最活跃的。但是，如果人们谈起古代日耳曼人，那么他们

的脑海里就必须区分古代日耳曼人与现代德国人。历史上，“日耳曼”称谓覆盖了一大片领土，包含了许多历史骚动，同德国的直接祖先相去甚远。在很大程度上，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法国和瑞士都像德国一样声称自己是“日耳曼人”，而斯堪的那维亚和冰岛更是如此。退一步来说，在巴尔干国家，中欧、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甚至在北非都有许多日耳曼的成分。美国的大部分公民也有日耳曼背景。有时候历史学家将“野蛮人”这个称谓运用到古代日耳曼部落，但是这个称谓不尽如人意，因为它还被随便用来指代那些非日耳曼血统的部落（比方说高卢人和匈奴人），而且它还表达了一种比实际存在更为野蛮的文化状态。

已知的最早的日耳曼住处是波罗的海西岸，也即现在的东普鲁士、丹麦以及斯堪的那维亚低地，然而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间的大迁徙资料表明他们的家，很有可能是现今的东德和波兰。由于他们直到公元2世纪才出现写作艺术，因此他们的早期生活没有文字记载。第一个描述他们文明的是儒略·凯撒，从公元前58年到公元前51年他是高卢的执政官。到了凯撒时代，日耳曼人已南迁到了莱茵河，占据了现代西德、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所有土地。

尽管日耳曼人总是好战，而且一刻也不愿停息下来，但很明显他们需要罗马扩张主义的挑战来唤起他们，使他们从部落争战中苏醒过来，转而从事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和政治发展。凯撒兵团在高卢的出现引起了日耳曼人新的恐慌，当凯撒征服了凯尔特族的高卢人后，他们发觉在莱茵河沿岸有更为凶猛的对手，虽然在其它地方各个部落还在不停地向东南移动，但罗马人在科布兰兹、科涅、美因兹以及其它莱茵河城市所建的城堡多少年来成功地扼制住了日耳曼人。最后，罗马堡垒沿着莱茵河和缅因延伸了228英里，此外又建了108英里，一直延伸到多瑙河，但是日耳曼人那

充满侵略性的扩张并没有得到扼制。到公元200年，他们占据了从莱茵河口到黑海之间的所有领土，而且还以锐不可挡的趋势向罗马帝国边界逼近。

甲、哥特人

日耳曼人中最好战也最精悍的是哥特人。他们住在日耳曼部落的最东部，占据了离多瑙河盆地和黑海沿岸的土地。他们被第聂伯河划分成东哥特和西哥特，虽然他们操着共同的语言，遵循相似的风俗习惯，但他们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部落。西哥特人是所有日耳曼部落中最善流动的。公元200年左右，他们迁徙到了黑海北岸，也即现在的乌克兰。从那儿，他们被匈奴人赶向南，直到公元395年他们才占据了雅典和科林斯。公元5世纪初，他们开始向西北移动到了意大利。公元410年，他们又绕道洗劫罗马（也就是奥古斯丁创作《上帝之城》的时候），然后又向西北转移，穿过高卢，向南挺进到了西班牙。在这里，他们巩固了自己的力量，建起一个强大的王国，获得了高度的文明，最终又被同化到已在西班牙建立起来的罗马文化里。他们的统治一直到8世纪才被摩尔人所推翻，此时他们已失去了他们的语言和法规，以及其它的东方部落传统，同伊比利亚半岛中的拉丁成分混为一体。

东哥特人不善于移动，他们穿过巴尔干到了意大利，于公元493年打败了对手日耳曼王子奥都阿瑟，控制了整个半岛和西西里岛。在这里，他们一直统治到被查斯丁尼大帝的军队打败为止，于公元555年被吸收到了拜占庭帝国中。

乙、法兰克人

同哥特人不同，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中最不善迁徙的部落，其文化也最具持久性。他们紧紧守护着莱茵河西岸的家园，模仿罗马人的政府和军事组织。随着罗马占领区的力量日渐弱小，他们又占据了高卢。他们的领袖克洛维斯于公元481—511年在位，制服了北部法兰西的罗马人，然后又继续向西哥特人进攻，直到

控制住莱茵河和比利半斯山脉之间所有的领土。法兰克人中出现了几位强有力的领袖，其中最著名的有查理·玛特尔(714—741)和查理曼(768—814)。

丙。其它的日耳曼部落

日耳曼部落中还有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人。他们穿过英吉利海峡到了英格兰(449—547)。勃艮第人住在法国东部，受法兰克人统治，不过这部分领土直到公元1678年才成为法国的一个正式省份。阿勒曼尼人是中莱茵河的一个小部落，他们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主要是因为现代法国人用这个名字为德国命名。汪达尔人是一个残忍好杀的部落，最终定居在北非。

丁。高卢人

早期历史多处提到高卢人，有关他们的情况，在此提一笔。高卢人不属于日耳曼人，而属凯尔特人。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同邻族条顿人有何种族上的姻亲关系。凯尔特人的原始住处同日耳曼人一样神秘莫测，但是我们知道早在公元前4世纪，他们就在南部和西部法国居住，他们非常强大，所以成功地洗劫了一次罗马。凯尔特文明还在海峡边的西部伊比利亚半岛和英国本土上建立起来。在最后命名的地方他们被称做布立吞人。从这些早期凯尔特居民中引来了不列颠和法国的布列塔尼的名字，就像比利时(Belgiecm)的名字来自每一个高中拉丁文学生都知道的部落比尔杰(Belgae)一样，凯尔特人所做出的最使人感兴趣的贡献是《麦比诺金》，一部凯尔特神话和传说集，于公元14至15世纪在旧有的资料上用威尔士语编成。

注释：

①原注：将这些入侵称做日耳曼人入侵更为恰当，但是既然哥特人是所有部落中最活跃，最具摧毁性的部落，既然他们的名字同中世纪，比方说哥特式建筑，紧密相联，那么本文作者就沿用这个不太精确的命名，免

得造成和后期德国之间的混淆。

②原注《日耳曼志》第4页

③同上 第14页

④同上第7页

⑤《高卢战争》第六卷第21页

⑥《日耳曼志》第16页

⑦同上，第8页

⑧原注：第五章，将冥世里这个奇形怪状的法官同《奥德赛》第十一部里的原始米诺相比较。

第十四章 日耳曼宗教、神话和传说

和希腊人一样，古代日耳曼人有一套精心制作的男神和女神神谱，一套庞大的自然神话和一个瑰丽的世界成形论。和希腊人相似的还有，他们在神祇面前举止随和，尊敬他们，但不盲从他们，他们的真正价值观建筑在更为世俗的伦理观上。但是在格调和精神上，希腊奥林匹亚宗教之光普照在北欧人那阴暗寒冷的黑夜之上。希腊诸神是一群活泼可爱、充满人性的顽童，他们的滑稽行为并不干扰希腊人对生活的热爱，也不影响其愉快的风俗习惯将美德观削减成一个中庸的道德准则。而北方宗教则建筑在毫无生气的自然界上，建筑在冷酷的、无尽的和毫无希望的善恶之争上。因此日耳曼人最早皈依基督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基督教给他们带来了人类的拯救者和幸福生活的到来的信仰。公元341年，乌尔费拉斯主教作为教士来到了哥特，将一部分《圣经》译成了哥特文，甚至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官方宗教之前就已使一帮人皈依了它。后来其它一些部落通过和基督教罗马人的接触而相继皈依。这种早期对福音书的接受解释了为什么明显来源于异教的

神话里含有许多基督教的成分。

北方宗教的主要素材来源是《埃达》，其中《旧埃达》即《诗体埃达》是由一位不知名的诗人于公元1050年写就的，而《新埃达》即《散文埃达》，则是由一位名叫斯诺里·斯图尔卢森的人于公元1230年左右完成的。两部《埃达》里的素材多少有点相似，而且很明显在诉诸文学之前就已存在了几百年。

《埃达》告诉我们宇宙本是一个无底洞，叫做聂夫海姆，在它的上空有一个雾气世界在缭绕盘旋。这个世界唯一的生命符号是一孔泉水，从中流出12条冷河，冷河中的冰块渐渐塞满了下面的裂口，雾层下紧靠着的是穆斯佩尔海姆，光的世界，里面送出的煦风融化了冰块，形成了云。从这些云中诞生了霜巨怪伊米尔和他的奶牛安德胡姆拉，还有一批不知名的霜小姐。安德胡姆拉以从冰中舔吃盐为生，这种奇特的营养方式无意之中创造了第一位神。有一天，她正在舔吃一块冰，神的头发出现了，第二天，整个头都出现了，第三天又出现了身体。这位新神不失时机地和一位霜小姐交媾，结果霜小姐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奥丁（有奥丁、沃登或沃腾等各种叫法）、维利和威。这三个儿子成人后就联合起来反对伊米尔，将伊米尔钉在一颗巨大的叫做伊格德拉西尔的秦皮树上，将他杀了。他们用他的躯体创造了地球，用他的血创造了海，用他的头发创造了树，用他的骨头创造了山，用他的颅骨创造了苍天，用他的大脑创造了云，用他的眉毛创造了一堵高墙环绕着土地，这被环绕起来的土地叫米德加尔德，成了人类的住地。穆斯佩尔海姆所迸发出来的火花形成了星星和行星，随着太阳照耀在新创立的大地上，植物发芽，鲜花开放。整个结构都由秦皮树伊格德拉西尔支撑。秦皮树有三条根，一直延伸到众神之家阿斯加尔德，霜巨怪之居约顿海姆和黑暗与寒冷王国尼弗尔海姆。延伸到阿斯加尔德的那条树根由三位命运女神乌达尔、伏但第和斯古尔德监管。她们坐在命运泉边，可以各自监视过去，现

在和未来。通向约顿海姆的那条根被牢牢地系在智慧泉上，但通向尼弗尔海姆的那条根却不停地遭到蝰蛇奈德豪格（即黑暗）的啮啃。结果这棵树摇摇欲坠，随时都可能带来宇宙的倒坍。这样树的三个支撑物形象地代表了精神智慧和无知。代表风的四只公鹿不停地吃啃树上的嫩芽，有时还吃钉在树上的伊米尔的遗体，结果造成了大地震。

物质世界形成之后，众神从秦皮树上创造了第一位男人阿斯克，并给了他一位伴侣爱姆布拉，这是他从榆树上塑造的。他们还创造了一批具有超凡手艺的矮神，他们住在地球下面，还有一大批照管花木小溪的小精灵。奥丁赋予人以生命和灵魂，维利赋予人以理智和活动力，威则赋予人以五官。全副装备好后，我们的祖先就在动荡不定的世界里去开辟毫无把握的道路。

诸神本身也处在无保障之中。对日耳曼人来说，诸神并不是全能的，相反，他们代表了同约顿海姆里的邪恶霜巨怪的优势进行拼搏的各种善势力。根据那部不朽的《大毁灭》所述，霜巨怪终将获胜，而诸神则会走向毁灭。这样，恶势力就会最终战胜智慧和精神。诸神本身也意识到他们的优势是短暂的，于是坐在他们的领地爱斯佳得，板着面孔，毫无生气，等待拉格纳洛克（即末日）的到来。

奥丁在建造大殿瓦尔哈拉（即忠烈祠）的时候就已引起了霜巨怪的不满。大殿瓦尔哈拉既是诸神的保垒，又是死于战场上的武士的天堂。奥丁坐在那里，而他的渡鸦哈金和穆宁（他们每天为他传递人间信息）则栖息在他的肩上。在这里还有奥丁的瓦尔基里斯（即他的武士女儿）。她们到战场去。遴选一些烈士回来和诸神住在一起。这些烈士们晚上大吃大喝，白天则撕杀战场，相互杀得粉身碎骨，而到晚上则又奇迹般地复活了。他们显然对这种单调而又使人精疲力尽的天赐永不疲倦。这个命运未定的天堂是由霜巨怪们建造的，奥丁给他们的报答是送他们一位爱情和

美丽的女神弗蕾尔。工程完成后，奥丁拒绝兑现诺言。在随后的争执中，雷神托尔用锤子杀死了一位霜巨怪。从此霜巨怪们成了诸神势不两立的敌人。诸神虽然创造了光和智慧，但是他们的贪婪却导致了自身的覆灭。在诸神自生自灭这令人沮丧的宇宙观下，基督教必然成了北欧人的一盏明灯，他们迫不及待地接受它的教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北方的男神，女神以及其他的一些超人和希腊人一样，等级森严，为此我们稍加叙述一下住在阿斯加尔德的几位主神也就够了。如前所述，最重要的神是奥丁，一位毫无生气而又备受折磨的神，不过他倒是一心一意想给人类带来幸福的神。他曾献出一只眼睛来换取智慧泉水，为了了解鲁恩的秘密（即日耳曼字母的秘密），而被一根矛钉在随风摇动的树上吊了九夜，并从霜巨怪那儿偷来了诗人酒，无论是谁，只要喝一口这种酒就可以成为诗人。同宙斯不同，他不想集这些权力于一身，而是随便地将它们赐给人类。然而，尽管他心地善良，但他也能降尊干些贪婪和不道德的事情，爱天地间的美女和他的希腊前驱不分轩轾。

奥丁的妻子名叫弗丽嘉（或弗丽卡）。和希腊的赫拉一样，她生性刻板、凶悍，其神职就是尽其所能保护婚姻和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弗丽嘉的妹妹名叫弗蕾尔，是爱情和美丽女神。除了激起情人之爱外，她还栽培了神所吃的永葆青春的金苹果，尽管有些传说将这后一项功能赋予了一位名叫伊多娜的小女神。奥丁的孩子中最重要的是托尔。托尔是雷神，而且还是爱斯佳得众神中最强健的一位，他有一把随意用来打击敌人的锤子、一条可以强壮肌肉力量的力量带和一双铁手套，使他锤无虚发。对诸神来说，他是“头面人物”，和希腊的赫耳墨斯一样，他被委托以最困难的外交关系一职。他的弟弟弗雷是生殖神，主管阳光和雨，而他的三弟提尔则是战争之神。

诸神中最受爱戴的是善神巴尔都尔，他是阿波罗和阿喀琉斯

的日耳曼结合。巴尔德尔被认为刀枪不入，诸神常常将各种致命的投掷物掷到他身上，看它们在他身上弹回来，借以取乐。只有阿斯加尔德诸神公认的挑拨离间和捣蛋者火神洛基知道敬爱的巴尔德尔的致命物是看上去毫无伤害作用的槲寄生。有一天，他引诱一位神用槲寄生的细枝掷向巴尔德尔，立刻刺进了巴尔德尔的心脏，尽管诸神多方抢救，但他还是去了地府。

在日常生活中，使我们最为频繁地感受到日耳曼神话的是一星期各天的命名。除了星期六（Saturday）来源于罗马的萨图恩神（Saturn），其它各天的名字都来源于北方诸神：太阳(Sun)，月亮（moon），泰尔（Tyr），奥丁（Odin 或 Woden），索尔（Thor）和弗蕾尔（Freyr）。[①]在文学方面，来源于日耳曼神话和传说的作品有前面提到的《旧埃达》和《新埃达》以及许多关于强人格雷梯尔、贾尔、西古德和贝奥武甫等人物的英雄故事，还有伟大的13世纪史诗《尼伯龙根之歌》。

查理曼的传说

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从公元768年到公元814年统治着现代法国的疆土，有关他的一大堆传说表现了错综复杂的文学问题，这里只能极为肤浅地一笔带过。如同所有来源于史实人物的传说素材一样，查理曼故事也有一个基本点，而诗人和说故事的人，其中大多数都是些无名氏，则将这一基本点用作他们奇思异想的出发点。就好像亚瑟王传说一样——查理曼故事和它大同小异，同样的事情常常有许多版本，而所有这些版本同史实出入很大。有时说书人似乎常常将查理曼的统治与他的祖父查理·玛特尔混为一谈。从公元714年到公元741年，查理·玛特尔作为宰相成了法国的实际——如果不是名义——国王，而经说书的人一搅合，这些简单的史实便变得错综复杂。

查理曼的大部分传说都靠这位高尚的武士对基督教的支持以及对比利牛斯山脉撒拉逊人强大的进攻所作的抗衡。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后，穆斯林从阿拉伯迅速向小亚细亚、埃及和北非迁移。公元711年他们进入了西班牙。在这儿，他们开始穿过比利牛斯山脉向法兰克人发起了杀气腾腾的进攻。在随后的100年左右时间里，他们对法兰克的安全构成了主要危险。公元725年撒拉逊将领安贝沙占领了加尔加松城，公元732年他们又占领了波尔多，而且迅速向法国南部展开，给法国南部带来了严重威胁。形势迫使法兰克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扼制他们的进攻。那一年的十月，查理·玛特尔在阿基丹纳王欢得的军事支援下，在图尔斯打败了撒拉逊人，阻止了他们的进攻。公元759年，在纳尔本战争中，查理的儿子佩潘彻底摧毁了伊斯兰人在法国的势力。这样当佩潘的儿子查理曼于公元768年登上王位时，比利牛斯山脉北部已没有穆斯林的势力。虽然他有时在西班牙同他们开过战，但在法国本土他从未同撒拉逊人打过仗。公元778年，由传说中的伟大人物罗兰指挥的查理曼殿军在著名的隆什瓦勒战役中被杀得一个不剩，而这次战争的矛头，正如《罗兰之歌》所述，并不是对付穆罕默德的军队，而是对付一小股加斯康尼的山地人。顺便提一句，这首诗说查理曼在这场战斗中已届200岁高龄，而实际上他只有35岁。

因此加洛林王朝大部分传说的起源并不是未加掩饰的历史。相反这是一部拉丁编年史《查理大帝的生活和事迹》，从而被认为是查理曼的同代人图尔班主教所作。根据传说，图尔班英勇地战死在隆什瓦勒战役中，但实际上他于公元800年自然死亡。这部作品其实和历史没有多大关系，和主教本人则毫无关系，而和11世纪就已开始大量出现的有关查理曼的民间和文学史诗却有很大关系。根据《查理曼大帝的生活和事迹》记载，查理曼是个白胡子大主教，具有非凡才能，中世纪骑士由最好的传统所孕育出来的高贵骑士为他效劳。他的随从中最杰出的是12位贵族（即武

士）。作为国王的高贵同伴和勇敢的正义捍卫者。他们极像亚瑟王的圆桌骑士。最著名的武士是查理曼的侄儿罗兰（即意大利人所称的奥兰多），他是法国中世纪史诗《罗兰之歌》的中心人物。其它有名的武士有罗兰的堂弟雷纳尔多、弗洛里斯玛尔、罗兰的亲密朋友，丹麦人奥杰尔、诡计多端的加尼龙，聪明的奥立维尔和英勇的图尔班主教。

文艺复兴后期的诗人喜欢利用这些遥远而又模糊的英雄的想象中的事迹。卢纪·浦尔契(1432—1484)在其《巨人莫尔甘特》中编造了一系列既庄严又诙谐的冒险故事。博亚尔多(1434—1494)运用同样的素材创作了虽未完成但却精心制作的浪漫史诗《热恋中的奥兰多》，而由弗兰西斯科·贝尔尼（1490—1536）进行的改编本甚为流行。而阿里奥斯托（1474—1533）的《疯狂的奥兰多》则完成了博亚尔多的作品，成为所有版本中最扣人心弦的作品。

第十五章　中世纪的高峰

一、文化融合的完成

欧洲历史上称为中世纪的时代成了古代文明的终结和现代世界的兴起的幕间曲。所以在人们的笔下，它常常被限止在5世纪罗马的衰亡和15世纪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之间。中世纪早期的几百年风雨飘摇，这主要是因为哥特人入侵的缘故。到了结尾的14和15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还一直处在中世纪时代，不过意大利已经明显出现了新的文艺复兴迹象。特别是当我们从文学角度来观看历史（文学上通常将14世纪的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划归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作者）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将文艺复兴的起始期界定为14

世纪，而将以前300年的文艺复苏和文化稳定看作是中世纪思想状态的顶峰倒是非常有益的。

从这个观点来看，中世纪的顶峰标志着文明已从前500年的混乱和无知，特别是从10世纪的海盗、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和穆斯林人一系列灾难性的袭击中复苏过来。它还意味着古典、希伯来和哥特三种文化遗产的融合。这三种文化通力合作，共同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很明显这种文化既不是颓废的罗马文化，也不是早期基督教，更不是原始的哥特文化。哥特人入侵后不久的几百年里，那些半野蛮人逐渐使自己适应基督教传统，但是除了基督教里已有的古典思想成分外，古典学问世界已经渐渐地被人遗弃，只有在希腊和罗马思想成就的入门教材以及不加评论的纲要里还零星地散布些古典学问。

9世纪前期，查理曼力图复活世俗学问，从而带来了古典文艺复兴的开始。在11世纪，穆斯林人在西班牙开始重新介绍希腊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哥特人开始充分施展其才能，进行智力扩张，这个方向对他们来说极为新颖，对他们的祖先来说更为陌生。结果，无论是世俗还是宗教方面的生活都变得更加统一，更富有理智，也更通人情。尽管这时代还充满着混乱、冲突以及很大的缺陷，但它还是取得了相对的稳定。一个仍由基督教控制的文明出现了。但是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三个相互平等的特征——力量、智慧和仁爱—有趣地象征了人们对这三种融合起来的文化情调所采取的近乎平等的尊重。力量（能量，行动）是哥特人的贡献。智慧是古典世界的主要理想。仁爱则是希伯来感情主义的标志，基督和仁慈的父亲被认为是神的形象，而这种形象来源于预言家，后来又传播到基督教传统里。人类至少从自身最高的愿望中去孕育神，从而创造出自己形象中的神。这样，中世纪文化传统的三位一体产生了一个包含三者的上帝观。

二、中世纪后期的发端

第一次明确面向秩序和高层次教育的新运动开始于加洛林文艺复兴。在他的祖先加洛林王朝的君主政体基础上，查理大帝于公元771年就任法兰克王国的国王。一次次成功的战争扩大了法兰克王国的版图和势力，查理毫无疑问成了欧洲的强人。公元800年教皇利奥三世封他为西方之帝，从而产生了新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一举动本身就表明了要回归到从前稳固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强烈愿望。查理死于公元814年，尽管这个新的加洛林帝国的寿命没有它的缔造者的寿命长，但很明显它已使高层次的民政管理，社会组织和可付诸实施的法典成为可能。由于查理恢复了宫廷学校，请进了欧洲最优秀的学者，所以这个王国促进了人们对学问的追求。他还指挥建立了一些同教堂和寺院有关的其它学校，从而促进了唯智论的复苏和罗马经典的保存与复制。在查理曼政治结构日趋衰弱的情况下，这种对学问所重新产生的兴趣却在继续增长，虽然它的势头已大为削弱。这个相当小的“文艺复兴”最使人感兴趣的部分是一个法兰克或日耳曼政体，它吸收了罗马经典的精华和基督教化了的希伯来文化，后来哥德在浮士德拯救特洛伊的海伦一节里对这一方面作了一番描述。

第二个更为伟大的启蒙促进因素来自穆斯林人对希腊学问的重新介绍，这群穆斯林人保存了许多希腊作品（在东拜占庭保存了下来），并将它们译成了阿拉伯文。当穆斯林人于8世纪横扫西班牙，在科尔多瓦建立了一个新的学术中心的时候，犹太学者已经渗透到了基督教欧洲和穆斯林西班牙之间的屏障里，将希腊探索精神和科学精神重新介绍给了西方。时隔不久基督教探险者就接踵来到了这个新的学术世界。到了11世纪，希腊和穆斯林作品开始在基督徒中流传。到了12世纪，一个培养翻译家的基督教

学校在托莱多建立，这个城市是基督徒1085年占领的。希腊—阿拉伯数学，科学和哲学构成了传播很广的新知识核心。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两位著名评论家阿维申那(960—1037)和艾夫罗斯(1126—1198)被推崇为权威，其地位仅次于《圣经》。由于穆斯林思想家的大力推进，以学院派闻名的中世纪唯智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巴黎和爱尔特尔这样的大教堂学校也就成了第一批优秀的现代文学。

然而，必须牢记的是这些新的学习热并不是强加给中世纪欧洲的居民的。相反，它需要深思熟虑去超越地理、国家、宗教和语言障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世纪的复兴主要是人类要前进的本能的结果，外国学者所带来的启蒙思想是一部分刺激，但也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不过不管因果如何，人们渐渐地重又和古典学问建立起了联系。公元1453年当君士但丁堡落到土耳其人手里的时候，那些逃到欧洲避难的希腊学者发现他们的智力货色很受欢迎。

三、中世纪后期的特点

这次文明高潮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渴望秩序。经过多少年的混乱不堪，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是很难得到建立的，而事实上也没有建立起来。但是中世纪人的思维里也充满了清晰的图解式安排，他们想把这种安排强加于社会结果成功有限。有两种组织模式很容易借鉴，这就是教会组织和罗马帝国的民政模式。圣·奥古斯丁在其《上帝之城》一书里区别了人城（起源于希腊文明，到罗马帝国达到了顶峰）和上帝城（起源于希伯来文明，在基督教里达到顶峰）。奥古斯丁认为新的基督教城应该取代旧城，中世纪的教会很自然地想强加这种观点。为了支持这种暂时的垄断地位．教会还保留了一份“君士但丁遗赠”文本。据说在这个文

本里，君士坦丁授予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以统治罗马帝国西部的绝对权力。但是追溯到日耳曼部落组织，从潜在意义上来说，和加洛林帝国一样强大的民政组织虽然占有教会，但却很少意识到这种世俗野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在学问和诫律世界中，教会毫无疑问地享有无上权威。但是在政府和社会里，圣·奥古斯丁所描述的两种城并行不悖，作为中世纪生活双重性的纪念物，教堂和城堡这两种杰出的中世纪建筑巍然矗立。

在人们的生活中，希求秩序消除混乱的欲望导致了封建制度的产生。无论是追溯到罗马人对贵族和侍从的社会安排还是相同的日耳曼头领和部下的部落组织，封建制度都来自弱者依附于强者这一自然的欲望，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作为回报，强者可以支配那些寻求保护者。从这简单的情形中渐渐分衍出两类截然不同的社会阶层，贵族与平民。贵族拥有所有的财产，是职业战士和统治者，他们充分享受安逸，创造出了一个阶层和礼仪分明的宫廷社会。贫民、农奴和奴隶不断服役以养活自己及其主子。他的主要责任就是服从命令，向主子表示敬意。两个阶层分道扬镳，越走越远，他们之间的通婚情况尚不清楚，贵族中有一种感觉，就是贫民实际上是另一种人，天生愚笨，粗鲁屈从，甚至他们的血也同流经贵族心中的血不一样。

与此同时，渐渐成长起来的罗马主教会（公元1054年和东部组织分裂，从此名为希腊正教）吸引了封建贵族和普通探险者的注意。他们在圣职中看到许多容易而又有利的生计。上至买卖圣职下至兜售赦罪符和出售圣物，教会里这些各种各样的贪污受贿在但丁的《神曲》里受到了严厉痛斥，在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受到了无情的嘲弄。

不过，无论是希求一个政治至上的教会统治（12世纪意大利反对德皇的教会教徒的地位）还是一个复苏了的神圣罗马帝国垄断（支持德皇的贵族政治党员的理论）或者像但丁所说由复苏了

的神圣罗马帝国和纯洁的教会各自统治，在这些宗教和世俗生活的纷纷扰扰之中，人们对秩序的追求还是一目了然的。既然这些目标都未实现，而事实上也难以实现，于是中世纪的理想主义者就从理论角度来组织事实上难以组织的事情。正如前面所述，这些模式就是基督教会和罗马帝国的组织。既然这二者都是权威性组织，上有绝对权威，下有各种人物，那么秩序和等级制实际上也就成了一回事。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还提出了一位至高无上的上帝，从他那儿创造出天地万物，希伯来主义则相信全能的上帝，而天使则是中间力量——简而言之，所有的权威都认为宇宙不可更改的法则出自一个至高无上的首脑，在这中间还有一系列相互联结的等级制度。

为了模仿秩序的这种绝对原型，教会精心炮制了各种不同层次的牧师，从至高无上的教皇依次向下。神学家将天使由上到下分为九个层次，顶上是六翼天使和司知识天使，下边是大天使和小天使。天文学家模仿天使等级，将上天视作九个同心圆。封建贵族有自己苦心经营的观念，他们根据高贵的程度来分享相对的权力。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中世纪的社会与中世纪的理想安排得至细至美。宏观世界（宇宙）和微观世界（人类社会）在理论上各行其事，等级森严；在上天从水晶天到地球，在教会从教皇到世俗崇拜者，在国家从国王到贫民。《神曲》里精心制作的建筑结构是中世纪爱好秩序的有力证明——而《地狱篇》里的混乱场面则反映了实际存在的混乱。历史上人类理想这么高而人类行为又这么低级的现象虽然少见，但绝非新颖。

这个新的，更加文明的时代精神，伴随着理念化的倾向，对基督教宗教概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尽管丑恶可耻的贪污受贿在基督教外表后面横行漫延，但仍有许多正直虔诚的平凡人和不平凡人。这样一来，基督教也就变得更加仁慈，更加脱俗，更加理智化。

基督教教义的人性化渐渐抛弃了上帝作为可怕的启示录审判者的观念，允许仁慈的上帝和受苦受难的救世主从黑暗时代所掩盖的阴影里重新出现。尽管如此，无罚之日的提醒物还是不易抹杀，从而需要引进一个新的观念来改变宗教教义的重点。这个新观念就是崇拜圣母马利亚，或者说对圣母马利亚的过分崇拜。理智化了的三位一体太抽象，难以激起人们的热情，那永久审判者耶稣的形象也很难使人忘却，但是耶稣的母亲经历了产子阵痛，看到圣子被吊在十字架上，这个形象更为深动感人。人们知道马利亚善解人心，所以祈祷她，请她代为圣子说情。对日耳曼人崇拜妇女的回忆，穆斯林的影响以及新柏拉图理论（即热爱尘世之美是在爱梯上迈开的第一步，由此人们可以上升到领略天国之美的境界），这些无疑地激励了人们对马利亚的崇拜。无论这种复合来源的因素是什么，对圣母马利亚的过分崇拜导致了马利亚的姐妹，所有妇女的地位的提高。人们对妇女大献殷勤，其顶点是但丁对比阿特丽斯的敬慕，在后者的引导下，他最终见到了天后马利亚显圣，进而见到了上帝显圣，“爱移动着太阳和其它星球。”

亨利·亚当斯在他对这段中世纪生活的杰出研究中（《圣·米歇尔山与特许状》）将中世纪这段重新焕发起来的灵性完全归于对马利亚的虔诚。确实，对马利亚的过分崇拜同它有很大关系，但是还必须考虑到人类对崇拜物的原始需求。在一个更为文明的时代，如果基督教要想生存下来，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将基督教信仰人性化。无论如何，这种重新唤发起来的宗教献身精神的结果是很明显的。那些从土耳其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地的十字军东征（1095—1270）为封建贵族提供了一次发泄精力的机会，但是他们也强烈地显示出新的宗教行动刺激。他们建造了大教堂，结构庞大而又错综复杂，即使是现代最好的机械技术也难以与之匹敌，而当时只是由一大批热心者手工完成的，鲁昂大主教将它描述为仅仅留作祈祷上帝之用。

这种新精神还体现在寺院制度和托钵僧会的成长和发展上。前者由僧侣组成，他们加入了新成立的克洛尼会，西斯特会或卡尔特教会，与世隔绝，过着禁欲生活。后者则由修道士组成。为了模仿原始门徒的简单生活方式，他们一心致力于简朴的田园生活和教义，沿途乞讨，生活非常贫困。这些托钵僧会中较为著名的有奥古斯丁会，加尔默罗会、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后二者特别突出，随着他们的版图、财产和势力的不断扩大，他们也很容易堕落，这种现象在教会组织里无所不在。然而这些托钵僧会的起源却是超越世俗的，而且不管如何堕落，他们总是不断地产生出优秀的学者和宗教领袖。

在这些领袖当中，伟大的弗兰西斯肯·波拿文图拉让人们注意到了中世纪灵性的另一方面：即一大批被称作神秘主义者的男男女女的出现。这些神秘主义者中最为著名的有圣·贝纳德（1090—1153），休（1096—1141）和圣维克多的理查德（死于1173年），宾根的希尔德加（1098—1179），还有波拿文图拉（1221—1274）。在启示录和新柏拉图思想模式的启迪下，这些神秘主义者经历了一阵阵从尘世到天国的梦幻与迷狂，他们希望和神灵打成一片。

尽管大多数著名的神秘主义者都是些智力超群的男男女女，但是中世纪智力复苏的主要形式还是经院哲学，这种哲学有理有据地阐述了基督教神学的杰出要点。经院哲学的起源和方法归之于阿伯拉尔（1079—1142），在其名著sic et Non（《是与否》）里，阿伯拉尔提了158个可供讨论的神学问题。同早期神学的教条主义观点不同，阿伯拉尔将从前的权威对每一个问题所发表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罗列了出来，然后由读者去作最后的判断。这种明晰地认为人们可以对神学教义展开公开争论的观点具有高度的革命精神，但是那种认为理性是一切观点的终审的言外之意激励了其他思想家的思想，使他们认真地检验与衡量基督教权威

在此之前所得出的结论。

经院哲学的第二个发展形式是彼德·伦巴德(约1100—1164)的格言。伦巴德试图运用自己的推理来调和各种互为冲突的观点，除了一些突出的神学问题外，这些“格言”还向好问者指出了一些基督教教义的基本结论。作者的言外之意是基督教神学的每一点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并非左道邪说的结论，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所以经院哲学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将过去备受尊崇的主要格言调和起来。随着穆斯林人对希腊思想的引进，人们对希腊思想重又发生了兴趣，并且提出了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这就是力图调和希腊和基督教哲学。

许多思想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由此出现了两大基督教哲学流派。第一个流派为唯实论（取自柏拉图现实唯有存在于思维之中的理论），它承认波拿文图拉的智力领导。波拿文图拉沿袭了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一个皈依了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者）的传统，创造出一个错综复杂的神秘哲学，这种哲学特别受到方济各会的推崇。而多明我会则推崇自己的两位博学者大阿尔伯特（1206—1280）和托马斯·阿奎那(约1224—1274)的唯名论，这两个人本质上都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经院哲学最伟大的成就是托马斯·阿奎那的巨著《神学大全》。在这种巨著里，托马斯·阿奎那不厌其烦地探讨了最为精细的宗教问题，详详细细地列出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最后提出了合情合理的结论。阿奎那引导出两种真理：一种真理人可以运用上帝所赋予的理智获得；另一种真理则只有通过启示方可知晓，从而解决了信仰和理性（希伯来主义和古典主义）之间不断抗衡的基本困境。

柏拉图的唯实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唯名论在中世纪并驾齐驱，而像但丁那样的学者型诗人也会对它们加以赞赏，甚至从中寻出意义，这样一种事实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同中世纪需求独裁主义管辖的思想信仰前后矛盾。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在于《圣经》和亚

里士多德。两者都同意绝对真理确实只有一个，但是接近真理的方法却至少有两种，就像托马斯区别理性和信仰一样。在《伦理学》一书里，亚里士多德同意将理性之道与积极生活等同起来，信仰则同他对静思生活所下的定义相吻合。《旧约》里的利亚和拉结，《新约》里的玛大和马利亚是上帝赞同世俗和精神生活的权威性象征。②

中世纪等级制度一表

天国的	神灵的	基督教的	封建的
天府	天帝	教皇	国王
水晶天	司知识天使	最高级主教	公爵
恒星天	六翼天使	大主教	男爵
土星天	三级天使	主教	骑士
木星天	君王天使	教士	青年骑士
火星天	美德天使	副主祭	骑士的扈从
太阳天	权势天使	副补祭	
金星天	七级天使	侍僧	
水星天	大天使	驱邪者	
月球天	小天使	读经文者	
		守门人	

还必须看到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基本教义上实际上相去不远，而早期基督教是在希腊和希伯来思想的融合上建立起来的，从而促进了二者的调和。从经院哲学对西方文化所产生的总的影响来看，它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鼓励智力活动与推测，尽管范围有限。我们现在仍在有限的领域来推测我们的文化遗产，中世纪思想的主要局限是未能取得和任何基督教教义相反的结论。

寓　　意

中世纪文学体裁中，最使现代人感到陌生的是他们的寓意技

巧。寓意在一件艺术品里意为艺术家特意塞进一个附属的，或隐含的意义，这种意义通常由象征来传递，而这些象征可能很明显，也可能很隐晦。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隐含的意义比易于理解的表层含义更为重要，因为它通常表达了艺术家的目的，宗旨或者思想。

寓意的来源在希伯来和古典文化中都很明显。在希伯来主义里，寓言就是一篇隐含意义的小故事。在拿单的寓言里，富人指大卫，穷人指拔示巴的丈夫，而羊则指拔士巴。在早期的希腊说书中，伊索寓言建筑在同样的标准上，只是动物常常被用来象征人的性格特征。希腊戏剧也使用寓意式人物，如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里的势力和威力。由于任何文学作品都暗含了一个超出舞台背景所局限的范围，所以说所有的文学从本质上来看都是寓意的。

然而，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正式寓意似乎起源于原始宗教神话和礼仪再也不为人所接受的智力发展期，风俗习惯表明他们那令人尊敬的神圣性已使他们坚不可摧。如果要想保存它们，人们就必须将它们解释为永久真理的象征。在希腊，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特别是在后期的斯多葛学派中，人们普遍认为奥林匹亚诸神那看上去不负责任的行为含有深深的寓意。同样，像菲罗·犹地阿斯的那样一些受过教育的犹太人运用寓意术语来解释《旧约》中所记载的原始事件。备受折磨的犹太人和早期基督徒相互之间急不可耐地想秘密交流，从而引起了寓意的广泛运用，这种运用不仅出现在《启示录》里，甚至还出现在普通的日常会话中。比如，在早期基督教里，“鱼”这个词代表基督，因为希腊文里的Ichthus，意为“鱼”正巧代表“基督耶稣，上帝之子，救世主。”生活在水中的鱼同洗礼的联系以及耶稣奇迹般地哺育着众生的故事增加了这个词的联想价值。

在早期基督教时代，寓意法备受人们的欢迎，神学家们逐字

逐句地去研究经文，调和《旧约》和《新约》里的教义，并从中发现了不少新的隐含意义。比如，《彼得前书》的作者发现诺亚一家遇大水获得了拯救，而这正好成了基督教家庭经过洗礼获得拯救的前兆（《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十至第二十一节），圣·奥古斯丁认为“隐含意义是最甜美的”，从而将他的建议精心制作成如下的寓意详论，这儿只复录一部分：

诺亚和他的一家为方舟所救，正如耶稣一家为洗礼所救，正如代表十字架的痛苦。这艘由桁条做成的船成了一个方形，正如圣徒建造好了教堂，一切业已就绪：因为方形的四条边坚强牢固。那长度是宽度的六倍，高的十倍，就像一个人体，表明耶稣以人体的形式出现。……这条船有三百腕尺长，是五十的六倍，正如这个世界的历史有六个时期……这条船有三十腕尺高，是长度的十分之一；因为基督是一个高度，他在他三十岁的时候批准了福音书的教义，声称他来的目的不是摧毁法律，而是实现法律。现在摩西十诫已被视作法律的核心，所以方舟的长度是三十的十倍。诺亚本人也是亚当的第十个……

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都在方舟里，就像善与恶一起参加教堂的圣餐……诺亚数了数他家，是第八个，因为我们复活的希望出现在耶稣身上，他在第八天死而复活，也就是说第七天后的一天或安息日。……诺亚进入方舟后，大水来了七天，就像我们被洗礼以求未来的安息，而这日又是定在第七天。……雨下了四十天四十夜，就像是神圣的洗礼洗涤了世界各地违反摩西十诫的一切罪孽。……②

正如《旧约》和《新约》由寓意技巧融为一体一样，深受敬重的古典作品也应接受基督教的阐释。维吉尔深受推崇，几乎成了圣徒，因为他的《第四首牧歌》似乎预见到了耶稣的到来。他的《埃涅阿斯记》从字面上看完全是一部异教作品，但是如果我们用寓意来分析，那么我们就会清楚看到特洛伊的摧毁也就意

味着耶路撒冷的摧毁，虔诚的埃涅阿斯就是使徒保罗，从特洛伊向罗马的迁徙预示着圣城耶路撒冷变成教皇的宝座。

作家们深受鼓舞，在寓言——启示录评论的基础上精雕细琢，写出了他们自己的寓言。波伊提乌的巨著《哲学的慰藉》就是一部扩展开了的寓言：甚至连玛蒂努斯·卡佩勒的一本有关七艺的杰出教科书《墨丘利与论学术的联系》也是以这一寓言形式编纂而成的。到了中世纪，寓言非常普遍，几乎成了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基督教布道主要是用寓言方式叙述一篇特定的经文。此外，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知道万物紧密相联。一切事物都来自上帝的头脑，因而必然要反映神圣观念的整体性。因此宏观世界（“大世界”——宇宙）和微观世界（“小世界”——人）一定有共同之处。一个人的性格据说由主管他出生的星星决定。（耶稣诞生的时候，占星学需要的难道是更好的权威，而不是伯利恒亚上空的星星？）这些星星为天使般的神明所驱使。天使是神道的产物。所以一切精灵，一切事物和一切的人都反映了这一永久计划，而且，所有这些据说只是单一神模式的各种不同的细节而已。

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都必然是时代的反映，但是很少有哪一部作品像法国的《玫瑰传奇》和意大利的《神曲》那样这么明显地运用寓言形式去反映一个特定的思维习惯。

注释：

①原注：利亚为雅各生了许多孩子；不育的拉结更为人们所喜爱，她最后生出了幻想家约瑟夫。玛大忙于家务，侍奉耶稣，而马利亚则坐在耶稣的脚边。如此一来，利亚和玛大被认为是积极生活的象征，拉结和马利亚为静思生活的象征，二者一道戏剧性地表现了两条伟大的基督教诫律：热爱邻居和热爱上帝。

②原注：《反对摩尼教徒浮士德》第十二卷

第三部分编年史

中世纪早期

一、4世纪

君士坦丁大帝主持了第一届全基督教世界会议尼西亚会议，使官方基督教教义正式化（325）；法国遭到法兰克人的入侵（326）；圣·奥古斯丁诞生，是早期最有影响的教会作家，其《上帝之城》提倡基督教，反对古典理想（354）。

二、5世纪

野蛮人入侵欧洲的高峰，罗马被西哥特人占领（410）；匈奴阿提拉被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击退（451）；罗马遭到汪达尔的洗劫（455）；法兰克人在克洛维斯的领导下强盛起来(481)；东哥特泰奥多立克成了意大利国王（493）。

三、6至7世纪

罗马皇帝查士丁尼赶走哥特人（555）；意大利北部为伦巴族人所占（565）；穆罕默德诞生（570）；拜占庭舰队为穆斯林人打败（655）；法兰克在荷里斯达尔的佩潘领导下统一起来（687）。

四、8世纪

（到700年，“罗马”意为罗马周围领土：在高卢、法兰克人讲高卢——拉丁语或法语，在意大利伦巴族人和哥特人将拉丁语变成各种各样的意大利方言，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拉丁语正在变成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穆斯林人从非洲进攻西班牙（711）；穆斯林人在法国被查理·玛特尔打败（732）；查理曼成了法兰克（法兰克——日耳曼）国王（771）；在隆什瓦勒对查理曼后

卫的进攻，在《罗兰之歌》中有记载（778）。

五、9至10世纪

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查理曼成为西方之帝，现在被重新命名为“神圣罗马帝国”（800）；虔诚的刘易斯接替查理曼（814）；虔诚的刘易斯去世，加洛林帝国衰落（843）；德王奥托一世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之帝。

中世纪后期

一、11世纪

阿维申那去世（1037）；教会分裂成东方（希腊正教）和西方(罗马天主教)（1054）；诺曼底的威廉征服英国（1066）；教皇格利高里七世对教会施行改革（1073）；卡尔特教会建立（1084）；基督徒从穆斯林手中夺得托莱多（1085）；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5）；西斯特会建立(1098)；布庸的盖德弗雷夺取耶路撒冷（1099）。

二、12世纪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夺取了里斯本，建立了基督教葡萄牙王国（1174）；耶路撒冷重被埃及苏丹撒拉丁夺取（1184）；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为香客免税进入耶路撒冷赢得了权利（1192）；艾夫罗斯去世（1198）。

三、13世纪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进攻东帝国（1202），夺取了君士坦丁堡，将东西方教会重新联合在西方统治之下（1204）；孩子十字军东征失败（1212）；教会认可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1216）；征服埃及的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失败（1221）；在第六次十字军东征中，西西里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夺取部分耶路撒冷王国（1228）后又被埃及的苏丹夺回（1244）；第七次征服耶路撒冷的十字军

东征失败（1250）；希腊人重新夺取君士坦丁堡（1261）；马可·波罗之行开始（1271）；教会承认加尔默罗会（1274）；教皇卜尼法八世举行教皇五十周年庆祝活动，吸引了一大批到罗马进香的香客（1300）。

第四部分　现代精神

第十六章　文 艺 复 兴

一、世俗主义的复活

被称作文艺复兴的文化运动起源于14世纪的意大利，到了15世纪中叶得到了蓬勃发展，后来又渐渐地传播到了其它欧洲国家，16世纪达到了顶峰。尽管被称作“复兴”，实际上它只是对中世纪的复活动力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实际复活的唯一生活面是古典主义对世俗而不是宗教活动的强调。尽管这种基本态度的变化因素很多，但却不难发现。凑巧的是教会权威的削弱和同异教世界的重新接触以及为世俗娱乐提供更多的机会互为吻合。

教会威望衰败的直接原因是世俗成分的不断增加和强大的中世纪机构的堕落。正如但丁在《神曲》里所讥讽地指出的，和他同时的三个教皇在地狱里找到了席位，而上帝在尘世间的奴仆已经变成政治权力，财富和奢侈享受的追随者。甚至连那些建立在向基督教组织灌输新的灵性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都被卷进了贪婪的洪流，无法抵抗中世纪教会力量所轻易提供的诱惑。但丁思维清晰，有能力辨别作为一套教义的基督领袖。但是大多数人缺乏这种修养，他们认为基督教自身主要是一种强大的尘世机构。如果说对教会活动的政治性还有什么怀疑的话，那么这种怀疑也为腓力四世所消除。公元1305年法国的美男子腓力让克莱芒当上了教皇，将教皇驻地迁至阿维尼翁，从此教皇的住地就一直在那

儿，一直到公元1377年。公元1378年，基督教世界产生了两个教皇，罗马的乌尔班六世和阿维尼翁的克莱芒七世，两人都声称自己是上帝在尘世间的唯一代表，但是这一举动毫无启发作用。

严肃的宗教思想家继续墨守基督教信仰。他们要么像伊拉斯谟那样从内部改革教会，要不就同现行的教会组织彻底决裂，重新回到使徒时代的简单信仰上，这个运动促进了20世纪的华尔都异教。[①] 14世纪，各种各样的秘密抵抗运动开始反叛教皇的权威，结果出现了宗教改革运动，其中代表人物有约翰·威克利夫（约1320——1384），他谴责教皇的权威，并开始将《圣经》译成英语。约翰·胡斯由于布道威克利夫的教义而于公元1412年被开除出教籍。公元1420年教皇马丁五世发动了一场讨伐威克利夫信徒和胡斯信徒的宗教战争。公元1517年马丁·路德将他的论文公布在维滕堡作为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正式宣言：希伯来主义神奇般地复活了，它那强大的宗教潮流与更加强大的非神秘性的古典主义复活并行不悖，而古典主义又和文艺复兴紧密相联。

但是，尽管严肃的基督徒——主要是在北方——继续他们那诚挚的精神拼搏，但是大多数的欧洲人却明显地陷入到各种各样的犬儒主义之中，他们通常只是口头上唱唱基督教，敷衍塞责似地参加一下宗教礼仪，而在日常生活中却很少看到他们的宗教痕迹。薄伽丘《十日谈》里的说故事者不再参加星期五纪念十字架受难的娱乐活动，但是有一位时髦的说故事者随口说道，“如果天堂允许恋人们像在尘世一样尽情享受，那么天堂依旧是天堂。”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比但丁晚了一代，两人都受到了良心折磨，但是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文学不朽，而不是别的事物。拉伯雷建议人们尽情享受今生；蒙田则对是否能获得最后真理持怀疑态度。

尘世享受甚至成了教士们的生活模式。教皇庇乌二世写了一本不成体统的小说，主要是想以其“雄辩”或拉丁文技巧出名。据说利奥十世曾说过：“既然上帝把教皇的职位赐给我们，那就

让我们尽情享受吧。”教皇庇乌二世，尼古拉五世和塞克斯都热心支持世俗学问。鲍季阿斯一家——亚历山大和他的儿子西塞里——个个聪明能干，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偷香窃玉，放浪形骸，贪得无厌，公开出售教职，并且暗杀他们的批评者。这种促进了贝文努脱·切利尼和鲍季阿斯无法无天的强烈的生活欲与强烈的美欲并驾齐驱。对人体和丰富多采的尘世生活的重新兴趣创造了新的艺术流派，产生了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列奥那多·达·芬奇的杰作，这里提及的只不过是当时富有灵性的艺术和建筑方面的几位巨人。

如果说灵性的堕落将人们的思维转向了世俗利益，那么它也为世俗的满足提供了新的机会。中世纪思想和古典主义的重新结合打开了一个新的门户，通过这扇门大批的异教学问源源流入。十字军东征将欧洲人引向了东方的奢侈生活，而且蓬勃发展的中世纪城镇及其工商业，不仅提供了所需花费的源源不断的金钱财富和奢侈，而且还暗示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的开始。中产阶级（城镇居民）独立性强，生活舒适，与此相比，中世纪农奴的蓬门荜户和封建贵族那金碧辉煌但却阴森可怖的城堡则相形见绌。这样，文艺复兴的主导精神从来世转向了现世，从希伯来主义的精神源泉转向真诚接受希腊和罗马古典主义式尘世生活提供的礼物。

二、国家主义的出现

贸易的复苏，金钱财富的增加和独立中产阶级的出现，所有这一切宣告了封建制度的灭亡。封建制度首先在意大利失宠，意大利的商人，市民和银行家层出不穷，兴旺发达。同样的情况也渐渐地出现在北欧。教皇统治的巴比伦囚虏明显地宣告了教会权威的破产。但丁在《帝制记》里提出：一个独立的教会应该是人的

精神向导，一个复活了的罗马帝国应该统治人的短暂生活。卢森堡王亨利七世曾试图重建神圣罗马帝国，但是他于公元1313年去世，于是计划也就宣告流产，中世纪所梦幻的重建世界秩序的重要运动也就随之宣告结束。结果，更小的政治单位开始涌现。在意大利，整个半岛给切割成许多像古代希腊那样的城邦，住在这些城邦里的人不称为"意大利人"，而是称为罗马，那不勒斯，威尼斯、费拉拉、佩鲁吉亚和其它小"国"的公民。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是唯一的"共和国"，他们通常为具有影响的家族或显贵所控制。而其它的则是彻头彻尾的暴君，费拉拉的宫廷在其礼仪和对这个行使统治权的公爵的效忠上几乎是东方式的。每一个城邦都有其自己的宫廷和宫廷社会。堆金迭玉而且出类拔萃的统治者相互竞争，试图重新恢复罗马黄金时代的富丽堂皇和繁荣昌盛。他们重新恢复了爱国主义思想，和奥古斯都大帝一样，全力支持诗人、学者、艺术家以及其他可以增加他们声望的天才。这时期的"声望"就像中世纪的祝福一样。在法国、马格里特和她的兄弟弗朗西斯一世仿照这些早期的意大利模式建造了16世纪的宫廷。

意大利之外的一些国家封建制度根深蒂固，因此，这个政治运动通常采取的形式是渐渐加强君主的力量，而相应地削减封建显贵的力量。随着这种转变，公众的忠诚从效忠封建君主转向效忠爱国主义。所以，公元1430年当英国人被圣女贞德所领导的法国人赶出法国时，法国所输掉的对手不是封建骑士，而是乡村女孩，她打仗的目的不是为了主教或君主，而是为了她的国家。法国、英国和西班牙是最为突出的新型国家。他们对新世界财富的掠夺表明金钱的重要性渐渐加强，土地的重要性则相对削弱。新的个人个性，城市个性和国家个性促进了艺术的创造活动，激励了一大批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雕塑家和作家的想象力，他们颂扬不朽，而且和彼特拉克一样，渴求尘世名望这一香醇美酒。

三、探　　索

随着世俗主义的复活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宇宙财富的探求欲，希腊主义中的探索精神重又再现。地球探索水陆两路共同进行；到东方去的陆路由乘客，传教士和马可·波罗这样的商人进行，到美洲和印度去的水路则由哥伦布，维斯普奇、狄亚斯、和瓦斯科·达·伽马开辟。对物质宇宙的探索带来了科学的复兴，成了我们现代科学成就的直接起源。特别是在14世纪的巴黎大学，物理学、化学、医学、数学和天文学等学科的新理论兴盛了起来，为后来几个世纪的牛顿和伽利略这样的大科学家取得辉煌成就打下了基础。这些独自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一方面同亚里士多德和《圣经》的权威性相抵触，提出了更为精确的自然法则，另一方面也为推测和研究打开了道路，从而在发明和巩固纯科学结构方面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多面手列奥那多·达·芬奇（自然博物学家，解剖学家，工程师和艺术家）的笔记本里有许多关于桥、人字起重机、煤油灯用玻璃灯罩、运河船闸、武器、甚至飞机的速写和描绘。在这种研究以及有创造性的设想中，新的个人主义精神开始创造现代世界。从前人们认为希伯来和古典作家的语汇是永恒的真理，现在他们开始从这种崇拜中渐渐地（但是非常缓慢地）解脱出来。这些研究的实际效果非常明显，他们发明了各种各样新的机械装置，意图将人们从缓慢而痛苦，单调而乏味的手工劳动中解脱出来。这些发明中最有革新精神的是印刷术。公元1446年，第一批图书由科斯特在哈勒姆印刷成功，公元1500年后大批古典和当代版图书得以出版，从而为新知识的广泛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古典主义的复活

前面所述的文艺复兴文化的主要方面的顺序同它们的时间顺序毫无联系。它们都发生在同一时期，相互促进。正如我们所见，对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成了促进进一步调查和探索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探索欲产生了一批手稿猎求者，他们在寺院博物馆里遍处搜索被人遗忘的书籍，结果重又发现了许多失传已久的古典文学珍品。文学研究转向编纂古典神话和传说，比如薄伽丘的《神谱》。创造性的作家则试图模仿古典主题和创作模式。在教育方面，这种对人的兴趣的复活，即人本主义，给宗教课程又增加了古典文学和哲学这两门课，此外还有对其它七门文科的广泛研究。

特殊热心研究的学科层出不穷，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复活使得人们在柯西莫·德·美第奇的庇护下在佛罗伦萨建立了柏拉图学园。学园的目的就是扩大对柏拉图的了解，调和柏拉图和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的基础是爱的阶梯观，通过这个观念，人们可以从冥思的尘世之美（如女人）到最终了解天国之美。英国读者通过斯宾塞的《赞歌四首》而对此理论深为熟悉。对于欧洲读者来说，其传播媒介是纳瓦尔的马格里特的《七日谈》（基于她本身的新柏拉图圈子）和卡斯蒂奥内的《侍臣论》。《侍臣论》的结尾就是一篇对柏拉图式爱的讨论。

古典模仿的主要气氛在市中心特别明显；这里，时髦的宫殿可以提供与希腊和罗马异教信仰有关的奢侈。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们住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周围是豪华的挂毯、绘画和装饰品。到宫廷来的都是些具有高度修养的男男女女，而职业画家，诗人和音乐家被用高报酬请来愉悦他们。在佛罗伦萨，一位著名的银行家柯西莫·德·美第奇(1434——1492)成了深受欢迎的政

府首脑。他这个人既残忍又豪爽，对学问兴趣甚浓，从而吸引了一大批语法家、手稿猎求者、鉴赏家、翻译家、学者和作家在他周围，鼓励人们学习意大利语、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他的儿子，英俊的罗伦佐则是一位多面天才。他不仅是艺术和学术的伟大保护人，而且本人也亲自实践。薄伽丘之所以得到佛罗伦萨的大使之职主要是因为他的文学才能，而不是他懂得实际事务。在纪念他们的庆祝活动上，艺术家们得到了非凡的荣耀，诗人们被主教和罗马元老所邀请，而大学校长则被戴上桂冠，以承认他非凡的成就。

结果，一方面是正统的学者和科学家，他们将研究中心从来世转向现世，而另一方面则是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艺术家和音乐家，他们的主要兴趣是提供优雅的娱乐。悲剧和喜剧的创作模式是古罗马戏剧，演出布景装饰豪华，这由当时最好的艺术家去精心布置，伴奏的是合唱舞蹈和音乐。诗人希望步维吉尔的后尘。散文作家则希望重新捕捉到优雅的西塞罗时代。二者都希望通过公开朗读他们的作品来取悦有经验和学识的观众。在这种情况下，时髦的“小说”创作和轻松的浪漫“史诗”满足了公众的趣味，因为他们喜欢乐趣，而不喜欢深奥。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推断古典主义的复活必定相当肤浅，对古代异教文明的了解也不全面；多少年来的基督教文化难以一时摆脱；古典作品最明显的部分也就是模仿最快的部分；人们所高度推崇的是西塞罗和维吉尔的拉丁语风，而不是他们的作品内容；人们所高度称颂的是异教徒的瑰丽神话，而不是古代人的智慧；希腊人的行为准则大为忽视，相反，聪明（不是智慧）和大胆（不是中庸）似乎成了早期文艺复兴作家如薄伽丘、切利尼和马基雅维里所推崇的新美德；后期作家如拉伯雷和蒙田则富有思想、含义深刻。但是后期作家是法国的产物，而法国既严肃（加尔文的国家），而且从表面上来看，又和罗马异教信仰的

直接提示相去甚远。在意大利，罗马纪念碑得以复原，希腊和罗马雕像得以恢复。为了模仿罗马皇帝和得胜将军的凯旋仪式，“凯旋式”得以设立，在这些仪式中，步行、或坐车、或乘木筏的象征性人物代表了当时的事件，宗教教义或古代神话里的男神和女神。卡斯蒂利奥内的《侍臣论》树立了礼貌行为的标准，同时它也确实指出了理想的侍臣应该是有用而不具装饰性。但是这本书更关注的是贵族技艺和行为举止而不是治国之才。

整个时期最有意义的发展是起源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个人主义探求这个新精神。对于那些墨守成规，不敢违背过去和现在那令人敬畏的权威思想态度来说，这些异教模仿成了脱离中世纪束缚的宣言。他们使人回忆起一种文化，而不是基督教，从而增强了独立调查能力。人们可以将权威性结论同可观察的事实相比较、从中得出真理。马基雅维里在其《君主论》一书里对这种新精神作了一句杰出评论：“对我来说，遵循事物的真正真理，而不是想象中的什么，似乎更为明智。”

五、改革与反改革

尽管世俗主义的复活是文艺复兴最明显的一个方面，但是强大的宗教潮流仍清晰可见。在对宗教愈来愈怀疑的人群中，有许多人，如但丁，米开朗基罗和伊拉斯谟，都怀有强烈的信仰。同样，许多非常虔诚的教徒无法调和基督教信仰和教会堕落这一可怕事实，这种与日俱增的不满浪潮在16世纪诞生的新教改革运动中达到了顶峰。尽管但丁的基本天主教信仰不变，但在《神曲》里，他将当时的三个教皇打发到了地狱，他严厉的批评得到了著名宗教领袖如英国人约翰·威克利夫（约1320——1384）·波希米亚人约翰·胡斯（1369—1415）和意大利人萨瓦那诺拉（1452—1498）的共鸣和引伸。与此同时，人们对教会的巨大财

富和教会对教民的横征暴敛广泛不满。从政治上来说，教会的强大势力和新的国家主义动力互为冲突。结果，蓬勃发展的宗教起义由于非宗教的原因而吸引了许多人，并且大大地促进了世俗起义，如血腥激烈的德国农民战争（1524），尼德兰人对西班牙统治的反抗（1568）以及16世纪后半叶导致法国分裂的内战。

这种新教改革运动起源于维滕堡大学，当时马丁·路德是该校的一位《圣经》文学教授。他深入思考拯救人类这个问题，提出了“信仰拯救”论以反对天主教的“圣餐和善行拯救”论，因为多明我会修士约翰·采泽尔当时正受命出售赦罪符，以集资建造罗马的圣彼得教堂。赦罪符购买者可以得到减刑，因为向教会捐款属于“善行”这一范畴。

公元1517年，路德在维滕堡的教堂门上贴了95篇论文，正式宣布他对教会出售赦罪符和其它举动的不满。这些论文被印刷出来，并且得到了广泛传播，成为激烈讨论的中心。在一场和天主教神学家约翰·艾克的争辩中，路德承认他对上帝的直接关系的信仰就像异教徒约翰·胡斯一样。在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智帝的庇护下，他同教会分道扬镳，出版了三篇论文。在这些论文里，他对信仰拯救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鼓励德国统治者没收教会财产，将他们从罗马司法权中驱逐出去。路德着手建立他自己经过改革了的教会，这个教会得到上层和中层阶级的热情支持，因为路德教免除“外国”捐税和控制，从而深受他们的欢迎。

公元1525年，赫尔德里希·茨文利在瑞士建立了一个新教教会，公元1536年这个教会的领导权落到约翰·加尔文手里，也就是在这一年，加尔文发表了他那本深受欢迎，影响深远的作品《基督教原理》。结果宗教派别剧增，他们将新教教义迅速传播到德国，瑞士、英国、苏格兰、匈牙利、波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斯堪的那维亚和法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还产生了点影响。加尔文教本身是法国的胡格诺教，后来又受到苏格兰的

长老教和荷兰的新教的启发。

尽管各个宗派都有其自身的教义和习俗，但对新教的革新还是可以作一番概述的。新教保留了几乎所有的中世纪基督教要义，包括相信《圣经》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它的新意是反对独裁主义和罗马天主教里的堕落和迷信成分。新的重点放在人与上帝相互之间的直接关系上，取消了居间的牧师、尊敬圣物和偶像、朝圣以及天主教里的大多数繁文缛节。新教强调《圣经》的绝对权威性，从而取代了各种各样的神父礼仪，将赤裸裸的崇拜形式引进到相对简朴的教堂里。

加尔文教在原罪观和宿命论上特别严厉，声称上帝“选中”了一些人去被拯救，而其他的人则被罚入地狱。辨认“选民”的方法是看他们出众的道德行为，而对人间乐趣的厌恶则同清教徒这一词普遍联系起来。（这种谴责美感满足的副产品就是否定艺术、文学、特别是戏剧。大多数新教作品的范围都局限在宗教方面，无论是灵感性的、神学性的，说教性的，还是争论性的。）性被认为特别有罪，所以道德常常同禁欲联系在一起，顶多是允许繁衍子孙的婚姻性关系。

一个重要的补偿，特别是对飞速上来的中产阶级来说，就是加尔文同意勤奋和节俭，广义地说，就是认为成功的商人是“上帝选民”的杰出一员。天主教反对利润剥削，而新教则祝福人们积累财富，允许个人主义将大多数商业企业包括进去。

为了消灭新教，阐述教会教义，纠正基督教会的滥用，教会于公元1545年召开了一个国际性会议，即众所周知的《特伦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教会击溃了新教对天主教的威胁。这个反改革的会议断断续续一直开到1563年。它重新肯定了信仰和善行拯救的教义，肯定了教皇的绝对领导，取缔了《圣经》的新教版本，认为中世纪的拉丁文版是唯一的权威版本。会议还让教皇不停地编一部索引，即禁书单。反改革的效果到处可见，特别是在西

班牙和意大利。本来作为压迫手段的西班牙宗教法庭是想消除摩尔人和犹太人，现在它的矛头却指向了基督教异教徒，并且强行施加严格审查。这种宗教冲突最明显的文学效果是人们对教主重新产生兴趣，明显的例子是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和杜巴塔斯的《周日》这样的基督教史诗的出现。

六、西班牙的文艺复兴

西班牙的文艺复兴一方面分享了欧洲其它各国的复兴和新生的总特征，另一方面，它又有着和欧洲大陆不同的现象。有些区别的原因是因为比利牛斯山脉将伊比利亚半岛和欧洲其它的国家相对隔开，使得交流难以进行。但是主要的特征是早期西班牙历史与众不同的特性。

伊比利亚半岛最早的居民是凯尔特人和伊比里亚人，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这个半岛为罗马所侵，成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罗马哲学家和戏剧家塞内加和诗人路康就出生在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人常常喜欢回忆他们。

公元409年，罗马为阿拉列王所洗劫，西班牙则被野蛮部落征服。公元415年，一个西哥特王国建立。西哥特人很快皈依基督教，成为欧洲最狂热的天主教徒，他们野蛮，不堪忍受异教学说和异教徒，早在7世纪就残酷压迫犹太人，甚至连牧师都明显地去求情。公元711年，西哥特王国衰败，随后是阿拉伯人的入侵。

穆斯林人对西班牙的征服尽管持续了700多年，但从未完成。大量的基督教社会一如既往，甚至在穆斯林统治的地区基督徒依然故我。穆斯林人所取得的一个突出成就就是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学问中心。在这些中心里，人们研究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这些译本很快又被传播到中世纪欧洲的其它国家（见第十五章）。但是中世纪西班牙的主要编年史就是基督徒和摩尔人之

间的战争、征服、失败和再征服。西班牙人很少出现在十字军东征记载里，因为他们在进行国内的东征。到13世纪末，这种持续不断的战争使得基督教重新获得了除格拉纳达之外的所有西班牙领土，而格拉纳达直到公元1492年才无条件归顺。

在这段时期里，西班牙和基督教欧洲的其它国家一样，由一大批独立的国家组成。公元1469年，卡斯蒂尔的伊莎贝拉嫁给了阿拉贡的费迪南，从而为这两个强大国家的结合铺平了道路，标志着西班牙作为一个国家的崛起。公元1512年，当纳瓦尔被吞并后，整个半岛除了葡萄牙都成了西班牙的领土。

随着哥伦布的远征开始，西班牙人通过掠夺新世界的金银财富而一跃成为世界上的富裕强国。但是西班牙经济混乱，老百姓穷困潦倒，就是靠着这个可怕的代价，西班牙人才获得了她的黄金时代，而这个黄金时代随着1581年尼德兰人的起义和1588年无敌舰队的失败而宣告破灭。

令人奇怪的是，所谓的西班牙文学的黄金时代集中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而当时的西班牙正忍受着毁灭性的崩溃。这种文化复兴中的许多奇怪特征都可以追溯到西班牙高度个性化的中世纪的过去事件上。结果西班牙的文艺复兴和欧洲其它国家的文艺复兴迥然不同。

甲．基督教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总特征是遍地蔓延的怀疑论，而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天主教所采取的是温和的人本主义，然而这两种特征在西班牙几乎都看不到。由于她的根基是西哥特的宗教偏狭，再加上她和穆斯林之间的长期冲突，所以在西班牙当一个天主教徒是一种明显的爱国举动。难怪西班牙于公元1478年建立了宗教法庭，1519年查尔斯五世自封为神圣罗马皇帝，并以“信仰保护者”的名义残酷迫害异教徒。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统治就是审查，尽管宗教戏剧在欧洲其它国家早已消声匿迹，但在西班牙却

正方兴未艾。

乙. 偏狭性

部分是由于比利牛斯山脉的阻隔，但主要的还是由于西班牙忙于自身的问题，所以盛行于意大利北部的文艺复兴冲击也只是断断续续地渗透到西班牙。由于这种疏远，再加上艺术家和作家缺乏保护，从而产生了“一个没有文学传统的文学”，其对象不是贵族鉴赏家，而是广大读者。早期有一部畅销作品《天国》被分成戏剧一样的幕，但都是叙述散文和戏剧对话的荒诞结合。因此，既不能将它划归戏剧或小说，也不能将它划归其它清晰可辨的体裁。一种新的被称之为“无赖传奇”的流浪汉小说起源于《拉撒里洛·德·图尔密》（1554）。洛普·德·维加，一位多产的戏剧家，说他“用六把钥匙锁上了所有的规则”，从而创作出深受欢迎的三幕悲喜剧。

丙. 西班牙主义

此外，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还生动地反映了许多高度个性化的性格特征。西班牙人引以为自豪的是他的禁欲主义和胆识。西班牙个人主义意识很强，常常强调自私自利，而且最为轻视外国人。他感到自豪的是他有一套礼仪，喜欢浮夸的举止和夸张的语言（这种雅致的顶点是堂吉诃德）。他坚持个人礼貌，他对“荣誉感”的极端敏感成了文学作品的主要主题。他对女人的荣誉特别敏感。如果有一个姑娘被大家所认识，或仅仅因为名声好而为人所知道，如若被认为受人勾引，那么她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结婚，要么进女修道院。她的父亲，兄弟以及其他的一些亲戚有责任去进行报复，这个传统在蒂尔索·德·莫利纳的《塞维利的诱惑者》中得到了特别论述。

这些特征中的大部分在西班牙文艺复兴文学两个著名的“堂”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堂吉诃德这个高于生活的人物表现出这个国家拒绝承认现实，而堂璜对女人、习俗、甚至死亡的

蔑视则突出体现了西班牙的个人主义，对世俗的反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注译：

①译注：新教宗派，起源于12世纪，其组织者是里昂的彼德·华尔都。作为凡俗传教士，他们提倡贫困，声称《圣经》是信仰和生活的唯一准则。在公元1184年到公元1215年间，这个宗派被指控为异教，这种迫害一直延续到18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后，他们力图使自己的观点适应新教的观点。后来，一群华尔都派定居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瓦尔都斯。

第十七章　新古典主义

一、新的古典主义

正如题目所示，17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是一种恢复古典世界气氛的自觉努力。文艺复兴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恢复希腊和罗马文明，这种热情方兴未艾，一直延续到了下一世纪，从而加深了人们对古代希腊作品的了解，揭开了丰富的文学和哲学宝库。而这些工作在上一世纪还只是刚刚开始。对于17世纪的学者来说，通过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的发展，这个世界充满了活力和希望，而希腊人对艺术形式和生活理智的强调似乎暗示了人类完善不可逾越的理想，值得恢复。而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给新古典主义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正是希腊主义里的理性秩序，希腊文学中的灵性和深思熟虑对文艺复兴明显没有多大影响，而对17世纪的影响更小。

与此同时，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动力涌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

的智力巨人，如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笛卡尔、帕斯卡尔、哈雷、霍布斯和洛克。这些巨匠作出了许多新发现，或至少提出了人及其宇宙本质的新理论。这些理论通常被描述为“法则”，这当然是因为人需要一个有秩序的世界，但同时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即注定要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一个理性和有条不紊的系统。现在“开明”的意识取代了从前的上帝观，人们认为上帝只是遥遥无期，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然法规创造者，他的一言一行从不会去满足个人愿望。因此新的知识分子不再相信它，认为它只是过去的虚构或当时的神奇叙述，对任何超凡入圣的现象半信半疑。

由于这种恢复古典秩序观以及在宇宙寻求新的秩序原则的欲望，个人的癖性遭到了社会的反对。正确性，加上规范的提出和维持，成了一个新的放之万物——从人类行为到诗歌创作——而皆准的理想。感情与激情受到怀疑，机智与练达备受推崇。人们最为强烈的欲望就是建立合情合理的管理，这就是说要建立各种各样可以仲裁正确性的科学艺术“学院”，这已成了一股强大的趋势。这种对个人主义的蔑视已变得合情合理，足以认可新唯智派的结论，万物皆有更好的途径，人类理智既可以发现更好的人类行为准则，也可以探索出自然法则的普遍规律。

这种对“普遍性”的追求产生了这样一种文学，即社会而不是个人成了学习的目标。而且由于追寻最高行为准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所以文学通常传授道德课程。这样一来，既有聪明性又有说教性的反讽成了深受欢迎的表达方式。由于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形式、思想和素材的更新持怀疑态度，所以艺术家所追求的是含蓄、妙语、语句简洁以及形式优美去赶超对手。法国人热爱形式，注重细微区别，这大概是她统治这个时期的欧洲文学的原因。所以我们先不讨论17世纪欧洲的主要趋势，而是来探讨一下法国贵族上流社会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特性，这样或许更为有益。

二、法国的黄金时代

同雅典的伯里克理斯时代和英国的伊丽莎白时代相比，法国的相应时代是17世纪，即法国人所熟知的“伟大世纪”。在黎塞留、马萨林和路易十四的相继领导下，法国政府成了一个专制君主国，其宫廷在欧洲最豪华，最优雅，也最光彩夺目。与此相适应，法国成了西方世界的政治强国。

公元1430年，圣女贞德领导法国人将英国人赶出了法国，结束了百年战争。从那以后，国家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趋势与日俱增，在人民中间创造了一种国家主义精神，削弱了贵族的威望。一般士兵取代了全副盔甲的骑士，而且这些士兵是为法国和国王而战，而不是为封建君主而战。16世纪早期，路易十二凭借王位的威望将各省政府和税收从贵族手中收回来，将它们委托给中上层选出来的受聘政府官员。由于这个新的官员层完全取决于国王的恩惠，所以这些受雇官员中的最高官员成了国王的大臣。这种趋势的不幸后果是，由于向人民直接征税以维持宫廷的豪华，所以法国被一分为二。工人和纳税人阶层被看作是一个肮脏、半开化的游牧部落，他们只有提供宫廷社会所需要的奢侈才能生存下来，而宫廷社会只代表它自己，并不代表“法国”。这种公然蔑视普通老百姓的长期后果是法国大革命（1789）的爆发。

真正的辉煌时代起源于亨利四世（1589—1610）。他为法国带来了和平与稳定。在他的大臣苏利的帮助下，他结束了同西班牙的昂贵战争，终止了宗教冲突，开始了一系列的计划和改革，希望给国家带来繁荣昌盛。公元1610年，当他被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暗杀的时候，他的继承人路易十三只有九岁；有一段时间政府落到了他的母亲玛丽·德·美第奇手里，但是玛丽的管理软弱无力，因此公元1614年召开了一个三级会议。这个事件之所以引人

注目，主要是因为它是大革命之前那个代表机构的最后一次会议。路易长大成人后将他母亲放逐，将政府的管理大权交给了才华横溢的黎塞留主教的手中。

黎塞留摧毁了含有政治因素的新教，结束了几个剩余的封建君主势力，兢兢业业，想使君主政治政权专制化，提高法国的势力和威望。他坚持政府各部门的有效管理，使法国在军事上坚不可摧，而且还直接鼓励艺术、科学和学术研究。结果，一方面德国为30年的战争搞得焦头烂额，英国为革命搞得四分五裂，西班牙则想方设法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帝国，而另一方面，法国则成了欧洲的领袖，法语成了国际性的外交语言。

公元1624年黎塞留去世后，其首相职位由马萨林主教继任。马萨林是又一位超群绝伦的政治家，他沿用了同样的总方针。公元1643年，路易十三去世，他的王位传给了路易十四。路易十四的72年统治标志着黄金时代的全盛期。公元1661年马萨林去世后，路易十四自封为首相。他认为自己是上帝在尘世间的代表，这话倒不是夸大，因为他声称："朕即国家"。和前面的黎塞留一样，他是艺术和辉煌崇拜者的热心保护人。他继续给普通老百姓施加税收压力，运用贿赂作为国家管理的手段（英国的查尔斯二世就为他所收买），同时他还建造了世所羡慕的凡尔赛大宫殿，他的豪华宫廷成了优雅高级社会的顶峰。宫廷里艺术品丰富，生活优美，里面的绅士头戴精致假发，身穿华服（丝绸和饰带），脚穿高跟鞋（手拄长长的细拐杖），走起路来一摇三晃。他们向宫廷女士卑躬屈膝，而这些女士头上戴着头饰，身穿波涛似的裙子（由金属丝悬着），其优雅的谈吐与身上的打扮相得益彰。

国家的专制和优雅反映在这个时期法国语言和文学所体现的专制主义和优雅的言谈上。大家齐心协力，取代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和探索动力，建立并维持了严格的规范。这个社会所追

求的是语言、行为、艺术和文学的绝对完善，因此人们不需要独创性。在这种动力下，同形式完善相比，主题的重要性常常退居其次。文学标准的基础是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批评格言，还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追随者斯卡利杰尔和卡斯特维特罗。对希腊、罗马智慧和文学的推崇非常普遍，其中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提及。由于对古典形式和主题的研究和模仿，这个时期被命名为新古典主义时期。和古典艺术一样，许多主题仅限于人类本性和社会行为这一普遍现象。（宫廷社会很容易将人当作一种社会动物。）在最好的情况下，新古典主义的目标是以完善的形式去表现人类真理。这时期优秀文学的主要特征是真理、中庸、对称、合适、和谐和美。这时期的次要作家常常陷于牵强附会、错综复杂的表达方式中去，他们认为这种表达方式是练达、若无其事和斯文体面的顶点。

追求完善已成了社会的主要激情，它的来源是当时最著名的机构—沙龙。公元1628年，出生于意大利尔后嫁给德·郎布依侯爵的凯瑟琳·德·维峰内发觉宫廷社会太不文雅，难以适合她的口味，于是就退出了宫廷，在靠近罗浮宫的家里款待了一批精选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一直到公元1648年，朗布依府邸一直为法国文化的主要人物所光顾。由于那时还没有客厅，所以这些著名的接待活动就在德·朗布依夫人的蓝色卧室里进行。她坐在床上，而她的客人则坐在椅子上，或凳子上，或站在床边的空处。这些空处叫室内沙龙，因此室内沙龙成了沙龙或接待的同义词。

在沙龙里，人们只欢迎智力的或妙趣横溢的会话，因此社会美德得到了极大的培养。这些会话集会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法语变得更为精密准确，以适合于传递微妙的思想和感情。这些自我命名的花花公子取缔了普通或粗俗的表达法，发明了各种委婉语，如用“嘴上的家具”来代表“牙齿”，用“空气的孩子”来代表“叹气”，用“维持生计”来代表“面包”。有些词汇由于

粗俗被划掉。"Po'trine"法语意为"乳房"被取缔，因为"小牛的乳房"是屠夫用语。据说他们为在斯文的会话里使用普通词"car"（因为）是否合适争吵了好几个星期。

在后人看来，这些沙龙愚蠢无聊，但它们为语言的巧妙措辞和清晰纯洁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还创造了形式完善的艺术标准，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轻松精致的诗歌，这种诗法语叫vers de société（诙谐俏皮的应酬诗），英语没有对等词。朗布依夫人的沙龙聪明合理，而她的模仿者如斯居代里小姐，萨布莱夫人和拉斐特夫人的沙龙则将优雅带向了极端，成了莫里哀的喜剧《可笑的女才子》（1659）的一个合适的讽刺目标。

创建沙龙的动力促使人们形成了法兰西学院。公元1629年，在路易十三的领导下，八位文人组建了一个俱乐部，讨论大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黎塞留建议他们成为国家领导下的一个非官方机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首相无疑是想把君主专制扩大到思想和文化界，但他对法国语言和学问也怀有深厚的感情。于是他于公元1634年起草了一个方案，将人数限在40位。1637年，这个组织得到了议会的批准，官方名字叫法兰西学院。到1671年，学院已成了一个国立机构，因而所有的会议都对外开放。1672年，路易十四在罗浮宫给了这个机构以一席之地。黎塞留还建议学院编一部辞典，使法国的语言变得标准而纯洁。公元1638年开始起草计划，但是直到1694年《学院辞典》才问世。这部辞典的奇特之处在于它所选的辞汇。编者并没有将所有的词汇都收进去，而是收了他们认为正确的词汇。通过学院，法国文人成了一批有影响的人物，几乎成了政府一员。在沙龙和宫廷，文人和贵族享有同等地位。学院正式批准或谴责当时的作品，主宰着国家的语言、艺术和文学趣味。从此，学院对法国的创作天才施加着保守的影响，使爱好形式这一全民特征明朗化。

与此同时，作为社会的另一方面，戏剧也就起源于这种形式

和优雅的气氛中。从前，巴黎人只知道意大利演员和平庸的法国剧团。1628年，皇家喜剧院常设在布哥涅府邸。剧团的主要剧作家亚历山大·哈尔迪在希腊悲剧的基础上创作了自己的戏剧。他省去了合唱，引进了更多的动作和场景。虽然他不算一个文人，但是他按照希腊的悲剧模式将故事情节集中在一个中心问题上，而不是像莎士比亚那样将整个事件都戏剧化，从而为高乃依和拉辛铺平了道路。新古典主义者对亚里士多德的尊崇以及当时的人们对形式的爱好使得他们对三一律、无舞台动作以及希腊戏剧的其它的一些清规戒律亦步亦趋。时隔不久，三座剧院在巴黎兴旺发展。1643年，莫里哀和其他九个人组建了另一个剧团，即“卓越剧团”，他们租用了一个网球场，然后开始上演悲剧。这个冒险使得莫里哀于公元1654年破产，整个剧团在各省巡回演出达12年之久。但是到1658年，莫里哀又回到了巴黎，成了一位饱经风霜的演员、导演、剧作家和舞台监督。他应邀到罗浮宫去表演，给路易十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路易十四批准这个剧团使用“老爷剧团”名称，并且同意他们分享意大利演员使用的剧院。

由于过分强调形式和文体，一大批17世纪的法国文学显得平平庸庸，矫揉造作，浮而不实。而且，许多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效果是浮夸，而不是优雅。但是，不管他们的衣着化妆受到多少限制，其内在的活力、智力、想象力和妙语却是有目共睹的。不用辩解就可以看出鲁什富柯杰出的犬儒主义，塞维涅夫人感染性的活力就受到当时思想气候影响的。拉·封丹、拉辛和莫里哀对人性的观察聪明细致 而且常常是入木三分，甚至连他们作品里矫揉造作的形式主义都值得称颂和欣赏。空中飞人虽一事无成，但他的优雅以及完成这项艰难壮举的敏捷本身就足以证明他的表演。人性由于避开显而易见的成分而让自己屈服于形式标准的严格纪律，所以显得很少这样开明。对伟大世纪的批评会发觉至善论哲学无懈可击。问题倒不在标准规范，而是它所采用的特殊准则范围

有限 矫揉造作，到处衍生，而且谄上傲下。本来人的聪明才智还可以发挥得更好，这样一来整个时代看上去腐化堕落。

第十八章　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

一、怀疑论的起源

18世纪最好可以称为革命的时代。在法国以及13个殖民地，政治动荡此起彼伏，这些政治动荡在整个西欧产生了反响。在英国，后来在欧洲大陆，工业革命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的形态，将中等工业提高到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政治和工业发展的背后，还有一个意义更为深远的现象：思想革命。行动只不过是思想的体现。为了全面了解18世纪政治和经济革命的重要性，有必要对造成这一动荡的各种势力作一番研究。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新的兴趣渐渐结出果实，人们对宇宙的本质有了一系列的基本发现。公元1543年，哥白尼声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从而动摇了基督教世界的信仰。自此以后，人们对自然现象越来越关心，一些重要的发展，如哈维对血液循环的发现（1628），波义耳的气体扩充法则（1660）和牛顿的万有引力（1687）加深了人们对自然现象的兴趣。随着人类对支配他及其宇宙的自然法则了解得越多，人类对生活现象的神学和“非科学”解释也就越不相信。“古人”的权威性逐渐下降。人们意识到，同过去的伟大思维方式相比，人类还可以通过各种不同途径来扩大理解力。

在一个科学启蒙的时代，宗教已经失去了它的地位。随着越来越多的宇宙奥秘通过实验室而不是祭坛被揭示出来，一些思想家也就越来越难以接受一个神秘的，具有人性的上帝观。从哥白尼

开始，科学家们清楚地指出自然由人们无法理解的不变法则支配。一个思想流派应该自然发展，从理性方面去思索上帝，将自然法则的检验看作是一种神圣崇拜的形式。这种自然神论哲学最初起源于英国柴伯里的赫伯特伯爵（1583—1648）的作品。

自然神论者将上帝看成是第一推动力，而不是一个模棱两可、无所不能的神祇。上帝出于善心创造了理智、自然法则以及进步的动力，然后又被他所创造的现象，也即统治力量所取代。他不再被人们看作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迹创造者。相反，他创造了支配宇宙的法则，他让人们按照这个法则去安排自己的命运，去服从法则。所以，要想崇拜上帝，人们就得研究自然，即生活的理性方面。古代的基督教之所以为人接受是因为它同理性相吻合，但是圣灵感孕、耶稣的神圣性、复活以及其它一些神迹的信仰却是非理性的，因而无法为人所接受。这就是自然神论思想，它对18世纪的影响既具摧毁性，又具戏剧般的推动力。

二、法国启蒙运动

法国革命思想的动力不是来自法国内部，而是来自英国。直到18世纪初，法国人还一直在研究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完全忽视了英国的思想力量。许多人甚至连弥尔顿和莎士比亚都不知道。但是南特敕令的废除（1685）结束了法国胡格诺派的信仰自由，迫使许多法国新教徒逃到英国和荷兰，从而接触到了自然神论。许多流亡者记笔记或写含有自然神论思想的宣传小册子，渐渐地他们的作品又传到了法国，激起了法国人对新思想的浓厚兴趣。在荷兰，皮埃尔·培尔的《历史批判辞典》(1697)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大多数正统宗教信仰的不合理性，从而为宗教怀疑的兴起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公元1700年，洛克的《人类理解力论》在法国翻译出版，从而为法国的启蒙运动火上加油。在洛克看来，天赋

观念根本不存在，人的一切反应，包括宗教反响，都是尘世经验本身的结果。

第一个发表重要怀疑作品的法国人是伏尔泰。伏尔泰一直是培尔的崇拜者，直言不讳地批评法国宫廷。公元1726年，他由于嘲讽国王的大臣和法国的摄政者而被流放到英国。在英国的时候，这位妙趣横溢的哲学家受到洛克思想的直接影响，写下了《英国通信集》。这部书里充满了自然神概念，并融进了伏尔泰辛辣的嘲讽笔法。尽管《英国通信集》遭到法国政府的查禁，但它对法国的思想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伏尔泰高度称颂议会政府，宗教容忍和公民自由这些英国习俗，让法国人注意到法国缺乏相应的习俗，而且他还让所有的自由主义者怒斥宫廷和教会的压迫和反动顽固。随着这一颗炸弹，伏尔泰写了许多小册子，戏剧和讽刺小说，攻击政治、宗教和哲学保守主义，支持对理性和自然法则的科学信仰。他的妙语使得法国人捧腹大笑，他就是用这种笑声击败了敌人。

伏尔泰之后，法国为激进作品的大水所淹没，其中大多数作品的思想比这位"嘲笑哲学家"的远为激进。孔狄亚克在《论感觉》一书里同意洛克的观点，即人出生时是一片空白，没有天赋或先入之见，因而所受到的影响只有感觉经验。尽管他是一个牧师，但他拒绝了人之初性本恶或有先见的正统观念，从而为后来的人类完善论奠定了基础。比孔狄亚克更为激进的是他的门徒爱尔维修。爱尔维修在他的《精神论》一书里第一次将他老师的观点用于社会和政治生活。爱尔维修首先提出了一切行动都是感觉的产物这一前提，然后又指出人所关心的只是他自身的利益。他寻求自身的乐趣和舒适，憎恶一切使他痛苦或束缚他的事物。人的满足途径是自我，他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它满足了他的妄自尊大感。因此，政府必须迎合人的舒适欲望和个人地位，必须给他行动自由，必须培养他的高贵感，必须通过广泛公开的教育来提

高公众的一般思想水准。只有这样做，国家才可普施善行。而另一方面，他得出结论，任何国家如果想否认人类寻求舒适的自然欲望，那么它必定是反社会的，因而终将会被推翻。不难想象这种革命思想在公元1758年强制而又专横的法国政府中造成了多么大的轰动。爱尔维修的书被当众烧毁，作者本人也被迫 逃 离 法国。

但是在传播激进的思想方面最为重要的媒介恐怕要算《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汇集了各门学科的知识，重点强调科学和哲学。整项工程的基调极为理性化，书中有关战争与和平、宗教忍让、法典以及有宗教和政府的观点远远走在了时代前列，对各种进步思想是种有力的挑战。这本巨著的撰稿人是一群思想家，被称为“百科全书派”。其中的人物包括狄德罗（著作的主编），德·拉·梅特里，孟德斯鸠，孔多塞，达兰贝尔和霍尔巴赫。这些人当中霍尔巴赫的轰动影响最大，他对现行体制进行了最为激烈的攻击。霍尔巴赫是位德裔贵族，他的家汇集了当时先进的哲学家和艺术家。他真诚高贵，即使是同他观点截然相反的人也对他肃然起敬。在《自然体系》（1770）一书里，霍尔巴赫否认上帝的存在，甚至连自然神明都不存在，从而重申了爱尔维修的观点，人所受的鼓舞只有自我利益。他攻击教会的迷信观，指出正统宗教使得人们花费无穷的精力去调整自己和根本不存在的超凡现象的变幻莫测的意愿。真正支配人的不是一套神学诫律和禁忌，而是机械的自然法则，它们不知道灵魂，也不知道神灵。道德必须遵循自然法则，而不是遵循教会和政府武断而且常常不合人情的规范。他推论说，如果一个人邪恶，那是因为这些体制使然。要想带来普世幸福，政府就必须鼓励人类的自然平等和尊严。而且当务之急是要彻底根除带有封建倾向和迷信色彩的基督教会。

在这群主要百科全书派中，只有孔多塞活着见到了大革命，但是他们的信仰之火一直燃烧了好多年，对19世纪的科学和自然

主义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这群人有理性，头脑精明而讲实际，不多愁善感，真诚地宣扬平均主义，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欧美伟大的民主运动。随着冷静的思考和时间的流逝，他们的一些激进思想已有所减弱，特别是在宗教问题上，但是他们成了当代唯物主义现实主义的预言人，自由民主史上的先驱。

三、让一雅克·卢梭：承先启后的人物

18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煽动者是让一雅克·卢梭。卢梭性格迷人且有几分反叛精神。他妙笔生花，思想简单，且多愁善感，从而遭到了理性主义者的嘲讽，但却赢得了人民的厚爱和称颂。百科全书派由于观点激进所以思想孤立，而正是卢梭的政治宣言燃起了大众之火，为人民提供了感情动力，从而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卢梭的最初声望建立在那本反智力的《论科学和艺术》(1750)上。在这本书里，他提出科学研究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只会使他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从而导致更深的堕落。他说，处于原始状态的人是幸福的，学习只会混淆他的自然善行。此外，艺术使他意识到奢侈，从而使他变得自私而贪婪。所有这一切导致了社会不平等，而这是人类不幸的最大因素。因此，“艺术和科学得到了改进，而我们的头脑却成比例地堕落”，人类希望在自然法则中轻易地找到指引，而获得指引的方法是观察自身的特性。

> 美德！简单思维的崇高直觉，如果我们要了解你，难道还需要勤奋准备？你的准则不已铭刻在每个人的心灵上？难道我们还要更加勤奋才能知道你的法则，而不是自我反省，去倾听良心的呼唤……？

从这点出发，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35)

一书里继续颂扬"自然状态"。在这里，人人都可以享受到大地的果实，而人，一个"高贵的野蛮人"，无知，满足，无拘无束。只是当私有财产出现后，人才开始奴役自己，失去他的自然善行。政府是一个保护私有财产的机构，因而产生了罪恶，促进了不平等。只有摧毁政府，人才可以回到自然状态，重新恢复平等。

很自然，卢梭也意识到"自然状态"只是一种哲学式的抽象，人从不会"回归"于此，只是谈谈罢了。在其重要作品《社会契约论》里，卢梭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这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式的政府，其功能仅仅是做人民的奴仆，它的权力要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他指出：统治权在人民手中，不可剥夺！强制和专制政府违背了自然法则，应予废除。最好的政府形式是所有的人都参加，不过，由于在大国里这项程序难以实现，所以另一个最好的政府形式是通过公众选举，选出一些对人民负责的代表。因此，政府应该是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一种契约，在这个契约里，前者雇用后者来治理国家，维持秩序，保证他们的正常自由。但是人民决不会屈服于他们的统治，而且，政府只是一个公仆，如果它的行动违反了公众利益，人民有权将它解雇。

《社会契约论》这一使人眼花缭乱的救世主式光芒给潜在的革命者以深刻印象。同其它作品相比，它举起了人权大旗，最终点燃了法国大革命这根导火线。

卢梭被公认为浪漫主义之"父"，因而和百科全书派的理性古典主义形成了直接对比。当然，他从感情方面去接触生活，怀疑理性和学问，对人的"自然"善行多愁善感，在这些方面他同启蒙运动截然相反，但在其它许多方面，他觉得自己和他的对手同出一辙。和他们一样，他崇尚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作品，常常将斯巴达或罗马共和国看成是国家机构的模式，和他们一样，他是一个政治革命者，憎恨君主政权，特别是波旁王朝。此外，尽管他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穿梭来往，但他一生中真正的观点还是自

然神论，与伏尔泰和狄德罗一样，而且他对教士等级也作了同样激烈的攻击。后期浪漫派一方面保留了强烈的政治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又抛弃了古典主义，用更为神秘的宗教信仰来取代自然神论。因此，精确地说，卢梭不是浪漫主义运动之“父”，而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是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这两条溪流上空的一座桥梁，而这两条溪流尽管弯弯曲曲，但它们并排流淌，最终同归大海。

四、浪漫主义的崛起

公元1778年，卢梭去世，一位不幸的半疯狂的老人，没人认为他听觉不好，也没人认为他缺乏门徒。尽管他最后几年自愿离群索居，但是他的思想感染力为他在各行各业赢得了一大批热心追随者。政治团体把他当作保护神，休谟、康德、赫尔德尔、托马斯·潘恩等哲学家将他当作导师。圣·皮埃尔、夏多布里昂、哥德、席勒、鲍斯威尔以及许多其他作家模仿他的文体，表现他的主题。而另一个极端轻浮的人捡起他“回归自然”的呼唤，假装羡慕简单的田园生活。玛丽·安托瓦内特甚至特别将自己想象成一位阿卡狄亚的牧羊女，住在森林里，周围有一群打扮简朴的宫廷大臣，一两个茅舍，还有一帮干活的仆人。

然而，新的“浪漫主义”多少年来并没有彻底消除理性古典主义精神。纵观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训练有素的古典传统势力依然体现在思想和大众趣味上。古典动机和理性思维垄断了大革命，而在恐怖时代，自然宗教暂时取代了基督教，理性则成了它的女神。古典绘画，雕塑以及建筑在拿破仑时代兴旺发展，直到公元1804年贝多芬“迈开了新的一步”，创作了《英雄交响曲》，古典音乐传统到浪漫音乐传统的过渡才清晰可见。

现在是给浪漫主义下定义的时候了。浪漫主义这个词松散笼

统，从各个方面的现象来看，它有一个共同特性，这就是思想自由，而古典主义的态度是思想必须循规蹈矩。现在让我们用自由作基础，罗列一下浪漫主义的几个主要方面，并用它最突出的特征来给这个大概念下个定义。

甲。个人主义

浪漫主义者将个人福利而不是国家和集体福利，看成是万物的主要目标，因此，一个社会应该允许行动的绝对自由，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社会的。这种学说严肃的一面体现在平均主义的感情上（百科全书派也有同感），而正是这种平均主义的感情"激发了"法国的大革命；其荒谬的一面则反映在各人的自私态度上，特别是文学艺术家，他们觉得强调个性，甚至怪僻，是天才的一种表现。

乙。感情主义

浪漫主义哲学非常重视人的感情，而不是理性反应。浪漫主义者认为人生来是好的，只是社会的堕落影响使他窒息。新古典主义认为表现情感是"低级庸俗"，因而要约束人的内心冲动这一自然现象。既然逃避约束是浪漫主义运动的灵魂，那么服从甚至表现情感被浪漫主义者看成是个人独立和优越的表现。

丙。崇尚自然

我们已经见到卢梭将"自然状态"看成是理想的，美好的，而将文明状态看成是堕落的，邪恶的。广而言之，一切自然形式都成了美好与善良的象征，无论它们是体现在个人感情的自由流露上还是体现在美好的风景里。同这信仰相一致，他们愚蠢地崇尚"高贵的野蛮人"，崇尚美国印第安人或南海岛屿土著民族，认为他们体现了人性中最英勇的特性。与此同时，人类刚刚苏醒就意识到了自然的优越，从而产生了激烈的反响，创作出超群绝伦的绘画、诗歌和音乐作品，迸发出崇高的哲学思想。

丁。异国情调

对自然与自然人的崇拜，再加上别出心裁，使得许多浪漫主义者去寻求异国生活，颂扬异国风光和丰富多彩的人民，去沉浸在神秘和超自然的气氛中，甚至还病态地采用了饮食、服饰，职业和社会娱乐上的怪僻。他们还采取崇古主义的形式，研究历史和风俗，特别是中世纪的民间文学，以此来反对古典主义者对希腊和罗马的专注。

戊．国家主义

一方面作为19世纪政治国家主义钳制一切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出于对丰富多彩的尚古主义的兴趣，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抓住一切时机去发展文学、艺术和音乐上奇特的“国家”主题。民间音乐和舞蹈变成了交响乐，戏剧和歌剧成了强烈的爱国宣言，诗人和哲学家为那些政治和种族独立丧失给外国压迫者的国家痛哭流涕。国家独立被视作个人自由的必要前提，许多理想主义十足的年轻浪漫主义者满腔热血地离开祖国，去为希腊，意大利，甚至美国十三州联邦的独立而战斗。

己，幻灭

随着19世纪的到来，浪漫主义者一反人之初，性本善的乐观信仰而变得深沉，幻灭，心灰意懒。大革命爆发的时候，许多知识分子，无论是古典派还是浪漫派，都相信现代人的启蒙。但是好景不长，大革命很快堕入恐怖时期，随后就是拿破仑时代的一连串战败，所以，甚至还在启蒙的世界，敏感的浪漫主义者就开始对人类的潜力感到绝望。理性得以尝试但实际已不存在。文明对人类的腐朽影响太深，人类无法回到自然和高贵的生存方式上去。除了受罪，别无进展。所以不难理解许多敏感的年轻浪漫者逃到新世界或南海，或离群索居，耽于无望的梦幻之中，更有甚者，有人竟放弃一切希望，自杀而亡。

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浪漫主义是一个万花筒。从这六个特征及其融合中引出了无数的政治、社会、宗教和艺术运动。有些是乌

托邦式的，有些是神秘式的，有些是中世纪式的，有些是超自然式的。浪漫主义之河的主流就是自然崇拜，爱国英雄主义的颂扬，或“为艺术而艺术”这些形形色色的热情。所有这些活动将19世纪——今天有时候看来已极为固定——转变成历史上思想活动的大熔炉。有些活动“荒诞不经”，但是大多数活动产生了高度创作天才。当然，除了已经提到的人物之外，还没有哪一个运动产生出康德、黑格尔、瓦格纳、勃拉姆斯、华滋华斯，雪莱、拜伦，爱默生、梭罗、惠特曼、雨果、果戈里或坡这样的天才。除了伯里克理斯时代，浪漫主义是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时代。

大革命时期（1770—1815）

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尽管是前所论及的激进思想的符合逻辑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但它的爆发不仅仅是思想宣言的结果。因为启蒙思想遍及欧洲，先进的政治理论出自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其它国家的人，当然还有法国人。但是这时只有法国发生实际革命。①思想本身很少造成具体行动，必须有接受这些思想成长的肥沃土壤。启蒙运动的种子遍撒欧洲，但它在法国生根发芽最快，因为只有法国这块肥沃土壤能够结出起义的果实。

法国的实际政治和社会形势远远落在当时的主导思想之后，无可挽救。波旁王朝的“旧政权”思想封建，习俗堕落，而教会自中世纪以来几乎就没前进一步。等级制度根深蒂固，就像在中世纪一样被看作是宇宙神圣秩序的一部分。如果有谁想跳出这个等级，那无异于公然违抗上帝，谈论放松等级区别和等级特权就是渎神。多少年来，贵族特权无可非议，他们缩在永久性的安乐窝里，万事不管。他们本身并不付税，但却向下层人民横征暴敛，以维持他们的奢侈生活。与此同时，他们学习波旁国王路

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不断追求奢侈享乐的榜样，实行了一种纯粹堕落的享乐主义。同波旁先驱相比，路易十六的个人开销算是小的了，但就是这样，据说他一年内用于个人的开销就达7千万美元，而这完全是人民的血汗，他从未向外公开过。

当然农民是一贫如洗。土地税，教会什一税，人头税，公路和地主田野里的劳动，以及间接强加的盐务税（一年一度要向政府食盐垄断机构购买食盐，而价格是产品的十倍），还有同地主分享的谷物等等，据估计每个农民的一年所得有五分之四经收税进入了政府的腰包。更有甚者，法国农民尽管不像其它欧洲大陆国家的农奴一样当牛作马，但是传统的农业"开放土地"制将他们紧紧地拴在迅速衰退的土地上。这种制度迫使他们只能在指定的地点种植指定的谷物，从而扼制了一切土壤保持谷物循环法，而让一个共同的牧羊人照看他们的牲畜，阻止了疾病控制或科学育种制的有效推行。如果有哪一个农民想离开他的土地，到别处去寻找一个更为葱绿的牧场，那么他就得支付昂贵的离开税，而这些税没有几个农民能付得起，这样他只好死了这条心，像奴隶一样呆在那儿。

不过，尽管法国农民负担沉重，但同欧洲其它国家的同伴相比，他们还算是幸运的。使人感到荒谬的是，大概正是这种相对的福利促使法国农民成了有效的叛逆者。从经济上来说，他们还算宽绰，知道享受舒适的生活，希望公平合理地分享他们所生产的物品，而且，尽管政府专制，但他们还没有像大多数的欧洲农民一样由于政府和地主的压迫而变得粗暴残忍，无计可施。此外，尽管他们的土地由于年年非科学性的种植而变得衰竭，但只要他们不再承担富人的享乐重负，那么土地还是可以维持他们过上像样的生活的。他们叛逆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命运无望和前途黯淡，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还有事情需要争取。

从潜在的力量来看，更为有利的是中产阶级即城市商业阶层

的命运。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贸易和商业迅速发展，而工业革命又给了它无穷的动力，许多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其中有些人在市场和工厂迅即获得成功。随着这种成功而来的是中产阶级的势力意识，而这种意识在波旁政权过了时的封建模式里是几乎不存在的。英国中产阶级取得资本主义的成功给法国的资产阶级以极大的动力和鼓舞。18世纪后期这些雄心勃勃的资产阶级准备为社会或政治改革进行斗争，只要这些改革给他们得到属于他们的机会。这些资产阶级比农民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急不可待地阅读革命哲学家的宣言，热情领导改革斗争。这些建设性改革立刻激起了他们的理想主义，为每个人的繁荣富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从而使开明的中产阶级成了企图维持现状的波旁王朝的死敌。有意义的是，当最后将言论付诸行动的时候，真正点燃第一把反抗之火的是资产阶级，还有几个开明贵族，而不是农民。

起义是不可避免的，而引起不满的最主要原因是法国政府金融的一片混乱。从传统上来说，法国没有预算，没有财政方案，国王的钱和国家的钱没有区别。政府任意收税，而这些税一经收上来就被花完。没有记帐，从国王向下的各级官员就像那些随意涂写支票的轻率的家庭主妇一样，对国家的财政状况一无所知，直到他们不得不被告知国库里已经没有钱来满足他们的奢侈计划。纵观18世纪，法国财政状况极为严重。自公元1715年路易十四死后多年，法国财政已被抽干，无法支付太阳王的昂贵战争。而且，由于路易十五的挥霍无度，情况变得更糟。到了这位君主体面去世的时候，他所留给他孙子路易十六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倒闭了的国库，还有玩世不恭的声明：从财政上来说，新国王应该自己照顾自己。

幸运的是，路易十六并不像他的祖父一样是个轻浮的浪荡子。尽管他没有过多的思想负担，但他至少头脑清醒，处置有

方，有一阵子看上去，那些变换频繁的财政大臣似乎能够避免国家的财政灾难。但是尽管这些财政大臣聪明能干，他们却无法做不能实现的事情。很明显，拯救法国的唯一方法就是向贵族收税，而这前所未有的步骤遭到了贵族的强烈反对。结果他们只能借助借贷的办法，而这种借贷越来越难以获得，而一旦获得，也只能将摇摇欲坠的国库推到崩溃的边缘。到了公元1786年，国家债务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数字，6亿美元，一年一度的赤字是2500万美元，而且还在上升。绝望之下，路易十六召开了知名人士大会（1787）以商量向贵族征税的问题，但是大会并不那么利他主义，所以只有心甘情愿地减少对农民的奴役，而这种笼络办法至多也不过是减少农民的税收，结果只会使实际情况比从前更糟。

最后，面对公开反抗的威胁，路易没有它法，只有满足公众需要，重新召开三级会议，一个由贵族、僧侣和平民组成的"三级"顾问机构。自从公元1614年以来，这个机构就没开过会。过去，国王召集三级会议主要是出于礼貌形式，平民的选票总为贵族和僧侣双方的联合势力所推翻，国王可以随心所欲，不受惩罚地接收或拒绝三级会议的建议。但这一次情况不同了。第三等级是个社会团体，比公元1614年的寒酸地位大有改善。他们精力旺盛，富有进攻性和战斗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的代表在一个官方政府机构里还占有席位，从而为前所未有的激烈改革奠定了基础。公元1789年，当三级会议召开的时候，第三等级立即要求选举应按"人头"（即各个人）来进行，而不是按照传统的"等级"或社会阶层法来进行。由于第三等级的代表等于贵族和僧侣的总和，由于有些上层人士赞同改革，因此大会的保守派将议程拖延了很长时间，拒不同意这种新的选举方法。国王一点也不调解双方的争吵。最后，到了公元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单独举行会议，宣布自己召开国民会议，并邀请其它两个等级一同参加改革事业。上层阶级对这一邀请的反应是将第三等级

锁在议会大厅之外，这样一来，义愤填膺的平民走进网球场庄重发誓，法国不起草宪法，他们就绝不屈服。“网球场宣誓”是法国大革命的真正开始。随着“网球场宣誓”的发表，神圣的王权原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波旁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

然而，路易十六顽固地拒绝看墙上的宣言。他公开将附近各省的法军部队调到凡尔赛和巴黎附近，而巴黎公民对国王敌视1789年7月14日的国民会议怒不可遏，于是直捣巴士底狱——一个象征波旁王朝迫害政治对手的老监狱——兵工厂。这群民众杀掉了瑞士雇佣军卫队，将武器弹药交给国民卫队——人民的军队。他们实际上已着手接管巴黎市政府。几个月后，有消息说国王为佛兰德斯的皇家援军举办盛大宴会，于是巴黎的女人，还有身穿女人服装的男人冲进凡尔赛，涌进皇宫，迫使国王及其被大众憎恨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和他们一起回到首都，后来他们又被关押在德维勒里宫里，这儿比在凡尔赛更容易监视他们的行动。

现在木已成舟，人人都很清楚王权已被摧毁。贵族和僧侣急于想从旧政权的残骸中捞点好处，于是急不可耐地加入了第三等级队伍，废除了等级特权、残酷的税役以及封建制度和波旁专制所剩下来的一切痕迹。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人权宣言》，一个启蒙性的文献，它奠定了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保证他享有“生活、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利，还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崇拜自由的权利。此外，公元1791年还采用了国家法案，建立了一个有限的君主政体，国王的职责只是行政上的，必须服从立法意愿，而最终也就是服从人民本身的意愿。卢梭和哲学家们的精神得到了胜利；公元1791年法国产生了一种社会契约，逃避苛政和非正义的工作似乎已成暂定的事实，并且得到全面实现。

但是对法国和平不幸的是，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并不能根除旧政权里的一切痕迹。甚至早在攻打巴士底狱的时候就有许多反动贵族逃离法国。随着国民大众力量的增加，移民之河流动更快，

直到公元1791年，一大批逃亡者集结在北部和东部边境上。从这里，他们一面运用大量的宣传和不断的政治阴谋骚扰革命政府，一面伺机用武力反对新政权。在法国国内也有许多人秘密同情逃亡者，从而对革命者形成了巨大的威胁。皇家成员很有可能参与了内部反动同情者。公元1791年6月，这些嫌疑活动成了公开事实，当时国王携带着王后和孩子试图逃离法国，加入逃亡者，后在边境附近的瓦伦被截留，皇族一家被带回巴黎，差不多和罪犯一样，从前还可能享受点欢迎，现在却丧失殆尽。

皇室成员的试图逃亡带来了法国政治的新基调。激进分子运用逃亡者的反革命活动作借口，开始强力鼓动彻底消除上层阶级，建立人民共和国。这些激进活动中最直率的是雅各宾派，这是一个温和的组织，赞同立宪制。但是在逃亡国王试图"叛国"后，他们很快变成了激进的共和国派。雅各宾派中最有影响的成员有马拉、丹东、德穆兰和罗伯斯庇尔，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发展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在公元1791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立法会议上，立宪政体发现自己遇到了麻烦。它的工作受到了国王的牵制。尽管国王仍在宫殿监管之下，但他仍顽固地坚持使用否决权来麻烦立法机关。而且从内部来说，汪代省的农民起义和贫穷的巴黎无产阶级的威胁性埋怨却在折磨着他。边境上逃亡者正等待有利时机进行反扑。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正准备发动战争，颠覆革命政府。到了公元1792年4月，这些迹象已确凿无疑，于是法国先发制人，对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

但是先发制人并没有为法国军队赢得多少主动权，由于一败再败，巴黎本身也受到了威胁，于是人民行动起来。公元1792年8月，巴黎激进分子在丹东的领导下闯进皇宫，将祈求国民大会保护的国王捕获，迫使惊恐万状的立法机关解散，取而代之的将是准备新的共和宪法的国民议会。9月22日，经过漫长的努力，

法国军队打败了布伦斯威克公爵的侵略军。国民议会热情宣布，从这一天起，皇权在法国废除了，逃亡者被永远流放，第一共和国开始诞生。随着共和国的建立，路易十六死亡的日子也为期不远了。公元1792年12月，他被带到审判台上，经过秘密投票，他被判处死刑。第二年的1月21日，他被处死，几个月内，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其它的皇室成员也和他一样走上了断头台。

路易十六的斩首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从这时起，新的执政者带来了恐怖时期。在这时期里，巴黎的街道上血流成河。在以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仅巴黎就有5千多名“人民之敌”走上了断头台，其它各省的死亡人数至少有三倍之多。国民议会本身为一帮激进领袖所取代，他们自封为公共安全委员会，行使绝对权力管理整个国家。

这些激进分子通过残杀或监禁皇族和温和主义分子中的政敌而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现在他们自己也开始争吵起来。到了公元1794年中期，马拉被暗杀，丹东、德穆兰，甚至罗伯斯庇尔都先后走上了断头台。罗伯斯庇尔的死标志着恐怖时代的结束。公元1795年，法国实施了一个新宪法，建立了一个共和督政府，督政府的行政和任免权由立法机关选出的五名总督担任。

督政府只延续到公元1799年。从一开始它就困难重重。总督自身就是政治上的低能儿，无法控制具有毁灭性的政治派性，而且也明显地不愿阻止内部贪污和堕落，从而使政府走上了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政府的资金落到了贪官污吏的腰包里，总督们得应付对外战争所需的开销，所以他们发行纸券，从而导致了纸券滥发，最后不得不取消。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督政府的阴暗统治中，唯一使他们感到宽慰的正是这些花费巨大的对外战争。幸亏当时还未出名的将领拿破仑·波拿巴的努力，法国军队才在意大利和埃及战无不胜，在其他将领的领导下，法军进入了莱茵河。拿破仑曾经在

叙利亚受挫，在尼罗河口同英国海军司令纳尔逊勋爵的海战中又败北了。但是这位超群出众的将官人缘很好，所以能够将这些败绩化大为小，从而使他成了当时的英雄。

到了公元1799年，公众对科西嘉将领的热情已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于是他成功地发动了伟大政变。拿破仑用忠诚的部队包围了立法机关，威胁大会推翻督政府，制定一部新宪法，在这宪法里，他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官。因此，十年之间法国经历了一个大循环，从封建王国，经君主立宪，人民共和国政府，委员会煽动，直到最后沉入到最低形式——军事独裁。几年之间，这个循环得以完成，法国重又回到保皇主义，先是以帝国形式，然后以"合法"手续重建波旁王朝。在令人陶醉的天才拿破仑·波拿巴的领导下，法国一度重又获得了从前的荣耀，一跃而登上了世界领袖的宝座。但好景不长，法国最终还是走向了彻底崩溃。

拿破仑时代

拿破仑在第一执政期的五年中（1799—1804），进行了一系列神奇的管理，其轰动程度不亚于战争上的胜利。他清除了国家政府里令人厌恶的堕落现象，由本人接管大多数立法事务，从而根除了立法机关的优柔寡断。他几乎清除了各个城市各个部门的选民官，将自己任命的亲信安排在这些位置上，从而建立了高度的集权统治。简而言之，他很快将法国变成了一个四平八稳的独裁统治，同从前的混乱不堪形成了戏剧般的对比。拿破仑公开宣称自己是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革命理想的提倡者，继续执行消灭等级特权的政策，从而使他深孚众望，个人势力也得到了加强。法国历经磨难，试图建立民众统治，但最后还是心甘情愿地将辛辛苦苦得来的政治和社会自由拱手让给了一人独自统治，而这个人似乎有能力使得国家机构运转。

一旦牢牢地巩固了统治，拿破仑就进行各方面的改革。他修

改了税务结构，建立了公共开销所急需的经济措施，财政恢复的高峰是建立法国银行，这个银行从此成为世界上最为健全的金融机构之一。他重建了天主教会（尽管他控制了教会的许多活动），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公立学校制度，鼓励各种作品的公开发表，保护艺术和文学，而且他还巩固和澄清了一大堆前后矛盾、混乱不堪的法典，将它们变成了著名的拿破仑法典，这个法典成为欧洲大多数国家以及新世界的立法楷模。所有这些改革，虽然最终宗旨是集中政府功能，提高拿破仑的威望，但是它们行之有效，其启蒙思想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机会主义，产生了法国生活中永久保留的基本惯例。

在国际事务上，拿破仑同样一帆风顺。公元1800—1801年他成功地打败了奥地利，迫使她签订了《路那维尔条约》。公元1802年，他还同英国缔结了《亚眠条约》，结束了同英国的战争，从而使法国十年间第一次变得国泰民安。在这些成功的顶峰之上，他召开了一个平民大会，选举他当终身第一执政官。在这个职务基础上，只要迈一小步就可以使这个职位世袭化，将头衔变成皇帝。拿破仑每迈一步都很傲慢、自信，这一步也不例外。公元1804年12月的第二天，拿破仑当着教皇庇乌七世的面将皇冠戴到了自己头上，宣称自己为拿破仑一世，法兰西的皇帝。

头衔的变动并没有改变多少法国人的生活，但是拿破仑现在深信他的影响甚至可以波及到阴间，因而胆子比以前更大，野心也更强。公元1803年，拿破仑重新对英宣战。公元1805年，奥地利，俄罗斯，瑞典和英国人联合起来，组成所谓的第三联盟，其公开宗旨就是要将拿破仑彻底逐出欧洲舞台。第一帝国的十年史是一部连绵不断，逐渐加深的战争史。对于战争的详细情节，联盟与反联盟，混乱不堪且迅速完结的条约，我们这里不作详细论述。应该说明的是拿破仑尽管有时打败仗，但他的魅力和声望却是越来越高，到了公元1808年，拿破仑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帝国的

统治者，而这个帝国从意大利延伸到丹麦，从直布罗陀延伸到华沙。在这片领土里，只有葡萄牙和普鲁士独立于法国的统治。波拿巴家族的成员领导着西班牙、拿不勒斯、荷兰以及小国家洛迦，在这帝国之外，拿破仑将丹麦和俄国的统治者看作他的朋友和支持者。奥地利和普鲁士已降成了三类势力，只有大不列颠还在顽强不息地抗击这位欧洲巨人。

故事的结局成了希腊悲剧的一个主题。帝国的最后六年目睹了表面上看来战无不胜的波拿巴的狂妄傲慢，他的同盟的丧失，他的法国支持者的不满，他那奇迹般的军队的毁灭性崩溃，而且更为微妙的是这位伟大英雄本人身体和智力的缓慢衰退。帝国多少年来的个人统治足以同罗马的光辉荣耀相媲美，但是这统治所带来的严峻考验以及随之而来的掠夺军事胜利果实不可避免地敲响了他们的丧钟。公元1799年这位天才攫取第一执政官的时候只有30岁，精力充沛，到了公元1808年，他已39岁，但却变得老态龙钟，肥胖，自我放纵，体力不济，自私自利，贪得无厌，为了夺取更多的权力，他好像疯了一般。

拿破仑并不满足于主宰欧洲大陆，从当皇帝的时候起他就想推翻英国这个海上霸主。英国海军在尼罗河（1798），哥本哈根之外（1801）和特拉法尔加（1805）的胜利最终挫败了他的海上野心，使他采用经济抵制大不列颠，这就是闻名的大陆制度。在这制度下，英国货物不得进入欧洲大陆，因而剥夺了英国最巨大的出口市场。然而这个计划看起来简单，实施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欧洲沿海的许多城镇主要依赖英国海运为生。此外，从技术上来说，英国的产品比大陆的更为先进，生产出来的货物比它的对手更便宜，质量也更好，因此，同大陆产品相比，它更能吸引消费者的兴趣。在施行大陆制度的同时，拿破仑不仅要认真对付英国，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阻止自己的臣民及其同盟私下里和英国进行称心如意而常常又是必不可少的贸易。

很自然，英国并不愿俯首屈服于大陆抵制。她的反应是“咨询枢密院敕令”，这个敕令宣布所有前往法国的商船必须接受检查，而且这个敕令还进一步规定在某些情况下中立国的船员必须先在英国靠岸，然后方可驶向目的地。英国的反击造成了中立国的极大敌视，就像大陆制度造成了欧洲货主的敌视一样，它不仅成了公元1812年英美战争的直接起因，而且还使欧洲各国的人民备尝困苦。本来欧洲人就对拿破仑不满，这一举动无异于火上浇油。从长期的观点来看，造成第一帝国崩溃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难以实现的大陆制度，另一个则是日趋衰落的军事力量。

除了在经济战上逐渐失败，拿破仑在抗击西班牙和葡萄牙上也是艰难重重。公元1808年，西班牙人奋起反抗拿破仑的兄弟，波拿巴王约瑟夫，迫使他逃离西班牙，然后又成功地劝请英国派遣了一支由威灵顿公爵领导的军队帮助西班牙人将法国军队赶出伊比利亚半岛。经过五年的浴血奋战，崎岖不平的伊比利亚地形和无情的西班牙游击战术对拿破仑军队的不断骚扰，这位皇帝最后被迫认输。与此同时，奥地利要求自由，尽管没有成功，但它却分散了一大部分法国兵力，使它顾不及西班牙的问题。同样，普鲁士正在兴起的恢复国家主义运动使得法国皇帝进退维谷。但是代价最大的还是公元1812年的俄法之战，这场战争迫使拿破仑将其大军的主要兵力用来对付从前的盟友亚历山大沙皇。法国军队采取“焦土”政策，直捣莫斯科，然后粗心地将它点上大火，结果这个举动毁掉了他们潜在的食物供应，于是，面对着饥荒，游击队的袭击以及俄罗斯的冬天，大军被迫沿着荒芜的来路进行漫长而可怕的撤退。这是历史上最惨的败仗之一。

拿破仑的威信急剧下降，他的大军撤出莫斯科后死亡大半，剩下的只会有损他的傲慢。要想恢复起来还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公元1812年战败后，一回到巴黎，拿破仑就立即征募了一个新的军队，迅速恢复力量，于公元1812年5月在卢琛和鲍琛暂

时打败了俄普联军。8月份在德累斯顿又打了一次胜仗，但是，到了10月16日至19日，整个形势完全逆转，在莱比锡“联军之战”中，他彻底战败，损兵折将7万人不得不沿着莱茵河落荒而逃。莱比锡之战后，留下的问题只是肃清残敌。拿破仑困兽犹斗，但是问题却不那么简单。公元1814年4月13日，走投无路的皇帝被迫签订了《芳丹白露条约》，放弃王位，到厄尔巴小岛去领取一年一度的养老金。他的王位由被斩首的国王之弟，大腹便便庸庸碌碌的波旁成员路易十八接任。

公元1814年秋天，同盟国召开维也纳大会，准备恢复秩序，进行分赃。到了2月份，这项行动缓慢的国际性纸牌游戏突然陷入一阵狂乱之中。波拿巴回来了！这位压抑不住的前皇帝和700名忠诚支持者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驶出厄尔巴岛，没经抵抗就登上了法国海岸，还没等政变消息传到巴黎或维也纳，拿破仑就已集结了一大批军队。只要一提拿破仑这神奇般的名字，群众就会涌跃参加。

国际同盟迅速行动。他们忘却了会谈桌上的分歧，再次拿起武器，直捣巴黎。经过几个小小的行动后，竞争对手于6月18日在滑铁卢摆开全面战场。无论从军事还是从英雄史诗方面来说，这场战争都足以流芳百世。拿破仑从此一蹶不振。他那惊心动魄的百日政变就此结束，没有一丝永久复辟的希望。作为英国的囚徒，他被流放到非洲沿岸小岛圣·赫勒拿岛去追忆昔日的光辉时代，直到公元1821年5月5日死亡夺走他的生命。他的去世已成了一个传奇，他征服一切的野心和嗜血成性的战争已遭人遗忘，留在人们心目中的是一个人民的英雄孩子的新化身。与此同时，维也纳的纸牌游戏也宣告结束，波旁王朝重又登上了法国的王座。

注释：

①原注：当然，欧洲其它的国家也发生了民主浪潮，但时间较迟。比如，德国的“革命”发生在公元1848年，意大利的发生在公元1870年，俄国发生在公元1917年。其它的欧洲国家，如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则试图用缓慢的政治演变来和平地发展民主体制。

第十九章　德国折衷主义（1740—1870年）一个国家的追求

一、法国时代（1740—1770）

为了取代封建腐朽的波旁王朝，法国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探索，希望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与此同时，德意志各国也在为统一进行相同的持久斗争。从《魏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到《法兰克福和约》（1871），许许多多从前形成神圣罗马帝国核心的王国和小的公国互相倾轧，争取优势。一会儿结盟，一会儿又毁盟，一会儿联合，一会儿又分离，频繁程度看上去杂乱无章，不合情理。它不仅使当时的欧洲政治生活，而且使今天的欧洲历史研究者感到困惑不堪。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神圣罗马帝国（借用一句陈词滥调，实际上它既非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由大约300个独立的德意志城市和城邦组成。它有一个议会，出于形式目的，它偶尔会会面。它甚至还有一个皇帝，通常是一位奥地利哈布斯堡皇族的成员，他的皇帝头衔的获得完全是出于礼貌。尽管这个神奇“帝国”的臣民享有一种语言和文化的共同契约，但是直到19世纪人们才下定决心要将这个一流势力和喜歌剧似的小公国变成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

公元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在此后的100年里，德意志

各国在政治和思想上一直停滞不前。卑劣的王子利用这种惰性对其孤立无援的臣民施行暴虐，对土地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以供其享乐，并且在这行将灭亡的帝国里谋求私利。从前繁荣昌盛的自由民阶层为三十年战争搞得倾家荡产，本来这个阶层里还可以出现一些社会或思想刺激，但是随着德意志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的衰竭，这种刺激也就无影无踪。

因此，难怪这时期的德国文学没有产生什么重要作品，即使产生了一些作品，主要也是模仿性的。18世纪上半叶，各种各样的宫廷贵族竞相模仿路易十四凡尔赛宫的豪华气派，而对真正的德意志文化兴趣不大。法国的服饰、建筑和内部装饰得到了刻意模仿。矫揉造作的17世纪法国妙语也得到了精心修习，而法国的繁文缛节更是得到了德意志人的喜爱。宫廷通常使用的是法语，德语被认为只适合自由民和农民。因此，那些博得宫廷好感的作家，如克里斯丁·哥特舍德，最有意识地模仿法国模式。这些文学之所以闪耀发光主要是因为他们模仿拉辛或高乃依僵硬的新古典主义或莫里哀或拉·封丹的机智妙语，虽然他们并没有抛弃德国的本土气息。由于德国思维和德国语言都不特别适合这些奇特的高卢表达方式，因此德国文学的“法国”时期并没有产生多少有价值的作品，这也不足为奇。

在德意志众多的“小凡尔赛宫”中，最著名的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的宫廷。从公元1740年到公元1786年，腓特烈大帝一直统治这个国家，他足智多谋，政绩卓著。到了这位著名的君主的时候，德意志已经从《魏斯特伐里亚和约》后的混乱中恢复过来，变得秩序井然。四个德意志国家，巴伐利亚、萨克森、奥地利和勃兰登堡—普鲁士已经形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实体，而后两个国家对欧洲力量的平衡更是举足轻重。和他的主要对手，哈布斯堡的玛丽亚·特蕾莎一同上台的腓特烈将其大部分统治时间都用于政治阴谋以及对其主要敌人奥地利的频繁战争上。18世

纪战争蜂起，牵涉到的国家很多。只要战争给普鲁士带来额外声誉，腓特烈就绝不袖手旁观。在奥地利继承人之战(1740—1748)，七年战争（1757—1763）以及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战争（1772）中，他成功地打败了奥地利，将普鲁士排到欧洲各国的前列。

然而除了战争和谋略，腓特烈过的还是一个开明的暴君生活。他进行了经济和农业改革，改善了普鲁士的教育制度，而且更为主要的是鼓励科学艺术的发展。他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和文学天才，因此他将他的宫廷变成一个豪华的沙龙，当时欧洲主要的哲学家、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经常是他的座上客。这些客人中大多是法国人（伏尔泰本人曾来过），他们的出现只会加重德国人对法国艺术形式的狂热爱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法国作品摆脱了黄金时代枯燥无味的形式主义，变得越来越开明，越来越具社会意识。作为一个即将进入革命时期的国家，其思想的传播只会促进德意志的国家意识。此外，尽管腓特烈大帝对德国艺术兴趣不大，但是德国思想家们有一位民族英雄。他们可以作为新生的德意志文化的象征聚集在他的周围。

因此，腓特烈大帝的宫廷极大地促进了整个民族的自我表现。尽管德国作家还在借鉴外国的文化，但它至少使这些作家有一种自尊感，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够达到更高层次的文化统一和民族荣耀。结果到了18世纪下半叶，德国文学终于开始表现民族个性，并在欧洲的思想生活中崭露头角。

二、英国影响（1750—1770）

尽管腓特烈大帝的宫廷非常宠爱法国的思想和艺术创作模式，但是德国文学复兴的最大动力还是来自英国。甚至还在18世纪上半叶，一些德国小诗人就开始模仿蒲柏、汤姆逊、普赖尔和盖伊。而最后两人的作品被不断地译成德语。笛福的《鲁滨逊漂

流记》（1719）深受德国小说家的喜爱，在以后的100年里被广为模仿。①塞缪尔·理查逊的感伤小说也大受欢迎，德国的书摊上充斥着《帕美拉》和《克拉丽莎·哈洛》的拙劣模仿。更为重要的是对姗姗来迟的弥尔顿和莎士比亚的认识。公元1773年，弗里德里布·克罗卜史托克经过25年的创作努力完成了弥尔顿式的《救世主》，从此德国文学有了第一部伟大的现代史诗，而C·M·魏兰（1762—1766）以及后来A·W·施雷格尔的莎士比亚译本则使这位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的戏剧家深为德国人所钟爱，对德国的剧作就像在讲英语的国家一样产生了很大影响。

英国对德国文学的影响最好地体现在G·E·莱辛（1729—1781)的创作生涯里。莱辛本人是一位伟大的评论家和剧作家，从早年起他就认识到一部德国戏剧如果要想发展就应按照英国的形式，而不是追随呆板的法国黄金时代的新古典主义。他的早期戏剧《萨拉·萨姆逊小姐》（1755），副标题为《一部日常生活的悲剧》，就是模仿英国戏剧家乔治·李洛的《伦敦商人》(1731)②所创立起来的日常生活剧。《萨拉·萨姆逊小姐》深受欢迎，一下子消除了人们对法国贵族悲剧的兴趣，使得戏剧家转去创作“日常生活悲剧”，直到日常生活剧成为德国戏剧文学中一个根深蒂固的体裁。莱辛自己的《明娜·冯·巴尔赫姆》（1767）被列入历代戏剧杰作，而他的《拉奥孔》（1766）和《汉堡剧评》（1767—1768）则可以列入最早的文学批评里。莱辛曾当过短暂但却很重要的汉堡剧院的导演，因而可以实际体验一下英国式的戏剧艺术理论，他对早期德国的文学复兴产生了主要影响。后来，在《爱米丽雅·迦洛蒂》（1772）和《智者纳坦》（1779）里，莱辛可以说不再依赖英国模式而创作出真正的民族戏剧。总而言之，通过将戏剧从古典主义和幻境中解放出来，莱辛为杰出的戏剧复兴铺平了道路，从而产生了席勒和哥德的辉煌作品，使得德国文学声誉鹊起。

这里还必须提及英国对德国文学影响的另一个例子。这就是假托奥西安的凯尔特史诗。这首史诗经过苏格兰人J·W·麦克弗森1762年的“发现”和“翻译”，像一场草原风暴横扫欧洲和美洲，对浪漫主义运动的早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③。1768年至1769年，经过奥地利人M·丹尼斯的翻译，这首诗歌深受欢迎，和莎士比亚及弥尔顿一起对德国文学的狂飙突进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狂飙突进运动（1770—1790）

有趣的是，德国艺术的飞速发展和欧洲政治生活的复苏期互为吻合。普鲁士和腓特烈大帝的崛起使得文学之壶在徐徐沸腾；美国和法国民主理想的兴起则使它烧到了沸点，产生了生机勃勃的狂飙突进运动。后来拿破仑战争又和德国浪漫主义的繁茂相吻合，而1830年法国的七月起义和1848年大陆起义总浪潮之间的动荡不安的年代体现在青年德意志运动上。后来俾斯麦上台，德国最终得到了统一，这时期的总特征是乐观主义，但也常有无情的文学国家主义，产生了F·W·尼采哲学这样空前绝后的作品。恐怕除了尼采，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各个阶级的特征是精力充沛，生机勃勃。年轻的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对转折中的世界里激动人心的思想潮流非常敏感，他们想打破过去的文学形式和传统，寻求新的表达媒介以陪伴启蒙革命时代所迸发出来的令人陶醉的新思想。可以争辩的是1770年至1870年间，大多数文学动力起源于缓慢而必然的德国统一，起源于对国家命运感的自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德国最终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得到了统一时，德国文学复兴的大部分精力业已耗尽，从而成了这个模式的唯一缺陷。

狂飙突进运动作为最早的青年冲动起源于1770年冬天的施特

拉斯堡，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作家J·F·赫尔德尔向一群诗人(包括年轻的歌德)宣传莎士比亚的伟大，卢梭的感情敏感性和开明的社会思想，还有德国民间文学里尚未被发掘的一大批宝贵财富。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这个运动就迸发起来，大量的德国民歌集开始出现，许多诗人模仿民歌里那简单动人的文体进行诗歌创作，每个人的手上都有一本有关一般民众生活的感伤小说和戏剧，而光芒四射的则是卢梭的人道主义精神，感伤情调，热爱自然以及相信简单心灵的直觉善行。这些书中最为突出的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这本爱情受阻的感伤故事使得欧洲人大为倾倒，整个一代年轻人都去模仿维特的服饰，模仿他绝望感情的痛苦，更有甚者，有人竟去自杀，以寻求最后的解脱。

除了效法"敏感"巨人卢梭外，狂飙突进运动作家还跟随革命家卢梭一起呼唤社会正义，反对根深蒂固的特权和牧师以及国王的腐朽专制。这些作品中较为著名的有歌德的《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1773)和《埃格蒙特》(1788)，还有弗里德里希·席勒强烈个性化的作品《强盗》(1781)，在这部作品里，具有感伤情调的高贵领袖以自由的名义而战，将普通人从封建压迫的束缚中解救出来。不难想象，许多作品尽管流露出非凡的天才，但是同时也显得过分，愚蠢，甚至反社会。但是与此同时，这些作品也是不可抗拒的，它那巨大的活力将其追随者带到了一个新的文学表达高度，而且深深地渗透到一个伟大民族的心灵里。

四、浪漫式的古典主义(1790—1800)

德国文学借鉴其它国家的一个有趣的方面是古典主义成分，这种成分一度渗透到了歌德、席勒和其他狂飙突进运动作家的作品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诱惑还体现在浪漫主义时期其它国家的

文学里，但它所采取的形式是羡慕希腊的政府形式（卢梭特别喜爱斯巴达式的生活），或者更常见的是它融化成了一种病态的，常常是逃避现实的尚古主义。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方面就是喜爱废墟，希腊和意大利成了年轻诗人经常驻足的地方，他们参观罗马椭圆形竞技场或巴台农神殿，冥思苦想，对转瞬即逝的荣耀和名望感慨万千。歌德就是这样一位游客，他的意大利之行（1786—1788）使他成为世界著名诗人。他的古代大地之行不仅为《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1787）和《托夸多·塔索》（1790）这样的作品，还有《浮士德》和《威廉·迈斯特》的部分章节提供了直接灵感，而且还使他日趋成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文学使命。在歌德的后期作品里，狂飙突进运动的炽热灵感和古典主义的尊严，节制，以及永久魅力互为融合，最崇高地创作出了德国精神。

尽管席勒从未获得歌德那样的宁静，但在古典主义的影响下，他也日趋成熟，在《华伦斯坦》三部曲里，他极为成功地将希腊和莎士比亚悲剧的特点融合起来。其后期剧作《玛丽亚·斯图亚特》（1800）和《布劳特·冯·麦西那》（1803）获得了同样巧妙的结合，尽管不那么引人注目。从此，席勒放弃了硕果累累的尝试。他对歌德写道："mit den griechen Dingen ist es eben eine missliche Sache auf unserm Theater"（大意为："关心希腊形式是我们戏剧的一大不幸"），此后他竭尽全力，泰然自若地去创作浪漫主义作品。

德国文学中的古典插曲除了歌德和席勒这两位巨人外没有吸引几位作家，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它不仅使这两位大诗人的诗歌创作日趋成熟，而且还使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在欧洲文学里极为成功地融合起来。此外，它还同法国黄金时代里那僵硬造作的新古典主义分开，从而帮助人们了解和欣赏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作品。歌德在《浮士德》第二部特洛伊的海伦一场里高度称颂了

希腊，从此，古代希腊文化再也不需要法兰西学院的精致教条主义来弘扬它的真正荣耀了。

五、浪漫主义运动的顶峰（1780—1850）

我们已经指出德国文学的各个阶段通常同欧洲舞台的政治发展密切相联。因此可以预料，拿破仑的生涯对19世纪早期的文学势力进入浪漫主义运动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我们在第十六章里对这一运动的宗旨和显著特征已经作了描绘，现在我们看到有许多现象已经体现在德国文学的狂飙突进运动上。所以拿破仑战争对德国文学的主要影响就是集中这些零散的势力，然后集中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由于德意志各个国家的极端专制，所以深受约束的作家政治表达机会一直受到严格限制。由于革命悬而未决，所以18世纪末的德国作家只能发发个人情感或隐隐流露出革命情趣，唯恐遭到政府部门的严厉报复。狂飙突进运动有时滥用感情，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作者渴望自由和政治改革更加具体，更加有力，而且更加具有地方色彩，但是这些渴望受到了挫折，而且他们也无法做到，因为有一双审查之手在时时地伴随着他们。

拿破仑出现后一切不同了。面对日益强大的法兰西帝国，德国国内的爱国民族主义不再遭人怀疑，拿破仑成了一个恶棍，他威胁说要灭绝德国人的生存，因而可以被用作所有社会意识强烈的作家去表达深受压抑的政治感情的替罪羊④。法兰西皇帝在滑铁卢最后战败后，欧洲明显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首要的问题就是要重建大陆各国。

随着拿破仑灾难的结束和新的地平线的升起，一种新的感情自由精神横扫欧洲，带来了许多其它艺术的重大发展。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艺术都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是它享有政治地平线

的扩张精神，从而使思想和感情表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些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是文学、哲学和音乐。

甲、浪漫主义文学

18世纪后半叶德国文学里的古典插曲只是两种浪漫主义风暴之间的短暂平静。19世纪初出现了一种新的浪漫主义浪潮，同狂飙突进运动的感情洋溢相比，它没有中心，缺乏反叛精神；但在个性和感情上同样无拘无束。新浪漫主义的旗手是柏林的《雅典娜神庙》杂志，由奥古斯特·W·和弗里德里希·施雷格尔兄弟俩创办。哥哥奥古斯特曾出色地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戏剧。这兄弟俩既当评论家，又当运动的大祭司。他们的杂志《雅典娜神庙》成了当时所有有抱负的作家的"圣经"。这个杂志的最大成就是超越纯批评价值的限制，发展阐述性的创作艺术。《雅典娜神庙》清晰，透彻地分析文学作品，缩短了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差距，使得有文化的人对创作艺术家的目的和方法有了更深的了解。

尽管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总素材和总特征同法国的没有多大区别，但是有些文学形式却是德国所特有的，这里应略作记述。其中最为独特的形式是歌曲（或抒情短诗）。歌曲的特点是简朴，富有乐感，因而同其它国家的抒情诗又有不同。歌曲的直接起源是18世纪对民间诗歌兴趣的复苏，后来亚宁姆和布伦塔诺于1805至1808年间在《青年羊角》上编成《民歌》集，于是歌曲便成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中最引人入胜的一方面。歌德、海涅、艾兴多尔夫、默里克，沙米索、缪勒，海泽以及其他许多作家的歌曲感情强烈，简洁微妙，这在抒情诗中是无与伦比的。经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或雨果·沃尔芙的谱曲，这些歌曲构成了一种美感经验，其它任何创作艺术都无法与之比拟。

和歌曲紧密相联的另一种文学形式是民间故事。作为一种散文化的歌曲，民间故事最有效的表达体现在J·L·提刻的作品里以及威廉和雅各·格林兄弟俩的著名童话里。后来人们对民间故

事的趣味日趋浓厚，从而对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传说重又发生了兴趣，如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罗恩格林》、《汤豪塞》和《尼伯龙根的指环》。

德国对其它文学的有效影响是日耳曼哥特传说。尽管形式本身和许多其它输入品一样来源于18世纪的英国，但它在19世纪的德国得到了充分发展。哥特传说的基本成分是荒诞不经，悬念十足，异想天开，而且常常是耸人听闻。最能体现这些特征的作家是E·T·W霍夫曼（1776—1822）和所谓的海德堡学派。我们在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里经常可以看到这类作品的模仿。

最后是德国戏剧。在狂飙突进运动时期德国戏剧得到了复苏，现在在席勒和歌德的后期作品里达到了顶峰。在席勒的《奥尔良的姑娘》（1801）一部有关圣女贞德的戏剧和《威廉·退尔》（1804）里，我们有了政治理想剧的最高表达法。而歌德的《浮士德》则是最伟大的哲理剧。它融合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政治与个人，崇高与民间传说，从而对整个浪漫主义运动作了最崇高的注解。

1832年歌德去世后，德国浪漫主义后期的特征是青年德意志运动的革命精神的复苏。1830年巴黎的七月起义和1848年的人民起义给青年德意志运动以极大鼓舞。可以说，他们主要是以文学形式来表达广泛而深远的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愿望。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个德国的长久梦想似乎可以实现，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诡计多端的梅特涅的保守政策使得德意志继续处于分裂无能的状态，于是一种爱国骚动发展起来，最终导致了1848年的流产起义。

这段政治冲突时期所产生的大部分文学都公开反对浪漫主义。它嘲弄前期感伤的自然崇拜和自我陶醉的个人主义，将注意力转到了社会改革，有争议的新闻报刊和政治哲学化上。这时期

所创作的作品大都平庸无奇，昙花一现。但是由于它还促进海因里希·海涅创作了一些最好的作品，由于它使年轻的理查德·瓦格纳日趋成熟，因此我们不能把它当作贫瘠时期而在德国艺术史上一笔注销。

乙，浪漫主义哲学

德国浪漫主义的第二个伟大发展是哲学。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主要基调是个人主义和道德观念。它既激起了人们的自由欲望，同时又散布了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精神，避免个人主义堕落到自私自利式的放纵。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德国唯心主义者是伊曼纽尔·康德(1721—1804)。他的作品形成了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的过渡。康德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自然地理学家和哲学家，是18世纪理性主义的产物，正是实验室的长期生涯使他确信上帝只有通过自然现象的媒介才可为世人所清楚了解，而不是通过神学教义。但是作为一名科学家，他也承认上帝只是一种假设，人类靠其理性的尘世根本无法直接证明上帝的存在。因此，我们所不能证明的，我们要用直觉去接受。人的道德观，内在德行观以及追求五官王国之外的价值表明有一个更高的法则，这个更高法则作为一个“范畴规则”控制人类，缓和他纯物质的和自私的欲望，使它们屈服于道德和精神需求。

康德的崇高理想主义之后是J·G·费希特（1762—1814）的爱国个人主义。费希特认为他老师的“范畴规则”不仅是一种思想原则，而且还是一种动力，迫使每个人去获取更高的成就。作为一名热忱爱国者，费希特将这动力原则运用到德意志精神上，因而极大地推动了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复苏，鼓励他们英勇抗击拿破仑。

费希特将康德的思想转变成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的同时，弗里德里希·W·J·谢林（1775—1854）则将它们发展成为一种宁静、沉思的自然哲学。和斯宾诺沙和康德的无所不在的更高法则

观一样，谢林相信拥有万物的宇宙灵魂，这种宇宙灵魂通过自然的可见现象清楚地体现在人的感官世界里。此外，他还看到个人与自然之间有一种绝对的同一，二者都部分地体现了宇宙灵魂，这种宇宙灵魂拥有并统一了所有的现象。我们看到这种神秘的自然哲学反映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泛神论精神，因此，谢林作品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本国，它还超出了德国本土（特别是对柯勒律治，雪莱和爱默生这样的作家产生了影响）。

同样唯心主义但却不太缥缈的是黑格尔（1770—1831）的思想。黑格尔是19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彻底补充了当时的物种起源研究，为达尔文和马克思铺平了道路。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核心在于他的斗争进化观。宇宙里的每一种力量（命题）都有一种反力量（对立面）。从这两种力量的冲突中产生出一种新的成分（综合），这种成分融合了前面这对敌对力量中更强大，也更好的一面。因此，社会就像个别有机体一样处在不断骚动之中，但是这种骚动并不会带来混乱和分解，相反，它会使最好的生存下来，不合需要的淘汰出去。很明显，这种年深月久的人类进化观一定是很乐观的，但是同样明显的是，他认为斗争是很自然的，并且将强者生存和善者生存相提并论，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早期康德的道德唯心主义，在黑格尔看来，社会在其无情的进化过程中要想获得更高层次的生存，罪恶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

同黑格尔的乐观主义截然不同的是亚瑟·叔本华（1788—1860）的悲观思想。叔本华是个康德主义者，他接受了宇宙道德精神超越了理性价值和可观世界的推测，并进而表明意识世界，也即思想世界，只不过是真实世界的一个可怜阴影，而这个真实世界存在于意志之中。一切直觉和反应实际上来自内部，来自意志，而所有的外部现象只不过是下意识势力欲望的合理化。意志是不可更改的，人无法用理智来改变其天性——他只能稍稍收敛

或改变其内心冲动的外部形象。此外，意志冲动来源于人类自身机能不全或受苦受难感，一个心满意足的天性只会平静无事。因此，人的冲动必须永远来源于人的痛苦，既然人的理智和意识生存无力改变这些基本冲动，那么很明显人必须永远不幸，直到他的意志在彻底宁静中得到满足，而这种彻底宁静就是死亡。尽管叔本华的哲学直到19世纪后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它成了现代悲观思潮极为重要的来源。这种影响特别体现在弗洛伊德的作品里，他的心理学理论对20世纪的生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而叔本华哲学在艺术领域里的影响则最好地体现在理查德.瓦格纳的伟大音乐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达》和托马斯·曼的不朽小说里。

丙、浪漫主义音乐

德国浪漫主义最令人满意的发展大概要算音乐了。从《英雄交响曲》（1803）开始，贝多芬深思熟虑地迈开了音乐表现的"新步伐"，从而使德国交响乐和歌剧作品同海顿和莫扎特的古典形式主义截然分开，赋予它们以清晰明了的浪漫性个人主义特征。贝多芬后期创作的弦乐四重奏、威柏民族歌剧里的民族主题以及舒伯特优雅的歌曲无论在气氛还是在表现方式上都同18世纪的维也纳作曲家有所不同，就像维也纳乐派和巴赫的巴罗克对位法不同一样。

随着第二或第三代浪漫主义作曲家的出现，丰富多彩，个人感情强烈的音乐之流一点也没放慢。尽管舒曼和门德尔松的作品没有贝多芬的深奥，而且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敌得过舒伯特非凡的抒情天赋，但是他们的交响乐和歌曲形成了一个愉快而迷人的插曲，为早期浪漫主义与勃拉姆斯和瓦格纳架起了一座联结桥梁。在这个时代，前者的交响乐气势雄伟，而拜雷特⑤大师的音乐剧则高耸云霄，甚至在他们之后，浪漫主义之流依然在理查德·斯特劳斯、雨果·沃尔夫以及年轻的阿诺德·勋伯格的作品里潺潺

流动。此外，德国音乐对其它国家的作曲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19世纪几乎所有的西方音乐都深深地扎根于德国土壤。总而言之，德国人值得骄傲的是她产生了人类为数不多的浪漫主义作曲家的音乐，这个音乐“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

六、国家主义的胜利（1848—1870）

从1848到1870年这段时间里，德国的文学以及类似的艺术停滞不前。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年代毕竟没有在政府里建立自由的原则，而且也没有带来德国大众所渴望的国家统一。在这种情形下，早期浪漫主义的乐观精神已彻底消除，创造伟大作品的欲望也无影无踪。⑥直到普法战争（1870—1871）结束，德国人的创作精神才重见天日，重新开始1848年之前的丰富的创作。

然而，从政治上来说，这段时期所产生的更多的则是具有决定性的活动。尽管自由主义在1848年的德国遭到了严重挫折，但是国家主义从未被人遗忘（无论是在保守派还是在自由派中都很盛行）。到了1860年，在威廉一世的领导下，普鲁士开始起步，建立起德意志各国的优势，1862年，俾斯麦担任首相，从而为实现这个目的迈开了一大步。尽管俾斯麦是个保守主义者，但他一开始就采取进攻政策。他宣布，德国所需要的不是爱国演讲和导致1848年惨败的虔诚决心，而是一种“铁血”政策，而这种政策只能用从前的抽象思想所没有产生的武力去获得。

俾斯麦遵循不择手段这个原则，相应地建立了一支庞大而有效的军队，并进而进攻丹麦（1864）和奥地利（1866），战争时间虽短，但却硕果累累。前者导致了普鲁士疆土的扩大，后者则粉碎了普鲁士优势的头号敌人。接下来一步就是将25个左右的重要德意志国家合并到紧密相联的北德意志联邦（1867）里，这样一来就只有奥地利、巴伐利亚、沃滕堡、巴登和黑斯——达姆希达

特成为独立的实体。1870—1871年爆发了普法战争，这场战争将奥地利之外尚未合并的德意志南方各国列入普鲁士同盟，随着法国的彻底战败，德意志爱国之心一浪高似一浪，从而消除了德意志内部的嫉妒精神。

1871年1月18日，德国迈开了一大步，宣布普鲁士王威廉一世为德国的皇帝。寻求统一的长久斗争结束了。当然，这种统一并不完全，因为奥地利仍在帝国之外，而且南方的一些国家尽管成了联邦的一部分，但是它们还保留了虚设的独立君主国。实际上300多个8世纪的自治政治单位最终集合在一个强大而实用的政府里了。诗人和哲学家朝思暮想的实现了：终于有了一个统一了的德国。但是霍亨索伦帝国大旗下的德国远不是他们所梦寐以求的自由兄弟会。而且，等到统一最终实现了的时候，大多数文学梦想家已经作古，随他们一同而去的是德国黄金时代的创作艺术。

注释：

①原注：在德意志，几乎每个国家都有“鲁滨逊”——有撒克逊鲁滨逊，图林吉恩鲁滨逊，斯瓦边鲁滨逊，等等。还有精神鲁滨逊，医学鲁滨逊，甚至还有少女鲁滨逊。这些鲁滨逊中大多数都是些不值钱的廉价罗曼史，但是四卷本的《阿尔伯特斯·裘力斯》（1731—1743）却是一本鲁滨逊式的作品，在18世纪小说中最受欢迎。最为著名的是韦司的《瑞士家族鲁滨逊》（1812—1827），其名气经久不衰，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

②原注：然而《萨拉·萨姆逊小姐》中的流泪情节可能受到汤姆斯·沙德威尔的《阿拉沙夏的乡绅》（1688）的启发。

③原注：麦克弗森声称在他所发现的古代手稿中有3世纪爱尔兰史诗作者奥西安的诗歌。批评家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指控这是伪作，麦克弗森为了保护自己，威胁说要上诉，但他从未出示手稿。现在人们公认这些文献是伪造的，奥西安诗歌总的来说是麦克弗森本人的作品。不过不管它是真还是假，它对后半个世纪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④原注：然而在德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恨拿破仑。在他一生的开始，他有许多朋友和支持者，如歌德，他们错误地将他看成是法国大革命的真正儿子，只是当他的无情野心日趋明显的时候，人们才对他感到仇视和恐惧。

⑤译注：巴伐利亚的一个小镇。

⑥原注：理查德·瓦格纳例外，他那些最伟大的音乐剧就创作于这段时期。然而有意义的是，除了《纽伦堡名歌手》外，这些强烈的国家主义作品全部反映了浓郁的悲观主义。

第二十章　拿破仑后的法国：自然主义的崛起

一、自然主义态度

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崇高理想主义、民主信仰、人类永久进步的希望以及激动人心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相反，拿破仑后的法国充满了悲观和绝望。随着软弱无能的波旁王朝的复辟，早期浪漫主义的一腔希望顿时化为一种使人灰心的世间烦恼，随着时代的前进，这种烦恼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越来越神经错乱。到了80年代，这种失败主义精神驱使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投身于痛苦而非常现实的运动，即自然主义运动。

同卢梭或夏多布里昂的感伤希望或百科全书派认为人类通过理智可以获得永久进步的信仰相反，文学自然主义者认为人只是机遇的一个孤弱动物，一个混乱不堪、毫无意义的宇宙中的一个纯化学现象。他们认为人的生存没有形式，没有理想，没有道德，甚至没有上帝。人类这个可怜虫发觉自己如同沙漠上的一颗风滚草，给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漫无目的地吹来吹去。作为遗传和环境这些神秘莫测的复杂性的牺牲品，人类无依无靠，到处挣扎，而他所生活其中的世界对他这种迷茫的挣扎却漠不关心。

人的一生充其量不过是对他所无法理解的刺激场所做的一系列机遇式的生化反应，骗人的神学语言除外。他谈论灵魂、不朽和人形上帝来充实其生活。对自然主义者来说，赋予生活以精神意义的努力是疯狂，正如左拉所说："一切都不神秘；人类只不过是各种现象和各种现象的条件。"

很明显，欧洲这种悲观决定论的起源在于法国民主试验的不断失败，在于毫不相关的科学探索的及时兴起，特别是进化生物学领域的激荡发展。详细地研究一下这两种因素对于理解文学自然主义的来龙去脉是很有必要的。

二、拿破仑后的法国

产生自然主义的悲观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1815年波拿巴的垮台。拿破仑的帝国之梦变成了百日和滑铁卢恶梦之后，法国发现自己正急剧退回到波旁王朝保守主义的荡析离居之中。辉煌革命成了一个流产了的屠宰场："人民的救世者"拿破仑原来是一个伟大的摧毁者。自从1812年拿破仑大军在俄罗斯溃败后，现实主义思想家就一直在摇头，预见到了一个坏的结局。现在他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在路易十八的领导下，君主国得到了复辟，而这位胆小、智力迟钝的波旁王族甚至还没有他那位被废黜的哥哥路易十六鼓舞人心。

然而，这位新国王很有头脑，他清醒地意识到即使是一个失败而且精神崩溃的法国也不会再容忍另一个皇家暴君。因此他坚持君主立宪制，这样从表面上保留了一些大革命时期的理想，而同时又恢复了一个统治家族的传统威望。但是路易的这种退让并没有满足自由主义的需要。无论如何，君主政权的象征都是无法忍受的，过去的历史证明波旁王朝是最软弱无能的。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不久，这位前皇帝的传说就开始迅速传开，从

而使人们对波旁王朝更加不满。多愁善感的自由主义者开始将拿破仑同1789年精神等同起来，忘却了他过去机会主义式的专制统治，认为他是人类自由事业的殉难者，从而使他笼罩了一股感伤神秘主义的气氛。这些传说在战败国特别流行，而法国已失却了昔日欧洲各大家族的盟主地位，在路易十八及其反动继承人查理十世的庸庸碌碌的领导下，变得越来越不安分。受刺激最深的是一帮年轻知识分子，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尚未出世，还很年轻，记不起帝国的事情，他们将拿破仑的神话无限制地加以夸大，慷慨激昂地要求来一个改变，要求重建法国的荣耀，重新收回1815年丧失给同盟国的领土。1830年，查理十世为了遏制人们的喧闹，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发动了一场徒劳无益的进攻阿尔及尔的战争。趁这时期，起义者抢占了巴黎，迫使国王退位。

一旦胜利，这些造反派便重蹈覆辙，进行宗派斗争，从而拱手让出胜利果实。此时波拿巴派和共和派之间相互倾轧，于是温和的立宪派让另一个波旁成员路易·腓力浦继承查理十世的王位。路易·腓力浦是奥尔良公爵，其家庭比他的堂兄查理十世更为鄙俗，也更为自由。他曾赞同1789年的革命，1830年他极力吹捧他们的理想，以此来吸引自由主义者的注意。他以“上帝的恩惠和国家的意愿”就任法兰西国王，恢复革命时期的三色国旗，鼓励工业，声称作为一个国王，他只会“统治但不控制”。但是尽管他用心良苦，声明公正，但是还是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路易·腓力浦庸庸碌碌，是保皇主义过时体制的愚蠢象征。他的政策只受富有的工业主义者的欢迎。老牌的正统王权拥护者觉得他的思想太激进，而共和派以及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分子则觉得他太保守，不够民主。改革者觉得他不够进步，而沙文主义的波拿巴派则觉得他的“一切代价下的和平”政策有辱国威。总而言之，这位用心良苦的波旁成员的折衷政权四处受敌，几乎受到国内每一个政治团体的反对。

1848年，巴黎人的骚动已到了严重关头。2月22日和23日，一群学生和工人在协和广场发生暴乱。国王的大臣基佐竟然派兵前去镇压，结果杀死了23个人。这一鲁莽举动点燃了革命的火焰，2月24日，路易·腓力浦感到厌烦透顶，决定退位。第二法兰西共和国宣布在同一天成立。

1848年，"革命"最激烈，也最有效的是路易·布朗领导的社会主义者。一旦第二共和国建立，掌权的也就是布朗的党派。布朗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包括成年男子普选权以及政府支持的工业协会合作。后者的试验从一开始就遭到失败，因为私有企业一致反对；前者则事与愿违，因为第一次大选就回到了国民大会上，而国民大会的主要成员都是些温和主义者。于是在1848年12月第一次总统选举中，人民一致选举前皇帝的侄子路易—拿破仑王子为最高行政官。波拿巴这个神奇的名字再一次眩惑着法国；人们急切期望重新恢复从前的荣耀。1848年没人会料到三年之内这位新当选的救世主会像他的叔叔一样背叛共和国，自封为法兰西皇帝。

路易-波拿巴王子是19世纪最为阴险，也最善于恶意中伤的一个政客，靠着其无耻的机会主义生涯，他终于于1848年登上了最高行政官的宝座。1815年，这个随着波旁王朝的复辟而被流放的"拿破仑小帝"——正如维克多·雨果所轻蔑地称呼的那样——在流放期间写了许多浮夸的书籍和小册子，并于1831年吵吵闹闹但却毫不光彩地加入了意大利革命烧炭党运动，从而使拿破仑的传奇到处传播。在路易-腓力浦统治时期，他曾两次试图返回法国，但都失败了。有一次他被监禁在海姆堡，后来化装成一个工人，从城堡逃到了英国。在英国，他力图使他的名字家喻户晓，成为"法律和秩序"的公开象征。1848年6月，当他还在英国的时候，他就被选进国民代表大会里，以此称颂他本人所竭力宣扬的拿破仑传奇。这离最高行政官只有一步之遥。

在三年最高行政官期间，路易-拿破仑尽量地伪装民主，而与此同时他也小心翼翼地采取一切方式来培养反动的保守政策。他公开恭维工人，但在法律上却支持雇主，他将学校重又转回到天主教中；他披上民主的外衣来操纵法律，声称为了防止君主复辟，必须剥夺三分之一选民的选举权。当君主主义垄断的大会拒绝撤除选举法时，路易·拿破仑于1851年12月2日大胆发动政变，自封为临时独裁者，然后由公民投票修改宪法。12月21日，全体选民一致支持执政官，因此拿破仑可以建立一个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政府。1852年12月2日，也即政变后的一年，路易-波拿巴宣布成立第二帝国，自封为皇帝，帝号为拿破仑三世。历史重演，法兰西第二共和政府的尝试随着拿破仑这个伪民主的帝国政变而宣告结束。小拿破仑重蹈老拿破仑的覆辙，18年后在法国蒙辱垮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小伍长① 的势力和军事荣耀在拿破仑三世的颓废时代里丧失殆尽。

在第二帝国的18年里，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法国已成了“一间病房，里面的人们压低着声音说话”。尽管“拿破仑小帝”采取了惯用的调和民主的姿态，但他却将法国变成了一个警察政体，使用秘密警察，大规模政治监禁和剥夺人权这些常用的手段。他的外交事务更是不幸。为了分散对国内困境的注意，拿破仑扮演了一个徒劳无益的军事领袖角色，将法兰西帝国扩充到阿尔及尔和远东，支持英国和土耳其的克里米亚战争。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法国依然默默无闻．他还插手意大利事务，鼓励意大利统一。这最后一次冒险是一大错误，因为这样一来，拿破仑不仅失去了天主教的支持，同时也引起了自由主义者的憎恨，因为意大利虽然统一起来了，但它的自由情况比从前更糟。

面对国内的渐渐不满，拿破仑继续在国外乱闯。他想安排一个傀儡，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大公为“墨西哥之帝”（1862—1867），结果却激怒了美国人，降低了法国在世界人民中的威

望。1866年，普鲁士战胜奥地利，于是拿破仑想使用外交手段为法国赢得比利时，结果偏偏败在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手里。最后，1870年发生的一件事最为丢人：俾斯麦冷嘲热讽地促使法国对普鲁士宣战。从理论上来说，法国要想战胜普鲁士本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普鲁士当时的势力只能排在二流。但是俾斯麦慧眼识时代，他清楚地意识到法国已经处在困倦颓废之中。她的军队虚弱，她的精神已死，她的盟军不复存在，她的士气也随着拿破仑多年的肮脏阴谋而彻底消失。1870年9月4日，法国军队在色当一下子被战败，这个失败使得法国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变得艰难重重。拿破仑三世成了德国人的俘虏，第二帝国也宣告结束，而战争也就告一段落。到了1871年1月，普鲁士人进驻巴黎，经过100年左右政治自由事业的尝试，法国达到了羞辱和绝望的顶峰。

三、科学探索的发展

尽管19世纪法国政治上的不幸本身就足以驱散一切浪漫主义希望，但是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由于科学探索的进取精神而得到进一步加深，特别是进化论的发展。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洛克、狄德罗、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这样的哲学家曾指出了人和动物之间的相似之处，而德布奈和拉马克这样的自然历史学家则更上一层楼，提出了一切动物种类的衍化和发展证据，证明多少年以来已经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甚至还暗示一切动物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有机起源。我们都知道达尔文为进化论之“父”，实际上1859年《物种起源》的出版主要是巩固和普及业已传播的科学思想。

达尔文作品中最基本的是“自然选择”论。这种理论认为，在生存竞争中，那些偏离规范，适应环境的有机体最有希望生存。通过这种适应，这些非凡的有机体发展出自己的特征，然后

又将这些特征传给后代，使得这些特殊种类优于——甚至还有可能控制——那些难以适应生存之战的生物体。因此，在一个高度竞争化的宇宙里，只有适者生存，这种生存的方式是超越竞争有机体，甚至将它们从种族中彻底消灭。

当然，人和宇宙之间这种机械的，非道德的掠夺关系理论对公认的基督教神学标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自从哥白尼以来，还没有哪一种科学理论如此深刻地扰乱西方世界的信仰。达尔文主义成了19世纪大辩论的战场。这场争论的细节不必在这儿细述，可以说从这些杂乱无章的苛刻的讨论，宣言和炽热论战中产生了一种全新的人生现象观。当然，到了最后，只有双方的一些狂热者改变了态度，承认宗教和科学真理有可能同时并存，而这时已经有许多新鲜迷人的人类特性和责任观加入到人类思想宝库里。

关于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是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甚至在达尔文以前，这位杰出的法国哲学家就试图调和理性和信仰之间的长久论争，鼓吹二者可以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实证主义神学，其上帝就是人类本身。孔德认为人类思想史已经表明了一种进化趋势，使自己越来越适应人类生存的需要。他指出，思想已经经过了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人的思想和反应由权威控制；玄学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人类开始抽象而独立地推测；最后是实证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一切推测最终都基于可论证的科学事实。在第一阶段里，人类将一切宇宙现象归之于超自然因素——一个神或众多赋有人形的神祇，对他来说，这些神祇集势力、智慧和权威于一身。在第二阶段里，他抛弃了人形神祇的思想，认为宇宙的促动因素是自然法则或模糊的小自然势力。然而到了第三阶段，即实证主义阶段，没有什么需要推测的了。神秘主义、迷信、甚至精明的设想都已消失，因为人们对这个精密的，可论证的以及可预测的宇宙已经有所了解。一切现象的真正起因只有在科学术语和精确的数学中才

能理解。

尽管孔德认为人类在各门知识上不可能马上达到实证主义阶段，但他对这一发展的最终结局毫不怀疑。他指出：有些科学已经达到了这种最高境界，如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生物学正在向实证主义靠拢。迄今为止，人类对自己的习惯、环境、偏见以及禁忌都缺乏确切的了解。如果不用实验室的精确去研究和了解这些事情，那么人类将一直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直接影响他的真正现象。通过鼓励这种研究，孔德为后来的“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从而被公认为社会学之“父”，这一点他是当之无愧的。

在文学上，孔德最为著名的两个门徒是夏尔·奥古斯丁·圣·佩韦和伊波利特·泰纳。前者是一位形象高大影响深远的批评家，他运用传记背景去研究一个作者的作品，从而认为社会环境是评价文学思想和形象思维的一个重要因素。泰纳在其《英国文学史》（1864）序言里指出，文学不可同她所创作的时代相脱节，就像时代本身一样，文学受到“种族、时代和环境”的限制。随着进化思想的逐渐发展，很明显，值得严肃考虑的文学基础必须是彻底研究社会因素。

影响文学自然主义的另一个有力声音来自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是一位激进主义者，他的本土德国1848年民主革命的失败使他大失所望。他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其基础一半是黑格尔的“命题”，“对立面”和“综合”体系，一半是持续不断的社会进化论。对黑格尔来说，一切现实来源于两个截然相反的势力（命题和对立面）的相互冲突，这个冲突产生出一种新的势力（综合）。马克思将这个公式运用到社会上，认为只有从“有钱人”（资产阶级资本）和“无钱人”（无产阶级劳动）之间的相互冲突中，人类才能达到最高境界，产生一个无阶级，无财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个人的社会

成了一个共同单位。他认为，只有在一个国际集体主义社会里才能达到完全的社会平等。只用来保护私有财产的政府应该予以废除，因为没有私有财产需要保护。国家将属于所有的人民，民族将会消灭，全世界的人民将并肩劳动，普天之下皆兄弟，他们的满足方式不是积累个人财富，而是乐于为共同的利益服务。

很自然，马克思并不是一个感伤空想家，他不相信宣言就能获得这种开心的综合，相反，人类要制订出一长串螺旋形的社会演化。第一步是要培养一个工业化社会，产生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资产阶层。这自然而然地会产生无产阶级，或称工人阶级，他们会受到资产阶级资本势力的抑制和压迫，直到他们成熟，起来反抗他们的主人。第二步需要一次成功的世界性工人起义，接下来是无产阶级专政。当这种命题和对立面斗争结束的时候，一个无阶级，无财产的世界就会统一起来，没有政府，没有国家主义，也没有阶级区别。

如果说马克思辩证法的最高境界的信徒不多的话，那么他至少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斗争上，对提高经济势力的研究，加强人的理解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工人阶级在社会思想中占据了史无前例的位置，基于经济因素的生活（即斗争）观念甚至渗透到了保守主义者的脑海里。马克思的影响特别体现在文学里，生活的经济方面再也不容忽视，人们不能以屈尊俯就的方式将穷人的生活看成是“短暂而简单的编年史”而将它一笔勾销。文学主要是一部斗争记载，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规划里，大多数19世纪作家看到了新的探索海洋，这些作家所幻想的海洋正在扬起未来的波浪。

四、文学上的自然主义[2]

在这一章的前几部分里，我们已经勾勒出19世纪法国的政治

倒退和社会科学态度的相应发展。这两种发展的结果使得法国文学格调阴郁。人类要在一个民主世界里获得至善至美的浪漫主义观念业已破灭，而且科学进一步证明，人只不过是一种动物，相对而言，依然处在社会演化的早期阶段。孔德和马克思认为人类经过斗争最终可以获得幸福结局（尽管原因不同），但是这种观点对这些作家毫无影响。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现在，现在的人掠夺成性，意气沮丧，而且六神无主。人失去了一切神学和大多数的玄学寄托，觉得自己是无法预言的化学作用和化学反应的一个可怜虫，在模糊的自然力量控制下的世界里四处漂泊。此外，他还发现自己卷进了一场阶级斗争，一场冷酷无情的经济斗争之中。使人感到一丝慰藉的是，自然力量最终会得到解释，经济斗争最终会得到解决，左拉所描述的“胖子与瘦子”之间的斗争使得人们很少去考虑太平盛世。

很难说自然主义精神什么时候开始向法国文学渗透，大概是巴尔扎克及其著名的《人间喜剧》（1842）绪言。巴尔扎克从自然历史中得到启发，认为人类和其它动物一样是周围环境的产物，并根据周围的生活发展个人特征。因此，一个优秀小说家的素材应该来源于社会。

> 法国社会是真正的历史学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选择最重要的社会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特征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或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学家忘了写的那部伦理道德史……这个庞大计划不仅包括历史和社会批评，而且还包括对它的弊害的分析以及对它的原则的讨论，我觉得这个包罗万象的计划允许我将它取名为《人间喜剧》。

福楼拜在同乔治·桑的通信以及《包法利夫人》里，也同样

采取"科学的"方式，他说，一个艺术家不应该出现在自己的作品里，他应该客观地评判自己的人物，努力渗透到他们的灵魂深处，看清他们的五脏六腑。《包法利夫人》写得——

> 没有一个激烈篇章，没有一句作者的评论……没有抒情，没有议论；没有作者的个性。读起来将很阴郁；书里将有令人不快的事情——肮脏，堕落。

龚古尔兄弟也用科学的方法去创作小说。他们在1865年的日记里宣称："今天的小说来源于自然的叙述或复制文献，就像历史来源于书写文献一样。"他们将这条准则付诸行动，搜集了大量的第二帝国的生活资料，对肮脏和耸人听闻的材料尤为偏爱。

但是，"科学自然主义"第一位全面阐述者是埃米尔·左拉。左拉对达尔文主义者、孔德、马克思和泰纳感到心驰神往，他热情地将自己打扮成一个进化论者，一个实证主义者和一个唯物主义者。如果艺术家要想描绘生活，那么他就必须先从科学和"事物的自然演化"中去寻求生活的答案。在"实验小说"里，左拉指出作者就是一位实验室科学家，依靠遗传和社会环境背景去研究各个人物的反应。他声称："我们从生理学家的手上接过人就是为了从科学上去解答人在社会中的现实表现这个问题。"在多卷本的《卢贡·马卡尔家族》里，他研究了路易-拿破仑时期一个不愉快的家族的历史。当时以及以后的许多评论家都认为这个系列本身是一部廉价的危言耸听实际上却是一部真挚的小说，它试图描绘出资产阶级的衰败和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的斗争。主人公就是社会本身，从沙龙到煤矿，从大厦到妓院。没有感伤，没有乌托邦式的前途，这是一幅单调的颓废图画，一幅顽固不化的中产阶级社会在政治和道德上濒于毁灭的图画。

在这篇自然主义的起源概述里，我们看到它对现代主要的悲观主义已作了一番剖析。自然主义表明在一个逐渐变小、逐渐机械化和逐渐集体化的世界里，个人已经失去了他的尊严；它动摇了人的精神信仰，而这种信仰在从前的逆境中曾是他们的堡垒；它给未来只描绘了一些学院式的无法实现的乌托邦。19世纪末马修·阿诺德觉得自己“正站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亡，另一个软弱得还未出世。”1905年，亨利·亚当斯愠怒地看着发动机，觉得里面有一个无限的象征，一个疯狂而无人性的上帝正将世界领向离心混乱中。所以人总是在历史时代末期去思索，然而，推测中的人类死亡时的痛苦原来却是另一世界出生时的阵痛。培养文学自然主义的世界精神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绝望的声明，也有可能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新的无法预言的世界历史大循环的开始。

注释：

①译注：拿破仑一世的绰号。

②原注：这部分选自罗德·W·霍尔顿和赫伯特·W·爱德华滋《美国文学思潮背景》一书的第十一章，经过阿普尔顿-散丞里·克罗夫兹出版商的同意。

第二十一章　俄　罗　斯

由于幅员辽阔，因此俄罗斯的地理和气候可以简单描述为千姿百态，对比鲜明，北极平原气候寒冷，而黑海附近的亚热带地区则风和日丽。但是大多数描绘环境的俄罗斯作家习惯于将作品集中在外省的凄凉画面，光秃秃的平原，贫瘠的土地，严酷的冬

天，所有这一切使得贫穷者感到潦倒不堪，甚至连上层阶级都感到意气消沉。“到莫斯科去”的愿望成了契诃夫《三姐妹》的主题，剧本表现了人们梦想逃避乡村生活的阴暗面。

俄罗斯的沼泽地里河川纵横，它成了俄罗斯防止侵略的天然屏障，同时又是受难者的庇护所。三条大的河系养育了俄罗斯早期历史上的商业和俄罗斯赖以著称的广泛交际。它们还促进了商业中心，其中有四个已成为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城市中出类拔萃的贸易中心，这就是第聂伯河上的基辅，伏尔加河上的莫斯科以及伏尔可夫-涅瓦河系上的诺夫哥罗德和圣彼得堡。总的来说，俄罗斯的人口居住在小村庄里，农业是主要生计。公地使用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每年每个村庄根据“人手”多少而将优等、中等和次等的土地分给每个家庭。贫瘠的土地和错误的管理导致周期性的饥荒，而这一闹通常就是三年。

俄罗斯人口大都集中在严酷而空旷的乡村，这种生活经历形成了独特的俄罗斯传统气质。俄罗斯人吃苦耐劳，因而喜欢用宿命论的观点去看待一切烦恼，并且以能吃苦耐劳而感到骄傲。“维纳斯利伏斯特”是一个常用的俄罗斯词语，意为“经受住”。俄罗斯人还习惯于物质世界的空旷，喜欢广阔的思维。他很健谈，特别是一些哲学问题，谈话的内容主要是表达各人的思想观点，而不是像欧洲人那样集中讨论一个大家所关心的话题。他喜欢探索未知事物，对科学知识理论心驰神往；但他的思维方式主要是精神的而不是实务的，更富于幻想而不求精确。他不喜欢受约束。他喜欢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从而使俄罗斯得到了“逃避王国”的雅号。他思维很活跃，但却缺乏均衡感。和气候一样，他常走极端，一会儿他会激烈地迸发出炽热的感情，一会儿他又会感到沮丧，阴沉，陷于“黑色思维”之中。“俄罗斯的灵魂”就在于感情主义的融合和爱好推测，它成了俄罗斯作家全神贯注，兴趣甚浓的一个主题。

在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家族的专制统治下，俄罗斯历史的早期阶段（865—1240）为欧洲和基督教思想所垄断。①从1240年到1480年，这个国家遭到了入侵的亚洲鞑靼人的蹂躏，在这段时间里，封建制度开始引进。这些农民心甘情愿地做入侵者的奴隶。作为农奴，他们接受政府官员的统治，还得上交税收。正是在这段时期，莫斯科才成为中心首都，因为从各个村庄或公社一齐收集起来的贡品全被鞑靼人寄放在莫斯科。每一个公社都有一位选举出来的长者负责土地分配和税收，但他主要的还是国王的经纪人。许多农民反抗农奴似的压迫，并且移居到了南方，在这里他们组成了士兵—— 工人队伍，成功地击败了鞑靼人。这些所谓的哥萨克（意为“计件工”）建立了一个松散的政府，战争期间由选出来的首领或哥萨克将官专政。

俄罗斯个人统治体制在伊凡雷帝的漫长统治中(1547—1584)得到了加强。1547年他废除了特权贵族的统治，被加冕为沙皇（拉丁文凯撒的斯拉夫语形式）。伊凡智力过人，精力充沛。他召集了第一次国民选举大会，建立了一个请愿办公室，设立了一套当地自治政府制度，征兵抗击鞑靼人，并开始征服西伯利亚。他妻子的去世（他相信是被人毒死的）似乎改变了他的性格，使他获得了“雷帝”的称号。他撤除了从前的方案，建立了一个专制统治，犯下一系列的滔天罪行。伊凡雷帝死后，他大儿子的内兄鲍里斯·戈东诺夫又统治了六年，他的统治虽然朝气蓬勃，但是也混乱不堪。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暴力事件，宫廷阴谋和内战。鲍里斯被指控为谋杀了一个王子，而这个王子是本该继承王位的，被迫同一个觊觎王位者展开竞争，而这位觊觎王位者又受到波兰贵族的支持，尽管如此，鲍里斯还是设法加强了俄罗斯的力量，恢复了沙皇无上权威的传统。

大概是由于下毒，鲍里斯突然去世，从而使波兰人直捣莫斯科，将觊觎王位者扶上了克里姆林宫宝座，金银财宝给波兰人洗

劫一空。最后农民组织起来，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将波兰人赶出莫斯科，并推举迈克尔·罗曼诺夫为沙皇（1613）。在他的领导下，在从前的动荡中获得很大独立性的农奴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所有逃掉的又被迫返回来，只有哥萨克除外，因为他们太强大了。1649年，农奴开始注册。所有的农民及其子孙的名字都被记载下来，成为束缚农民的官方合法认可形式，这个人口普查为果戈里的《死魂灵》提供了基本情节。

真正使俄罗斯欧洲化的主要是彼得大帝（1682—1725）。作为一个什么都管的绝对君主，他组建了陆军和海军，强迫所有无业游民参加国家事务，创建俄罗斯工业并任命管工业的总监，建立了一个错综复杂的间接收税制，改革了字母，并且编辑了第一份报纸。他广游欧洲，将女儿嫁给欧洲王子，鼓励同欧洲的接触，贵族们渐渐地讲起优雅的法语，以此来同粗俗的农民区别开来。俄罗斯作家也很快开始模仿欧洲作家，而法国是他们灵感的主要来源。

彼得大帝去世后，一系列软弱无能的沙皇给了贵族极大的特权，却豁免了他们对政府的义务。18世纪，农奴成了他主人的绝对财产，他的主人对他没有义务。农民家庭随意被拆开，农奴被出售，或用来换马，甚至被武断地送到西伯利亚去受刑。18世纪后半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试图进行改革，但她无法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到贵族头上。她热心于狄德罗和伏尔泰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她本人也进行创作，并且鼓励翻译法国文学，从而促进了俄罗斯文学创作活动的进一步发展。拿破仑战争（1814）后，俄国占据了一部分法国领土，从而进一步增进了同法国自由主义的接触，促使许多贵族热心地进行社会思考。他们组织了各种秘密协会，阴谋暗杀沙皇，成立一个政体，有一个团体荟集了当时的社会精英，他们企图发动起义，但是遭到了失败。其中有五位领袖被处死，其余的则被送到西伯利亚。这群阴谋者叫做

十二月党人，因为他们是1825年12月起义的。

这是贵族成员领导的最后一次革命。从1825年到1855年，尼古拉一世引进了一系列细小改革，但却加强了严格审查，用铁腕进行统治。尽管这样，到处都可以听到社会改革的呼唤，特别是在中产阶级中。大学的学生大都是贫苦人家的儿子。这些学生的生计是翻译，当家庭教师，或进行手工劳动，以便受到教育。欧洲社会哲学家，包括马克思的作品，被译成俄文而加以阅读和讨论。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的出现表明了这种思想和探索暗流的无限活力。大多数煽动都集中在社会以及政治改革上，这是现存形势的必然结果。

起源于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的虚无主义运动成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宣传运动和革命活动的中心。正如屠格涅夫小说中的主人公巴扎罗夫所宣扬的，虚无主义的起源明显地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哲学，它否认国家、教会或家庭强施义务于个人的权利。虚无主义很快变成了一种自由主义运动，其主要宗旨是妇女平等，解放农奴以及建立立宪政府。虚无主义从口头煽动转向恐怖暴动，掀起了一阵阵罢工、阴谋和反抗浪潮．最后以革命告终。在初期，虚无主义的宣传和欧洲自由主义者的布道融为一体，结出了累累硕果，导致了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解放宣言。在这个宣言下，农奴获得了个人自由，从而在公社制里接受国家的直接监管。一个选举出来的地方政府在县里叫柴门斯特伏，在城镇里叫杜马。从理论上来说，这些地方政府控制着税收、教育和公共卫生这些事情，但在实际上政府的事务仍由代表沙皇的外省省长进行严格控制。此外，无论是当地警察还是秘密警察都是联邦官员。农奴的解放带来了经济的必然上升。破产贵族索取高额土地租金，从而迫使农民挤进薪水低的工厂里。耕种土地越来越少，饥饿和贫困比从前更为突出，刚刚出现的革命和游击战争越来越频繁，直到这种起义以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

告终，从而结束了1881年到1901年的所有改革。

1964年，尼古拉二世召集了一个国民大会，着手制定一个保守的改革计划。这个新的改革运动刚见成效就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打断。在最初的14个月里，俄国人打得非常有力，但到后来战争势力渐渐衰退，一方面是由于军火和粮食的缺乏，但主要的还是由于皇帝撤销了政府，将政府大权移交给皇后和她的顾问农民神秘主义者拉斯普京。1916年11月，拉斯普京被皇室成员所暗杀。市民不断举行粮食暴动，而军队又软弱无能，于是一些军官于1917年3月16日坚持要皇族退位。在随后的混乱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为控制政府展开了斗争，最后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而告终。随后是同盟国的武装干涉，签订《里加条约》迫使俄国割让一部分土地给波兰。由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党统治的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终出现。

注释：

①原注：从10世纪起皈依基督教的人数逐渐增加。希腊正统天主教渐渐地成了垄断宗教。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得俄罗斯教会成了在东方主要的基督教势力。

第三十二章　世纪末：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一、实用国家主义

初看起来，从普法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40多年只是前几章已经叙述过的各种倾向的持续和加强。很明显有同样的国家主义，只不过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更为微妙，有同样丰富

多彩的政治自由主义；有同样的对惊人的科学发现及其发展的兴趣和惊讶。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觉《法兰克福和约》后的50年和“维也纳会议”后的50年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只有舞台相同；演员早已换了角色，而且戏剧的形式已经从浪漫的幻想剧变成了郁闷的悲剧。在第一阶段，普鲁士只是一个配角，现在它已从法国手中夺取了主角，而一些斯拉夫国家的新演员又被引荐进来，从而使情节错综复杂。节奏已经加快，冲突愈演愈深。此外，许多道德和爱国理想主义已经从剧本中消除，取而代之的台词仅仅反映了在战火中得到锻炼的现实主义和玩世不恭的自私自利。

不错，人民群众仍在广泛谈论和平、民主和人权，而且至少有一部分谈论为普通老百姓带来了明确的利益，但是这个时期的基调是实用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势力是国家，而不是人。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渐渐认识到17世纪的国家主义已发展成了一个佛兰肯斯坦[①]的怪物，最终摧毁了它的创造者。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这种不祥之感从象牙之塔渐渐弥漫到整个人类。欧洲人也知道恶有恶报，因此从1870年以后他们就在焦躁不安地等待着这场风暴的来临。

在民族竞争中，还是德国跑到了前头。一方面，新近取得的统一使她踌躇满志，普法战争中轻而易举赢来的胜利又使她沾沾自喜，而另一方面，她继续发展军事力量，直到她拥有世界上最有效、最灵活、也最可怕的军队。到了世纪的转折点，她的海军也得到了均衡发展，甚至连英国都感到惴惴不安。她夸下海口说要通过帝国主义侵略来占据“显要地位”，从而使全欧洲都处于自卫的备战状态。由于有天才的俾斯麦主持外交活动，有非凡的军事机器为她赢得声望，所以德国很快地发现她已登上了可以在欧洲政治上发号施令的地位，很明显，实现垄断世界商业贸易的梦想已为时不远了。

实际上这位德国宰相并不希望战争。尽管他摆出一副穷兵黩武的姿态，实际上他却喜欢采取缓慢的外交方式，而他在这方面已驾轻就熟。在这样一个游戏中，他发觉德国强大的军队的生存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服者，但是他希望避免军队的实际使用，至少要等到德国在世界上强大起来，保证做到百战百胜。如果俾斯麦有权再执行几年这种“劝说”政策的话，那么他大部分的目的就很有可能实现。但是1888年，威廉二世继承了德国皇位。于是铁血宰相很快发觉他遇到了一位顽固不化，固执己见的对手，两人外在舞交台上相互竞争。

威廉二世精力充沛，自我主义十足，缺乏真正的政治家气概，从而使人感到泄气。由于无法和别人同享舞台，于是他很快发觉自已和他的宰相格格不入。1890年，威廉二世宣布从今以后由他本人制定德国政策，从而导致了俾斯麦的辞职。通过这种“抛弃良师益友”政策，威廉二世撤除了一个在德国历史上为德国赢得赫赫政治声望的唯一天才，与此同时，他也警告这个坐卧不安的欧洲说从今以后德国政策的基调是武力，而不是外衣。他吹嘘凭借上帝的帮忙（他总是慷慨大方，将造物主划入他的计划的一个积极成分）以及战无不胜的军队，他可以很快使德国登上由命运安排的崇高地位。然而，尽管威廉二世夸夸其谈，胃口很大，但是他的政策同俾斯麦的政策别无二致。不过，由于他自命不凡，不断的穷兵黩武，再加上他反复无常的习性，所以在他统治的20年里，整个欧洲都处在一片恐惧之中。

随着德国登上了高峰，法国在欧洲事务中就降到了次要地位。普法战争中，法国遭到了惨败，而俾斯麦的战后政策又将她同她的潜在同盟隔开，因此法国很快陷入到一种政治骚乱和思想幻灭的状态中去。从1871年到1914年，她产生了至少50个各不相同的内阁，此外还有两个流产的义起，本来这两个起义是想达到大规模的群众革命，结果目标也没有实现。然而从物质利益上来

说，法国却兴旺发达。她的工业发展速度惊人，在两次大战期间，她工厂里的机器马力从87万增加到860万。法国赢得了一大笔财富，增加了许多殖民地，外国投资增加了四倍，国民财富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这种国内国外的兴旺发达促使法国避开了俾斯麦所布下的罗网，提高了进步的中产阶级在国内日常事务中的权力地位，取代了第二帝国时代所遗留下来的颓废保守分子。当初《法兰克福和约》“蹂躏”了阿尔萨斯和洛林，极大地伤害了法国的国威，现在随着法国的繁荣昌盛，法国人对德国感到义愤填膺，决心要为此进行报复。到了1914年，尽管法国实际上不想战争，但她在心理上和物质上都已严阵以待，和德国一起等待着德国人把征服世界命名为“白昼”行动计划的报复时刻的到来。

然而从1870年到1914年，法国的社会道德已大大丧失。工业的兴起使得城市为烟雾所污染，产生了一个穷困潦倒，居住在贫民窟里的无产阶级，与此同时，却提高了暴发户的地位，增加了他们的财产以及由发横财带来的威望，使他们有能力去参与法国的事务。财富的追求，庸俗的社会价值实利主义和工业化城市的丑恶使得这段时期的整个生活基调贪婪肮脏，玩世不恭，加深了那些对道德标准极为敏感的人的绝望和幻灭。在一个粗俗与奢侈和邪恶与悲惨并驾齐驱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满含辛酸，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去崇尚文学自然主义（见第二十章）。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的世纪末观不仅产生了一个左拉，而且还迅速传遍了其它国家，包括美国。

二、白人负担

欧洲内务中重要的是殖民扩张所带来的实用国家主义。尽管殖民政策一直是欧洲政治中的一个熟悉因素，但是19世纪末的扩张主义活动在几个方面都同早期的扩张主义活动不同。首先，他

们的目的几乎全是工业性的。早先的殖民扩张主要是吞并未开发地区的领土，以利于定居和军事目的，再加上贸易往来，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半个世纪的殖民竞争主要是争夺原材料或工业产品市场。根据理论，旗帜在先，贸易在后，但是世界边远地区殖民和保护关系竞争激烈，有时很难辨出究竟是贸易还是旗帜位居其后。在一阵领土增加热中，许多国家为了不使土地落入别国手中，常常将不知价值的土地吞并进来。这些土地长期闲置无用，阻碍了国家的预算和防务。由于大部分获得物都在遥远的亚洲，非洲或大洋洲，因此他们的防御问题极为棘手，帝国的生命线常常受到威胁。

后期殖民主义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达尔文的公开信徒所推出的各种各样的种族主义，对他们来说，掠夺抢劫仅仅代表适者生存的一个例子。人们高谈白人优越于"没有法律的低级种类"，高谈高加索人的道德义务，即"承受白人负担"，将他们优越的文化利益传送给世界上"落后的"或"非白种人"国家。学术巨著，如德·戈比诺的《人类种族的不平等》（1853）和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19世纪的基础》（1899）被认为是支持种族区别理论的"圣经"式权威。张伯伦的书对建立"雅利安人"优越于南欧各个种族的神话产生了特别影响，造成了许多种族歧视，后来又产生了纳粹德国这样的畸形怪物。在爱国主义、虚伪的利他主义以及直率的种族沙文主义这样一种混合氛围中，由"科学"发现所支持的商业帝国主义和蔼地鼓励着这面大旗向前进。

没有几个国家没有从事殖民竞争。到了1900年，几乎非洲、远东和大洋洲所有的地方都落到了欧洲人的手里，或在欧洲人的控制之下。其中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战利品最为丰富。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占据的领土比较少，而德国则姗姗来迟，她宣布要用军事和海上威力去获得她的"显著地位"，从而

使其它各国忐忑不安。在世界的其它地区，日本和美国从事着相同的掠夺计划，但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遭到了顽强抵抗，很快他们就放弃了这一政策，而相应地采用了一种更为微妙，代价更少的“美元外交”。

在一些知识分子和善意者的敏锐眼光里，从事领土竞争的西方世界所展示的只不过是启发并诱导出甚至连种族道德主义者的甜美势力都无法减轻的痛苦反应，不过总的来说，1870年到1914年是帝国主义势力猖獗的阶段，其标志是精力充沛，不断上涨的爱国沙文主义；他们储备好了燃料，准备点燃萨拉热窝这把大火。然而，随着不重要的奥地利大公及其妻子在默默无闻的波斯尼亚小镇上的被暗杀，这把大火终于给点了起来，而这时只有德国为这即将到来的大爆炸做好了准备。尽管各种各样的穷兵黩武，行进与反行进，帝国竞争以及普法战争所留下的微妙仇恨，但是欧洲大多数国家还是在忙于工业繁荣，改善生活标准和梦想未来的伟大，他们无暇顾及已到了门口的火药箱。从内心来说他们早就意识到一场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不断告诉自己短时间内战争或许不会发生。不错，1900年以后，摩洛哥、土耳其以及整个巴尔干地区战火烽起，在亚洲，俄国和日本互相残杀了一年半，但这些行动在当时看来只不过是地区性的冲突，是孤立的事件，对整个欧洲没有重大关系。而且这些战争以开明的仲裁精神结束，这种仲裁精神近来成了国际关系的特征。从19世纪末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大谈国际合作，许多危险的争执都为无偏见的国家的友好干涉而终止。人们建立了各种国际和平协会来传播和平主义的学说，1899年和1907年在海牙召开了两次由世界大国参加的和平会议，旨在限制武器，促进国际了解。由于这种文明会谈和活动正在进行，所以人们很容易忽视这样一种事实，即和平运动和国际会议本身收效甚微，而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仍是当时的主要格局。此外，由于普遍的繁荣昌盛，所以即使是显而易见的痴心妄想也

有人想付诸实现。

因此，这个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在一个没有道德准备的世界里突然降临了。甚至在战争爆发后人们还没有理解这种冲突的真正含义。大家都以为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一切就会结束；现代实用社会的开明精神会通过各种政府措施找到阻止残杀的有效办法。只有当凯塞尔的军队胜利穿过比利时和法国北部而站到巴黎郊外的时候，一些观察家才意识到这确是德国征服世界的“白昼”行动计划开始了，这是100年放任自流的国家主义后的报复时间。

不错，那100年取得了许多战绩。科学已向孔德所梦想的实证主义迈开了一大步。一般民众的自然环境已更为健康，更为舒适，人也更为自由，更为富有。有了节省劳力的机器，一般民众工作得不太紧张，幸亏成批生产，一般民众中的个人可以享受到他所创造的产品。如果说他还没有享受到什么正规教育的话，那么他至少可以通过改善了的通讯工具和扩大了的国外兴趣来逐步了解世界各地。

但是仍有一些人认为尽管人类取得了这些成就，但是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麦克斯·努尔都在其耸人听闻的小册子《堕落》（1893）里指出欧洲道德结构已明显衰退，理想主义与尊严业已丧失。他觉得民主并未带来和平，工业主义只不过是将一种奴隶形式换成另一种奴隶形式。科学已毁掉了精神价值，变得比牧师的正统教规更为武断，也更为专制。弗里德里希·尼采观察当时的自由人道主义，看到里面只有一个自我利益的追求。他说：“不要相信那些标榜正义的家伙，当他们标榜自己正直善良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们只有在一件事上不如法利赛人：这就是权势。”他对实利主义欧洲的自私自利和庸庸碌碌极为反感，从而鼓吹需要一种非凡的人，需要在进化的过程中达到另一个高峰：这就是超人。在英国，马修·阿诺德对这种新的“市侩作

风”深恶痛绝，认为他们赚钱至上，缺乏文化，对艺术无知。

译注：

①英国作家玛丽·雪莱的小说《佛兰肯斯坦》（1818）中的主人公，他是生理学研究者，创造了一个怪物，但结果自己为怪物所毁。从此他被喻为作法自毙者。

第二十三章　欧洲的崩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

带来“全面战争世纪”的战争是一种新的冲突，因为它吸收了参战人口的全部精力，打得精疲力竭，人的生命和各种财产都遭到了可怕的毁灭。

战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这个世纪初，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哈布斯堡的君主力图镇压巴尔干的国家起义，德国和俄国在领土野心上的逐渐敌视以及德国妄想赢得她的“显著地位”的动力，因为在19世纪的殖民掠夺中她只扮演了一个微小的角色。

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王位继承人弗兰西斯·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的被杀成了黑手党一系列恐怖活动的顶峰。黑手党是一个塞尔维亚的秘密组织，矛头直指奥地利，旨在扩大塞尔维亚的领土和势力。奥地利的反应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停止反奥地利活动，并严惩与暗杀有关的一切凶手。塞尔维亚的答复是调解抚慰，但却闪烁其辞。1914年7月28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

出于斯拉夫的利益，俄国立即动员起来。德国于是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她停止动员，否则就将面临战争。由于法俄联盟，所以德国军队设计出所谓的施里芬计划，这样在战争中，德国随便从中抽调一支力量就可以给法国一个决定性的打击，然后集中精力对付俄国，因为俄国行动缓慢，通讯设备也没有法国或德国的有效率。不过这个计划的成功取决于速度，所以在12小时内没有收到最后通牒的答复后，德国于8月1日对俄宣战，8月3日对法宣战。为了避开法国的堡垒，德国军队闯进比利时的领土，从北部攻击法国。根据协议，英国要保护比利时，于是英国8月4日宣战。土耳其则于10月加入了中央势力（德国和奥匈帝国），随后保加利亚也于1915年加入进来。日本、意大利、希腊、罗马尼亚、门的内哥罗共和国和葡萄牙则加入了同盟国（英国，法国和俄国）。在欧洲，只有西班牙、瑞士、荷兰、丹麦、挪威和瑞典保持中立。

出乎意料的是，德国速胜法国的计划遭到了比利时和英国军队的坚强抵抗。德国在马恩河战斗中的失败阻止了她向巴黎进军，西线双方在一个巨大的战壕网里进行遭遇战，而这些战壕在整个战斗中几乎就没改动过。

尽管东线和西线人力和物力的需求给中央势力以很大压力，但他们在东线还是取得了辉煌战果。俄国的军队渐渐后撤，1917年3月，俄国革命的爆发进一步削弱了俄国的抵抗力，迫使沙皇于11月提出和约请求。

西线的僵局很明显，同盟国封锁是迫使敌人投降的唯一办法。英国明显地拥有海上优势，为了对付英国的海上力量，德国决心孤注一掷，进行毫无限制的潜水艇战争，结果导致了美国于1917年4月6日对德宣战。一大批美国势力的增加保证了同盟国的胜利，1918年11月11日签订了停战协定。

除了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损失外，这场战争还成了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序曲，因为它已开始使用科学和机械化的手段，潜水艇、坦克、飞机、毒气、这里只不过列举几个最明显的军事新玩艺儿。美国所提供的人力是重要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所提供的军事援助，这对受到封锁，资源耗尽的中央势力来说不啻雪上加霜。

美国的参战还带来了伍德罗·威尔逊的战争目的的理想主义声明，以图恢复早期19世纪民主与和平国际主义的趋势。他声称这是“一场拯救世界和平的战争”，宣布根据他的十四点和平纲领，胜利可以带来永久和平。这十四点和平纲领包括各国民族自治，“随意达成的公开契约”，海上自由，减少税收关卡，大裁军以及建立一个“国际联盟”。

《凡尔赛和约》建立了一个德意志共和国，剥夺了德国的殖民地以及萨尔煤矿地区，将她的兵力削减到最低限度，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并索取未详细说明数字的赔款。奥地利和匈牙利丧失了一大片领土，罗马尼亚得到了扩大，而新的波兰、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南斯拉夫诸国则得以成立。

国际联盟成立了，但是尽管它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它维护世界和平这个主要功能却由于美国否认威尔逊的权威和拒绝参加国联，由于欧洲各国在基本政治问题上缺乏真正的义务而变为无效。

二、20世纪20年代

据估计，在这场战争中死亡了1000万人，伤了两千万人。在欧洲，这等于消灭了近一代风华正茂的青年。许多生存者在心理上同社会疏远，也就是人们通常所描述的“弹震症”，几乎所有的参战者都在梦中重新体验了战壕里的恶梦般折磨，就像埃利希·玛丽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和亨利·巴比塞的《战

火》这些战争小说所描述的一样。而德国人由于是战败者，所以心灵上的创伤更重，更不用提因强加的《凡尔赛和约》而出现的巨大的不公正感（德国没有代表出席会议）因为和约宣称只有德国要为导致战争负责。

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为俄国革命后共产主义传播的可能性感到关注，但是实际上欧洲共产党组织（意大利、德国和法国最强）并没有取得显著的规模或政治地位，随着人员流失和个人痛苦的降低，从战争到和平经济的过渡大体上得以完成。相对而言，欧洲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但是生产企业的必要改进意味着设备的现代化和生活标准的提高，还有技术和农业生产的显著进步。医学科学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据估计它所拯救的生命数和战争中所丧失的人数一样多。同威尔逊的新民主理想主义和国际联盟的勉强生存同时并举的是这种新的稳定、和平和进步观使得20年代总的来说充满了乐观精神。即使是德国，在承受了政府为了避免赔款所造成的灾难性通货膨胀后，随着1924年4月道威斯计划所体现的金融安排而迅速恢复起来。

在思想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于1905年发表了《性学三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于同一年发表了《相对论》，这对世纪初已经建立起来的非宗教和实用态度是一大冲击。正如通常所阐释的，弗洛伊德心理学所暗示的是：个人的行动并不由他本人负责；人格是内在性格和童年影响的结果；性被推崇为利比多的精髓，也即人们模糊地意识到的“生命动力”和个人力量源泉。恐怕没有几个人了解爱因斯坦，但是他的相对论却被人们广泛接受，从而表明并不存在艾略特所称为的“客观对应物”，没有什么明确的标准来衡量价值。这种哲学相对论在安德烈·纪德的小说和路易纪·皮兰德娄的戏剧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大多数艺术家和作家不躺在神秘的或科学肯定的安乐椅上，而是各走各的路，去探索下意识思维，自然记载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或建造

高度个性化的幻想。

艺术脱离了19世纪末的通俗运动而倾向于艺术名流之类的小圈子。意大利的“玄学绘画”，马克·麦加尔的梦幻以及战时英国的旋涡画派成了达达主义运动的先驱。达达主义运动起源于瑞士，其主要宗旨是对艺术秩序或艺术或文化上的约束理论进行虚无主义的攻击。1924年安德烈·布列东写下了第一篇超现实主义宣言，颂扬无拘无束的幻想：“奇异的总是美的，事实上只有奇异才美。”文学里社会主题的自然主义处理一半为普鲁斯特和托麦斯·曼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史诗般探索所取代，一半则为安德烈·纪德的表现主义所取代。意大利的阿尔伯特·莫拉维亚，法国的让·阿努伊以及瑞士的赫曼·赫塞也擅长心理探索。法国的安托万·德·圣—埃格尤伯里的作品特征则是异国风味和离奇幻想。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心理学融合在捷裔德国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的神秘世界里；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统一在西班牙作家加西亚·洛尔伽的诗歌和戏剧里。许多想概述当代世界的作家倾向于当让·吉罗杜那样的和平主义者，或安德烈·马尔罗和伊格纳西亚·西隆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诗歌试验（和难懂）成了大多数欧洲诗人的标志，他们的创作通常很难跳出埃兹拉·庞德和托·史·艾略特的阴影。

三、苏　　联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1936年采用了修改过的宪法，从而体现了惊人的社会革新。其基本原则阐述在宪法第十二条上：“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苏联起源于列宁领导的1917年11月革命以及延续到1919年的内战。1918年《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将俄国从战争中解脱出来，新政权消灭了敌人或可疑分子，包括皇室成员。1919年共产国际（或

第三国际）成立，指导各国的共产主义活动，俄国则成了它的“发源地”。

四、30 年 代

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带来了悲观主义和精神恐慌，从而取代了20年代的温和乐观主义。在美国，股票市场急剧上涨，投资热浪急剧高升，从而大大提高了证券价格。这种不健康情形，加上农业和工业的过分扩张以及债权的过分冒险导致了1929年股票市场的崩溃，造成了一场严酷的美国经济萧条，其影响遍及欧洲。英国、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工业国家受到的打击最大，但是没有哪一个欧洲国家逃避掉失业和债券暴跌这股浪潮。1929年到1932年世界产量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二，世界贸易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五。1931年德国和奥地利的金融结构彻底崩溃。

在文学上，萧条复活了社会小说，其中著名的当推于勒·罗曼的《善意的人们》。在这部小说里，于勒·罗曼使用了“一致主义”这个新的技巧。所谓“一致主义”也就是说将注意力集中在整个文化上，而不是在某一个人身上。欧洲人还非常担心俄国共产主义的感化和渗透，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这样的作家就对俄国共产主义流露出明显的同情。实际上，共产主义在苏联之外并未取得实际政治胜利，但是它对害怕经济不稳定的中低层阶级来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而对知识分子这种感染力更强，因为他们在一个有希望获得内部协调、社会正义和国际和谐的思想中找到了意识形态上的安全感。

这个时期最为明显也最主要的基调是绝望感和方向的丧失，就像路易—斐迪南·塞利纳的小说《夜末之行》所反映的一样。超写实主义艺术家萨尔瓦多·达理的离奇怪诞从表面上看是想震惊一下中产阶级的敏感性，但它却受到了广大公众的热烈欢迎，

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它那精湛的技巧和人们很熟悉的日常物体所作的非凡结合，如将手表和电话离奇地并列在一起，使整个画面看上去既奇形怪状又流畅自如。但是他那主要的吸引力恐怕还在于弗洛伊德式的性欲象征和恶梦般描绘。在他梦一般的描绘里，无精打采的钟表（使人想起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悬挂在空旷沙漠风景中的骨化木材或无叶细枝上，反映了一个贫瘠的世界，使人想起托·史·艾略特的《荒原》，熟悉的现实已经失去它那舒适的稳定性，变得离群索居，与世隔绝。

1930年，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在西班牙发表了《民众的造反》一书，非凡地预示了即将到来的一代。他强调这种造反的根源在于欧洲的道德败坏，因为它已经丧失了从前所享有的对世界其它地方的控制权。他所说的"民众"是指欧洲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心境是害怕与众不同，喜欢墨守成规。他认为，当少数人的意见分裂了一个社会的时候，那么由于缺乏占支配地位的公众舆论引起的空白会被残酷的势力所填充。实质上这是客观事实。当失业人数达到百分之五十的时候，对劳工起义的广泛担忧以及布尔什维克活动所造成的紧张使得上中层阶级越来越依赖于政府权力，从而为这一时期的一系列独裁统治铺平了道路。

1920年意大利左派革命的失败已经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反革命。由于害怕共产主义，军队和商业势力联合起来，于1922年将贝尼托·墨索里尼推上了总理宝座。1924年"领袖"成了所谓组合国的独裁者。组合国是一个一党专制的法西斯政府，控制着工业和劳动力，并且享有国家的一切职能。

在德国内部，由于对大萧条的极端不满而产生了纳粹党，在军队和大财团的合力相助下，这个党将阿道尔夫·希特勒扶持上台。希特勒谴责共产党人、犹太人和《凡尔赛和约》，大力宣扬雅利安特级种族的纯洁性，答应将所有德国人联合起来，为德国人建造生存空间。1933年2月27日，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毁于一

场神秘大火，于是希特勒的副官赫尔曼·戈林将罪名推到共产党人身上。在随之而来的恐慌中，纳粹党在下一届选举中获得了百分之四十四的选票。1933年经过普选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第三帝国。1934年，希特勒成了这个帝国的首相兼总统。通过公共工程、重新武装和精神饱满的年轻组织，再加上他具有非凡的使人着迷的个人魅力所创造的公众歇斯底里气氛，这位元首使大多数德国人深信德意志那久已被耽搁而完全应该得到的光辉日子终于到来了，即他在自传《我的奋斗》里所浮夸描绘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同欧洲各地的独裁上台相一致的是西班牙从1936年到1939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内战，结果是以另一个独裁者，弗兰西斯科·佛朗哥将军上台，体现了天主教会、军队和上层阶级的三方联合。波兰的毕尔苏茨基和匈牙利的霍尔蒂也将民主政府变成了独裁政府。

这样一来，威尔逊的欧洲各国民主和合作联盟的美梦宣告破产，取而代之的是残忍的国家主义政体的恶梦。每一个国家所关注的主要是国家的势力，而不是个人的权利和福利，而且所有的国家在本质上来说都具有好战性。

五、第二次世界大战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得比较突然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可以预见到的，而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有两个基本现象：首先，欧洲各个独裁者出于势力饥渴而展开殊死竞争，其次，各个民主国家的道德败坏使得这些独裁者跃先登上了独裁宝座。

1933年，希特勒退出国际联盟。1935年，他通过公民投票重新获得了萨尔，并宣布了德国重新武装的方针。同一年墨索里尼

无视国际联盟对意大利所作的经济制裁，征服了埃塞俄比亚。1936年，罗马—柏林轴心国形成，后来又同日本签订了反对共产国际条约。1938年，奥地利的纳粹分子接管政府，宣布和德国合并。捷克斯洛伐克强大的工业基地苏台德主要被日耳曼人所占住。1938年9月，希特勒以民族自治为借口，将大批军队开驻苏台德边境，要求汉莱因纳粹领导的苏台德人独立。希特勒、墨索里尼、法国的达拉第和英国的张伯伦急急忙忙召开了一个会议。英法向希特勒作出了退让，会后张伯伦回到英国，宣称他已赢得了“我们时代的和平”。1939年3月，希特勒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部分，最后向英国和法国表明他们的绥靖政策是一大错误。到了这时，英国和法国都立下保证要保护波兰，但是希特勒和苏联结成同盟。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开始了一场只有德国才一切准备就绪的战争。

波兰很快投降，并为德国和苏联所瓜分。9月3日，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但是他们除了装备自己的军事力量，什么事也做不了。1940年4月，希特勒迅速装备起来的海军舰队在空军的支援下，对丹麦和挪威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闪电战术。接下来的目标是比利时，荷兰和法国。5月27日到6月4日，英国军队撤离了敦刻尔克。与此同时，意大利人从南部进攻法国。6月14日，希特勒进军巴黎。6月22日，法国和轴心国签订了一个和平条约，留下五分之二的土地给法国政府，条件是法国政府必须支付住在其余五分之三土地上的德国军队的占领费用。在占领国土上，希特勒允许对无依无靠的屈服者进行医学试验，试图通过灭绝人性的集中营灭绝欧洲的犹太人。据估计，在这场恶魔似的战争中，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

此时，只有英国独立抗击轴心国。作为入侵英国的第一步，希特勒进行空袭，结果遭到英国皇家空军的胜利抵抗，于是入侵计划被迫取消。经过一场垄断巴尔干地区的争吵后，希特勒于

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还没到达列宁格勒或莫斯科，入侵就被迫停止。

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一直处于中立状态，但她对英国极为同情，作为“民主的兵工厂”，一直为英国提供战争必需品。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入侵中国，美国于1941年8月开始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铁和汽油。美日之间的关系达到了一个紧张阶段。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珍珠港海军基地发动了突然袭击，于是美国参加了战争。在欧洲，英美的反攻是先从南部（非洲到西西里到意大利）开始，然后分开来进军法国的诺曼底，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德国进行不停的空袭，这样最终导致了1945年5月8日德国的投降。同样，太平洋战场也对日本大陆进行越岛作战，消耗了日本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导致了帝国战时内阁的垮台。接替的政府试图寻求和平，但不愿接受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于是美国于8月6日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① 8月9日又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结果日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美国的条件，1945年9月2日签订了投降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已精疲力竭，只有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唯一生存下来的世界大国仍在进行抗衡。据估计，取得这种形势的代价是，战斗者和平民的死亡人数为2200万人，军事开支和财产损失为3千亿美元。

注释：

①原注：原子分裂理论发展于魏玛德国和英国。但是纳粹德国明显没有意识到这些理论在战时的潜力。原子弹的制造在美国神秘的曼哈顿计划中得到实施。

第二十四章 1945年以来的欧洲

一、一个新的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个标准的会话练习，这就是人们都在一本正经地断言：经过这场大火之后的世界将同我们所知道的或想象的世界迥然不同，他们承认没有谁能够真正赢得一个现代化战争，因为曾经有一个仅以图迷惑人的，草草的鸡尾酒会式描绘到头来成了对现时代的克制性陈述。甚至近在1945年8月初，随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战败和裕仁的势力在孤岛抵抗进入最后阶段，又有哪一个业余政治专家会断言几年之内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会同美国和西欧各国结成亲密同盟，甚至友好往来呢？而且尽管没有几个人真正期望西方同苏联结盟以幸免战争，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完全理解1945年以后东西方之间的深刻的裂痕？谁会料到西欧仅仅成了美苏之间强烈竞争的工具？或者说尽管政治每况愈下，但50年代的经济回升却带来了几乎全西欧的商业发达和个人富裕，这在历史上未曾有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客厅权威能够预见到原子弹、冷战、太空探索和人类登上月球这些原子时代的含义（或甚至事实）吗？

在这相对简朴的历史记载里，世界不断地为各种事件和发现所震撼，从而彻底改变了人对自己及其宇宙的了解。它多多少少地适应了孔子、耶稣、哥伦布和哥白尼这些遥遥相距的奇才。它对牛顿驾轻就熟，熟练得恐怕有点过分。它只用一代的时间就将达尔文放到合理的角度，它甚至开始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含义开始接近实际水平，这些理论获得了确实成效，报纸的头版新闻每天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但是实际效果

正如人们所说，却使人大吃一惊。当宇航员阿姆斯特朗、阿尔德林和科林斯从月球返回的时候，尼克松总统断然宣称他们的登月飞行是创世以来最伟大的行动。初听起来，这个评论似乎出于政治圆滑和对人所共知的名人的偏爱。但是它多多少少给人一种新的疆域已经给超过的感觉。如果说人类现在已掌握了向月球发射一颗完全成功的探测器的尖端技术，那么指导和运用这一知识去改善或者摧毁他所居住的问题重重的行星的潜力又会有什么限制呢？

二、帝国的破碎

1942年温斯顿·丘吉尔发表公开声明，宣称作为大英帝国的首相，他无意取消英帝国，但是几乎就在他任期内，这种取消活动就已成为事实。印度于1947年获得独立。黄金海岸（加纳）在1956年，南非在1961年，随后非洲各国陆陆续续获得了独立。1948年以来，所有英帝国自治领的公民都成了英国的臣民。随着经济和军事的明显优势，英联帮的会员身份完全成了一种自愿式的联系，一些和英联帮有联系的前英国殖民地已经脱离了关系，各走自己的路①。英国殖民部的伟大时代结束了；勒克瑙（印度）莱迪史密斯（南非）和马弗金（南非）等处的阴魂似乎和十字架里的幽灵一样遥远；塞西尔·罗得斯爵士②和约瑟夫·张伯伦③的幽灵静静地融进了勉强记得的过去历史的外胚层质里。

在大陆上，从前的帝国主义国家也采取了相同的步骤，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理所当然地失去了海外领土。墨索里尼想扩大意大利帝国的版图，但是随着1943年 9 月这位独裁者及其情妇的被暗杀，这一梦想也即宣告破灭。1960年，比利时突然撤离刚果，从而使这片广大领土在政治上动荡不安，尽管十多年的流血过去了，但这里没有安定。荷兰则被迫于1946年承认印度尼西

亚的独立，并于1949年放弃了一切主权。1961年以来，葡萄牙一直想方设法想保留对非洲的安哥拉、几内亚和莫桑比克地区的控制。早年，法国的殖民帝国和英国的不相上下，现在它也同样在走下坡路。由于被迫撤出叙利亚、黎巴嫩和印度支那，并被不光彩地赶出摩洛哥和突尼斯，法国于是将最后一点海外威信寄托在50年代后期的阿尔及利亚危机上。

阿尔及利亚事件骇人听闻，对这个时期法国的整个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尽管这本篇幅不大的小书主要是论述文学背景，但还是有必要对这些事件作一番概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纠缠开始于1827年，当时在阿尔及尔的那位土耳其官员对法国领事感到愤慨，于是用苍蝇拍子打了他一下。对这个有损高卢荣耀的侮辱，法国的反应多少有点迟缓，1830年法国政府进行了一次讨伐，占据了这块领土，并且无期限地驻扎在这儿。直到1847年当地的穆斯林势力被削减为一个消极忍受型的国家；事实上，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法国人根本不觉得他们在北非的出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入侵。

尽管穆斯林的敌视，法国侨民还是爱上了阿尔及利亚，他们使自己相信他们给这个地区带来的法国文明利益已远远补偿了900万本地阿拉伯人的不便。这些阿拉伯人接触文明的能力有限，他们宛如局外人，对这既不热心，又不理解。20世纪50年代，穆斯林人郁积已久的怨恨之火开始呈现出一燃就着的势头。随着欧洲的不断繁荣，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125万法国居民的富有和完全生活在欧洲经济之外的700多万阿拉伯人（其中近100万人长期失业），或在这种经济边缘开小店，当小公务员，或当普通佣人之类的200万人形成了鲜明对比。④

法国占领时期，穆斯林的地下抵抗组织一直存在，从1927年开始，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骚动越来越使法国人为难。对于所引起的“阿尔及利亚问题”，法国所建议的解决办法包括了全范围，

从强大的军事镇压到法国军队完全撤离，但是最受欢迎的，至少嘴上说来是这样，是将当地人渐渐同化到法国文化模式里。1943年，戴高乐将军作为法国流亡军队的领袖将法国公民资格呈献给穆斯林社会名流（前军官，大学学位获得者，公务员、国家雇员）而发现反应不太强烈时，他又将他赠送法国公民资格面扩大到包括中学毕业生以及各种军衔的退伍军人在内的穆斯林人。当然，这种赠送是与同化方案相一致的。但是穆斯林人觉得他们在这儿居住了多少世纪，拥有自己的文化，因而对成为法国公民丝毫不感兴趣。他们直截了当地反对戴高乐的慷慨施与，继续不停地要求独立。

1958年5月13日，在一次阵亡将士纪念日的仪式中，阿尔及尔爆发了公开叛乱。10万名穆斯林进攻总督府，决心将法国人彻底逐出。这一行动将欧洲的保护人分成两个互为对抗的派别。一派赞成军事镇压活动，另一派则鼓动外交和谈。在因此而产生的巴黎内阁危机中，赞成和谈的皮埃尔·菲兰林巴黎政府倒台，接任的是由戴高乐领导的新政府。戴高乐得到军队的支持，他们普遍认为他会赞成强硬措施。政府的更替暂时平息了本来会有三个竞争者形成的阿尔及利亚内战，移民反抗巴黎政府，穆斯林人反抗一切欧洲人。但是这只是暂时的。时隔不久，一切已很明显。使军队极为厌恶的是戴高乐也愿意和谈，这个事实激怒了右翼侨民，他们觉得被自己所支持的领袖欺骗了。1960年1月，这些众所周知的"过激派"公然反抗政府，和当地独立军展开了公开冲突，戴高乐发觉自己腹背受敌。于是他勇敢地提出了一些建议，向每个过激派作些让步，但他发觉双方都不愿妥协。最后，沉着冷静的将军于1960年11月提出了一个停火建议，并附上一个"建立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的和谈方案。无论是法国还是北非的"激进派"都为这一建议所激怒，因为它彻底破坏了"逐步同化"的方法，于是阿尔及尔的侨民再次发动了反政府暴乱。然而，戴高

乐意志坚定，而且使人惊奇的是，军队支持他的决心，甚至准备向阿尔及利亚首都持异议的欧洲人开火。1961年1月8日举行了一次伟大的公民投票，全法国的投票者都被要求表达他们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意见。2千多万名大陆法国人参加了这次投票，另有260万人在阿尔及尔表达了他们的观点。结果是绝大多数人赞成自治，即使在阿尔及利亚也只有不到一半的人（76万）投票反对戴高乐的政策。这位足智多谋的法国领袖设法从一个殖民主义的退却变成了一个为人类自由而努力的胜利。

但是在这件事解决之前，还有一件更为惊人的暴力事件。1961年4月，四个势不两立的法兰西将军在从前戴高乐的拥护者皮埃尔·萨朗的领导下准备在阿尔及尔发动一次政变，甚至还威胁说要派伞兵进攻巴黎。这一次戴高乐同样坚持立场，反抗组织很快被镇压了。但是震惊却远没结束。只有在这个时候，法国老百姓才真正意识到戴高乐将军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多么大，他恐怕是唯一的领袖，坚韧不拔，足智多谋，不用展开公开内战就能转危为安。1962年7月3日，法国正式宣布阿尔及利亚的彻底独立，新选举出来的当地政府不失时机地将这幼小的国家加入到阿拉伯联盟里。在很短的时间内，大约有80万名在法国被称为“黑脚”的侨民离开阿尔及尔，在法国各大城市的贫民窟定居。然而，法国当时的经济就是如此，随着这批新来者的涌进，许多低级职业都为他们所占，这样，不用承受多少痛苦就解决了本来可能会发生的严重失业危机。

阿尔及利亚危机和柏林墙一起有力地象征了古老的战前欧洲及其高度国家主义意识，军事方向以及依然强大的帝国主义经济的消失。殖民地的丧失，核武器所带来的军事潜力的激进演变所需要的西方合作使得上几世纪的行进和反方向行进看上去像消防站里的跳棋联赛，而维也纳会议则像一个乡村拍卖。甚至连顽固维持古代民族仇视的《凡尔赛和约》看上去都退却到黯淡的过去。不

错，欧洲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丘吉尔和戴高乐留在公众的脑海里仍是19世纪的偶像；不过，正是这些领袖通过其现实主义的方法解决了20世纪的问题，从而行之有效地将克服传统压力以及接受新规则下的新比赛需求戏剧化。但是在这场新的比赛中，欧洲再也不是橄榄球赛中指挥反攻的四分卫，相反，它只是一只橄榄球。无论这种考虑能得到多少受虐式满足，但是如果没有橄榄球就不会有橄榄球场，而且他们还泄气地认识到在战后进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中有好几只橄榄球，还有好几个球场，在这场错综复杂，迷惑不解的竞赛中，新的规则甚至还未写出来。

三、新 欧 洲

殖民帝国的衰败和冷战的威胁给失去政治光泽的欧洲各国只留下一条出路：不合作毋宁死。多少年来，欧洲各个大国已习惯于同虚从殖民地和仆从国一道追求大幅度的新型重商主义经济，现在他们所面临的是在各种各样的条约下必须进行友好贸易往来，尽可能地使这种商业变得行之有效，经济节俭。这些一直坚持好战式的国家主义并且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贸易活动的国家凭借马歇尔计划资金所给予的幸运慰藉，觉得他们可以通过心甘情愿地洗涤各自的防御精神来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从而有效地恢复遭受战争洗劫的经济。

这种行动的结果是物质利益的逐渐繁荣，这种繁荣彻底改变了欧洲主要国家的面貌。弗朗索瓦·诺里西埃先生在《法兰西人》一书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本土作了一番透彻的研究，描绘出这样一幅图画：

一个游客……于1945年第一次来到法国，然后于1955年又来了一次，现在他将三次访问的印象集中起来，

必然会被今日的繁荣富饶现象所打动。当然他还会看到可怜的旧房屋，但是房顶上电视天线林立，而且房屋前面停着许多装饰一新的轿车。他还会注意到许多新房屋，同1944年到1954年50万个房屋单元总数相比，我们现在每年要建造近40万个房屋单元。他会注意到每两家都有一台电冰箱，我们的小路上挤满了八百万辆汽车，在农场上，拖拉机从1946年约56,500台增加到今天的100万台左右。他会观察到人们穿着已不那么寒碜，会注意到那里有如此众多的年轻人以及货币是如何快速流通的。⑤

诺里西埃先生对法国繁荣的表面描绘在其它国家也可看到——在意大利和英国，程度或许低一些，但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程度则明显地高。此外，这种印象可以通过统计进行证实。在采用马歇尔计划后的十年里，欧洲的国内产值（按1954年价格）从一年的750亿美元增加到一年1220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加百分之五点四，比美国的快两倍，到这一时期的结束，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8,000亿，超过了美国的数字。通过马歇尔计划中欧洲经济合作部所签订的一系列协议，贸易障碍大大消除，无用的重复和竞争大大减少⑥。而且，这些协议受到了公众的热情支持。⑦人们开始谈论欧洲的"美国化"，这一次这种民族称号没有被看作脏话。确实，60年代末在欧洲游荡的美国游客对汽车游客旅馆、超级市场、快餐部以及家庭汽车的不断增加有时感到奇怪，不知道深深植根于旧世界魅力的神话是否归之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所习惯称呼的"痛苦的重新估计"。

然而，对于这种繁荣印象以及美国风俗，诺里西埃先生要加进几个不同意见。诺里西埃认为，只要游客在法国旅行，他就会看到尽管有超级市场，但是小商店却在悲惨地死去；尽管大农场繁荣昌盛，但是小农场却日趋倒闭；尽管生活水平很高，但仍有

许多人的劳动所得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

我们的金融制度一直是反政府的，现在它不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建立一个更好的平衡，而是加快这种不平衡。它对工资和薪水（即工人、白领雇员、公务员和军人的劳动所得）毫不怜悯，但实际上却在默认工业和商业利益以及各种自由职业的偷税漏税。结果一个新的阶级开始形成，他们并不富有，但至少可以赚得一笔可观的费用，不为收入税所困扰。这群人很多，大概占了人口的十分之一。这群人并不是从前的小资产阶级，也不是真正财产及其权力的占有者。他们只不过是些在饭馆或路上，在商店或度假时花上好多钱的法国人。……这个有利的阶层相当大……使人忘记了这只是一小部分人；这个阶层的成员"只是屏幕而不是目标"；他们传播"普遍繁荣的神话，因为人们经常看到他们，到处看到他们。⑧

然而，尽管表面上十分富有，诺里西埃先生问道，法国的钱花得是地方吗？正如他所说的："出售唱片和T恤衫给十来岁的孩子并不是为他们建造学校；出售阳光，游泳以及假日，并不是建造房屋……一个生产，购买以及出售奢侈品的社会并不一定就是经济上健全的社会。这里面就没有一点的欺骗吗"？⑨对美国的读者来说，这种对新欧洲繁荣的含蓄认可听上去确实耳熟，如果人们进一步思考，他就会问，这个大陆的美国化是不是比乔治·C·马歇尔所预想的跑得更快。

尽管这种繁荣带来了各种祝福，但是现代欧洲的物质富有促使人们意识到一个统一大陆的长久梦想。由于害怕共产主义，欧洲各国不知不觉地团结起来，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有点意外，他们学会了消除积怨，一起生活，甚至享受这种新秩序所带来的经济优势。当然，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欧洲联邦这样一个政治事实，但是经济竞争已大大削减。由于尝到了经济合作的成果，并且将高标准的生活甜蜜和咸涩的意识揉和起来，认为没有哪一个

欧洲国家可以战无不胜，因此，这个伟大的大陆似乎不会再陷入到那曾经使历史变得错综复杂，折磨并且消灭了罗马帝国陷落以来的居民的巴尔干化。

四、紧张局势和对抗情绪

尽管欧洲的“美国化”几乎完全局限在物质发展上，但它却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的生活模式，并且最终改变了欧洲人的思想。改善了的生活标准，就业机会的增多，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日的缩短给了许多欧洲人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物质舒适感。面对购买力的普遍增加，欧洲商人和厂主终于克服了从前市场经营的惯性，学会了迎合和发展民众市场。随着税收漏洞的逐步堵塞以及一般选民的大量需求，政府将更多的预算注意力转到一般市民的方便和福利上。这种对普通老百姓的关心在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个新发现的利他主义，最后政府知道一个相对满足的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关键，而在从前，人们还以为这个稳定是由军队有力支持的上层阶级来完成的。

结果，欧洲大陆迅速使用超级公路来弥补传统上优越的铁路网，建立优秀的电话服务来弥补工作过度而效率又不高的邮局，并且广泛扩建房屋、教育和福利项目。甚至连受到传统束缚的金融服务都迅速现代化。支票付款不再被视作妖术。分期购买在1939年以前几乎还没人知道，或者说至少贵得可怕，现在它已成了标准服务项目。深受欢迎的信用卡组织成员的标签开始出现在欧洲一流的旅馆、饭店、商店、航空公司代办处、礼品商店以及花店的入口处。简而言之，效率、生产、市场营业额以及公共关系这些词汇开始在欧洲商业词汇里占据了一个深受尊敬的突出地位，其原理也开始为公众所了解和接受。对乔治·F·巴比特来说，1960年的欧洲商业世界使他含泪回忆起1921年美国赞尼思

的富饶时代。除了对法语不规则动词或意大利言谈快速有点可以原谅的困难外，巴比特甚至可以漫游在巴黎或米兰大街上，相对而言感到心情舒畅。在扶轮国际地方分社的集会上，他肯定会碰到许多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谈论自己的语言。

欧洲社会经济形势所发生的这种深刻变化并不是没有调整的痛苦。旧脑筋对20世纪中叶和追溯到亚当·斯密时代的传统商业方法和思想之间的冲突感到迷惑不解，甚至不知所措。雇员得学会新技术，有的甚至要改变接待顾客的态度，家庭商业机构（是目前欧洲商业公司中最为盛行的形式）的首脑得将一大部分精力放在商业机构的敏感区域和雇员关系的处理上。家庭首脑再也不满足于早上走进车间或办公室和每个雇员握握手，或在节日季节在薪水信封里塞进一小笔赏金。正如美国，这些经常受到工会支持的工人除了定期得到谈判赢来的工资合同外，还期望得到各种各样的小额优惠，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他们就会大胆地走出车间。

很自然，经济模式中的这种变化（这里提及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对社会结构产生了直接影响。正如拉尔夫·达伦多尔夫所指出的，旧的势力阶层与“低级秩序”（即资本与劳动，地主与佃户，甚至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冲突产生了一种新的平衡论，他称此为“服务阶层”，即专业经理的任务就是维持秩序，使得经济世界的功能对不再起积极作用的所有人来说仍然有利可图[10]。在这简短的秩序里，达伦多尔夫先生看到这个阶级安全地坐在欧洲驾驶员的坐椅上，就像美国的对手一样。正如法国大革命摧毁了贵族，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19世纪的工业卡特尔一样，1945年标志着家庭商业及其家长式的雇主关系，低资本投资高百分比利润的财政政策，有限的市场，不冒风险的发展政策，立刻可付现金的金融制度，或者说至多是高利润的短期贷款的金融制度。不可能指望经济结构中这样革命的一场变化的实现会没有严峻的

个人或阶级冲突，甚至公开爆乱。20世纪中叶欧洲的报纸提供了大量的冲突证据，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运用因此而产生的社会动荡作为它的主要主题。但是没人期望新制度退回到从前的模式上。大众市场已经进入欧洲，大众文化的必然结果（对传统主义者来说不管有多么痛苦）似乎永久地被安置下来，就像在美国所发生的一样。诺里西埃先生在谈到1968年的法国时说道（他的评论也可以适用于大多数欧洲国家）：

> ……
>
>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这个蹒跚前行的古老民族，尽管现在仍在蹒跚，但却变得年轻了……这个国家，随着马克思主义者的渴望和工人的加入，已经投入到一个浩瀚的中产阶级白日梦之中。这个精疲力竭的国家正在经历一场相对的繁荣富裕，和我同龄的人已经目睹了这场变化，经历了这场变化（经历这场变化而不是造成这场变化）。当他们注视着今日祖国的时候，他们露出真正好奇的目光。现今的法国人为祖国的飞速有时又难以预料的演化惊讶得目瞪口呆，他发现自己碰到了一种节奏以及各种需求，他觉得在这些需求里他的古老的欧洲怀旧病和懒惰会保护他⑪。

正如诺里西埃先生在上面这一段所捕捉到的，同朝气蓬勃的上升精神形成迷惘对比的是1945年以来欧洲大陆的政治命运全都掌握在老人手里；他们的公众形像和他们所领导的、甚至所开创的各种发展很难合拍。这群老人中有英国的丘吉尔、艾德礼和麦克米伦，西德的阿登纳，当然还有法国伟大的戴高乐。不错，伊比利亚半岛有佛朗哥和萨拉查这样从30年代开始就一直留任、思想僵硬的独裁者，而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则有古老的王室——尽

管出于公正，人们不能用政治动脉硬化症来指控这后面几个国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人口却在明显地年轻化。比如，1938年法国有百分之十五的市民年龄在六十岁以上；到了1968年，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年龄在十五岁以下，三分之一的人口年龄在二十岁以下，五分之二的人口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到了1979年，绝大多数未成年的人口仍有可能增长②。同样，这种年轻化的趋势，在欧洲其它国家里也可发现，尽管统计数字不一定有上面列举的那样显著。

而且，正如人们所期望的，这些年轻人逐步认识到他们的力量。他们对传统的方法以及传统的解释同样感到不耐烦，这些方法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他们的政治偶像是约翰·菲·肯尼迪，他们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一位为年轻人说话的政治家没能在欧洲大陆出现。与此同时，他们不断地向老人施加压力，发展一些和欧洲更加年轻化的需求和抱负相等的项目。必须承认的是，这些老人都是些经验丰富的政客，他们经常看到留心年青人要求的实际便利。但很明显，大多数年轻人认为老一代人通过适应性的变化来继续执政顶多只是一种权宜之计③。

对许多人，特别是美国人来说，欧洲的这种“美国化”似乎是一个值得称颂的进步现象。但是，尽管人们从生活水准的普遍提高，或者更加年轻的政治思想结构，或者更为宽广更加自由的教育系统中得到满足，但是还有许多其它考虑（同传统主义者明显的感伤怀旧迥然不同）在极大地困扰着一些富有思想的人物，其中有许多人都属于同一个中等收入小组，他们主要从欧洲社会的现行发展中获取利益。

这些不平静势力之一就是一个新型机构（一个有效的管理官僚政治）的兴起。长久以来，欧洲人已习惯于政府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无能得早已臭名昭著的官僚统治，因而对商业和工业中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型效能崇拜感到迷惘甚至还有点恐慌。欧洲人

还习惯于各种各样的常规做法，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就逃避法律，无视教会的正式声明，将从前的“领导家庭”倒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现在，一般由家庭控制、思想独立并且顽固地坚持个人主义的中等或工人阶层欧洲人开始看到他的生活正被卷进一个计算机化、没有感情和由经济决定的制度里，由于这个制度牵涉到他及其家庭的生计，所以他再也无法逃避、忽视或进行有效的拼搏。简言之，欧洲人也和他的美国同僚一样开始感受到个性丧失的冲击，而这种个性的丧失也就是因为他成了控制论社会的一员，过着一种由一些无名的势力（其本身也是这种“制度”的俘虏）在一个庞大的、完全没有感情的电子怪物为他所设计出来的程序生活，这个怪物可以操纵人的每一个理智活动而不用麻烦人的感情来控制这种程序。

战后欧洲迷惘的另一个因素是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在1929年所预示的大众社会的出现[⑩]。它消灭了无产阶级（就像在美国一样），将它提高到中等消费者的地位，其无穷的购买力和没有个性的无动于衷立刻成了现代唯物主义社会的活力和可视特性的源泉。从前欧洲文化的价值标准是由一位既受过教育又有教养的伟大人物来决定，现在欧洲社会又和美国一样正成为大众头脑无关痛痒的沙漠，在这沙漠里，普通老百姓的趣味和欲望控制了文明和富有经验的优秀者的趣味和欲望，尽管这种人为数不多，但无论在欧洲人的生活表层还是内心深处都打下了这些人特点的烙印。

随着这种平凡人物的广泛登台，他们开始享有至高无上的决定势力，但是一般老百姓（其本身就是一位毫无特色的平庸人物）却感觉到了那些曾经约束和支配他的机构的丧失，与此同时他还开始感觉到他作为集体领袖行列中的一员的无能。美国人从未体验过这种正在欧洲流行的困惑，当年他们的祖先逃离欧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逃避这些传统的约束性机构。起源于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的美国大众富裕时代只是从物质上丰富了一个已经大大平等了的社会。尽管19世纪欧洲发生了众多的民主革命，但是直到60年代他们才开始感受到全体富裕和消费者势力的愉快融合。这种新的经历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些复杂的感情，不一定都令人不快，但多少有点扰乱人的情绪。

影响整个不安的第三个因素是不断兴起的政治真空的出现。从前，政治对欧洲人来说就像性和运动一样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是那些时代似乎已经消失了。政治生活基调就像市场一样变得平淡无奇。党派标签再也不意味着什么；甚至连国家实体在这种由冷战和炸弹的普遍恐怖所产生的新型集体安全潮流中也失去了它的色彩。政治成了升华了的战争，其刺激性主要来源于“边缘政策”术，来源于将对手推到墙边而不用粉碎他这一游戏。但是这种国与国之间的游戏太危险了，因为大家都相信在这种情形下下一次大战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为了维护各国生活的相对和平，有必要维持一个带有地方色彩的统一战线外表。在随后的政治世界的半文雅中，人们感受到（也许不太确切）一种毫无目的的僵持，置身了一个没有基本问题的社会的感觉以及遇到了缺乏机智、殊难使人信服的笔墨官司的感觉。年轻人已抛弃了政治，或者至多将这一领域看成是衰败的老人耗尽了其徒劳无益而又踉踉跄跄的毕生精力的生活字谜，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在德国，这种抛弃政治的现象特别突出，由于希特勒的暴行，老一代人普遍带有一种负罪感，他们在明显受到尊敬的阿登纳政府里寻求庇护。随着“长者”作为一位严厉而慈祥的父亲偶像，战争的一代总的来说甘愿将政治留给专业人员，赔赎纳粹政权的暴行（他们常常强烈声称他们在纳粹政权中没有起过任何作用，对这政权也不同情），赎罪的方法是朝觐前集中营，在静静的恐怖中观看死刑毒气室，或搜集纳粹暴行的陈旧胶卷剪辑，将它们出示给学校的孩子们，从而保证“这种事再也不应发生”。

尽管这种举动用心不错，而且无疑对社会有用，但是这种屡屡出现的"是我的过错"的气氛最终导致了从不知道纳粹的年轻人的不满，他们厌倦老人的负罪感，希望忘却它，忘却整个政治领域，努力过上60年代联邦共和国所享有的物质舒适并且深受尊敬的中等阶级的富裕生活。

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年轻的一代所普遍感到厌倦的不是老人对社会的拙劣修补，而是他们的祖先所机智地带来的社会的近似完善。在一个具有高度组织系统、几乎掌管人类每一意外事件的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下，年轻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经历了许可的，有保护的和小心组织起来的教育以及随后的工作，他们物质满足，外部安定，就是精神感到空虚，这种精神空虚感很好地体现在许多有争议的小说和起源于20世纪乌托邦的优秀电影里。

这个时期的法国青年既没有过分安全感，也没有烦扰生活的负罪感，但他们有别的理由拒绝过去：这就是他们的国家在战争中丢人的过早失败、经济混乱、房屋短缺、战后的旋转门式政府、法兰西帝国崩溃所带来的从前的民族荣耀的明显衰败以及虽然给人以深刻印象但看上去却大大落后了的戴高乐政府。50年代的法国青年对政治毫无兴趣，但是到了60年代他们却成了活动分子，在不满的示威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最终导致了已入耄耋之年的老将军辞去了共和国总统职务。

五、知识分子的反应

对大多数大陆知识分子来说，战后欧洲中产阶级的逐渐富裕没有什么诱人之处。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毁坏了他们对传统制度的信仰，他们还没有从这场战争的冲击和毁灭中完全恢复过来就被投入到另一场全球恶梦中，最后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大陆在文化上已经死去，欧洲悠久的辉煌史业已结束⑮。必须牢记的是，

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陆国家全部战败，其中有些国家在战争中输得既早又丢人。波兰、比利时、丹麦、荷兰、挪威和法国于1940年投降，不过法国还有一些力量无视贝当政府，继续进行抵抗；芬兰、南斯拉夫和希腊于1941年垮台，意大利于1943年垮台，最后倒台的是希特勒的德国。其它一些国家则被占领或同化，因此，除了瑞典、瑞士和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没有哪一个国家在1939年到1945年间躲过羞辱或彻底的军事失败。这个事实，加上纳粹对犹太人所进行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贝当将军、比利时的莱奥波德国王和其他一些据认负有责任的政治领袖向纳粹政权的背叛；或者占领军双方对当地人民起义的镇压并没有为政府或者说在这件事上为整个人类赢来多少尊敬。所以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人在被占领区积极参加秘密抵抗运动）感觉到欧洲文明已黯然失色，这一点是毫不奇怪的。前文已提到，欧洲大陆在东西方冷战中已降低到了马前卒的地位，这一点更加微妙地加深了失败与绝望感，甚至连那些从表面上来说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毁灭所“解放”出来的国家也不例外。

这种失败主义感直接导致了一位作家所称作的欧洲思想的“解体神话”[16]和“大”的理论（自然主义和天主教教义）的衰败，无论正确与否，这些权威给了它们的信徒一个框架和一条诫律，他们可以以此来与意义不明的现代生存相抗衡。随着这种解体和衰败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在公共事业中不承担义务的哲学，即“非政治化”，就像法国人称呼他们退出政治意识形态一样；尽管短暂，但却是广为宣布的上帝之死；甚至对神圣的欧洲家庭理想的蔑视，这种蔑视体现在年轻人的反抗精神上，他们有意表现出各种各样骄奢淫逸的荒诞行为。

甚至连那些不太想公开阻止世界前进而想脱离的人都常常从所发生的事件中得出阴郁的结论。1956年，罗曼诺·加蒂尼[17]提出，在现代宇宙中，人已失去了他的地位。过去人们曾天真地认

为宇宙就是为了他的更大荣耀而富有意味地创造出来的，但是现在相对物理学已将他降低到了一个纯粹的生存实体，一个在宇宙中迷失了方向的小人物。人类已摧毁了一切旧的人道主义价值，而个人的个性则成了技术世界的畸形物。过去人的世界建筑在自我、自然以及文化发展观上，现在所有这些观念都被技术革命所抛弃。人不再寻求经验，相反，他在寻求能力，也就是说在创造一套毫无感情的器械，而这些器械最终又会使他的创造者成为牺牲品。1959年，C·P·斯诺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提出科学应与人文学科完全分开⑱。五年以后，皮埃尔·泰阿德·德·夏尔丹在《人类的未来》中运用达尔文观点，得出了和加蒂尼一样的结论；作为一个有机体，人还会继续生存下去，但是他的真正实体已经没有了；一个没有灵魂的种类等于死亡，而科学最终无可挽回地摧毁了这个灵魂⑲。

尽管这些阴郁的声明赢得了一大批敏悟的信徒，但仍有许多其他作家虽然感到同样的抑郁，但却没有被打败，他们在宗教中寻得一些希望，而这种宗教大体上是非制度性的。比如，阿诺德·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就提出了一种在逆境中以苦为乐的美德，指出最伟大的文明是那些敢于正视对他们的生存方式进行强烈挑战的文明。其他的一些人，特别是老作家，则在非宗派性的基督教中寻得安慰，还有一些人则在冷战中互为敌对的两种文化之间无所适从，于是退回到东方，信奉起禅宗佛教的教义来，因为这些教义既不冗长又不痛苦。与此同时，官方宗教本身也成功地吸引了一批新的信徒，他们采用了全基督教的方法来解决当时的道德和社会问题，这种努力的高峰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于1963年宣读的具有惊人的自由性的《地上和平》通谕。这种没有宗教联想的全基督教精神激发了各种各样的和平部队活动，这种援助贫穷人口的活动是由美国的肯尼迪政府发起的，后来欧洲的一些国家也逐一采纳了这些形式。

恐怕除了业余佛教外，所有这些半宗教性的方法都没逃出社会这个圈子，这表明这些方法的实践者还没到接受人的结局就是社会动物这一地步。即使是50年代愤怒的一代的年轻人，虽然反应常常粗鲁狂暴，但是他们仍在特定的社会道德观念里进行活动，他们的净化声明所反对的是老一代的十足虚伪以及技术怪物。所有的人都在一个看上去迅速而蓄意走向自我毁灭的世界中寻求价值，所有的人都在寻求人还没有过时这一信念，而且，尽管犬儒主义和暴力屡屡出现，但是所有的人都在一个既有组织又注重道德的社会和文化模式范围内寻求自信。

其它的一些流派尽管最终目标也非常合乎道德，但其方法却很少具有社会性。这些反叛者同样致力于个人完善，而且同样厌恶技术和俗不可耐的大众文化（"作呕"这个词为这些流派中的存在主义所普及），他们采取现象学的态度，认为一切活动都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而不是根据预先想好的社会标准。这些流派中争论最大，而且从文学观点来看也最有影响的是存在主义，一个定义模糊的流派，其原理可以说影响了战后大西洋两岸至少有一半的重要作家。

有关存在主义的论述已经汗牛充栋，其词汇和许多概念也已耳熟能详，因此这本书只需对此进行一番简单而明了的概述[20]。存在主义的原理为新浪漫主义，它反对有组织的社会，拒绝预先想好的绝对，从事件本身去处理每一个行动。存在主义的目标具有高度的道德，但是它认为道德起始于当时的情形，任何正式化了的道德价值标准都必然无法满足具体事件的需要。因此，个人应该寻找他自身的道德，作出自身的选择，并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必须为后果负责。正如爱默生在另一场合所论述的，如果有谁愚蠢地认为这是一门简单而随意的哲学，那么就让他哪一天来追求这门哲学的言外之意吧。

作为一个术语，存在主义相对而言比较新，但是它的思想在

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最早的记事文学，西方世界许多名著都基于这种为大家称呼的“存在主义处境”。（谨慎和报应就多少有点存在主义的味道，而许多希腊戏剧也就基于此；哈姆雷特的困境也是如此，这里只列举两个例子。）然而从哲学角度来说，存在主义的公认来源是丹麦神学家和哲学家 梭 伦·基 尔 凯 郭 尔（1813—1855）的作品。尽管人类的日常生活明显无聊而且不连贯，但是基尔凯郭尔还是要引导人们进入一种内心信仰。他承认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不可能找到意义或有意义的价值，因此他敦促人们去过个人自身的生活，认为人们有责任去作出自身行动的自由选择，在他自身的行为及其理想的完善中寻找一个神圣的信仰以及上帝存在的证据。真理来源于信仰；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真理，而这个真理他必须凭信仰去接受，因为这个不连贯的世界不会出现什么明确的证据。

基尔凯郭尔是位牧师，相信上帝。他的思想是从牧师的角度出发，通过虔诚而明确地相信自身来帮助人类重新发现圣灵。另一位深深影响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则是一位无神论者。在著名的《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里，尼采声 称 上 帝已死，接下来他又提出了一种哲学，预言人必须作出自身选择，在这个敌对的宇宙里设计出自己的航行图，因为在这个宇宙里只有强者能够成功。在宣扬超人主义的同时，尼采陷入到进化论里，认为物种通过其环境适应能力向上发展，弱者和同情者 自 然 淘汰；只有具有强权意志的强者能够向上发展，超过常人，达到演化程序中的更高阶段。

尼采哲学的言外之意不仅仅是要满足露骨的强权欲。他们期望遵循一种个人纪律以及常人难以得到的创造性随机应变，遵循一种意志和思想力量，这样一来人们既可以超越自然的敌视，又可以超越犹太— 基 督 教道德所宣扬的自我卑谦和对人怜悯仁慈的道德观。超人发现所有这些人道主义特征开始退化，并且自拆

台脚，但是他控制自己不去同情这些弱者，也不虚伪地去问候别人，免得阻碍自己的发展航程，阻碍自己在进化过程中获得另一个更高境界。只有接受整个宇宙、特别是人类社会都毫无意义的这一概念，人类才有可能将尼采的这种哲学同公众脑海里所获得的掠夺性自我放纵这一名声分离开来（他们认为希特勒是未来超人的完美体现），看出有必要去训练尼采所打算的品性，坚忍、纪律和创造性。

基尔凯郭尔和尼采一起决定了现代存在主义思想的范围。两人都宣称人类日常世界的“荒诞”（尽管基尔凯郭尔提出了一个神秘的神圣机构）；两人都强调个人必须通过相信自己以及由自己自由决定的生活来超越这种荒诞。但是他们两人的上帝观却迥然不同，一个宣称人类在发展自身内心力量的同时也可以发展自己对上帝的信仰；另一个则提出，因为根本就没有上帝这样的事物存在，所以人类必须学会做自己的上帝，按照自己的神学去生活。

存在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体现在德国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1859—1938）的现象学里。胡塞尔反对将人类思维理解为生理上的因果现象，认为外表世界就是真正的现实。先入之见，逻辑演绎，甚至从前的经验，都没有事实本身重要，因为事实无论何时都存在。如果人类能对事物本身作出反应，那么他就会在他的生活中发现一些意义。只有当他将这些事实塞进一些固定的形式或一些公认的道德或哲学推测标准时他才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每一个经验都必须被看作一个孤立的现象；每一个问题都有其自身的解决方法；每一个快乐都有其自身的报答。

继胡塞尔的声明之后是深为人们所研究的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海德格尔强调人必须逃离平庸的日常生活，过上一种充实的物质、智力和社会生活，接受全部的乐趣，关心，忧虑，负罪感以及必然死亡，而这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必然结

果。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一种上帝观，只有通过这种上帝观他才能与人类生存的空虚和荒诞幻觉相抗衡。

作为一种姿态或一门哲学，现代存在主义对前已勾勒出的思想无所补充，或者说毫无补充。它接收了一种荒诞的宇宙观，然后让个人去决定是选择基尔凯郭尔还是选择尼采的上帝存在观。和胡塞尔一样，它抛弃了先入之见，和海德格尔一样，它敦促人类过上一种充实的生活。

为了集中这些前存在主义者的格言，让我们对无神论存在主义思想的主要倡导者让·保尔·萨特（1905—1980）的观点作一番高度简化了的综合。萨特文笔犀利，思想丰富，远远地站在存在主义运动的前列，这倒不是因为他发明了一些新思想，而是因为他善于从阐述性小册子以及戏剧和小说这些想象性作品中捕捉并且生动地表现这些哲学态度。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基本论点是一样的：世界是一个外部势力，而不是内心自我的投影。事实上它对自我倒是常常有害，有害得使它的复杂性、多重性以及毫不相关的枝节问题导致了萨特所说的“作呕”的精神厌恶。这种讨厌的反应的受害者觉得同生活疏远，陷入到一个除了死亡“别无出路”的处境里。不过在这种诱发自杀的情形下仍有一线逃跑的空子；这就是个人选择自由。萨特认为每一个人都完全有自由去寻找自身生活问题的解决方法。他可以容纳，也可以接收自身生活中的无聊，过上一种呆板单调的生活。当然他也可以选择一条简单的出路，这就是自杀。但是这两种方法无论哪一种都是自拆台脚，就像生活本身一样荒诞乏味。尽管萨特的推测沉闷压抑，但他还是一位道德家，一位谨慎的乐观主义者。他反对这两种选择，从而提出了一条更为困难但也更为积极的道路。人类必须献身于“自为的有”，献身于为自己设计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而且负有道义责任的生活方式，这样多少可以满足他内心的需求，不管这项工作是否得到社会的许可。当然，他还必须学会忍耐自己

在独立进行道德选择时所出现的忧虑，必须接受由于不可避免的错误所产生的内疚和羞愧，必须意识到他是和别人生活在一起，因此不管正确与否，他必将受到同其生活有所接触的众多的观点的评判。在这种复杂而不痛苦的冲突势力混合中，他必须抑制自己，不要将自己的过错推诿给别人（萨特称这种过程为坏信仰）。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就会获得一种合格而正当的自身生存方式，这恐怕是他在这个偶然性横行的世界里所期望找到的最佳幸福了。他的报答是他真正地生存着，在精神上活着，他已经取得了真实性，而且，在这混乱而又荒诞的世界里，他多多少少已经达到了查拉图什特拉式的超出常人的理想。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他塑造了自己的模型，遵循着自身痛苦的选择，从上帝那儿没有得到帮助，总之，在萨特的眼里，上帝根本不存在。

这样一种哲学和公众脑海里的存在主义概念截然不同，在他们看来，存在主义就是享乐主义式的自私自利。一个人如果要想得到萨特真实性的言外之意，那么他就得获得一种自我约束，这就要求他具有索福克勒斯式的道德严肃，圣·奥古斯丁式的敏感性，但丁式的创造性思维以及极为狂热的加尔文派式的热忱。在没有出路的存在主义地狱门口就是生活本身，就像马洛的《浮士德博士》一样，因此新的告诫铭文应该刻成："入门者放弃一切设想。"后面再加上一句："意志不坚定者不用申请。"

到了6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系列事件和发展尽管复杂混乱，但不外乎还是那种世界范围内的道德和人道主义造反。由于对原子弹的恐怖，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团结在一起，希望恢复某种体面感，现在他们似乎已经形成了一支既不成熟又不稳定的同盟来反对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的粗俗，反对独立而且有可能邪恶的先进技术世界，反对军事官僚的无限权力，特别是反对模糊不清的管理精英，它们的态度（以及人造卫星）组成了庞大

的无形势力，这种势力在欧洲叫“局势”，在美国则叫“权力机构”。抗击这种多头“敌人”的武器多种多样，前后矛盾，而且还常常弄巧成拙，从激烈的街道游行以及同样激烈的文学谴责（通常使用淫诲和色情描述的下流混合）到随心所欲地滥用药物以及性混乱来进行蔑视和逃避。然而，在这些模棱两可而且通常好出风头的极端之间出现了一个气魄宏大而又令人尊敬的正确思想和具有同样价值的创造性作品，这些作品设法向人们灌输一种复兴了的个人自尊感，从而使人们努力去发展一个更加合理也更为正当地安排优先考虑事项的社会。首要的问题是这些持异议者拚命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常常是困难重重）想鼓励人们去积极支持这些迫在眉睫的优秀项目，即需要更多更好的学校、医院、医药护理、各个种族各种阶层的人民的就业和房屋机会；按比例分配财富来支持艺术领域和物质产品领域；消灭世界上的一切贫困，并且彻底消灭最后世界大战的幽灵。50年代和6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年轻人以及各种年龄的善意人们发觉自己已降低成了反面角色，或多或少地成了这个“制度”的清晰批评者。不过他们希望70年代会更加积极地将这种精神力量和人道主义道德意识运用到我们这个贫富不均、精神依然贫困的社会所清晰流露出的各种需求上。他们中间有一位早在40年代末就已限定好了最后期限；到了70年代，大家都忧心忡忡地意识到1984年已为期不远了。

注释：

①原注：到了60年代，英国发觉它不得不接受从前的殖民地和英联邦享有同等地位，只要它们愿意完全独立，它就无权迫使它们留在英联邦里，最后确有许多殖民地完全独立。

②译注：塞西尔·约翰·罗得斯（1853—1902），英国殖民扩张者，曾在南非一带进行掠夺。今罗得西亚即来源于他。

③译注：约瑟夫·张伯伦（1836—1194），英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倡导者，1895年任英国殖民大臣，是《慕尼黑协定》的缔造者之一亚瑟·涅维斯·张伯伦之父。

④原注：1954年，只有七千名穆斯林人进入初级水平的学校，在校生男孩不超过五分之一，女孩不超过十六分之一。只有百分之六的穆斯林男人和百分之二的穆斯林女人懂法语。与此相反，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侨民的生活水平和大陆法国人的不相上下。罗依·C·麦克里迪丝和伯纳德·E·布朗：《戴高乐共和国》（荷姆伍德第三版，1960，1963年增补本）。

⑤弗朗索瓦·诺里西埃：《法兰西人》（纽约，1968）第76页。

⑥原注：这些协议中最为重要的是那些创造共同市场的协议，这市场包括法国、西德、意大利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外围七国是英国、挪威、瑞典、丹麦、奥地利、瑞士和葡萄牙，还有各种各样的特别机构，如欧洲煤钢联营、欧洲原子能联营（用于和平目的的原子能）、欧洲投资银行（用于资本投资）、欧洲社会基金（用于雇佣工人）以及海外发展基金（用于从前殖民地的现代化）。

⑦原注：1963年的一次投票表明，西德有百分之七十一，荷兰有百分之七十五，法国和比利时有百分之六十，意大利有百分之四十三的人赞同共同市场，每个国家只有很少一部分的百分比反对。剩下的百分比则对这问题不作评论。

⑧原注：诺里西埃，同注⑥，第77—78页。

⑨注⑧，第78页。

⑩拉尔夫·达伦多尔夫：《阶级结构的近期变化》，《达达努斯》冬季刊，1964，第225—270页。

⑪诺里西埃，同⑥注，第5页。

⑫注⑪，第11页。

⑬原注：改变传统政策的最大压力恐怕还是来自教育领域。从古到今，人们都认为大学教育是一小部分杰出人物的先决条件，但现在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已为美国的高等教育观所改变。美国的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是满足技术社会的需求，而这就要求整个工人具有高度的技术。为了满足20世纪中叶的需要，人们对古老的课程及其中世纪的僵化，理论的强调和死记硬背作了较大的更改。顺便提一下，有趣的是，正当欧洲的大学开始染上美国的色彩的时候，美国的大学却在向欧洲方向移动，要求本科学习达到欧洲的优秀标准。当然，1945年以来，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的大学生人数都在剧烈猛增。

⑭奥尔特加—加塞特·何塞：《民众的造反》，英语版，1932。

⑮原注：比较阿尔弗雷德·威柏：《告别欧洲历史》，1946。

⑯埃立克·韦尔：《今日欧洲思想》，《代达努斯》冬季刊，1964。

⑰罗曼诺·加蒂尼：《现代世界的结束》，纽约，1956。

⑱C·P·斯诺：《两种文化》（剑桥大学出版社，纽约，1959）。

⑲皮埃尔·泰阿德·德·夏尔丹：《人的未来》（纽约，1964）

⑳原注：有关存在主义的优秀记述有：戴维斯·邓巴·麦克埃勒罗依：《现代文学中的存在主义》（纽约，1963）；海塞尔·E·巴恩斯：《可能性的文学》（林肯，1959）；厄内斯特·布雷萨赫：《现代存在主义入门》（纽约，1962）；马若里·格雷拉：《可怕的自由：存在主义批评》（芝加哥，1948）；詹姆斯·柯林斯：《存在主义者：一个批判性研究》（芝加哥，1952）；华尔特·考夫曼：《存在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萨特》（纽约，1956）。

第四部分编年史

文艺复兴

一、14世纪

教皇卜尼法八世为奥辛尼家族所监禁（1303），克莱芒五世为法兰西国王选作教皇，教皇法庭在阿维尼翁建立（1305）；谴责教皇权威，将《圣经》译成英文的约翰·威克利夫诞生；英法百年战争开始（1338）；“大瘟疫”（黑死病）遍及欧洲（1348）；教皇格列高里十一世从阿维尼翁返回罗马（1377）；教会大分裂，乌尔班六世在罗马，克莱芒八世在阿维尼翁（1378）；英国的农民起义（1381）。

二、15世纪

传播威克利夫教义的约翰·胡斯被逐出教会（1412）；教会大分裂结束，马丁五世成为教皇（1417）；马丁五世向异教徒

（威克利夫派和胡斯派）宣战（1420）；在赋有圣灵的圣女贞德领导下，法国人将英国人赶出法国（1430）；科斯特在哈勒姆印刷第一批书籍（1446）；自然学家，解剖学家．工程师，和艺术家列奥那多·达·芬奇诞生（1452）；百年战争结束，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攻占．迫使希腊学者到欧洲避难（1453）；第一位现代天文学家哥白尼诞生（1473）；米开朗基罗诞生（1475）；拉斐尔诞生（1483）；迪亚士绕好望角（1486）；哥伦布发现美洲．罗德里哥·鲍吉亚成为教皇，随着格拉纳达的入侵，西班牙的穆斯林势力结束（1492）。

三、16世纪

马丁·路德将其论文张贴在维滕堡大学，从而使德国的新教改革明朗化（1517）；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西班牙百年统治开始（1519）；洛约拉的伊格内修斯创建天主教耶稣会（1539）；特兰特会议试图改革教会（1545）；伊丽莎白成为英国女王（1558）；动力科学的奠基人伽利略诞生（1565）；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1588）。

17 世 纪

君主专制时代的开始，在国王亨利四世领导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1589）；九岁的路易十三成为国王（1610）；大革命之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三级会议（1614）；德国三十年战争（内战）开始（1618）；国王的首相黎塞留成了法国的实际统治者，进一步巩固了贵族统治（1624）；朗布依夫人创办第一个沙龙(1628)；黎塞留创建了法兰西学院，提出了语言和文学的标准（1634）；英国爆发内战，黎塞留去世，马萨林继位（1642）；路易十三去世，路易十四继位（1643）；继续推行黎塞留政策的马萨林去世，路易十四成了绝对君主（1661）；英国皇家科学院被特许成

立，牛顿发现万有引力（1666）；法兰西科学院成立（1666）；由于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法国的牢固性受到削弱(1667—1713)；英国的光荣革命（1688）；法兰西学院的成员终于完成了大字典（1694）；路易十四统治了七十二年后去世。

18 世 纪

一、历史事件

A．大革命前的欧洲（1696—1775）

使俄国"西方化"的彼得大帝登上王位（1696）；普鲁士王国建立（1701）；乌得勒支条约暂时稳定了欧洲的政治(1713)；路易十五开始了他在法国的挥霍生活（1715）；波兰选举战争加强了波旁王朝对欧洲的控制（1733—1738）；腓特烈大帝上台，普鲁士势力开始增强（1740）；蓬巴杜夫人控制法国的政治（1745—1764）；埃克斯一拉一夏帕拉和约结束了八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结果是普鲁士打败了奥地利，德国人领导开始（1745）；七年战争改组欧洲，英国和普鲁士在欧洲战胜了法国和奥地利，而英国在印度和新世界又战胜了法国(1756—1763)；卡琏琳娜大帝统治俄国（1762—1796）；路易十六登上法国王座（1774）；腓特烈大帝去世（1786）。

B．大革命时代（1775—1795）

美国革命（1775—1783）；1614年以来第一次召集三级会议，第三等级宣布成立"国民大会"，从而开始了法国大革命（1789）；1791年的宪法限制了法国君主的权力，丹东领导的雅各宾派起义，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1792）；法国的恐怖时期（1793）；五人督政形成（1795）。

C．拿破仑时代（1795—1815）

拿破仑成为法国军队的统帅（1795）；拿破仑攻打意大利

（1795），埃及（1798）；五人督政府被推翻，拿破仑成了第一执政官（1799）；第二次意大利战争（1800—1801）；亚眠和约结束了同英国的战争（1802）；但是第二年重又开战，拿破仑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失败，但在奥斯特利茨陆战中获胜(1805)；普鲁士彻底战败（1806）；半岛战争（1808—1813）和悲惨的俄罗斯战争（1812）中法军溃败；普鲁士在俄国和奥地利的帮助下重新恢复，将拿破仑赶出德国（1813）；在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四国联军的打击下，拿破仑溃不成军，被流放到厄尔巴岛，《维也纳会议》（1814）；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重组大军。但在滑铁卢彻底战败（1815）。

二、思想事件

皮埃尔·培尔的《历史批判辞典》的发表影响了法国自然神论（1697）；约翰·洛克去世（1704）；伏尔泰的《英国人通信集》激起了法国自由思想（1740）；法国《百科全书》工作开始（1751）；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发表（1762）；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发现氧（1774）；唯物主义哲学家大卫·休谟去世，亚当·斯密《原富》发表（1776）；林奈去世，他的植物分类法曾激起人们对进化论的兴趣（1778）；布封去世，他的《动物自然史》划分了所有的动物种类，指出一切动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1788）；唯心主义哲学家，《纯理性批判》的作者伊曼纽尔·康德去世（1804）；拿破仑颁布法国法典（1804）；黑格尔就任柏林大学哲学教授，提出了他的神秘主义哲学（1813）。

德国折衷主义

一、历史事件

腓特烈大帝登上普鲁士王位，玛丽亚·特蕾沙成了奥地利的女皇（1740）；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40—1748)七年战争（1756

—1763）；瓜分波兰（1772,1793,1795）；玛丽亚·特蕾沙去世后，约瑟夫二世成了奥地利的皇帝（1780）；腓特烈大帝去世（1786）；普鲁士废除农奴制（1807）；在抗击拿破仑的自由战争中普鲁士加入俄国势力（1813）；维也纳会议（1814—1815)；梅特涅首相垄断欧洲外交（1815—1848）；萨克森的自由起义（1831）；德国建立海关协会（1835）；德国和奥地利自由起义蜂起（1848）；普鲁士组成第一个德国联邦（1850）；威廉一世就任普鲁士王（1861）．在冯·毛奇的领导下德国军队得到发展（1859—1866),俾斯麦成为首相（1862）；与丹麦交战(1864)；普奥七周战争（1866）；普法战争(1870—1871)；德意志帝国宣布成立（1871）。

二、思想事件

J·S·巴赫去世（1750），莱辛的描写中产阶级生活的先锋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面世（1767），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面世；席勒发表《强盗》（1781）；莫扎特去世（1791），康德去世（1804）；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问世（1804）；席勒去世（1805）；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出版（1808）；歌德去世（1832）；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1848）和《资本论》（1867）；瓦格纳音乐节在拜雷特建造剧院举行（1871）。

拿破仑后的欧洲

一、历史事件

A、保守派对自由派（1815—1832）

保守派的主要特征，奥地利的梅特涅首相垄断了欧洲的政治（1814—1830)；法国波旁王朝复辟（1814）；意大利开始国家主义的烧炭党运动（1820）；在法国查理十世接替路易十八(1824)，

希腊独立于土耳其统治（1829）；南美的自由革命，（1810—1830）；俄土战争（1828）；法国七月自由革命，路易—腓力浦成为国王（1830）；英国通过第一个改革法案（1832）。

B．自由主义占优势（1832—70）

英国废除奴隶（1833）；维多利亚成为英国女王（1837）；大陆欧洲自由骚动蜂起，巴黎革命废黜了路易—腓力浦，建立了第二法兰西共和国，由路易、拿破仑担任第一执政官（1848）；腓特烈·威廉四世催促"德意志联盟"，德国联邦恢复（1850）；第二法兰西帝国成立（1852）；加里波第领导意大利国家主义战争（1854—1861）；克里米亚战争阻止了俄国向东方渗透（1854—1856）；拿破仑三世抗击奥地利（1859）并且干涉罗马尼亚、波兰、意大利和墨西哥（1856—1867），俄国废除农奴制，意大利王国成立（1861）；俾斯麦任普鲁士首相（1862）；普鲁士打败奥地利，成了德意志的头号强国（1866）；普法战争，拿破仑三世被废黜（1870）。

二、思想事件

艺术中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兴起（1815—1832）；英国的第一条蒸汽铁路（1825）；法拉第发明电动机和电镀（1830）；孔德发表《实证主义哲学》（1837—1857）；第一个电报发明成功（1837）；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1848）；贝色麦炼钢法获得专利（1856）；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859）；斯宾塞发表《第一原则》，孟德尔提出遗传定律（1865）；格林机枪发明（1867）；马克思发表《资本论》（1867），利斯特发现外科消毒法（1867）；社会自由主义的主要倡导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去世（1873）。

俄 国 史

北欧海盗俄瑞克建立俄罗斯帝国（862）；蒙古人入侵(1224)，抑制了俄罗斯200多年的发展，德米特里四世击败蒙古人(1380)，伊凡雷帝成为沙皇（1547）；最后一位海盗国王费奥多尔去世，鲍里斯·戈东诺夫加冕(1613)；彼得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圣彼得堡，试图欧化俄罗斯（1689—1725)，卡捷琳娜二世(1762—1896)鼓励自由主义和模仿欧洲；亚历山大一世的人道主义统治（1801—1825）；拿破仑的灾难性入侵（1812）；十二月党人起义（1825）；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1861）并且引进改革，但是由于革命鼓吹者的活动而变得保守起来，阿拉斯加被卖给美国(1867)；俄土战争(1877—1887），亚历山大被一个革命家的炸弹炸死（1881）接下来的是亚历山大三世的专制统治，犹太人开始被大屠杀（1881）；横穿西伯利亚铁路开始运行（1891）；一系列的暗杀揭开了恐怖活动时期的序幕（1901）；帝国宣言答应改革（1904）；日俄战争(1904）；对罢工者的红色星期天大屠杀，为日本打败，武装部队的起义，强迫选举改革，宪法与人权宣言开始；政府毁约导致暴乱与骚动，最后以莫斯科起义和大屠杀而告终（1905）；第一杜马和国王发生冲突（1906）；恐怖主义增强，强施戒严令（1907）；第二杜马解散，保守的第三杜马标志着一个镇压和反革命时代的开始(1907—1912)；第四杜马实施一些小改革（1913）；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联合起来（1914）；拉斯普京被暗杀(1916)；俄国军事力量的衰败以及成功的革命（1917）；签订布列斯特一里脱维斯克和约（1918）；斯大林接替列宁（1924）。

世 纪 末

一、历史事件

第三法兰西共和国建立（1871）；建立西班牙君主民主制（1869—1873）；第一西班牙共和国（1873—1874）失败，波旁王朝复辟（1875）；土耳其战争削弱了奥图曼帝国（1877—78）；俄国改革运动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遭暗杀而告终（1881）；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三方联盟（1882）；威廉二世成为德国统治者（1888）；俾斯麦首相辞职（1891）；尼古拉二世成为俄国的沙皇（1894）；俄日战争（1904—1905）促进了日本的迅速发展；缔结法英协约（1904）；土耳其为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所侵（191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

二、思想事件

教皇不谬性的教义（1870）；发明第一只白炽电灯（1878）；伊斯特曼·科达开始生产电影片（1880）；尼采的《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1883）；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报，伦琴发现X射线（1895）；汽车生产在美国开始（1895）；张伯伦的《19世纪的基础》提出了条顿民族优越的理论（1899）；第一架飞机起飞（1903）；爱因斯坦首先提出相对论（1905）；柏格森发表《创造性的进化》（1909）。

欧洲的崩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一、历史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意大利参战（1915）；美国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俄国革命开始和俄国的停战（1917）；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和德国的停战（1918）；凡尔赛和约，

俄国"红色恐怖"开始，魏玛共和国成立（1919）；墨索里尼领导下的法西斯革命（1922）；德国通货膨胀（1923）；道威斯赔偿计划（1924）；洛迦诺会议（1925）；德国加入国际联盟，毕尔苏茨基成为波兰的强人（1926）；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议（1927）；凯洛格—布赖恩德条约取缔战争（1928）；托洛茨基被流放，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意大利和梵蒂冈和约，美国股票市场崩溃（1929）；法国撤离莱茵河（1930）；希特勒任德国首相（1933）；法俄和约，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5）；西班牙内战，颁布新的苏联宪法，建立罗马—柏林轴心国（1936）；德国占领奥地利，有关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1938），佛朗哥在西班牙内战中获胜，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1939）；德国入侵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法国、法国陷落（1940）；德国入侵苏联、美国参战（1941）；发表《联合国宪章》（1942）；墨索里尼倒台（1943）；盟军在诺曼底登陆（1944）；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

二、思想事件

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发表《西方的衰落》（1918）；官方的共产党最早形式第三国际形成（1919）；第一次商务无线电广播，氮原子弹被厄内斯特·卢瑟福改变成氢和氧原子弹（1920）；阿尔弗雷·诺恩·怀特海发表《科学与现代世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第一卷出版（1925）；林德伯格从纽约单人飞到巴黎，英国的第一次电视广播（1927）；阿奇博尔德·弗莱明爵士发明盘尼西林（1928）；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发表《民众的起义》（1930）；世界经济会议在伦敦召开（1933）；罗伯特·沃森—瓦特爵士建造有效雷达（1935）。

1945年以来的欧洲

纽伦堡法庭判决纳粹头目，国际联盟正式解散（1946）；"杜鲁门主义"，印度和巴基斯坦获得独立，第一次超音速飞行（1947）；柏林空投（1948）；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立，四点建议开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首都波恩，联合国把纽约作为永久性总部(1949)；肖伯纳去世(1950)；安德烈·纪德去世（1951）；伊丽莎白二世成为英国女王，约瑟夫·斯大林去世，康拉德·阿登纳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相（1953）；阿尔及利亚暴力爆发（1954）；托马斯·曼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去世（1955）；苏伊士运河危机，匈牙利事件（1956）；罗马和约建立共同市场，国际地理年对太空探险作出了重大贡献，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57）；尼基塔·赫鲁晓夫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第五法兰西共和国成立，夏尔·戴高乐就任总统，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当选，垮掉的一代运动侵入欧洲（1958）；第三颗月球卫星拍摄第一幅短距离月球照片（1959）；苏联进行了第一次载人太空飞行，阿尔伯特·加缪去世（1960）；柏林墙危机（1961）；阿尔及利亚独立（1962）；教皇约翰二十三世道谕《地上和平》，路德维希·厄尔哈特就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去世（1963）；赫鲁晓夫下台（1964）；温斯顿·丘吉尔去世（1965），法国撤出北约，基辛格就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1966）；英国英镑贬值，康拉德·阿登纳去世（1967）；捷克斯洛伐克事件(1968)；戴高乐辞去法国总统，法国法郎贬值，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1969）。

译 后 记

这本题为《欧洲文学的背景》的书，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是为大学水平的学生提供欧洲文学的背景知识，使他们充分了解欧洲文化的起源以及从古到今西方历史上所出现的重大事件。

长期以来，作为大学文科学生的必修课程，欧洲文学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学生往往是就文学而论文学，而对整个欧洲文化的起源，对欧洲思想史上所出现的重大事件所知甚少。罗德·W·霍尔顿教授和文森特·F·霍普尔教授所创作的这本书可以说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关于这本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原则，两位作者在第一章《我们的文化遗产》中就已经开宗明义地给点了出来，这就是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东方的希伯来文化和中世纪的哥特文化这三大方面来全面论述西方世界的漫长衍变。

在这本书里，两位作者对文化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因此读者读完此书不仅可以得到欧洲文学的背景知识，而且还可以全面了解西方文化的来龙去脉。纵观西方历史，古代的希腊人可以说开创了西方文化的先河。他们所关注的是人与宇宙的关系。他们运用理性来探索自然的奥秘，善于提出各种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是他们的特征。他们的思维方式具有外在系统，善于抽象化，理论化和逻辑化的思维。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缺乏神秘的直觉，缺少一种精神支柱，在这方面，希伯来宗教信仰正好弥补了它的空缺。基督教在欧洲的出现并不完全出于偶然，它那无所不

能，无所不知的上帝为西方人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宇宙起源，人生价值和善恶伦理等观念，它那人性论思想通过剖析人的内心世界来揭示人们内心深处所存在的矛盾，并为他们指出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使他们得以解脱，换句话说，古典主义注重的是对自然界的外部研究，而希伯来主义注重的则是人的内心反省。这一外一内互为冲突，互相弥补，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发展。

中世纪一般被认为是欧洲文化发展的低潮，各种神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统一。古典主义的理想是智慧，希伯来感情主义的标志是仁爱，而哥特人的贡献则是力量。这三个互为平等，类似于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文化得到了绝妙的融合，产生了中世纪一个含有三者的上帝观。但是由于过分注重神学，理性的发展受到了压抑，哲学无形之中成了神学的婢女。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理性开始抬头，科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作为一种宗教的基督教则相应地受到了削弱。随着尼采的“上帝已死”，基督教已失去了它昔日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尽管如此，基督教精神依然弥漫在西方的各个文化领域。事实上，文艺复兴或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所攻击的只是教会的腐败和专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正统的基督教观念。经过近代的一系列宗教改革，基督教已成了西方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它和古典主义理性以及哥特文化一起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基石。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业师张子清先生的大力支持，他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校阅全稿。重庆出版社的陈世勇兄为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谨在此一并致谢。

译　者

1989年3月26日于上海

参 考 书 目

（为供中国的专家学者参考，仅录英文参考书目）

第一章至第八章

(Because of the broad chronological scope of this volume, the authors have been forced to omit mention of purely literary works or studies of individual authors from the list of suggested readings. To have included even the most important volumes in these categories would have been to increase the size of the book beyond all practical proportions. Place of publication, when not mentioned, is New York.)

GENERAL

M. Arnold, "Hebraism and Hellenism" in *Culture and Anarchy* (1902); K. B. Avery, *The New Century Classical Handbook* (1962); P. Devambez et al., *The Praeger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Greek Civilization* (1967); G. L. Dickenson, *The Greek Way of Greek Civilization* (1967); G. L. Dickenson, *The Greek Way of Life* (1931); W. Durant, *The Life of Greece* (1939); W. W. Jaeg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3 v, 1939-1945); H. D. F. Kitto, *The Greeks* (Harmondsworth, 1951); R. W. Livingston, *The Greek Genius and Its Meaning to Us* (Oxford, 1912); R. W. Livingston (ed.), *The Legacy of Greece* (Oxford, 1924); W. W. Tarn,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1961); A. J. Toynbee, *Greek Civilization and Character* (London, 1924); L. Van Hook, *Greek Life and Thought* (1930); N. P. Vlachos, *Hellas and Hellenism* (Boston, 1936); L. Whibley (ed.), *A Companion to Greek Studies* (Cambridge, 1931).

HISTORY

S. Barr, *The Will of Zeus* (1961); G. W. Botsford and C. A. Rob-

inson, Jr., *Hellenic History* (1939); J. B. Bury, *A History of Greece* (1931); John Chadwick, *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 (Cambridge, 1958); M. I. Finley, *The Greek Historian*(London, 1959); C.A.Fyffe,*History of Greece*(London,1938); Leonard B. Palmer *Myceneans and Minoans;Aegean Prehistory in the Light of the Linear B Tablets*(1962);C.A.Robinson, *Zito Hellas*(London, 1946); M. Rostovzeff,*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2V, Oxford, 1928-1930); C.G. Starr, *The Origins of Greek Civilization* 1100-650 B.C.(1961).

LITERATURE

M. Bieber, *History of the Greek and Roman Theatre(Princeton*, 1961);C.M.Bowra,*Ancient Greek Literature*(London,1933);

L. Feder,*Crowell's Handbook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1961); H. N. Fowler, *A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1923); M. Hadas, *A History of Greek Literature* (1950); A. E. Haigh, *The Attic Theatre*(Oxford,1907); E. Hamilton, *The Great Age of Greek Literature* (1942); P. Harsh,*A Handbook of Classical Drama* (Palo Alto,1944); Sir Philip Harvey,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Oxford,1937); G. Murray,*A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1932); G. Murray, *The Rise of the Greek Epic* (1934); G. Norwood, *Greek Comedy (Boston*, 1932); G. Norwood,*Greek Tragedy*(Boston,1932); G. Norwood, *The Writers of Greece*(London,1935); H. J. Rose, *A Handbook of Greek Literature* (London, 1934); J, A. Symonds, *Studies of the Greek Poets* (London, 1920): W. C. Wright, *A Short History of Greek Literature*(1907).

MYTHOLOGY AND RELIGION

T. Bulfinch, *Mythology*(Modern Library reprint,n.d.);F.M. Cornford, *From Religion to Philosophy* (1912); F.M. Cornford, *Greek Religious Thought from Homer to the Age of Alexander* (London, 1923); F. Cumont, *Astrology and Religion among the Greeks and Romans* (1960); Sir James Frazer, *The Golden Bough* (1922); W. C. Guthrie, *The Greeks and Their Gods (Boston*,

1951); E. Hamilton, *Mythology*(1942); J. E. Harrison, *Epi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Greek Religion*(Cambridge, 1921); J. E. Harrison, *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Greek Religion* (Cambridge, 1922); J. E. Harrison. *The Religion of Ancient Greece* (London, 1905); J. E. Harrison, *Themis: A Study of the Social Origins of Greek Religion* (Cambridge, 1912); W. W. Hyde, *Greek Religion and Its Survivals* (Boston, 1923); G. H. Moore,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the Greeks* (Cambridge, Mass, 1925); G. Murray, *Five Stages of Greek Religion*(1955); G. Murray, *Four Stages of Greek Religion* (1912); M. P. Nilsson, *Greek Folk Religion* (1961); M. P. Nilsson, *Greek Popular Religion* (1940); M. P. Nilsson, *A History of Greek Religion*(Oxford, 1949); H. J. Rose, *Ancient Greek Religion* (London, 1948); G. Schwab, *Gods and Heroes* (1946).

PHILOSOPHY

C. Bakewell, *Source Book in Ancient Philosophy* (1909); F. M. Cornford, *From Religion to Philosophy* (1957); B. A. G. Fuller,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3v, 1922–1931); W. K. C. Guthrie, *Greek Philosophers* (1960); T. A. Sinclair, *History of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1961); E. Zeller, *Outlines of the History of Creek Philosophy*(1931).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LIFE

G. M. Calhoum, *The Business Life of Ancient Athens* (Chicago, 1926); V. G. Childe,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6th ed.*, 1958); V. Ehrenberg, *The Greek State* (1960); R. Flacelière, *Love in Ancient Greece* (1962); J. B. Gittler, *Social Thought among the Early Greeks*(Athens, Ga., 1941); B. E. Hammond,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s* (London, 1895); Sir John P. Mahaffy, *Social Life in Greece from Homer to Menander* (London, 1925); H. Michell, *The Economics of Ancient Greece* (1940);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e Daily Life of the Greeks and the Romans* (1933); M. C. Quenell, *Everyday Things in Archaic Greece* (London, 1931);

C.E.Robinson, *Everyday Life in Ancient Greece* (Oxford, 1933); M.Rostov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Oxford, 1941); G.D.Thompson, *Studies in Ancient Greek Society* (London, 1949); M.O.Wason, *Class Struggles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1947); M.O.Wason, *The Greek Political Experience: Studies in Honor of W.K.Prentice* (Princeton, 1941).

第九章至第十一章

GENERAL

C.Bailey, *The Legacy of Rome* (Oxford, 1923); V.Chapot *The Roman World* (London, 1928); W.Durant, *Caesar and Christ* (1944); R.M.Geer, *Classical Civilization: Rome* (1940); W.C.Greene, *The Achievement of Rome* (Cambridge, Mass., 1933); E.Hamilton, *The Roman Way* (1932); F.G.Moore, *The Roman's World* (1936); G.W.White and E.C.Kennedy, *Roman History, Life, and Literature* (London, 1942).

HISTORY

G.P.Baker, *Twelve Centuries of Rome* (1934); S.Barr, *The Mask of Jove* (Philadelphia, 1966); A.E.R.Boak, *A History of Rome to 565 A.D.* (1943); J.B.Bury,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n.d.): T.Frank, *Roman Imperialism* (1914); E.Gibbon,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J.B.Bury, ed., London, 1900); M.Hadas, *A History of Rome* (1956); F.M.Heichelherne, *A History of the Roman People* (1962); T.R.E.Holmes, *The Roman Republic and the Founder of the Empire* (1967); T.Mommsen, *History of Rome* (London, 1901); C.E.Robinson, *A History of Rome* (1935); H.H.Scullard, *A 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 from 753 to 146 B.C.* (London, 1961).

LITERATURE

M.S.Dimsdale, *A History of Latin Literature* (1915); J.W.Duff, *A Literary History of Rome* (2V, London, 1928, 1932); J.

W. Duff, *The Writers of Rome*(London, 1937); T. Frank, *Life and Literature in the Roman Republic* (Berkeley, 1930); G. Howe and G. A. Harrer, *Roman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1924); J. W.. Mackail, *Latin Literature* (1895); H. J. Rose, *A Handbook of Latin Literature* (London, 1956).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F. Altheim, *A History of Roman Religion* (1938); C. Bailey. *Phases in the Religion of Ancient Rome* (Berkeley, 1932); A. W. Benn, *A History of Ancient Philosophy* (1912); J. B. Carter, *The Religious Life of Ancient Rome* (1911); W. W. Fowler, *The Religious Experience of the Roman People* (London, 1911); T. R. Glover, *The Conflict of Religions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 (London, 1932); J. B. Mayor, *A Sketch of Ancient Philosophy from Thales to Cicero* (Cambridge, 1889); H. J. Rose, *Religion in Greece and Rome* (1959); E. Westermarck,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 Ideas* (2v. London, 1917).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LIFE

F. Abbott, *The Common People of Ancient Rome* (1911); F. Abbott, *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Rom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Boston, 1933); F. Abbott, *Roman Politics*(Boston, 1933); J. Carcopino, *Daily Life in Ancient Rome* (New Haven, 1940); J. A. Crook, *Law and Life of Rome* (Ithaca, 1967); S. Dill, *Roman Society from Nero to Marcus Aurelius* (London, 1905); D. R. Dudley, *The Civilization of Rome* (1962); W. W. Fowler, *Social Life at Rome in the Age of Cicero* (1929); T. Frank(ed.), *An Economic Survey of Rome* (5v, Baltimore, 1933-1940); L. Friedlander, *Roman Life and Manners under the Early Empire* (London, 1908-1913); A. H. J. Greenridge, *Roman Public Life* (London, 1911); L. Homo, *Rom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1930); H. W. John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the Romans* (Chicago, 1932); P. Louis, *Ancient Rome at Work* (1927); W. B. McDaniel, *Roman Private Life and Its Survivals* (Boston, 1924); U. E. Paoli, *Rome: Its People, Life. ane Customs*(1963); M. Rostovtzeff, *His-*

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 (2v, Oxford, 1928); M. Rostovtzef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2nd ed., Oxford, 1957); H. T. Rowell, *Rome in the Augustan Age* (1962); J. Toutain, *Economic Life of the Ancient World* (1930); H. A. Treble and K. M. King, *Everyday Life in Rome in the Time of Caesar and Cicero* (Oxford, 1931).

第十二章

GENERAL

J. M. Adams, *Biblical Backgrounds* (Nashville, 1934); W. F. Albright, *Archeology and Religion of Israel* (1942); M. Arnold, "Hebraism and Hellenism" in *Culture and Anarchy* (1902); J. Baikie, *Lands and Peoples of the Bible* (London, 1932); H. K. Booth, *The Bridge between the Testaments* (1930); H. Creelm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1917); H. T. Fowler,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the Hebrew Religion* (Chicago, 1943); Sir James Frazer, *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 (1923); I. Goldberg, *Outline of Jewish Knowledge* (1929); A. Hertzberg (ed.), *Judaism* (1962); E. Jacob, *The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1958); G. A. Knight, *From Moses to Paul* (London, 1949); L. H. Koehler, *Old Testament Theology* (London, 1957); M. R. Laehr, *A History of Religion in the Old Testament* (1936); J. L. Miller, *Encyclopedia of Bible Life* (1944); I. G. Matthews, *Old Testament Life and Literature* (1923); J. Muilenberg, *The Way of Israel: Biblical Faith and Ethics* (1961); F. B. Oxtaby, *Israel's Religious Development* (1927); L. Powys, *The Cradle of God* (1929); H. H. Rowley, *The Faith of Israel* (London, 1956); H. H. Rowley, *The Rediscovery of the Old Testament* (London, 1946); R. B. Y. Scott, *The Relevance of the Prophets* (1944); Sir George A. Smith,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Holy Land* (25th ed., 1932).

HISTORY

A. E. Bailey and C. F. Kent, *History of the Hebrew Common-*

wealth (rev. ed., 1935); G. A. Barton (ed.), *A History of the Hebrew Peopl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Year* 70 A. D. (1930); S. M. Dubnow, *An Outline of Jewish History* (1925); L. Finkelstein, *The Jews: Their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 (3rd ed., 1960); P. Goodman, *A History of the Jews* (1943); C. H. Gordon, *Introduction to Old Testament Times* (Ventnor, N.J., 1952); H. H. Graetz, *History of the Jews* (1927); A. L. Sachar, *A History of the Jews* (rev. ed., 1953); J. M. Powis Smith, *The Prophets and Their Times* (rev. by W. A. Irwin, Chicago, 1941).

LITERATURE

E. C. Baldwin, *Types of Literature in the Old Testament* (1929); J. A. Bewer, *The Literature of the Old Testament* (1922); W. K. Clarke, *The Story of the Old Testament* (1940); W. Eichrodt, *Man in the Old Testament* (London, 1951); E. J. Goodspeed, *The Story of the Old Testament* (Chicago, 1934); R. B. Henderson, *A Modern Handbook to the Old Testament* (London, 1927); L. B. Langaise, *The Old Testament, Its Form and Purpose* (1945); D. B. Macdonald, *The Hebrew Literary Genius* (Princeton, 1933); G. F. Moore and L. H. Brockington, *Literature of the Old Testament* (rev. ed., Oxford, 1948); L. H. Wild, *Geographic Influences in Old Testament Masterpieces* (Boston, 1915).

第 十 三 章

RELIGION

H. Betterson (ed.), *Document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1947); A. C. Bouquet, *Comparative Religion* (3rd rev. ed., London, 1950); M. Burrows, *An Outline of Biblical Theology* (Philadelphia, 1946); S. C. Carpenter, *Christianity* (London, 1953); E. C. Colwell, *The Study of the Bible* (Chicago, 1937); V. D. Macchioro, *From Orpheus to Paul* (1930).

HISTORY

C. K. Barrett (ed.), *The New Testament Background* (1961);

D. M. Beck, *Through the Gospels to Jesus* (1954); G. Bornkamm, *Jesus of Nazareth* (London, 1960); C. T. Craig, *The Beginning of Christianity* (Nashville, 1943); F. R. Crownfield, *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New Testament* (1960); W. D. Davies, *Christian Origins and Judaism* (Philadelphia, 1962); M. Dibelius, *Paul* (1953); M. S. Enslin, *Christian Beginnings* (1938); F. J. Foakes-Jackson, *The Life of St. Paul* (1926); G. H. Gilbert, *Greek Thought in the New Testament* (1928); T. R. Glover, *The Jesus of History* (1921); J. Klausner, *From Jesus to Paul* (1943); S. Madeleine and J. Lane Miller, *Encyclopedia of Bible Life* (1944); A. C. McCiffert,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Apostolic Age*(1912); A. T. Olmstead, *Jesus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1942); J. W. Parkes, *The Foundations of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London, 1960); A. Robertson,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ity*(1962); W. Walker. *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1959).

LITERATURE

A. E. Barnett, *The New Testament: Its Making and Meaning* (1946); A. C. Culler, *Creative Religious Literature* (1930); C. A. Dinsmore. *The English Bible as Literature*(1931); F. C. Eiselen, E. Lewis, and D. G. Gowney (eds.). *The Abingdon Bible Commentary* (1929); R. H. Fuller, *The New Testament in Current Study* (1962); F. C. Grant, *Ancient Judaism and the New Testament* (1959), F. C. Grant, *The Gospels: Their Origin and Their Growth* (1957); H. H. Halley, *Pocket Bible Handbook* (Chicago, 1946); J. Hastings (ed.).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1942); M. E. Lyman, *The Christian Epic* (1936); J. L. Price, *Interpreting the New Testament*(1961); F. B. Rhein,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the New Testament* (Great Neck, N. Y., 1966); D. W. Riddle and H. H. Hutson, *New Testament Life and Literature* (Chicago, 1946); J. H. Ropes, *The Synoptic Gospels* (Cambridge, Mass., 1961); E. F. Scott, *The Literature of the New Testament* (1932); W. O. Sypherd, *The Literature of the English Bible* (Oxford, 1938); E. R. Tratner, *Unraveling the Book of Books*(1929).

第十四章至第十五章

J.B. Bury, *The Invasion of Europe by the Barbarians* (1963); E.S.Duckett, *The Gateway to the Middle Ages* (1938); V. Gronbech, *The Culture of the Teutons* (Oxford, 1932); M. L. W. Laistner, *Thought and Letters in Western Europe* 500-900 (London, 1931); H.S. Moss, *Birth of the Middle Ages* 294-815 (Oxford, 1935); E. K. Rand, *Founders of the Middle Ages* (2nd ed., Cambridge, Mass., 1929); H.O.Taylor, *Classical Heritage of the Middle Ages* (1925); B. Thorpe, *Northern Mythology* (London, 1851).

第十六章

H.Adams, *Mont Saint-Michel and Chartres* (1904); F.B.Artz, *The Mind of the Middle Ages* (1953); M. Bloch, *Feudal Society* (tr. L. A.Manyon, Chicago, 1963); N.F. Cantor, *Medieval History: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Civilization* (1964); M. H. Carre, *Realists and Nominalists* (Oxford, 1946); G.G.Coulton, *Medieval Panorama* (Cambridge, England, 1939); C. G. Crump and E. F. Jacob. *The Legacy of the Middle Ages* (1926); S. J. Curtis, *A Short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15); H.W. C. Davis, *Medieval Europe* (2nd ed., 1960); E. C. Gardner, *Dante and the Mystics* (1913); F. Gilson. *The Spuit of Mediaeval Philosophy* (1936); E. Gilson, *Reason and Revel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1938); G. H. Haskins,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1927); G. H. Haskins, *Studies in Medieval Culture* (1929); G. H. Haskins, *The Rise of Universities* (1923); B.J.Hawkins, *A Sketch of Mediaeval Philosophy* (London, 1946); F. J. C. Hearnshaw,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deas of Some Great Medieval Thinkers* (1923); F. J. C. Hearnshaw, *Medieval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Civilization* (1922); R. Klibansky. *Continuity of the Platonic*

Tradition during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39); R. P. McKeon, *Selections from Medieval Philosophers*(1929); J. T. McNeill, *Makers of Christianity* (1935); S. H. Mellone, *Western Christian Thought in the Middle Ages* (Edinburgh, 1935); S. Painter, *A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1953); E. K. Rand, *Founders of the Middle Ages* (1957); H. Rashdall,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1895); R. R. Steele, *Medieval Lore* (1924); J. L. Stocks, *Aristotelianism* (1925); H. O. Taylor, *The Classical Heritage of the Middle Ages* (1901); H. O. Taylor, *The Medieval Mind* (4th ed., 1927); J. W. Thompson, *The Middle Ages* (1931); A. S. Turberville, *Medieval Heresy and the Inquisition* (London, 1920); K. Vossler, *Medieval Culture* (1929); H. B. Workman, *Christian Thought to the Reformation* (1914); M. de Wulf, *History of Mediaeval Philosophy* (1953); M. de Wulf, *Medieval Philosophy, Illustrated from the System of Thomas Aquinas* (Cambridge, Mass., 1922); M. de Wulf, *Philosophy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1922).

第十七章

R. H. Bainton, *The Reforma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Boston, 1952); J. Burckhardt,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Phaidon ed., London, 1937); E. Cassirer and others (eds.), *The Renaissance Philosophy of Man*(Chicago, 1948); R. T. Davies, *The Golden Century of Spain* 1501–1601 (rev. ed., London, 1958); W. Durant,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Italy from 1304–1576 A. D.* (1953); E. Emerton,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Europe* (1917); W. F. Ferguson, *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 (Boston, 1948); M. P. Gilmore, *The World of Humanism* 1453-1517 (1953); F. P. Graves, *A History of Education during the Middle Ages and Its Transition to Modern Times* (1925); H. J. Grimm, *The Reformation Era*, 1500–1650 (1956); B. Hathaway, *The Late Renaissance in Italy* (Ithaca, N. Y., 1962); D. Hay,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in Its Historical Back-*

ground (Cambridge, 1961); E. M. Hulme, *The Renaissance, the Protestant Revolution, and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in Continental Europe* (1914); H. Kamen,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1965); H. S. Lucas,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Reformation* (2nd ed., 1960); J. O. Riedl (ed.), *Catalogue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ies, 1350-1650* (Milwaukee, 1940); N. A. Robb, *Neoplatonism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London, 1935); R. Roeder, *Man of the Renaissance* (1933); F. Scheville, *The First Century of Italian Humanism* (1928); F. Scheville, *A History of Florence* (1936); E. Sichel, *The Renaissance* (1914); J. A. Symonds, *The Revival of Learning* (3rd ed., London, 1897); J. A. Symonds,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1935); H. O. Taylor, *Thought and Expressio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920); J. N. Thompson and others,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Chicago, 1929); W. T. Waugh, *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1378 to 1494* (1932); W. H. Woodward, *Vittorina da Feltre and Other Humanist Educators* (Cambridge, England, 1897).

第十八章

J. Boulenger,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France* (Magnolia, Mass., 1963); E.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1951); A. Cobban, *In Search of Humanity: The Role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Modern History* (1960); G. R. Cragg, *Reason and Author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64); Lester G. Crocker, *An Age of Crisis: Man and the World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ench Thought* (Baltimore, 1958); Otis Fellows and Norman Torry, *The Age of the Enlightenment* (1942); A. Guerard, *The Life and Death of an Ideal: France in the Classical Age* (1957) C. Hastings, *The Theatre: Its Development in France and England* (1901); George Havens, *The Age of Ideas* (1955); Paul Hazard, *The European Mind: The Critical Years (1680-1715)* (New Haven, 1953); Paul Hazard,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18th Century* (New Haven, 1954); W. H. Lewis, *The Splendid*

Century (1954); D. Ogg, *Europ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3rd ed., 1938); H. Peyre, *Le Classicisme Francais* (1942); L. Rothrug, *Opposition to Louis XIV: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1965); A E. Shipley, *The Revival of Scienc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1914); S. G. Tallentyre, *The Women of the Salons* (1926); H. O. Wakeman, *The Ascendency of France* (London, 1897); B. Willey, *The Seventeenth-Century Background* (London, 1934); C. H. C. Wright, *French Classicism* (Cambridge, Mass., 1920).

第十九章

F. A. Aular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10); I. Babbitt, *Rousseou and Romanticism* (1919); J. Bainville, *History of France* (1926); J. Barzun, *Classic, Romantic, and Modern* (2nd ed., Boston, 1961); C. L. Becker,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Haven, 1932); E.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tr. by F. C. A. Koelln and J. P. Pettergrove, Boston, 1955); A. Cobban, *In Search of Humanity: The Role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Modern History* (1960); W. and A. Durant, *The Age of Voltaire* (1965); W. and A. Durant, *Rousseau and Revolution* (1967); H. N. Fairchild, *The Romantic Quest* (1931); P.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1966); F. C. Gree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London, 1929); F. C. Green, *Minuet* (London, 1935); A. Guerard, *France: A Modern History* (Ann Arbor, 1958); G. R. Havens, *The Age of Ideas* (1955); C. J. H. Hayes,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1932); P. Hazard, *The European Mind: The Critical Years* (1680-1715) (New Haven, 1953); J. C. Herold, *The Age of Napoleon* (1963); R. Z. Lauer, *The Mind of Voltaire* (1961); G. Lefebre,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1947); H. Nicholson, *The Age of Reason, 1700-1798* (London, 1960); J. H. Rose, *The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Era* (1895); J. J. Rousseau, *Confessions*; H. M. Stephens, *European History from 1789 to 1815* (1893); H. M. Stephens,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02); R. N. Stromberg,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1966); H. Taine, *The Ancient Regime* (1875-1885); J. M. Thomps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43); A. A. Tilley, *The Decline of the Age of Louis XIV* (1929); A. R. Viney,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inburgh, 1854); A. Young, *Travels in France* (1792).

第二十章

E. K. Bennett, *A History of the German Novelle* (Cambridge, England, 1934); J. Bithell (ed.), *Germany, a Companion to German Studies* (London, 1937); W. A. Braun, *Types of Weltschmerz in German Poetry* (1905); W. H. Bruford, *German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England, 1935); E. M. Butler, *The Tyranny of Greece over Germany* (Cambridge, England, 1935); K. Francke, *A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 (1916); G. P. Gooch, *German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20); J. H. Hayes,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1936 et seq.); C. Hentschel, *The Byronic Teuton: Aspects of German Pessimism*, 1800-1933 (London, 1940); L. W. Kahn, *Social Ideals in German Literature*, 1770-1830 (1938); G. Lichtheim, *Marx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1961); G. Mann, *The History of Germany since* 1789 (1968); K.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Hegel and Marx* (1926); A. W. Porterfield, *An Outline of German Romanticism*, 1766-1866 (Boston, 1914); H. S. Reiss, ed.,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German Romantics* 1793-1815 (1956); J. G. Robertson, *A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 (1925); J. J. Saunders, *The Age of Revolution* (1949); W. Silz,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 (Cambridge, Mass., 1929); O. Walzel, *German Romanticism* (1932); R. M. Wernaer, *Romanticism and the Romantic School in Germany* (1910); G. T. Whitney and D. F. Bowers, eds., *The Heritage of Kant* (1962); L. A. Willoughby, *The Classical Age of German Literature*, 1740-1805 (1926); L. A. Willoughby, *The Romantic Movement in Germany* (1926).

第二十一章

FRENCH HISTORY AND THOUGHT

F.B.Artz, *France under the Bourbon Restoration*(1931), *Reaction and Revolution. 1814-1832* (1934); J. L. Dubreton, *The Restoration and the July Monarchy* (1929); C. J. H. Hayes,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1936 *et seq.*),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1931); H. Laski, *The Rise of European Liberalism* (London, 1936); G. Ruggiero.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Liberalism* (1927); J. J. Saunders, *The Age of Revolution* (1949); F. A. Simpson, *The Rise of Louis Napoleon* (1909); F. A. Simpson, *Louis Napoleon and the Recovery of France* (1923); R. Soltau, *French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31).

DARWINISM, MARXISM, NATURALISM

J.Barzun, *Darwin, Marx, Wagner--Critique of a Heritage*(1947); O. Cargill, *Intellectual America*(1941); J. Dewey, *The Influence of Darwin on Philosophy*(1960); R. Dumnesnil, *Le Réalisme et le Naturalisme* (Paris, 1963); G. Himmelfarb, *Darwin and the Darwinian Revolution* (Gloucester, 1962); S. Hook, *Toward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 (1936); S. E. Hyman, *The Tangled Bank; Darwin, Marx, Frazer, and Freud as Imaginative Writers* (1962); M.Josephson, *Zola*(1931); F.Meirung, *Karl Marx*(1936); H. B Parkes, *Marxism; An Autopsy* (Boston, 1939); V.L. Parrington,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Vol. Ⅱ (1932); G. Saintsbury, *History of a French Novel* (1919); P. B. Sears, *Charles Darwin* (1950); Robert Shafer, *Christianity and Naturalism* (New Haven, 1926); H. Tain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1873).

第二十二章

M.Baring. *Landmarks in Russian Literature*(1910), *Outline of*

Russian Literature(1914); E. Crankshaw, *Russia and the Russians* (1948); H. von Eckart, *Russia* (1932); J. G. Fletcher, *The Two Frontiers* (1930); M. T. Florinsky, *Russia: A History and an Interpretation* (1953); N. K. Gudzii, *History of Early Russian Literature* (1949); I. F. Hapgood, *A Survey of Russian Literature* (Chautauqua, 1902); R. Hare, *Russian Literature from Pushkin to the Present Day* (1947); P. Kropotkin, *Ideals and Realities in Russian Literature* (1915); T. G. Masaryk, *The Spirit of Russia* (1919); P. N. Miliukov, *Outlines of Russian Culture*(Philadelphia, 1942); D. S. Mirsky, *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 (1926); H. Muchnic, *An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 (1947); B. Pares, *Russia* (8th ed., 1953); W. L. Phelps, *Essays on Russian Novelists* (1916); S. F. Platonov, *History of Russia* (1925); B. J. Stern (ed. *Understanding the Russians* (1947).

第二十三章

C. E. Black,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1966); E. Brandenburg, *From Bismarck to the World War*(1927); G. Brandes, *Main Current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6v, 1901-1905); H. S. Chamberla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2v, 1911); G. L. Dickenson, *The International Anarchy, 1904-1914* (1931); A. de Gobineau, *Essay on the Inequality of the Human Race* (1915); J. L. and B. Hammond, *The Rise of Modern Industry* (1925); Q. Howe, *A World History of Our Times* (v.1, 1949); J. S. Kittie, *The Partition of Africa* (1895); H. Kohn, *Nationalism and Imperialism in the Near East* (1932); W. Millis, *The Road to War* (1935); L.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1934); M. Nordau, *Degeneration* (1895); O. Pflanze, *Bismar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 (Princeton, 1963); S. H. Potts, *History of French Colonial Policy* (2v, 1929); C. G. Robertson, *Bismack* (1918); J. J. Saunders, *The Age of Revolution* (1949); B. E. Schmitt, *The Coming of the War* (2v, 1930); W. M. Simon, *Germany in the Age of Bismarck* (1968); R. Soltau, *French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31); M. E. Town-

shend. *The Rise and Fall of Germany's Colonial Empire* (1930); A. Toynbe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12).

第二十四章

L. Albertini,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tr. and ed. by I.M.Massey, 3v, London, 1952-1957); R. Aron, *The Century of Total War* (Boston, 1955); G. Barraclough,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1965); J. Barzun, *Darwin, Marx, Wagner* (Boston, 1941); C. E. Black and E. C. Helmreich,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 A History* (2nd ed., 1963); A Bullock, *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 (Evanston, Ill., 1964); H. Butterfiel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1952); E. H. Carr, *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1951);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6 vols., 1962); I. Deutscher,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49); A. Eddington, *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World* (1929); J. E. Edmonds, *A Short History of World War I* (London, 1951); A. Einstein, *The World as I See It* (1949); E. Eyck, *A History of the Weimar Republic* (2 vols., Cambridge, Mass., 1963).

H. Feis,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The War They Fought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 (Princeton, 1957); E. Fischer, *The Euro pean Age* (rev. ed., Cambridge, Mass., 1948); J. K. Galbraith, *The Great Crash*, 1929 (Boston, 1955); K. Heiden, *Der Führer* (Boston, 1944); Q. Howe, *A World History of Our Own Times* (v. 2., 1953); H. S. Hughes. *Contemporary Europe: A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N.J., 1961); G. Hugnet, *Fantastic Art, Dada and Surrealism* (1949); I. Kirkpatrick. *Mussolini: Study of a Demagogue* (London, 1964); H. Kohn, *The Twentieth Centuy* (1950); A. W. Levi, *Philosophy and the Modern World* (Bloomington, Indiana, 1959); E. Lyons, *The Red Decade* (Indianapolis, 1941); A. J. May, *Europe and Two World Wars* (1947); R. B. Nowat, *The Concert of Europe* (London, 1930); L.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1963); B. Nelson (ed.), *Freud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57); E. Nolte, *Three Faces of Fascism* (tr. by L. Vennewitz, 1966); R. R. Palmer and J. Colton,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1956); E. A. Peers, *The Spanish Tragedy, 1930-1936* (1936); R.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rev. ed., Cambridge, Mass., 1964); C. Sforza, *Contemporary Italy* (1944); W. L. Shir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1960); L. L. Snyder, *The War: A Concise History, 1935-1945* (1960); H. Thomas,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61); A.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1947); D. Treadgold,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Chicago, 1964); A. B. Ulam, *Lenin and the Bolsheviks* (London, 1966); F. P. Walters, *A Histo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52); D. C. Watt, F. Spencer, N. Brown,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68); A. N.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1925); C. Wilmot, *The Struggle for Europe: World War II in Western Europe* (1952); B. Wolfe, *Three Who Made a Revolution* (1948).

R. Albrecht-Carrié, *One Europe* (1965); L. Barzini, *The Italians* (1964); R. A. Butler, ed., *The New Conservatism* (1964); *Daedalus* (Winter, 1964), "A New Europe?"; M. Djilas, *The New Class* (1957); M. Duverger, *Le Cinquième Rèpublique* (Paris, 1959); R. Guardini, *The End of the Modern World* (1957); J. Gunther, *Inside Europe Today* (1962); S. R. Hopper, ed., *Spiritual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52); J. Huxley, *The Human Crisis* (1963); H. Kohn, *The Mind of Germany* (1960); G. Lichtheim, *The New Europe* (1963); R. Macrides and B. Brown, *The de Gaulle Republic* (Homewood, Ill., 1960, 1963); G. Marcel, *Man against Mass Society* (1952); K. Minogue, *The Liberal Mind* (1963); H. Morgenthau, *Germany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Chicago, 1951); F. Nourissier, *The French* (1968); M. Oakeshot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1962); J. Ortega y Gasset, *The Modern Theme* (1961); G. Orwell, 1984 (1949); *The Animal Farm* (1954); H. Peyre, *French Novelists of Today* (1967); D. Pickles, *The Fifth French Republic* (1960); J. J. Servan-Schreiber, *The American Challenge* (1968); C. P. Snow,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 N.Y., 1959); W. Stahl, *The Politics of Postwar Germany*(1963); W. Stankiewicz,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World War II*(1965); P. Teilhard de Chardin, *The Future of Man* (1964); D. Thompson, *Democracy in France* (1952); R. M. Weaver, *Visions of Order: The Cultural Crisis of Our Times* (1965); A. Weber, *Farewell to European History* (1946); R. Wellek, *Confrontations* (1965); A. Werth, *France* 1940-1955(1956); P. Williams, *Politics in Post-war France* (1954).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欧洲文学的背景
作者＝
页数＝３７１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Ｖｓｓ号＝７０７５４５２１